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理论渊源、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

周春辉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第三次历史飞跃,从“理论渊源”“价值内涵”“实践路径”三个层面深入研究。首先,在理论渊源层面,从个人维度、历史维度、国内外环境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其次,在价值内涵层面,注重对一些核心问题、重要概念、治国理政方略开展系统解读;最后从理论研究层面落脚到“如何实践”层面,真正有效推动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治国理政;实践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01

中图分类号:D61;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01-05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通过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都没有取得成功,归根结底就是没有先进的理论做指导。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从此中国革命便有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后,无数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程中,党的百年奋斗坚持理论创新、理论创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飞跃。第一次飞跃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飞跃是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理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中国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2]也是马克思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第三次历史飞跃。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习近平领袖特质是新时代伟大理论产生的根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也与习近平同志数

收稿日期:2021-12-28

作者简介:周春辉(1962—),男,河南温县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党建思政、传统文化。

十年的成长经历、家庭境遇、实践摸索和理论思考紧密相连。首先,习近平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有深厚的优秀文化积淀。习近平同志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大,阅读过大量的传统文化著作,对古诗词、典故很有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精神因素影响很大。从2012年当选总书记至今,他几乎在每次讲话中都引经据典、以古喻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始终把爱党、爱国放在第一位,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其次,习近平同志在独特的、丰富的个人经历中,对中国社会有全面了解和真切关爱。习近平同志不到16岁就去陕北插队当农民7年,作为“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的知青”^[3],他了解基层情况,了解中国国情,关心百姓生活,体恤百姓疾苦,有强烈的平民意识。这使他形成了讲实话、办实事的工作作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反对腐败,主张走共同富裕之路,遏制贫富差距拉大。

(二)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探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现代化强国方面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也吸取了不少惨痛的教训。从经济特区、经济新区到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从干部队伍“四化”建设、到基层民主、协商民主的发展;从维稳性的社会管理到协商合作的社会治理;从一味学习别国经验到“四个自信”;从低端技术的仿造到高科技的自主研发;从单一的经济大国到全方位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改革开放各种成功的经验层出不穷。这些宝贵经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学习和借鉴,中国未来要发扬光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反腐、精准扶贫、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式方法,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缩小贫富差距、塑造美丽中国、弘扬中华文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擘画了今后几年奋斗的目标是人民生活更为宽裕,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这些生动的实践,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与发展需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催化剂

我们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可是问题也越积越多,有些问题到了非常棘手的程度,甚至影响到党的形象和执政能力。习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采取果断措施,建立了多个新的领导小组,把分散的高层领导权集中起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出台“八项规定”,采取一系列加强党纪政纪建设措施,严厉惩处一切腐败分子,整顿党的队伍,纯洁了党的组织,净化了社会风气,有效遏制了腐败的蔓延,提升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在国际事务方面,由于过去我国综合国力较弱,在全球性、国际性、区域性、多边和双边等国际事务中影响力有限,呈现出非常被动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运筹帷幄,更加主动地制定一系列全球、国际和区域外交新战略、新政策,开展一系列主动的外交活动,积极开拓中国的外交空间,实现了在综合国力提升的同时,构建起世界新秩序下的新型外交关系。指导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催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这个重大判断,既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总体上已经不再落后,尽管还不是制造强国,但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我们国家在很多领域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比如建筑(建隧道、高铁、填海、高楼大厦、桥梁),现在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比如航天、计算机、通信、互联网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与此同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不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有了更高的追求、更好的希望,而我们现在面临的的就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还不能满足这个需要。比如,人们盼望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人们盼望孩子们都能够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人们盼望幼有所育、弱有所扶,人们盼望我们这个社会到处充满公平正义等等。显然,我们在环境、生态、社会建设、民生等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判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至少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它提醒我们,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补短板、强弱

项上,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继续努力。第二,它要求我们调整发展战略和大政方针,从而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就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内涵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突出、一以贯之的主题,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是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金钥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论断、重要思想。比如,用“中国梦”形象生动地表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作出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描绘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坚守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认识成果,最根本的规律总结;强调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强调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丰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指南。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系统的内容体系,即“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概括和战略指引,其主体

内容体系可概括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八个明确”偏重于理论层面的高度概括和凝练,集中反映着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今时代的理论思考和理论贡献。“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偏重于实践层面、方略层面的展开,涵盖坚持党的领导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涵盖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对外战略,涵盖此前提出的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是对党的治国理政重大方针、原则的最新概括,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要求。“八个明确”与“十四个坚持”有机融合、有机统一,凝结着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凝结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拓展、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四梁八柱”,有力撑起了整个体系的宏伟大厦。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是指导我们党治国理政、执政兴国的科学理论体系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条件下创立并不断发展的,也正是由于这一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开启和引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蓝图,又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明确了“路线图”“时间表”。既从宏观上擘画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又从中观、微观层面对实现总体布局 and 战略布局进行周密部署,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战略和战术相一致、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路径

(一)开展主题教育,让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全党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

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中央政治局带头,一场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自上而下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党内突出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在这场“触及灵魂”的政治洗礼中，广大党员、干部精神上补了“钙”，铸牢了群众观点，站正了群众立场。“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会所中的歪风”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无所遁形。我们党始终“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2]，中央相继出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公务用车改革等一系列制度，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牢。

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以践行“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为主题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对党员干部在思想、作风、党性上又一次集中“补钙”“加油”。“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聚焦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基础上，对领导干部修身做人、干事创业提出进一步要求。经过近一年的集中学习，“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激发了各级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活力，有力推动了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等各项工作，也让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我们党管党治党、实干兴邦的决心和胆识。

2016年2月以来，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并将其常态化、制度化，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基层延伸。党内教育并不止于领导干部，治党需要从严，而更关键在于全面。“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定位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通过“学”与“做”，让每名共产党员铭记身份、牢记誓言，时刻对照“四讲四有”，正己修身，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中锤炼党性，坚守初心。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2019年5月31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总要求是“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目标是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重要内容是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牢记党的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转变作风，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努力取得最好成效。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全党的教育提高一刻也不能放松。2021年2月20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5]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每名党员只有坚持以知促行、以行促知，活到老改造到老，才能对党知之更多、认之更深、爱之更笃，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提高党性修养，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永远在路上。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如果说延安整风是党的建设史上保证党的纯洁性、提高战斗力的关键阶段，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抓住思想教育这个根本，通过一次次环环相扣的主题教育，让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全党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补足精神之钙，让我们党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这是我们党前进道路上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必将是我党建设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结合具体实践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要真信、真学、真用。真信是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回答当代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科学理论，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真理性。真信是我们认识世情、国情的思想武器，是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方案。比如改革的问题、发展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民生的问题、廉政和反腐败的问题等等，习近平总书记都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和方案，是实现“中国梦”的行动指南，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所以我们要真信。

真学也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学,原著要认真地读,专题要认真研究,观点要认真领会,而不是去装点门面做样子。真用,就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指导工作。

要敢于担当,努力奋斗。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各级党组织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责任担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之一,也是贯穿体现在十九大报告精神其中的一个闪光点。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广大青年朋友:“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6]年轻干部要牢记总书记教诲,把个人的奋斗目标与党的事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克服困难,敢闯敢试,努力干好工作,真正做到对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负责。

要有人民至上的情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满着人民至上的情怀,强调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就高校而言,就是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解决好师生最关切的问题。

要坚持问题导向。这是我们做工作、抓发展、搞管理的基本方法,也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法。应当根据我们所面临的认知问题、作风问题、教学管理问题、抓整改落实

实的问题,认真地学习和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有关教育的指示,有力地推动各项工作。

要结合工作突出重点。“四有”好老师、“六要”新要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工作者的谆谆教诲,我们要认真对照,努力践行,突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弘扬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道德滋养,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言传与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更要涵养奉献精神,把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志趣爱好作为终生课题,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接班人。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3]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
-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求是,2021-04-16.
-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吕志远)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Values and Practice Approache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ZHOU Chunhui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s the third historical leap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an be intensively studied at three levels: theoretical sources, values and practice approaches. The first level study consists of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history and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The values of Xi Jinping Thought focuses on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core issues, significant concepts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Theoretical research eventually serves for practice, that is, how to effectively promot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the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to be the ideology in people’s heart and soul.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Marxist governance; practice approach

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逻辑、内在逻辑与价值逻辑

钱昌照^a, 刘宇岚^b

(北方工业大学 a. 组织部; b.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44)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青年工作提出许多重要论断,深刻解答了“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这一重大命题。习近平青年观以青年工作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为基本遵循,表现出具有唯物辩证规律的内在逻辑,在指导新时代青年工作的过程中彰显时代价值,实现了生成逻辑、内在逻辑与价值逻辑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习近平; 青年; 生成逻辑; 内在逻辑; 价值逻辑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02

中图分类号:D4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06-06

习近平青年观是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青年工作思想理论体系,本质上呈现出自洽有机衔接的逻辑体系结构。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逻辑与内在逻辑服务于价值逻辑,价值逻辑科学印证生成逻辑与内在逻辑。生成逻辑、内在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多维衔接、辩证统一,深刻解答了“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这一重大命题。

一、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青年观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关青年思想以及一代代青年投身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青年工作思想。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发展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渊源,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青年工作思想为理论源泉,以新时代青年工作的伟大生动实践和习近平青年时期人生经历为实践基础,不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青年工作思想的新境界。

(一) 历史逻辑

习近平青年观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并滋养着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发展,使其在适应时代发展的同时具备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习近平指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1]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青年品德修养、为人处世、敬亲爱国等诸多方面有大量论述,对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青年的论述主要呈现出个人处世、家庭亲友和国家天下三个层面的内涵。在个人处世层面,长期居于封建社会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提倡青年要立大志,“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做学问要认真严谨,“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还要“温故而知新”。遭遇挫折和失败的时候,要“不怨天,不尤人”,应该“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周文王提倡青年要效仿天地万物运行,做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家庭亲友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儒家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对待父母,不仅要深知“父母为其疾之忧”,而且要“无违”。对待好友,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他人相处,要“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国家天下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和经世济民之心,从心忧天下苍生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收稿日期:2021-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高校青年思政课教师政治认同的内在机理与实践取向研究”(20VSS116)

作者简介:钱昌照(1977—),男,湖北黄梅人,博士,北方工业大学组织部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

乐而乐”的情怀、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时“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壮志，到内忧外患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思，再到报国无门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豪情，再到士大夫慎独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哲学，无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抑或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都无不体现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尽管受不同历史时期朝代更替、主流思想变化等因素影响而产生了不同形式的表述，但最核心的爱国、救国情怀却从未间断。家国情怀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亘古不变的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等诸多场合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论述对青年提出殷切期望，构成了习近平青年观的鲜明特色。

（二）理论逻辑

理论是在历史的基础上产生并不断发展。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和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青年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思想为指引，具有完备成熟的理论体系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肯定了青年在时代发展当中的巨大作用和突出地位。马克思主义不仅看到了青年一代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作用，而且还强调青年工作直接关系到现在与未来。马克思表示：“拥护他们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2]马克思充分肯定了青年一代在未来的发展潜力和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巨大作用和突出地位；此外，马克思高度重视青年工作，他说，工人阶级乃至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3]。马克思将青年工作的重要性提升至决定未来的高度，恩格斯则将青年与现代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指出现代的命运“取决于青年崇高奔放的激情”^[4]。列宁阐明了青年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过程中的重要性，“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有青年来担负”^[5]，“不吸收全体工农青年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你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5]。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和培养，对青年的培养方式、教育内容等方面都有详尽的阐述。早在1869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记录》中说到，“年轻人应当在日常生活斗争中从成年人那里获得这种教育”^[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和实践的工艺教

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7]。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既使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得到保障。”^[8]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详细阐述了青年的发展权利、实现路径和奋斗目标等。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指出，选择职业应遵循“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两个主要远大理想目标，并阐述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强调：“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到，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9]在青年的人生发展问题上，了解青年特性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列宁曾强调，“青年总是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的，青年总是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的”^[10]，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青年工作的论述突出了青年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也再次彰显出青年工作的重要性。

（三）实践逻辑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民族危难、国家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积极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之中，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进行了艰辛探索，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英勇就义，李大钊、陈独秀等青年知识分子苦苦求索，在诸多救国方案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反抗民族屈辱条约中，北京广大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运动中，杨靖宇、赵一曼、陈树湘、刘胡兰等革命先烈，为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新中国成立以后，诞生了“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老西藏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等伟大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广大青年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许多杰出贡献，对新时代青年人的价值取向和习近平青年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工作，促进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发展。随着信息化革命的不断深入，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对青年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以发展的理念审视青年工作，不断推进青年工作的创新性实践：一方面，亲自关怀并指导青年工作。习近平先后视察了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澳门大学、贵州省机械工业学校、南昌大学、国防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陆军步兵学院、内蒙古大学、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培黎学校、西安交通大学、空军航空大学、湖南大学、闽江学院、清华大学等 20 余所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对青年成长成才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中表现卓越的青年们回信，肯定他们甘于无私奉献并勉励他们矢志不渝。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召开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给全国青联和学联的会议致贺信等，对青年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另一方面，注重对青年工作“四梁八柱”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将教育视为对民族振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将青年发展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总体部署青年工作，引导青年与民族同命运、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齐发展。

习近平的青年时期成长经历是习近平青年观生成发展的重要实践来源。陕北七年知青经历是习近平青年观的逻辑起点，在陕北梁家河插队时，他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水乳交融，逐步认识到实事求是和贴近群众的重要意义，树立起为群众办实事的理想信念。七年知青岁月深刻影响了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方略，他在河北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时就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是振兴正定所依靠的生力军”^[11]，他带领群众解决温饱、发展经济，以自身的行动证明青年的担当作为。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为当地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体现出锲而不舍的韧劲、实干兴邦的精神和一心为民的信念。在浙江任职期间，习近平的多项大刀阔斧的改革解决了经济发展与当地社会民生问题，这一时期他关注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和青年干部的基层锻炼经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促进当地青年的发展进步。习近平的基层工作经历涵养了他的治国理政理念，教育青年肩负历史重任、引领青年成长成才，为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习近平青年观的内在逻辑

（一）政治性和人民性相结合

习近平青年观具有政治性和人民性相结合的内在逻辑，政治性体现为青年工作要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致，人民性则表现为青年个体成长与人民

发展、社会进步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引导青年担当时代使命，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12]。青年群体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中坚力量。“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13]^[14]因此“广大青年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14]，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将个人理想融入实现中国梦的共同理想之中，“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14]。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成长与人民发展同向而行、与社会进步同频共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工作之于社会和人民的意义作出深刻阐释，他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指出“青年要在提高为社会、为民众服务水平中建功立业”^[13]^[53]。习近平还同时强调青年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14]。做好青年工作的政治性能够确保青年群体为人民服务，即确保青年工作的人民性；反之亦然，做好青年工作的人民性就是在践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即确保青年工作的政治性。

（二）民族性和开放性相呼应

习近平青年观具有民族性和开放性相呼应的内在逻辑，民族性体现为青年工作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开放性表现为青年群体与世界互联互通互通互融的重要意义。

就民族性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引导青年厚植民族主义情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青年群体要“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15]，民族主义情怀包括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许多重要论述都将青年的成长成才与二者联系在一起，而二者兼备亦是青年群体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多种形式内化在习近平青年观中，彰显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就开放性而言，全球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等发展趋势势不可挡，国家繁荣和世界和平都离不开青年一代的努力。习近平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有家国情怀，也要有人类关怀”^[16]，出访俄罗斯时提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世界的未来，也是中俄友

好事业的未来”^{[17]277},谈及中非关系时号召“中非有志青年共同接续奋斗”,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提倡为互联网时代的各国青年提供创业平台等,着重强调青年工作的开放性、世界性。民族性和开放性相呼应,畅通本土与国际之间的联系。中国梦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共产党也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而这一切需要广大青年群体的赓续奋斗。

(三)历史性和现实性相贯通

习近平青年观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相贯通的内在逻辑,历史性表现为鼓舞青年学习历史、强调青年的历史贡献,现实性表现为现实环境对青年工作的影响。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岳麓书院等地视察时多次强调青年要了解并运用历史文化,他在庆祝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对青年提出要求,“全国广大青年要深刻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历程”^{[13]54}。学习历史可以为青年的成长成才指明方向并提供启示,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青年不仅要学习历史,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此外,广大青年更是历史的创造者。习近平指出,“没有广大人民特别是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持续奋斗,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16],充分肯定了青年近代以来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当前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青年工作需要顺应并引领时代潮流。

因此,青年工作需要适应现实环境,抓住机遇顺势而上并恰当规避风险,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力求新的突破。习近平青年观兼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特征,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进现实和未来,而透过现实亦可反思历史,进而对现实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习近平青年观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党青年工作的伟大生动实践。

习近平青年观的理论性在于:一方面,习近平青年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青年工作思想的核心要义,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体现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另一方面,习近平青年观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有机

整体,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且可以从理论角度将其内容以不同方式做进一步细分。此外,也正是源于习近平青年观的理论性,才使其充分具备学术上的研究意义。习近平青年观的实践性表现为三点:一是来源于实践。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青年工作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期个人成长经历是习近平青年观的重要实践基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的动力,习近平青年观是在实践中萌发、发展并逐步趋于完善的。二是鲜明指导实践。习近平青年观是适应新时代青年群体和青年工作特点的理论体系,为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指引,可以直接应用到青年工作中,实现指导实践的目的。此外,习近平青年观的真理性也在其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检验。三是强调实践的意义。习近平指出:“不论学习还是工作,都要面向实际、深入实践,实践出真知;都要严谨务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苦干实干。”^[15]根据实践的观念,他还强调思政课要将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日常思政工作与思政课程同频共振;团干部要向实践学习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

三、习近平青年观的价值逻辑

(一)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青年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习近平青年观的价值逻辑首先体现为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青年观强调青年工作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致,接受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接受党的教育,才能保证青年工作的发展进步与党和国家保持一致。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在青年群体和青年工作中的统帅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是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内容,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领导,此外,还强调党政齐抓共管和党员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习近平强调青年工作要围绕党的事业展开。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他提出“广大团员青年坚定跟党走,就是初心”^{[13]87}，“共青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16]等观点,充分论述了加强党的领导过程中的青年责任。

(二)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青年工作理念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加强党的领导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青年工作理念是习近平青年观的价值逻辑内核。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青年工作要以人为本,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以人民为中心”在习近平青年观的价值逻辑中体现为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中心。习近平青年观具有人民性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将人民的幸福视为当代中国青年必须和必将承担的重任之一,他多次阐述青年对于全体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重要意义,多次号召青年要热爱伟大的人民,“人民”这一字眼贯穿在习近平青年观中,已然成为其关键词。另一方面,以青年群体为中心。青年群体不仅是习近平青年观的关注对象、青年工作的服务对象,更是广大人民群众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最富有朝气的青年群体必然是创造历史进程中的中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年工作中主张以青年群体为焦点,他指出,全党要“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13]108},号召全党服务并引领青年,使青年工作发挥传承根脉又面向未来的作用。

(三)提高青年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

思想道德修养是青年发挥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基础,青年成长成才需要高尚的人格和道德品质,习近平青年观在价值逻辑上对青年思想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青年思想道德修养水平对个人成长的作用,还强调其对社会国家的决定性意义,“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上”^{[13]21-22}。因此,习近平青年观号召青年群体坚定理想信念、提升个人修养,专注于公德和私德,巩固和培养勤俭节约、宽容感恩、助人为乐、自省自律等优秀品格,他要求广大青年“时常用真善美来雕琢自己,不断培养操行和纯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18]。进一步而言,提升思想道德修养水平需要一定的价值遵循,在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品德的基础之上,习近平青年观要求青年群体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将价值观养成比作穿衣服扣扣子,而青年的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则是扣好最关键的“第一粒扣子”。“广大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养成高尚品格”^[19],他号召青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身的基本遵循,并

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心,带头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此外,他再三强调学校要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实到教学 and 实践中,进而促进青年思想道德修养水平的提升。

(四)引领青年坚定完成“中国梦”的责任感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青年群体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力量,实现“中国梦”是党的重要时代使命,习近平青年观要求全党引领青年完成使命,号召青年以完成使命为己任。

习近平青年观要求全党引领青年坚定完成中国梦奋斗的责任感,发挥青年群体在这一进程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习近平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14],凸显出青年的理想担当对完成“中国梦”奋斗目标的关键意义。“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20]青年将实现“中国梦”作为远大理想,可以加强实现该目标的理想信念和责任感,因此青年群体应当志存高远、勇担重任。在习近平青年观价值层面的引领下,青年群体已经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进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面对严峻的新冠疫情防控局势,习近平再次高度赞誉中国青年的风采和担当,号召青年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坚定理想信念:“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20]

(五)锤炼青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硬本领

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青年群体,习近平青年观不仅对青年群体的责任担当提出要求,更要锤炼青年实现中国梦的过硬本领。

锤炼实现中国梦的本领并非与生俱来:一方面,需要青年锲而不舍地进行系统学习,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习近平指出,“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14],对学习之于青年的重要性做出阐述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学习基础知识又要及时更新知识,既要钻研理论又要掌握技能,因此青年的学习是一个长期而深入的

过程。另一方面,实现中国梦的本领需要青年在实干中不断积累和磨炼。如前所述,习近平青年观具有实践性的内在逻辑,锤炼实现中国梦的本领需要实干,是实践性在价值层面上的体现和应用。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提出“在工作中增长才干、练就本领”,就是在强调加强实干与提升本领的正向关系。青年通过实干可以不断增长见识和才能,锤炼自身的过硬本领,通过学习获取的知识本领也需要通过实干不断巩固,形成自身见解的同时不断内化,进而为青年群体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积蓄力量。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44.
- [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青年[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64.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17.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75 - 176.
- [5] 列宁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55.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1 - 562.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9.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 - 7.
- [10] 列宁选集:第 6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6.
- [11] 习近平. 知之深 爱之切[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66.
- [1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2017 - 10 - 28(01).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4] 习近平. 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3 - 05 - 05(02).
- [15]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 - 05 - 03(02).
- [16] 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9 - 05 - 01(02).
- [1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18] 习近平. 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7 - 05 - 04(01).
- [19] 习近平. 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 - 04 - 30(01).
- [20]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 - 07 - 02(02).

(责任编辑 林川)

The Generative Logic, Internal Logic and Value Logic of Xi Jinping's View on Youth

QIAN Changzhao^a, LIU Yulan^b

(a. The Party Committe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b. School of Marxism,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4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put forward many important remarks on youth work, and profoundly answered the major proposition — what kind of youth to train in the new era and how to train youth. Xi Jinping's view on youth is based on the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youth work, showing the inherent logic of dialectical law, highlighting times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guiding youth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realiz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generation logic, internal logic and value logic.

Key words: Xi Jinping; youth; generative logic; internal logic; value logic

语境与纲领

——别林斯基主笔阶段的《现代人》研究

耿海英

(上海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44)

摘要:别林斯基执笔《现代人》之时,俄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要求进行变革。就如何改革、如何对待西欧道路问题,别林斯基遭遇的是不同阵营的声音。面对保守力量,别林斯基因应最尖锐的农奴制度问题,为自己也为《现代人》提出新的纲领:从19世纪40年代早期空泛的乌托邦幻想转向俄国现实问题。基于官方有改革的动议,因而别林斯基的纲领也并非激进的“革命”,而是欢迎“变革”,倡导启蒙,这些都反映在《现代人》的栏目中。

关键词:别林斯基;《现代人》;语境;纲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03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12-09

苏联涅克拉索夫研究专家弗·叶甫盖尼耶夫-马克西莫夫认为,“无论从社会学还是文学史观点看,1847—1848年的《现代人》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1]。这两年正是别林斯基主笔《现代人》阶段。40年代后期《现代人》改变了风格和方向,从普列特尼约夫手中的温和保守的刊物转变为19世纪上半叶积极对社会问题作出反应的杂志之一。何以有如此转向?杂志内部立场是否完全统一?这种改变仅仅是因为别林斯基个人的风格与倾向?或者,这是一个偶然现象?这一时期的《现代人》面临什么样的语境?它要回应什么问题?遵循怎样的纲领?这些也许都是研究这一时期的《现代人》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别林斯基主笔阶段《现代人》的语境

如果说这一时期《现代人》的转向是一个偶然现象,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又能得到完全自然和必然的解释。我们在整体考察涅克拉索夫主编《现代人》时期的文章中提到,1847年别林斯基加盟《现代人》,立即成为刊物的精神领袖,他确定了杂志的新方向——聚焦社会问题,以研究现实为第一要务。

首先看经济现实。19世纪30—40年代俄国对外粮食贸易增长,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徭役经济发生危机。而且就在1847年经济增长是最显著的一年,正是这一年粮食出口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根据俄国《农业报》1847年9月12日的报道,在1846—1847年,从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粮食就达32,891,622银卢布(见图1)

ОТПУСКЪ ХЛѢБА ИЗЪ РОССІИ	
въ 1846—47 г.	
По случаю значительнаго неурожака во многихъ странахъ Европы, въ прошедшемъ году, отпущено туда изъ Россіи хлѣба всякаго рода, по объявленнымъ цѣнамъ, на 32.891,622 руб. сер., въ томъ числѣ:	
Пшеницы	3.171,756 четв. на 21.901,976 р. с.
Рапи . . .	1.708,401 8.517,967
Ячменя . .	81,882 247,194
Овса . . .	362,442 931,724
Кукурузы	65,145 237,134
Гороха . .	24,946 180,974
Крупъ . .	— 35,983
Муки . . .	— 707,580
Разнаго хлѣба . .	— 41,090
Итого . .	32.891,622 р. с.

图1 截图自1847年9月12日《农业报》

收稿日期:2022-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1836—1866)”(17AWW005)

作者简介:耿海英(1964—),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与翻译30余年。

与此相关,1847年来到波罗的海和黑海港口的贸易船只的数量与上年度相比几乎翻倍,特别是1847年彼得堡港口尤其繁忙,这样,1847年就比任何一个时期更尖锐地提出了“地主庄园”向“谷物工厂”转变的问题,同时也是徭役劳动最无利可图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必须废除农奴制度的问题。因此,尼古拉一世1847年5月18日在接待斯摩凌斯克贵族代表团时,以从未有过的坚决态度表示,要尽最大可能加快解决农奴问题。可是如果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然导致社会集团斗争的激化。一方面,地主阶层并不情愿彻底解放农奴。列·托尔斯泰本人在自己庄园中先行的不彻底解放农奴的改革试验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他的作品《一个地主的早晨》更清晰地表明农民对改革的懈怠和不接受。另一方面,农民阶层在农奴制下被地主阶层极端、无节制地剥削,到了赤贫的极限;他们开始越来越强烈、经常地表达自己的不满。1845年至1849年农民起义达到200多次,这些起义常常带有非常恐怖的特点,而官方常常用武装力量来平息。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现实是:40年代思想领域的斗争也加剧了,文学即是其舞台,尤其在新闻刊物上,各个斗争集团纷纷在这里出场,不是打着西欧派的旗帜,就是打着斯拉夫派的旗帜,或者官方民族性的旗帜。

其一,西欧派。这是自由派贵族和自由派资产者以及当时人数还不多的激进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期望俄国生活的欧洲化——首先是将个人从政治和社会奴役中解放出来。因此,西欧派对“邪恶的俄罗斯现实”,即专制、警察官僚政权、农奴制等,持激烈的否定态度。“邪恶的俄罗斯现实”正是别林斯基用来标识俄国专制制度的。他在1840年10月4日给鲍特金的信中写道:“我诅咒我与可恶的现实和解的可恶的愿望!”^{[2]556}1841年5月1日,同样是在给鲍特金的信中他又写道:“俄国现实是可恶的,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是对它的一记耳光。”^{[3]25}西欧派的左翼倾向于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自然来自平民阶层的西欧派对革命思想最易于接受。别林斯基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布尔加林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无神论”的布道在“每天大量增长的阶层——军事学院、神学院学生,贫穷的小官吏的孩子等人群——中尤其获得成功,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反而在转变中有希望获得一切”^[4],他没有说错。这里所说的西欧派对社会主义的狂热追随,当然指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安年科夫和谢德林多次讲到,40年代人们对圣西门、卡

贝(Кабэ)^①、傅立叶,路易·布朗(Луи Блан)^②,尤其是对乔治·桑的作品特别迷恋;透过约瑟夫·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我们也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身经历中,看到“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狂热和波及的范围之广。毫无疑问,对这些“空想社会主义”人物及著作的熟悉极大地促进了读者的社会视野,使他们关注社会的基本问题,如正确组织公共关系、平等分配生活福利、贫穷和财富、劳动和资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然而,由于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在严厉批评社会现实时,他们只指出了乌托邦式治疗社会之恶的方法,过分迷恋他们的理论带有危险的一面:它不仅脱离了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更令人们从现实问题分心,憧憬“黄金时代”的美好梦想,甚至到后来采取激进方式去实现这一梦想。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年代以后的创作全部都是献给这一思考的。曾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小组的谢德林也精彩地描述这一渴望,他从这一社会乌托邦小组的纲领中提出关于“黄金时代”、关于社会和谐的可能性,一切“不是在我们身后,而是在我们前面”^[5]。如果说这还是“空想社会主义”,那么,“科学社会主义”也已经发表其宣言:《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出版^③,不言而喻,至少它对当时的俄罗斯读者来说是熟悉的。之后,为这一“黄金时代”之目的,人成了手段。

因此,1840年代后半期包括别林斯基在内的相当一部分西欧派知识分子背离乌托邦社会主义立场,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在其中能够看到对待生活的务实态度战胜了理想主义态度,为改变现实而应进行具体有效的行动的思想 and 方针占了上风;然而,具体行动并不是许诺不久的将来的“黄金时代”,而是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创造先决条件。这些方针,在别林斯基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中得到了非常明确的阐明:“俄罗斯的拯救不在神秘主义,不在禁欲主义,不在虔信主义,而是在文明、启蒙、人道的成功……俄罗斯现在最紧要最迫切的民族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废除体罚,尽可能严格执行已经存在的法律。”^{[6]582-583}此信写得如此之尖锐、热烈和激情,简直就是一种要革命的印象,因而到60年代,车、杜从他这里汲取“革命”资源也很自然,列宁在其论《路标派》的文章中,将该信与反抗农奴制的革命情绪联系起来也不足为奇。

尽管在1840年代西欧派在共同赞成废奴上是一个“统一战线”,但他们分属不同阶层,阶层上的异质性导致他们在60年代初解体,从其队伍中分化出俄国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模式的“普鲁士道路”

的支持者和“美国道路”的支持者^④，前者的纲领是“和平改革”，后者的纲领是“民主革命”。这种倾向上的差别在40年代已露端倪。后者的对立面即是那些旧秩序的思想家们——他们代表两个群体，虽然两个群体的社会经济观点不同，但在意识形态上仍然相当接近。一是老一代斯拉夫派（指霍米亚科夫、基里耶夫斯基、康·阿克萨科夫），一是“官方民族性”活动家（舍维廖夫、波戈金）。他们有共同的信念：俄国命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俄国不仅可以赶上而且可以超过西欧——“腐朽的西方”（这一社会思想的代表们如此表述西方，也有表述为“老太太式的欧洲”^⑤）。斯拉夫派将正教、专制和民族性视为俄国独特性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官方民族性”圈子的主张相一致。不过，不同圈子赋予这些概念的内涵并不总是相同。比如，“专制”一词，斯拉夫派在这一概念中融合了“全俄缙绅会议”（земский собор）因素，它能够促进“沙皇与人民的统一”；还融合进了“言论自由”因素，允许人民表达自己关于当下一切问题与现象的见解。此外，实质上斯拉夫派甚至固有某种“封建社会主义”的社会倾向——其精神在《共产党宣言》（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манифест）中明确描述过。而在“官方民族性”代表们的观点中，则失去了斯拉夫派所具有的捍卫自由的色彩。然而，认为斯拉夫派圈子与“官方民族性”尖锐对立，也未必正确。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文章《波戈金与阶级斗争》中指出：“霍米亚科夫的斯拉夫主义与《莫斯科人》的出版人（即舍维廖夫——笔者）的‘官方民族性’在那一根本问题上吻合的，即在俄罗斯对待西方的态度上。换句话说，霍米亚科夫的斯拉夫主义与波戈金和舍维廖夫的‘官方民族性’能够相区别的仅是某种看得见的特征，但是这两种学说具有同样的始祖。”^{[7]30-31}

如果从社会学角度考察斯拉夫主义与“官方民族性”，问题将会更简单——斯拉夫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大、中封建贵族的意识形态，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庄园中，接受的是过去严格的爱国主义和父权制宗教精神的家庭教育。即便是农奴的儿子波戈金宣称的“官方民族性”纲领，也表达了贵族和官僚高层的意识形态，他们部分地构成了宫廷贵族圈子，他与之关系密切。刊登在1841年第1期《莫斯科人》上的波戈金给舍维廖夫的一封信即表明了这一点。该信题目为《俄罗斯人对欧洲教育的看法》，堪称一篇纲领性文章，其中“天然的俄罗斯情感”（即“官方民族性”的核心内涵）与“病重的西方的堕落”尖锐对立。

波戈金信中说：“我给你写信谈谈你的杂志。它在高层产生反响。这简直是个奇迹：所有人都阅读和赞叹，斯特罗加诺娃公爵夫人（Графиня Строганова），维耶利戈尔斯基（Вьельгорский），普罗塔索夫（Протасов），巴兰特（Барант），乌瓦罗夫（Уваров）……你的欧洲简直是疯了。”“所有这一切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舍维廖夫的‘观点’正是‘高层圈子’的观点。”^{[7]30}舍维廖夫和波戈金对待西方的否定态度，再没有在《观点》一文中表达得这么尖锐了。乌瓦罗夫对此文万分欢喜；斯拉夫派的理论家霍米亚科夫则称舍维廖夫的文章相当出色^{[7]30}。可见斯拉夫派圈子与“官方民族性”的相通之处。

还有，如果杂志三巨头^⑥《北方蜜蜂》《祖国之子》《读者文库》也可以称为一股社会潮流的话，那么这股社会潮流比“官方民族性”圈子和斯拉夫派走得更远。他们三家既强调自己对俄罗斯之根的忠诚，但干的却完全是社会订货，不仅远离地主阶级，也远离贵族阶级，三巨头著名的文学民主主义立场就源于此。但其民主主义是非常特定的，与其说是内在的，不如说仅是外表的，而且还是完美地完成第三庭的各种“任务”，布尔加林尤其如此。

显然，40年代的西欧派，既与斯拉夫派，也与“官方民族性”代表，还和“三巨头”之间形成对立与论争，而其在论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即是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在1842年第3期《祖国纪事》上的讽刺文《书呆子》^⑦回应舍维廖夫在1842年1月号《莫斯科人》上的《对当代俄国文学倾向的看法》对自己的恶毒攻击。这一讽刺文使得舍维廖夫闭锁在家，一个星期没有在社交界露面；同时，讽刺文不仅在《莫斯科人》圈子，而且在斯拉夫圈子中也激起对别林斯基的仇恨。鲍特金说：“这次攻击产生了完全超乎预料的结果……在头面人物霍米亚科夫、基里耶夫斯基（兄弟）、帕夫洛夫那里如果谈起此事，就会满嘴唾沫星子地咒骂。”^[8]关于别林斯基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反响，安年科夫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格拉诺夫斯基被问：“难道这样一篇文章之后和别林斯基见面时还能公开握手吗？”格拉诺夫斯基回答说：“什么话！握手？还要在广场上与他拥抱呢！”^{[9]225-226}这样，由《书呆子》一文始，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间彻底形成了鸿沟。当斯拉夫派得知来自西欧派的攻击后，就坚决站在了“官方民族性”的舍维廖夫一边。因而也就不奇怪，此后别林斯基很快就不得不转向与斯拉夫派本身的公开论战。

别林斯基在该文中第一个攻击的就是前不久还是其最亲近的朋友的康·谢·阿科萨科夫（K. C.

Аксаков), 针对后者的单行本小册子《关于果戈理的长诗“乞乞科夫的漫游, 或死魂灵”说几句》展开反驳。他反驳阿克萨科夫对果戈理的过高评价——将果戈理视为荷马和莎士比亚一样的诗人, 并在自己的文章最后强调阿克萨科夫的意识形态立场与舍维廖夫接近, 他阐明道: “我们深信, 他的小册子与那著名的《死魂灵》‘评论’是一致的, 在著名的批评中, 谢立方被弄成了未被污染的俄罗斯天性的代表。”^[10] 别林斯基所说的关于《死魂灵》“著名的评论”, 是指舍维廖夫在《莫斯科人》1842 年第 7、8 期上关于果戈理的文章, 在文中谢立方确实被命名为天然的未及尘染的俄罗斯天性的代表, 并且尤其赞美他“热情”而“顺从”地回应老爷对他的威吓: “抽得应该, 为什么不抽呢? 主子高兴怎么办, 就怎么办, 鞭子是得抽的……为什么不抽呢?”^{[11]56} 如果对于舍维廖夫, 同样也对于斯拉夫派来说, “顺从”——也就是别林斯基认为的“臭名昭著”的“谦卑”, 是俄罗斯人民最主要的美德, 那么别林斯基则完全持另一种看法, 他作为西欧派的左翼, 越来越从温和倾向于革命, 认为“顺从”和“谦卑”绝不关涉什么美德。

1842 年开始的别林斯基反对斯拉夫派的公开论争, 在 40 年代中期更激烈了, 这是因为时代生活越来越迫使他关注社会问题, 还因为此时斯拉夫主义已经形成了自己学说的基本信条。最先的交火即 1844 年别林斯基发表的关于奥多耶夫斯基公爵的文集的著名文章^[12], 其中谴责奥多耶夫斯基明显表现出来的对斯拉夫派的好感。稍晚, 在年度观察《1844 年的俄国文学》^[13] 中, 别林斯基严厉批评了斯拉夫派和“官方民族性”的歌手——霍米亚科夫和雅济科夫。该文章的发表恰逢雅济科夫针对西欧派领袖人物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赫尔岑和恰达耶夫的“告密性”诗歌出现在莫斯科。尽管不是所有斯拉夫派人物都热情欢迎雅济科夫的诗歌, 但是从这时起, 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分歧已经尖锐到要在格拉诺夫斯基与基里耶夫斯基之间进行决斗的地步了; 尖锐到赫尔岑和康·阿科萨科夫之间断绝了任何个人关系。稍晚, 别林斯基在文章《彼得堡与莫斯科》和《1845 年的俄国文学》中, 又给予对手一系列抨击。另外, 由于布尔加林于 30—40 年代在俄国文学和杂志中的立场和作用, 别林斯基也要经常发表文章与之斗争。

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论争, 在 1847—1848 年别林斯基执笔《现代人》时期继续延烧, 因而《现代人》带上激烈色彩是不可避免的。此时, 正值社

会政治条件变得尤其紧张, 正值人们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兴趣尤其提高, 正值西欧派激进的情绪笼罩了如此广泛的知识分子圈子, 以至于对新的西欧派刊物产生了毫无疑问的需求。因而别林斯基担纲的《现代人》插上了西欧派旗帜, 并且从温和保守的刊物转变为 19 世纪上半叶激进的杂志之一——就绝非偶然现象。

二、别林斯基主笔阶段《现代人》的纲领

在 1846 年 12 月的《现代人》上, 其出版人普列特尼约夫认为需要给广大读者一个声明, 这既是与读者告别, 也是他自己作为编辑和出版人对九年杂志工作做个总结。普列特尼约夫的声明表示, 他把杂志交到了自己志同道合者手里: “我把杂志交给了我同事及教学同仁尼基坚科教授。这一交接我很满意, 也为我的刊物的未来命运感到安心。”^{[14]250} 这种说法多少有些口是心非。因为, 他与尼基坚科确实是老相识, 但如果说 30 年代他们多少还是接近的, 那么在 40 年代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就相当分歧了。普列特尼约夫不可能不知道, 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在重组《现代人》过程中的作用要比尼基坚科重要得多, 而他对待涅克拉索夫纯粹是否定和不接受的。所以, 《现代人》从普列特尼约夫手里到涅克拉索夫手里必然是杂志倾向的重大转变而不会令老出版人安心的。

重组后的《现代人》第 1 期可以让我们充分研判杂志的真正倾向, 这一倾向甚至在尼基坚科这位官方圈子中最右人士的文章中也与普列特尼约夫的倾向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开始执笔《现代人》, 别林斯基就和同僚们思考杂志的纲领和主要思想倾向。鲍特金对《现代人》的倾向有近距离的和绝对的影响, 他当时住在彼得堡, 与那时《现代人》的领导层有密切交往, 正值编纂第 1 期, 讨论和决定那些纲领性问题。鲍特金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 “现在俄国文学的力量主要在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提升了《祖国纪事》, 意识形态也应当提升《现代人》。很幸运, 在这一意识形态中已经完成了一种转变——在长久地沿着德国道路徘徊之后, 意识形态已经开始转向现实世界, 换句话说, 我们的朋友们已经具备了那样一种意识形态——直接面对现实世界。文学批评只剩摆脱自己的天神——文学性, 这是它暂时唯一的避难所了。……当文学在英国和法国是面道德的镜子时, 它在我们这里是一位教导者。大众不是靠思想而是靠利益驱动的, 但是要用思想教育他们。这就是为

什么文学的整个力量在于意识形态。”^{[15]521}

几天之后,鲍特金在给安年科夫的另一份信中,关于当代俄国文学及批评的任务,他说道:“别林斯基在几乎摆脱黑格尔理论的同时,还牢牢地待在文学性之中,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的批评远没有那种自由、独创,那种简单和切实的观点,还没有达到他的天性擅长的方面……德国理论几乎扼杀了我们批评的健全理智。如果别林斯基在自己身上多少保留了它,那他就会在自己的时代种下多少野蛮。是的,法国观点,即基于健全理智的观点——历史是多数,而非奉献者和被拣选者,这是俄国批评所需要的。”^{[15]527}

在这些文字中,鲍特金表达的是正在上升的工业资产阶级最有意识和最前沿的意见。他认为《现代人》的意识形态口号应该是——“面对现实世界”;为了能够坚持这一立场,《现代人》,首先是其灵魂人物别林斯基,必须摆脱审美主义,克服德国理想主义哲学理论的影响,接受“法国观点”的东西,也就是:健全地务实地对待现实的态度,大众化的方针,注意力中心应该是“多数”,是“群众”,而非“奉献者和被拣选者”。鲍特金将“意识形态”与工业资本主义的成长联系在一起,而且他是纯粹唯物地解释历史进程——推动大众的不是思想,而是利益。鲍特金的这一思想几乎可以说就是即将出版的《现代人》纲领的基础。

而巴纳耶夫则把杂志的主要任务界定为观察欧洲的动向。在1848年法国革命前夕,这一观察变得越来越集中。关于欧洲的问题,别林斯基自己也予以重视,他在和卡维林一起撰写的关于1846年俄国文学的述评中写道:“现在新的重大问题占据了欧洲,我们可以、也应该关注它们,跟踪它们,因为没有什么人类的问题是与我们无关的,只要我们想成为一个人。但是同时对于我们来说,把这些问题作为我们自己的问题也完全是无益的,其中只有那些是我们的问题,即发生在我们处境中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周围——这就是我们要寻找问题和答案的地方。这一方向将是富有成效的,即便不是锦上添花。”^[16]做到这一点的条件,别林斯基认为是研究现实,而文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接近现实”。论述“自然派”作家的作品时,他强调,他们“使文学同社会、同生活、同现实接近”^[16]。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与鲍特金“面对现实生世界”的思想相呼应。

当然,这篇述评就是著名的《1846年俄国文学观察》^⑧,新《现代人》第1期《批评和书评》栏目即

以此文开张,也可以说这是《现代人》的纲领性文章。我们之所以如此说,缘于文章这样开篇:“我们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预先使读者认识《现代人》对俄国文学的观点,自然也是认识这份杂志的精神和倾向。关于这一点在杂志方案^⑨和预告中(指1847年《现代人》发刊广告——笔者)什么也没有说,它们只不过是一些预告,因而《现代人》方案中是尽可能简短和言简意赅的表述,仅限于一些表面的承诺。而我的文章,连同主编本人^⑩的文章,将是《现代人》的第二份内在纲领,读者可以在这里一定程度上亲自检验预告的执行情况。”^[16]

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审查制度使人们不可能直接就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人们只能把政治问题作为“私货”带进文学评论中,从而表明自己的倾向。别林斯基同样如此。我们在该文中发现,文章前、后部分都在大量表述俄国文学的历史与传承问题,可是就在文章中间段落有大段的关于民族性、关于斯拉夫派、关于俄国生活、关于欧洲问题、关于俄国的欧洲主义等重要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在叙述文学与历史传承中是如此显眼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携带了如此之多的政治表达,常常遮蔽了纯文学批评因素。因而,文章的着力点,与其说是文学问题,不如说是俄国问题。如他所说:“如果问我们,当代俄国文学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会回答说:在于越来越多地与生活、与现实的紧密联系……理论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与现实的关系。对于我们俄罗斯人来说,还有很多重要问题,它们在欧洲早已解决,在那里早已成为谁也不再怀疑、谁也不再争论、所有人都赞同的生活的普遍真理。而且,难得的是,这些问题在那里是由生活本身解决的,或者哪怕理论参与解决,也是借助于现实。但是,这不应使我们失去勇气和意愿处理这些问题,因为除非我们自己且为我们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给我们带来益处,即便在欧洲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于我们无补。转移到我们土壤上的这些问题,已经不是那些问题了,它们要求另一种解决。现在新的重大问题占据了欧洲^⑪……但(暂时)还是异己于我们的,如果我们为之兴奋不已,就只能是扮演了一个堂吉珂德的角色;为此我们只会受到欧洲人的嘲笑而不是尊重。”^[16]

这样,按照别林斯基的观点,当前的任务是解决“最重要的问题”——与俄国生活、俄国现实有最直接关系的问题,虽然在欧洲已经得到解决。这是什么问题?——即我们前面提到的他在《致果戈理的信》中指出的“俄罗斯现在最紧要、最迫切的民族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废除体罚,尽可能严格执行现有

的法律”^{[6]582-583}。受制于审查制度，别林斯基不可能形成某种确定表述，但毫无疑问，这里他指的就是这一现实问题。

这样，以解决“我们处境中的问题”的务实态度，并以此为纲领，他认为必须改变曾是自己1841—1846年间最主要的那些立场，即他不再沉迷于乌托邦社会主义，对待斯拉夫主义者也不再持曾有的不容忍态度。

一方面，他在文中提到占据欧洲的“新的重大问题”，这时正被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们提出来，但别林斯基认为“把这些问题作为我们自己的问题完全是无益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尚未废除农奴制和体罚的国家，谈论实现社会主义为时尚早，不切实际。不过，他离开乌托邦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他的意识形态中具有了某种负面的因素，他在《致果戈理的信》中表达的最低纲领，在当时俄国现实条件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另一方面，因现实的要求而使他不再沉迷于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也解释了他对斯拉夫派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意味着他的西方派立场的改弦更张，对于他来说一切照旧：“当代俄国中一切鲜活、美好和理性的东西，都是彼得大帝改革的结果。”^[16]同样也绝不是吸收所谓的斯拉夫派“学说的积极的方面”——即“某种暧昧不清的东方战胜西方的预感，这种预感已经由现实生活的种种事实显露出其站不住脚，无论是全部事实整体看，还是分开看。”^[16]所谓的转变，是别林斯基承认了他们学说中值得注意的方面，即他们的反俄国西方化中有许多“切实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别林斯基认同斯拉夫派人士的那些观点，即“彼得大帝的改革只不过是剥夺掉了我们的民族性，使我们变得不伦不类”，“我们应当回到过去的社会结构和道德（风俗习惯），既不是戈斯托梅斯尔那个神话时代，也不是那个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时代（关于这一点斯拉夫派的先生们还没有达成一致）”^[16]。“不，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俄国已经结束了、度过了变革的时代，改革在俄国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它已经为俄国做了一切能够而且应该做的一切，现在俄国已经来到了一个独立的从自己出发来发展的时期。但是绕过、越过所谓的改革时代，回到俄国以前的时代，难道意味着独立发展吗？光凭下面这一点来看，这种想法就是很可笑的：这就像要改变一年四季的次序，使得春天之后是冬天，秋天之后是夏天，同样都是不可能的。……与其考虑不可能的东西，嘲笑一切，按照自己的如意盘算，妄自尊大地干预历

史命运，远不如承认不可抗拒和不可改变的当前现实，以现实为基础做出行动，遵循理智和常识，而不是按照马尼洛夫的幻想……欧洲因素已经如此多地进入俄国生活，进入俄国风俗习惯中，因此我们完全不需要不断地转向欧洲以便认识我们的需求，因为根据我们已经从欧洲习得的东西，我们已经完全能够判断我们需要什么。”^[16]别林斯基确认俄国已经度过了彼得改革时代，他是想说，在俄国，进行新的改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而且首先是根据俄国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必须以模仿欧洲模式为新的改革的基础。

由此，别林斯基阐明了文学与之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的俄国生活和现实状况，也就是阐明了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特点和任务，亦即《现代人》的纲领和任务。

别林斯基在文中提到“主编本人的文章”也是杂志纲领的表达，他指的是尼基坚科的《论当代俄国文学的倾向》。通过对比两篇文章，可以研判《现代人》编辑集体内部意见是否一致的问题。

在强调当代文学应当思考生活和现实，而不是幻想和空洞地议论这一点上，尼基坚科并不反对别林斯基，他同样也认为，当代生活使文学对它的兴趣自然而合理地增长，认为“现代社会运动有其深刻的意义，值得最聪明和崇高的思想家参与；人类正在解决重要的生活问题，试图调和以前充满敌意的异质社会因素，消灭对于建全公民权有害的因素以及野蛮、愚昧和不公的毒瘤，用真理和合法取代之”^{[17]55}。对于那些“尽管燃烧着爱国热情却只能带来不切实际的概念的乌托邦理论和体系（萨马林语）”^{[18]158}，尼基坚科同样不予同情，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对乌托邦尤其是斯拉夫派乌托邦的反对立场。

但是在理解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的作用上，尼基坚科持有的观点，是别林斯基此时已经不再坚持的。他在文中指出：“艺术在人类心中和其他一切根本愿望和需要一起成长；但是，在神圣元素推动下，它主要是从属的，它很快就会走向自己神圣的使命，投身最崇高的精神使命。”^{[17]55}尼基坚科这样定义艺术的社会使命：“艺术的源头受神圣的奥林匹斯山护卫的守护，像光与热，艺术灵感流向社会，滋养人类心中所有神圣而伟大的信仰与信念的幼芽。艺术不知道也不以任何其他样式参与社会……在社会冲突和斗争中一方自称蓝色，一方自称绿色；一方称自己的色彩是最纯洁无瑕的，另一方也如此这般。这与艺术有何相干？它如果参与到任何一方，在他们错综复杂的欲望中迷失，和他们共谋，解决他们自

己的问题,这将是“不成体统的。”^{[17]57}

这样,他的艺术观点就与此时的别林斯基有了分歧。无怪乎尤里·萨马林在《莫斯科人》杂志上的文章《论〈现代人〉的历史与文学见解》就指责《现代人》在原则性问题上缺乏一致性,尽管别林斯基在其《答〈莫斯科人〉》中反驳了这一点。但是两人的分歧还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关于“自然派”的观点上。

别林斯基关于自然派的观点我们都十分熟知。尼基坚科在谈到“自然派”时,他最初是客观的,愿意承认在文学中谴责“恶性”和“各种扭曲的心灵”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和好的,但是他认为这并不能达到文学“崇高的目的”,因为,“指出了敌人,它却没有给出与他们战斗的力量,击败他们的力量就更少”^{[17]58}。接着,他就开始指责“我们的幽默——道德作家”了,因为他们“揭露地主、官员的荒谬的一面,忘记了另一面……”^{[17]62}

“如果说我们有涅滋德廖夫、索巴凯维奇、乞乞科夫^⑫,那么我们也有表现出人民优良传统的道德品质、受过教育熏陶的地主;有那些开明的、理解开明的益处和荣耀的地主,他们面对过往时代的愚昧无知,只知道吃和睡的画面会十分羞愧。你会在任何地方遇到他们,在偏僻的外省,在公务和日常生活中,他们中有的人在做事,有的人则默默地在内心深处培育了值得践行的美好愿望。”^{[17]63}

他在文章最后还对讽刺倾向表达了否定态度:“我们大家都喜欢成为幽默家,这太容易了,认为应该嘲笑一切,我们有时陷入可怕的庸俗。我们这里少的是思考,是爱,尤其是爱。因此,我们的作品是肤浅的、枯燥的、冷冰冰的。顺便说一句,这一切将导致乏味的千篇一律!您将总是看到同样的事情:一个骗子官员,一个傻瓜地主。整个省都成了我们幽默的牺牲品,仿佛这个省不是我们的祖国,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爱和尊重的,好像那里只有一件事值得研究——恶行和荒谬。这种倾向对于我们文学的艺术价值大有害处……这不是意味着将艺术作为外在目的的工具,也就是毁灭了艺术吗?”^{[17]70}这种对“自然派”文学的见解明显与别林斯基就果戈理《死魂灵》的评论相左。

不过,虽然我们说别林斯基这时已经从过去的审美主义转向文学“面对现实任务”,从而使使得两篇纲领性文章的声调不那么和谐,但是,别林斯基说尼基坚科的文章同样也是《现代人》的纲领,这表明,他在坚持文学的现实任务的同时,也没有否定文学的审美性。因而我们也不能说尼基坚科与别林斯基

之间的分歧是实质性的,这种分歧是因时代任务的不同而使别林斯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况且,正如我们前文的分析,虽然尼基坚科在《现代人》领导层中属于右翼,左翼是别林斯基、赫尔岑和涅克拉索夫;却不能否认,别林斯基在领导《现代人》短暂的时段里表现出的倾向上的演化,更多的是向右。于是,显示出别林斯基的复杂性。

一方面,他不再维护赫尔岑否定资产阶级的观点,别林斯基最终转向团结赫尔岑的对立面。他在1847年12月给鲍特金的信中写道:“赫尔岑的观点是否毫无疑问是错误的,甚至不值一驳——这一点,我不知道,先生,也许您是对的。是我太愚钝,不能理解您的智慧。我不是说,赫尔岑的观点毫无差错。考量事物的方方面面,我认为,关于资产阶级的的问题,是一个暂时谁也没有彻底解答的问题,甚至是谁也解答不了的问题——只有‘历史’这一人的最高裁判官能解答。”^{[3]447}这里“关于资产阶级的的问题”,是指赫尔岑发表在1847年第10、11期《现代人》上的《来自马里尼大道的信》中揭露了法国资产阶级反人民的实质。他的观点激起莫斯科自由派人士的愤怒(《格拉诺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和《安年科夫和他的朋友们》中都有记载^⑬),别林斯基对此的看法在《1847年俄国文学观察》中也有表述。他说:“对于《来自马里尼大道的信》,尽管大部分人还是赞许的,但是还有一些读者很不满。确实,在判断当代法国状况时,作者不由自主地陷入错误,他过于狭隘地理解资产阶级这个词的意义,只把它理解为有钱的资本家,因而从这一阶级中排除了人数最多因而也是这一阶层最重要的群众本身。”^{[19]353-354}因而,我们说他“转向团结赫尔岑的对立面”即是这人数众多的“群众”,也可以说是支持“莫斯科自由派人士”的观点。

另一方面,在生前的最后几个月,他又准备相信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可能性,而同情地回应尼古拉一世及其部长们的方案,这种回应体现在他1847年12月初给安年科夫的信中^{[20]435-442},别林斯基对那些他称之为没有头脑的自由主义者又持明显的否定态度。别林斯基态度的这一演变,应当与1847年出现的政府高层开始准备取消农奴制的动向密切相关。别林斯基认为农民改革如此重要,如此紧迫,以至于他准备因这一改革而原谅尼古拉的诸多罪孽。“自由主义者”^⑭使别林斯基如此不安的原因在于,他深信,他们的行为方式将政府推向了右翼,从而阻碍了似乎已经预先确定的改革的实施。

不过,从历史的结果看,如果不是在“黑暗七

年”之初别林斯基就去世了,他将不得不承认,把一些希望寄托于沙皇及其亲信是多么错误,不得不承认政府反动猖獗的事实——特别是《现代人》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严酷的审查,而且这很可能就是他自己将来痛苦的经历。笔者记得电影《别林斯基》中有一个情节:1848年沙皇正想严办别林斯基的时候,大臣禀报说,别林斯基已经病逝。不管这是真实的还是电影构思,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别林斯基先前对沙皇的幻想必然破产。其实,在那个年头,对沙皇抱有幻想的何止别林斯基一人,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无不如此。因此秘密警察头子杜贝尔特^⑤并非毫无缘由地强烈抱怨别林斯基没有活着:“否则我们就把他关进城堡。”^{[21]122}

从上述事实中会得出一个结论,别林斯基在1847年底和1848年初有点偏离了曾是他1841—1846年间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因此,《现代人》在1847—1848年的倾向如果完全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来描述是不准确的。尽管革命民主主义调子在整个杂志中都有,但是它没有占绝对优势,没有构成杂志的主调。无论是这一时期的别林斯基,还是《现代人》的大多数作者,还是“同时代人”,整体上人们都相信借助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可以和平更新俄国生活的可能性,改革中占第一位的就是解放农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到别林斯基执笔《现代人》时,经济与政治语境都使得俄国现实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回应国内变革的诉求,使得别林斯基及其《现代人》在意识形态上与斯拉夫派和官方民族性形成对立,也使《现代人》带上了激烈的色彩;而官方改革的动向,也曾使包括别林斯基在内的一批进步人士一度抱有幻想。因而,吁求变革与兼顾启蒙,直面与讨论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同时也不偏废文学的审美性,就成了这一时期的真正纲领和基调。这些都反应在《现代人》的各个栏目中。不过,对栏目的具体研究将是接下来的文章的任务,这里暂且止步。

注释:

- ①埃蒂耶纳·卡贝,著有《伊加利亚旅行记》。
- ②路易·布朗(1811—1882)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媒体人,1848年革命活动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社会主义政治家。
- ③第一版俄文版60年代初由巴枯宁翻译发表在赫尔岑的《钟声》上。
- ④普鲁士道路是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农奴制残余的基础上,政

府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富裕农民可以交纳赎金免封建议务,成为自己份地的所有者。地主阶级逐渐采用雇佣劳动,按照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组织资本主义农场,从而把封建领主制经济缓慢地转化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容克地主经济。与普鲁士式道路相对,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废除封建制生产关系,建立农民个体经济,然后通过小农经济的两极分化而自发产生出资本主义农业的道路,地主经济已不存在,农民在普遍建立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通过自由竞争和分化,产生雇佣制的大农场。

- ⑤见本人的文章“《现代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阶段研究”。
- ⑥使用这一术语之可能,是基于维·卡维林关于勃拉姆别乌斯男爵(即先科夫斯基)的观察,他很好地证明了布尔加林、格列齐与先科夫斯基之间只是缺乏统一的组织,他们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立场。
- ⑦1980年译林出版社的汉语版别林斯基选集(三)有收录,翻译为《学究先生》。
- ⑧有的译为:《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
- ⑨指根据政府批准的办杂志方案。
- ⑩《现代人》转到涅克拉索夫手里时,为通过审查,避开官方一直禁止出现的别林斯基的名字,在官方注册的主编是尼基坚科,但实际起领导作用的是别林斯基。
- ⑪指的是在欧洲已经展开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问题的讨论。
- ⑫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三个地主。
- ⑬见:A. T. Станкевич, Т. Н. Грановский и его переписка. М., 1897. т. II. С. 424. 和 A. С. Суворин, П. В. Анненков и его друзья СПб., 1892. С. 550—552.
- ⑭这里“自由主义者”别林斯基指的是基里洛-梅福季耶夫协会(Кирилло-Мефодиев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的成员,如Тараса Шевченко(1814—1861)和П. А. Кулиш(1819—1897),此时尼古拉一世正对他们加以残酷镇压。基里洛-梅福季耶夫协会是1845年底至1846年初基辅的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旨在建立一个由乌克兰领导的斯拉夫民主联邦。
- ⑮Леонт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Дубельт(1792—1862),尼古拉一世秘密警察头子:警察总部司令(1835—1856)并领导第三庭(1839—1856)。

参考文献:

- [1] В. Евгеньев - Максимов, От автора [С] //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в 40—50 гг. - От Белинского до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Ленинград. 1934. http://az.lib.ru/e/ewgenxewmaksimow_w_e/text_1934_sovremennik_shtml
- [2]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Письмо к В. П. Боткину [С] //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1953—1956, М., Т. 11.
- [3]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Письмо к В. П. Боткину [С] //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1953—1956, М., Т. 12.

- [4] А. В. Западко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С]//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XVIII – XIX веков. <http://radischev.lit-info.ru/radischev/kritika/zapadov-istoriya-zhurnalistiki/otechestvennye-zapiski.htm>
- [5] М. Е. Салтыков (Щедрин). За рубежом [С]. http://az.lib.ru/s/saltykow_m_e/text_0350-1.shtml
- [6] 别林斯基. 文学论文选 [М]. 满涛, 辛未艾,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根据原文, 译文有改动)
- [7]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М. П. Погодин и борьба классов [С]//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XIX века. Петроград. 1923. С. 30—31.
- [8] А. Л. Осиповат и Л. С. Пустильник, ПРИМЕЧАНИЯ [С]//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Педант. http://az.lib.ru/b/belinskij_w_g/text_0460.shtml
- [9] П. В. Анненко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3.
- [10]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объяснение по поводу поэмы Гоголя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С]. http://az.lib.ru/b/belinskij_w_g/text_0810.shtml
- [11] 果戈理. 死魂灵 [М]. 田大畏,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 [12]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Сочинения князя В. Ф. Одоевского [С]. http://az.lib.ru/b/belinskij_w_g/text_3230.shtml
- [13]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1844 г. [С]. http://az.lib.ru/b/belinskij_w_g/text_1844.shtml
- [14] Плетнев, К читателю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J].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846. № 12.
- [15] А. С. Суворин, П. В. Анненков и его друзья – –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переписка 1835—1885 гг. [М]. СПб. , 1892.
- [16]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Взгляд на рус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1846 года [С]. http://az.lib.ru/b/belinskij_w_g/text_1846.shtml
- [17] А. В. Никитенки, О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J].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847, Т. 1, II. (“Наука и искусства”)
- [18] Ю. Ф. Самарин, О мне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С]// Русская эстетика и критика 40 – 50 – 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М. : Искусство, 1982.
- [19]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Взгляд на рус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1847 года [С]//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1953—1956, М. , Т. 10.
- [20] Белинский, Письмо к Анненкову [С]// Белин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1953—1956, М. Т. 12.
- [21] К. Д. Кавелин.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В. Г. Белинском [С]// Белинский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Ленинград, Academia, 192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Context and Guideline

—Study of *The Contemporary* at the Stage of Belinsky as Chief Commentator

GENG Haiying

(College of and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When Belinsky served as the chief commentator of *The Contemporary*, serfdom is called for reform in the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f Russia. On how to change and how to treat the issue of development path of Western Europe, Belinsky encountered voices from different camps. In face of the conservative forces, Belinsky, in response to the most incisive serfdom problem, proposed the new guideline for himself and for *The Contemporary* as well; transitioning from the vague utopian fantasy at the early forties to the problem of Russian reality. Based on the official motion of reform, Belinsky’s guideline is not the radical “revolution”, but the welcome of “change”, the advocating of enlightenment, which were all reflected in the column of *The Contemporary*.

Key words: Belinsky;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guideline

卞之琳诗本事与释评三题

萧梦麟

(河南文艺出版社,河南 郑州 450016)

摘要:《断章》交织了作者童年的故乡印象和对苏州城里远人的寄情;其《无题》组诗,发生、形成于1937年卞之琳江南游访探望张充和时期,而不是回忆1936年秋苏州之行。考释卞之琳代表作,可见钟情与爱慕点亮诗心、使人格进境、赋予生活光辉。“情种”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隐而不显,而在西方文化里可以清晰溯源。

关键词:卞之琳;《断章》;《无题》;考释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0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21-06

一、《断章》前后因缘

卞之琳的《断章》写于1935年。这个时期(1934到1935年末),卞之琳自认为是写诗的第二阶段,也是他作为诗人真正出现的时期;特别是1935年,《距离的组织》《尺八》《音尘》《断章》《航海》,写书斋生涯与情感,雅致知性,纤细入微,在语体诗里自成一格,惆怅中出现了开朗以致喜悦的苗头,“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也多了起来”^[1]。

这种转变,由两个主要因素促成:一是认识张充和,“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1];二是卞之琳1935年春夏在日本小住的一季,滤去了诗风里北国苍凉的风沙,浮现出本来宁静的明秀。

往前追溯,1930—1932年是卞之琳写诗的第一阶段,他在北京大学读英文系,在北国风沙里破旧的故都,出入于波特莱尔的世纪末情绪与艾略特文明崩溃的“荒原”,承袭晚唐南宋诗词的末世之音,随着当时写“劳动人民”的新潮思想时尚,他常在长短句里寄情北平街头没落的小人物,如算命的、洋车夫等这些与他生活关系很远的路人。这些浅掠社会现实皮毛的行句没什么诗意,倒似在练习各种英法诗里习得的技巧。

1933年秋,卞之琳在北京大学刚毕业,打算以文学翻译为职业,在沈从文家遇见21岁的张充和,刚从苏州来北京,爱吹笛子爱唱曲,聪敏直率,自由得像一只小鸟儿,轻快得像条游鱼,照亮了卞之琳的眼睛。

卞之琳也自知个性畏缩,没有信心,“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2]。他决定趁自己还没有深陷,赶紧逃避,去了保定育德中学教书,在保定待了一个学期,寒假(1934年初)返回北平。

在北平,卞之琳很快得到机会,为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译书,报酬较丰厚,成了主要生活来源。为此,1935年3月底,卞之琳去日本京都,投靠一个北大同学,闭门译书,当时这里生活费比北平还便宜,不需签证,从天津去买船票就是。

在日本小住,所见修竹幽篁、板桥流水,杨梅枇杷、插秧采茶,仿佛回到了童时的境地,“说来也怪,我初到日本,常常感觉到像回到了故乡,我所不知道的故乡……仿佛回到了童年的境地……”^[3]刚到日本的晚上,在若有若无的细雨中听到尺八,五月间又在京都深夜听尺八,犹有唐音,为他无意间开启一个忘却的故乡,不自知的故国的古香。过了一个月光

收稿日期:2022-02-10

作者简介:萧梦麟(1968—),女,河南郑州人,现任河南文艺出版社副编审,一直从事出版编辑工作与现代文学研究。

景,卞之琳写了短诗《尺八》,有明显的古典色调。不过,《尺八》20行句子,3行出现“凄凉”,结尾出现“失去的悲哀”,其审美病态可以与其同学何其芳的《画梦录》联想在一起。《尺八》被其同学笑为海派杂凑,他说自己后来也越看越不喜欢。

1935年7月卞之琳回国交译稿,但“非常怀念那边,想仍然回到那边去”。北平此时已成“边城”,处境日益危殆。卞之琳只好应李广田之约,秋初去济南再教中学。

1935年10月在济南,卞之琳写了《断章》《寂寞》《航海》《音尘》等诗。虽然从大学二年级起,卞之琳就经常写新诗寄感和杂译短诗,经常发表,但实际上,作为诗人的卞之琳在1935年秋季才自成一派。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四行诗原在一首长诗中,但全诗仅有这四行诗卞之琳满意,于是他将这四句抽出独立成章,标题也由此而来。周良沛在《永远的寂寞》一文中说,此四行在新诗里可以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相比。^[4]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一年半后,卞之琳题献给张充和的诗集,即取名《装饰集》。卞之琳的老友王辛笛在《“琐忆”记痕》一文中讲:《断章》里的“装饰”二字,叫他立刻联想到1942年桂林明日社出版的卞之琳《十年诗草》(1930—1939),其中有一辑题作《装饰集》,次页标明“给张充和”。而全书题端“十年诗草”四个字,又是张充和题写的。这至少可以坐实,《断章》中的“你”就是张充和。^{[5]104}

蓝棣之为卞之琳作品选集作的序,也暗示了《断章》关涉作者的爱情故事:“‘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这两句诗,写尽了他的谨慎、矜持和顾虑。”^[6]

写《断章》时,作者应是在济南。诗的景色可能与作者童年的故乡印象有关,^[7]再者,章句里楼窗、桥上相映互看,张充和家乡苏州的景色也是这样。据何晓木《张充和的百年人生》一书,张充和1935年4月因病休学,9月离开北平南归,回苏州家里,此时张充和正住在苏州。沉藏于潜意识的童年故乡印象,对苏州城里远人的怀念和寄情,织成《断章》里太湖流域古城水乡的画面景象。

1935年10月26日,卞之琳写《音尘》——邮差送来期盼的远人的信,也是有关旅程、邮递信札、关心远人的,也写得精致、矜持,调和了现代英法诗的元素和古雅的中文趣味:

绿衣人熟稔的按门铃
就按在住户的心上:
是游过黄海来的鱼?
是飞过西伯利亚来的雁?
“翻开地图看,”远人说。
他指示我他所在的地方
是那条虚线旁那个小黑点。
如果那是金黄的一点。
如果我的座椅是泰山顶,
在月夜,我要猜你那儿
准是一个孤独的火车站。
然而我正对一本历史书,
西望夕阳里的咸阳古道,
我等到了一匹快马的蹄声。

二、《无题》组诗缘起考辨

1937年3月—5月,27岁的卞之琳行吟江南,写下《无题》组诗,既有一如既往的精致知性,又有了色彩和喜悦之情,是他作为诗人的代表作。

《无题》组诗缘于1936—1937年作者数次探望张充和。早些年,对照卞之琳其他资料细读《无题》,笔者以为是回忆1936年10月去苏州看望张充和之行。但当时就有疑问,卞之琳去苏州前刚奔完母丧,怎么可能迅速陷入恋爱的喜气。

卞之琳排行最末,自幼深得母亲宠爱,自出生至小学毕业的14年间,都在母亲身边度过。1927年去上海读中学,每年寒暑假都回来度假。他在上海读中学期间,家庭经济就十分拮据,1929年考取北大英文系后,其母变卖出嫁时带来的金银首饰,千方百计筹措学费。^[2]

在卞之琳《朋友和烟卷》《还乡》《朋友和伞》里,都可见其对故乡的怀恋;1936年5月卞之琳寓居日本所作《尺八夜》:“又看见修竹幽篁、板桥流水、杨梅枇杷……我仿佛回到了童时的境地……”1991年的《沧桑琐话》,回忆故居的春笋、鲜花、桑葚黑甜。

对故居与故乡的思念赞美,是对父母亲眷恋的衍化,可见作者从小至高龄对母亲和故乡怀有的深厚感情。卞之琳奔母丧后,顺路去看望爱慕的女子,寻找“友好”的安慰,也是情理之中。但在那样的沉痛里,不会有诗中这样喜悦的心情。不说古代三年

之丧,仅就通常人情来看,也不可能。这个疑惑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当时尚未见到卞之琳表述丧母之悲的文字。虽然卞之琳说过,“一向怕写自己的私生活,越是触及内心痛痒,越不想写诗来抒发”^[1],还是觉得有所缺失。

至今,有关1937年春“无题诗”,论者多沿袭北塔《卞之琳先生的情诗与情事》之论:在(卞之琳1936年秋去苏州看望张充和)半年后,写了五首《无题》。他的大部分情诗基本上都写于1937年,可见这次苏州之行对卞之琳的影响之大,“卞先生在苏州与张充和相会是在秋天,而他写这首诗时是在春天;整个组诗写的是回忆起来的激情,应该处理秋天的景象;但我们读到的是一派春天的良辰美景”^[8]。

对照近年新出的文献与研究,笔者以为,这些诗确实充满了春天的气息,那是因为本来就是写于春景。这不是秋天的回忆,而是春天的写真和向往。

先从1936年苏州之行说起。1936年10月,卞之琳在青岛突然接到北平转来的电报,说母亲薛万芝病危,他赶回家时,母亲已于8月22日病故,享年51岁。他在故居住了两星期。之后,10月21日专程去苏州,待了一两天。张充和之弟张宗和日记有记录:“二十一日星期三……卞之琳来了,眼红红的,说起来刚死了母亲,从青岛回海门的。”21日、22日,张充和姐弟二人陪同卞之琳,燕游苏州各处名胜,山中水上,吃茶吹笛谈诗。22日夜,卞之琳乘坐晚上十点的车离开苏州。

此行应是卞之琳“做起了好梦”的开始。然后卞之琳经上海乘船回青岛,埋头译书。卞之琳这个时期的心情,在2014年吴心海发现的卞之琳集外文《“当毕”》^[9]里可以解读。此文于1936年12月2日写于青岛。“当毕”是法语Tant pis音译,文中说:

作“活该”讲:既然自取了,Tant pis,工作啊!作“管他”讲:笑骂由他笑骂,Tant pis,工作啊!作“算了”讲:到头来都是一场空,Tant pis,工作啊!

文中诉说丧母之痛与为情困扰,“我最近受遭了人力所不能挽救的打击,人力所自召的折磨”,如陈越在《“若有其事”:卞之琳的爱情诗考释》所说,此处“人力所不能挽救的打击”当是指其母亲去世,而“人力所自召的折磨”则是指他为情所困而饱受煎熬,强作醒悟与解脱,其实只是自己的一种幻觉,实际上依然痛彻心扉。^[10]

与此同时,1936年冬张充和为卞之琳抄写《数行卷卞之琳》^[11]。可见1936年的探访与同游,令双

方的关系有所增进,但是从《“当毕”》看,卞之琳仍在痛苦与失望之中。

卞之琳1937年1月回北平交卷,算了译书的稿费,大有积余,“足够我南返江浙,逍遥大半年,会友,写诗,自由译书”,于是春初南下江浙、上海等地转悠,自由作译。

1937年3月20日卞之琳到南京,来到张充和姐弟住处,张充和此时在南京,为《中央日报》做“副刊编辑”。卞之琳23日离宁,清明时节在上海作译。4月间,卞之琳再到南京见张充和。据张宗和日记,这回不遇,张充和出门躲避。

目前已知1937年春卞、张有一次会面。这只是据张宗和所记的会面,也许还有其他的会面。春季相会,投射在10年后卞之琳的自叙小说《山山水水》里,是纶年(卞之琳)再到苏州看望未匀(张充和):“那个春天纶年确曾第二度到苏州来看她……从北平来,去上海,路过。下车住了两天。”时春回大地,一个名媛撮合二人去一个园子里挖荠菜。

1937年3月,卞之琳写《无题一》:

三日前山中的一道小水,
掠过你一丝笑影而去的,
今朝你重见了,揉揉眼睛看
屋前屋后好一片春潮。

百转千回都不跟你讲,
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
你的船呢?船呢?下楼去!
南村外一夜里开齐了杏花。

笔调一向内敛冷静的卞之琳,在好梦中、在对心上人的恋慕里,看见了世界的笑影和喜悦。人心的欣喜期待,与春潮与杏花互相起兴,心内心外的美互相焕发。喜悦是造化的本来面目,其中有生动活泼的力量。虽然下阙的第二句“水有愁、水自哀”是败笔,是其个人认知对外境的歪曲。

1937年4月,卞之琳写《无题二》,下阙里喜悦之情表现得最充分:“窗子在等待嵌你的凭倚……/杨柳枝招人,春水面笑人。/莺飞,鱼跃;青山青,白云白……”

4月,还写了《无题四》,“隔江泥衔到你梁上,/隔院泉挑到你怀里,/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我想要研究交通史”。少年时初读此篇,模糊觉得是写给女性密友的。近年知道写作本事后,看出诗人的亲昵,不过表达得还是很文雅。

5月写《雨同我》:

“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

“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
两地友人雨，我乐意负责。
第三处没消息，寄一把伞去？

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
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
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
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

卞之琳章句中常有对鸟的关心，以及蜘蛛、蜗牛、鱼、蜜蜂等纤细生物。本题中织起人与雨、鸟、天井、玻璃杯在自然中的关系，上阙洗净铅华，下阙玲珑清澈。

《无题五》：“我在散步中感谢/襟眼是有用的，/因为是空的，/因为可以簪一朵小花。//我在簪花中恍然/世界是空的，/因为是有用的，/因为它容了你的款步。”可看出诗人的慕念和寄情。

据陈越《“若有其事”：卞之琳的爱情诗考释》，《无题》组诗的前四首，最初发表于1937年5月15日《文丛》1卷3号，署名“薛大惜”，题名《若有其事四章》，写于1937年3月—4月。陈越说：他是拘谨的，小心翼翼的，不愿否定自己，又不能自我确认，于是只能以“若有其事”的态度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激动之情……对于爱情怀有美好憧憬的诗人觉得这一次幸福似乎来临了，情感基调是欢快和愉悦的，这一点不同于《“当毕”》那种苦恼焦虑的心情。

陈越敏感地指出，从《若有其事四章》中，可以看到诗人的情绪已非1936年底写作《“当毕”》时的那种焦虑与懊恼，也远非那种单相思的苦闷与焦灼，分明有着两情相悦的那种“哀愁中含了一点喜气”和惆怅中含有喜悦的诗意。

即是在1936年12月的《“当毕”》与1937年三四月间的《若有其事四章》之间，卞、张关系必然有一个不同的转折。但当时陈越尚未看到相关史料，即1937年卞之琳在江南游访期间见过张充和。他只能说卞1937年集中创作的诗作基本上都是起源于这份感情。

1937年春季重会，此时距诗人丧母已半年。江南春景，伊人若有情似无意；上海有李健吾，西湖有芦焚，好友相邻。伤痛渐淡，良辰美景、喜气发生，才写了为将来留作纪念的几首无题。

又及，1937年春的组诗，由于恋爱和女性的精神赋予，卞之琳看到并在组诗里表现了世界的正面内质。但几乎每一首都带有裂隙，如《无题一》的“水自哀”“水自愁”，《无题二》的“怅望”，《无题三》的“字泪”，《无题四》的“轻喟”，《雨同我》的“忧愁”，

暮春时写的《白螺壳》，尾句的“宿泪”。现实相对于本原，是有裂隙和歪曲的世界，但是怎样面对和表现这种裂隙，是作者可以选择的。像以上词句，对于裂隙是美化、自恋的态度，认可无力、病态审美，与中国古诗词里无望的情诗相承。卞之琳自己也明白，自嘲说：“我这种诗，即使在喜悦里还包含惆怅、无可奈何的命定感（实际上是社会条件作用）、‘色空观念’（实际上是阶级没落的想法）。”

5月在杭州陶社，卞之琳把本年所作《无题》等十八首加上前面两年各一首，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张充和。因为这些诗中的大部分本来就是写给她的。8月7日，他住在雁荡山慈悲阁，为张充和手抄一册《装饰集》。

三、情种的传统

当年读罢《卞之琳文集》与其传记，掩卷想起唐人诗：此情可待成追忆。不爱说话、温文尔雅的卞之琳，从1933年秋初遇张充和，到1947年去国前苏州话别，经年山山水水，于苏州、成都、昆明、重庆、上海等地追踪相会，又至少四次为张充和去江南逗留，长则半年，短则几天。

如果根据张充和与其家人的说法，卞之琳似乎是在单恋。在《天涯晚笛》里张充和说：卞之琳一见之后，“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不过有论者认为，她实实在在地“惹”了他却“又不理他”，他们在事实上有过浪漫的拍拖。据裴春芳、解志熙等学者考证，沈从文《梦与现实》里有此事的映像：“她”因为抵补空虚，所以“生活上来了一个平常大学生。为人极端平常，然而外表好像很老实，完全可靠，正因为人无用也便无害，倒正好在她生活中产生一点新的友谊……随后是性情上的弱点，不知不觉间已给了这个大学生不应有的过多亲近机会”，其中包括两人一起看电影、吃饭、逛街、喝咖啡、闹别扭又和好、玩至半夜等。^[12]巫宁坤也在回忆中写：20世纪80年代他去拜望卞之琳时，卞之琳告诉他说，“有人认为，他和充和的关系是他自作多情，其实当年他俩之间的感情是很热烈的”^[13]。但即使若有其事，并不是通常有确定相许的恋爱关系。

从昆明到重庆，张充和有个煮茗论艺的知音（或暧昧的密友），中年学者郑颖孙，二人共事6年。与张充和同住的弟媳孙凤竹，家信里说了不少郑如何迷惑张充和的秘闻，称其老油子，说张充和醉了睡在佛堂蒲团哭，骂个个都是王八蛋。^[14]张充和去重庆后，卞之琳搬到她在昆明呈贡所住的“云龙庵”。

关于1941年他住过来的情形,沈从文写过:“然而这个大院中,却又迁来一个寄居者,一个从爱情得失中产生灵感的诗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每到小溪边去散步时,必携同朋友五岁大的孩子,用箬叶折成小船,装载上一朵野花,一个泛白的螺蚌,一点美丽的希望,并加上出于那个小孩子口中的痴而黠的祝福,让小船顺流而去……诗人却必然眼睛湿蒙蒙的,心中以为这个三寸长的小船,终会有一天流到两千里外那个女孩子身边。”“他完全不明白他所爱慕的女孩子,几年来正如何生存在另外一个风雨飘摇事实巨浪中。”^[15]

1941年暑假,住在这个小房里,卞之琳开始写《山山水水》,写“一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其实是写他自己。1943年中秋节写完了全部草稿,1944年又开始用英文译改。现存《山山水水》残章《雁字:人》,写1940年夏末至1941年在昆明的情形,可看出情人怎样描绘眼里的西施:

从背后看去,她耳际发鬢微微颤动,伸手可抚的这一头发丝的颤动,纶年觉得胸中起伏着什么,他赶快把话题转开,谈起了路上的耽搁……举头见明月似的,纶年仔细端详一下她的脸,宛如秋霄的朗月,眼珠两点光的栩栩,春风当真就拂过了全脸。

这个真情的视角,有尊重,有爱怜,还很有教养。再联想起沈从文“看虹摘星录”猎色的视角,不可同日而语。

1947年夏,卞之琳去牛津大学访学前,至苏州小住数日,与张充和话别,此别至1978年才又一见。在牛津,卞之琳仍在修订《山山水水》英文稿。1948年11月,张充和与傅汉思举行婚礼,12月17日启程往美国,本月卞之琳匆匆启程回国(他自己说是因为淮海战争),1月才到达香港。时夏济安致夏志清信说到此事:“傅汉思将同张充和结婚,同时……看到卞的信,仍是一片痴情……卞为人极天真、诚挚,朋友中罕有,追求张充和,更是可歌可泣,下场如此,亦云惨矣。”

1949年1月间,传闻卞之琳怨恨沈从文,说沈从文对不起他。据近年几位学者对沈从文相关佚文的考证,认为1938—1940年间,沈从文与张兆和曾有亲密关系。^[12]

1950年代初期,卞之琳把《山山水水》全稿烧毁,一部稿子苦费了八年的时间与心力,终于自废。他仍然不间断地给远在美国的张充和写信,到张兆和家打听张充和的近况。1953年,他南返江浙,参

加农业生产合作化试点工作,一晚在苏州城里滞留,“恰巧被接待在旧友张充和旧居——我过去熟悉的她曾独住的一间楼室”。^[16]

1955年,卞之琳45岁时方结婚,之后的家庭生活里,疼惜妻女;1978年,张充和终成回国之行,也见了卞之琳。其时卞之琳正整理自选诗集《雕虫纪历》,三个月后撰成《雕虫纪历·自序》,回顾了写诗与钟情的记忆;1980年秋,卞之琳访美两月,三次去新港看望张充和;2000年2月,卞之琳去世,张充和隔海托人送来了花圈。

当年在雁荡山大悲阁,卞之琳为张充和手抄的《装饰集》,根据他的遗愿,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该馆字画库还有一幅书法长卷《数行卷 卞之琳》,是张充和1936年冬抄写的五首卞之琳诗,卞之琳一直珍藏^{[5]105};卞之琳七旬时与晚辈偶尔讲到张家小姐为他《十年诗草》题写的书名,忽然神采焕发,用诗意的陶醉描绘她的书香、学养、美丽、洒脱。^[4]

正如师陀语,这是一个情种的故事,“一往情深,是光荣的失败”^[17]。情种者,天生有钟情的禀赋与纯粹的品性。在中国古代,不乏性情纯粹、不落俗套的男子的记载,如柳下惠,如青年时妻亡不复续弦的王维、傅山,殉情者如抱柱的尾生,他们在多妻妾、男尊女卑、不知尊重女性意志和个人感情的中国古代,矫矫独立。但是像卞之琳这样为没有确定回应的精神钟情,守志过不惑之年,在古代有没有同样的例子?笔者只想起曾看到一则明清笔记,记述有男女二人少年订婚,未曾见面,因世变离散,都守约不嫁不娶,至花甲重逢终成眷属。似乎有点像,又有点不像。

这或与卞之琳深造的英诗熏陶有关。此事可以联想起叶芝之于茅德·冈(Maude Gonne)。叶芝23岁对茅德·冈一见倾心,到52岁最后一次求婚被拒,求而不得的倾慕化成一行行瑰丽的诗句。茅德·冈因此说,世界会为她没有嫁给叶芝而感谢她。

在卞之琳同时代,还是有同样钟情或者情种的故事,虽无果而甘心,所谓“宗教态度”的爱情,即“一方面是崇拜与牺牲”,爱慕而不求有之,如金岳霖,他并非传说中的终身未娶(早年有同居女友,后来也考虑过与别人恋爱结婚),但作为友人他一直爱慕、守护林徽因。与金岳霖(金龙荪)并称清华三孙的陈岱孙、叶企孙,专注学术、终身未婚,有说二人都内心爱慕王蒂澂(周培源夫人),^[18]当然不可捕风捉影说二孙因此未婚,但像这样懂得爱慕女性美好的有识之士,有情感理想,未娶应该还是有个人

操守。以上提到的这些钟情之事,迄今所知都是知命、止乎礼、不逾矩的,所以成为佳话。这几位学人都曾游学欧美,栉沐西风。

情种的传统,从西方文化有关女性和爱情的观念里可以清晰溯源。据《托马斯·阿奎那爱的学说研究》,从古希腊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爱的学说,发展到柏拉图达到极致,其《会饮篇》谈论爱神,说爱本质上就是永远渴望美善,是对不朽的企盼,自然和灵魂不是那种静止不动的不朽,它们是生生不息的,其实现的方式,就是生育,而且是在美中生育。^[19]

有关美、精致、喜悦、温柔的精神殿堂,主要是女性精神掌管的。通过对具有这些品质的女性的爱慕与赞美,可以获得相应品质的开放和赋予,实现个人精神的孕诞、更新和成长。但丁的作品就充分表现了在对理想女性的爱慕里得到引领上升。这里暂不展开说了。

从本篇所考卞之琳代表诗作的形成,可以看到造化怎样通过美好爱慕之情点亮诗心,使人格进境,赋予生活光辉。这就是情种的成就和创造。

参考文献:

- [1]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M]//雕虫纪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2] 姚峰.低吟浅唱的歌者:卞之琳[C].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
- [3] 卞之琳.尺八[M]//卞之琳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4] 周良沛.永远的寂寞[J].新文学史料,2001(3).

- [5] 王辛笛.梦余随笔[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3.
- [6] 卞之琳.地图在动·序[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
- [7] 丁士凤.你不知道的卞之琳故居[N].海门日报,2004-12-01.
- [8] 北塔.卞之琳先生的情诗与情事[J].新文学史料,2001(3).
- [9] 吴心海.人力所自召的折磨[J].现代中文学刊,2014(6).
- [10] 陈越.“若有其事”:卞之琳的爱情诗考释[J].新文学评论,2020,9(3).
- [11] 慕津锋.《断章》背后的故事[J].语文世界(中学生之窗),2021(3).
- [12] 商昌宝.卞之琳、张充和、沈从文之间的爱恨纠葛[N].南方周末,2021-03-18.
- [13] 巫宁坤.缅怀卞之琳老师[N].东方早报,2014-03-16.
- [14] 何晓木.人间清音:张充和的百年人生[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11:234
- [15] 沈从文.绿魇[C]//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97-99.
- [16] 卞之琳.合璧记趣(写于1985年)//卞之琳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17] 师陀.两次去北平(续篇)[J].新文学史料,1988(3).
- [18] 许渊冲.山阴道上[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赵景伦.我的姐姐赵萝蕤[C]//惠特曼.我自己的歌:惠特曼诗选.赵萝蕤,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王凯.周培源的美好婚恋[J].幸福(上半月),2014(11).
- [19] 张祎娜.托马斯·阿奎那爱的学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 刘海燕)

Bian Zhilin's Story of Poem and Interpret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XIAO Menglin

(He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Zhengzhou, Henan 450016, China)

Abstract: The poem *Fragment* interweaves the impression of poet Bian Zhilin's childhood hometown and his affection for the maiden far away in Suzhou. *The Untitled Poems Series* was created in 1937 when Bian Zhilin visited Zhang Chonghe several times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rather a recall his trip to Suzhou in the autumn of 1936. Textual research on Bian Zhilin's representative poems indicates that love and adoration in the heart of poet could purify personality and add brilliance to life. The theme of love is not obvious i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while it can be traced clearl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Bian Zhilin; *Fragment*; *The Untitled Poems Series*; textual research

试论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创作特色

——以《人民文学》和网络新媒体平台非虚构文学作品为主要考察对象

成艳军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121)

摘要:近年来,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非虚构文学作品引起国内读者的广泛关注,始于《中国作家》和《人民文学》杂志对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刊发及引导,以及网络新媒体平台的助推。国内非虚构文学作品以梁鸿的“梁庄”系列作品为代表,以时空和情感“双重在场”的方式,呈现了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关注,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魅力。

关键词:非虚构文学;时空在场;情感在场;“人民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05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27-05

一、国内外非虚构文学考证辨析

(一)国外“非虚构文学”的发展流变

非虚构源自 Non-fiction 一词,在国外常被应用于图书分类。国外的图书通常由两大类型组成,一类是虚构类,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另一类是非虚构类,主要指新闻类、纪实类图书,包括人物传记、回忆录、新闻调查、科普读物等。国外的“非虚构文学”概念指的是滥觞于美国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虚构小说”创作热潮。“非虚构小说”一词,最早由美国新闻记者杜鲁门·卡波特在 1966 年提出,这一年,他花费六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闻纪实作品《冷血》(In Cold Blood)出版。该书因写作风格迥异而一时“洛阳纸贵”,出版当年即畅销三百多万册。卡波特创作《冷血》,缘起于他对一件震惊美国的知名凶杀案件的深度报道,书中描写了大量的案情细节,包括社会调查、人物访谈等。卡波特凭《冷血》一书,声誉鹊起,如日中天。他指出,《冷血》既不是普通的新闻报道,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小说,而是一部真实新闻报道和小说艺术特征并存的杂糅体,他将其称为“非虚构小说”,声称书中的每一句

话都有据可查。此后,美国另一名记者诺曼·梅勒的纪实作品《夜幕下的大军》(1968)、《刽子手之歌》(1979)相继出版,再次轰动了美国文坛。梅勒也声称,他的作品也是“非虚构小说”。

美国“非虚构小说”创作的理论依据,源自作家菲利浦·罗丝在《写作美国小说》中提出的一种“事实与虚构混淆不清的理论”^{[1]112}。究其产生的原因,美国作家沃尔夫认为:“当代严肃的纯文学小说家的创造力已经枯竭,无法继续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1]112}“非虚构小说”凭借对热点新闻题材背后故事细节的深入发掘,参与到美国当时社会的自我反思和批判之中。非虚构小说大量借鉴虚构类文学写作中的心理描写、独白、对话等叙事策略与技巧,与简单、直白的新闻报道相比,趣味性、可读性大大增强,能够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在艺术上,非虚构小说具有小说的形式、表现方式和艺术技巧,几乎具有小说的所有优点。虽然它在虚构上不如小说那样完全自由,但在内容上,它严格尊重客观事实,具有新闻报道的性质,其真实性是任何虚构的现实主义小说不能比拟的。”^{[1]117}

1978 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设立了特稿写作奖,

收稿日期:2021-12-02

基金项目:2021 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当代文学视域下的非虚构文学研究”(2021-ZZJH-496)

作者简介:成艳军(1984—),男,河南鹤壁人,文学硕士,郑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化研究。

进一步增强了非虚构写作的影响力。2001年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从事“非虚构”写作,作品总数达二十余部。2015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凭“非虚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摘得诺贝尔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影响力愈加强大,在国外的畅销书中,“非虚构”作品常年占据主导地位。如今,“非虚构”写作已经成为国外高校创意写作课堂的重要教程之一。

(二)国内非虚构文学创作考察

1. 2010年前的发展历程

据笔者考证,最早把“非虚构”文学概念介绍到国内的是美籍华人学者董鼎山,他在《所谓“非虚构小说”》^{[2]133}一文中,介绍了美国“非虚构小说”的发展情况。王晖和南平在1987至1988年间,相继发表三篇论文(《对于新时期非虚构文学的反思》^{[3]64}《1977—1986中国非虚构文学描述:非虚构文学批评之二》^{[4]35}《生活真实与非虚构文学作家的真诚》^{[5]60})讨论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创作问题。他们尝试将美国的“非虚构文学”概念来对应“中国的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和口述实录体”^{[4]35}等作品。之后,聂珍钊、王晶、缪俊杰、吴炫等学者也曾撰文阐释“非虚构文学”。此外,在1988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美国作家约翰·霍洛韦尔的《非虚构小说的写作》中译本,这是国内最早引入的“非虚构”写作教程。

在1990年代,“非虚构文学”的讨论依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新世纪后,国内个别文学杂志开始推介“非虚构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在2005年10月发布公告:“从2006年起,《中国作家》杂志将由月刊改为半月刊,每月出刊两本。分为《中国作家·纪实》和《中国作家·小说散文》。”^[6]并在《中国作家·纪实》中常设“非虚构论坛”栏目,企图促成“非虚构文学”讨论的热潮。当代作家邢军纪对《中国作家》的改革寄予厚望,他指出:“‘非虚构论坛’的提法是很合适的,因为非虚构文学从理论上还是比较薄弱的,要通过这个刊物,建立自己的阵地,与虚构文学阵地相对峙。要把‘非虚构’叫响,真正用文学来表达真实和生命。”^[6]学者卢跃刚也曾讲:“《中国作家》杂志要建立两个高目标:一是通过作品引领非虚构文学的潮流,二是通过认识引领非虚构文学的理论建构,即通过对这种文体的开创性解读来建构中国特色的非虚构理论框架。”^[6]此外《钟山》《厦门文学》《延安文学》也都在2010年前开设过“非虚构”类作品专栏,但都没有在文坛上引

起足够的重视。

2. 《人民文学》引发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创作热潮

真正推动“非虚构文学”驶入发展快车道的是《人民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从2010年第2期始,增设“非虚构”栏目,陆续刊发《梁庄》《中国,少了一味药》《词典:南方工业词典》《羊道·春牧场》《羊道·夏牧场》《盖楼记》《拆楼记》《女工记》《相亲记》《生死十日谈》《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宣传队》《定西笔记》等系列“非虚构”文本。其他杂志和网络新媒体平台协同跟进,在全国迅速掀起了“非虚构”创作的热潮。文艺批评界积极回应,促使“非虚构文学”研究急剧升温。截至2021年11月24日12:00时,笔者通过中国知网学术平台,以“非虚构”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查询,共得出4514条相关信息。其中1988至2009年,共445条信息;2010至2021年,共4027条信息,后者占比达89.21%。以上数据说明,非虚构写作在2010年之后才真正得到批评界的集中关注。

2010年以来,批评界对“非虚构”的争议很大。目前,已由最初的排斥、批评、否定为主,转为接纳、客观、冷静地分析研究阶段。2021年5月23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社会学评论》和《探索与争鸣》杂志共同主办了“非虚构写作与中国问题——文学与社会跨学科对话”研讨会。围绕非虚构写作的概念与方法、非虚构写作与真实的关系、非虚构写作的时代思想性、非虚构写作与情感的关联、非虚构写作与记忆书写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何平、洪治纲、梁鸿、屠毅力、王磊光、项静等学者均提出了各自的理解和看法。十年来,“非虚构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构的快速发展,表明“非虚构”写作的生命力是旺盛而持久的,已经成为我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塑造时代精神的参与者、共建者。正如“非虚构”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梁鸿所言,文学的概念不应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和发展的。“非虚构”则是让文学重返现实的实践,“试图重建文学与现实、重建知识者和‘人民大地’的关系”,“重建一种新的更加融会贯通的知识体系”^{[7]99},当用这一新的知识体系来观照文学时,可以使文学激发出新的审美特质。

二、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创作特色

在当代西方文论中,“非虚构小说”蕴含着特殊的文学审美特性。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格林伯雷《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一文,在讨论卡波特的《冷血》

和梅勒的《刽子手之歌》等“非虚构”作品时指出：“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术语，用来描述诸如官方文件、私人文件、报章剪辑之类的材料如何由一种话语领域转移到另一种话语领域而成为审美话语……不仅因为这里的审美话语已经完全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捆绑在一起，而且因为这里的社会话语已经荷载着审美的能量。”^{[8]715}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创作的技巧和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西方“非虚构小说”的影响，笔者认为其突出表现在“时空在场”和“情感在场”的“双重在场”创作模式和显著的“人民性”特质两个方面。

（一）“时空在场”和“情感在场”的“双重在场”创作模式

2010年《人民文学》为进一步激励“非虚构”写作，推出了“人民大地·行动者”写作计划启事，设立基金，资助鼓励作家们，离开书斋，离开电视机、报纸这些二手信息，走向民间，深入一线生活。“以‘吾乡吾民’的情怀，以各种‘非虚构’的体裁和方式，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9]208}从《人民文学》的上述倡议中，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在场”“行动”是构成“非虚构”文学创作的重要元素。依笔者看来，所谓“在场创作”，就是创作主体要对客体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观察和研究，以保证作品内容的真实性 and 可靠度。此处的“在场”，不仅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一种简单的“时空在场”，也包含着一种深层的“情感在场”。这种“双重在场”的创作方式，促使创作主体、客体和读者三者间在情感上形成“同频共振”，达到强烈的“共情”效果，使得社会生活的真实与文学艺术的情感真实很好地融合。

梁鸿在讲述《中国在梁庄》的创作经历时讲：“我想强调一种‘在场’感，作者、读者和人物在同一段历史和时间之内，而不是单纯的观望者和审视者，这样，才有可能更深刻地进入乡村生命的内部，可以真正感受他们的悲伤、疼痛或者快乐、幸福，并真正察觉他们所处的历史处境及痛苦的来源。”^{[10]3}梁鸿的“梁庄系列”（《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都是在她的“见证”和“双重在场”的创作理念下完成的。梁鸿在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重返家乡——河南省穰县梁庄；她用五个月时间深度体验当下的乡村生活。她不但对村庄的老人、妇女、孩子等进行了采访聊天，而且还对村庄的自然历史环境、政治改革、文化结构、家族姓氏、家庭伦理道德等进行田野调查，尤其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乡人的情感等精神状态进行了重点考察和剖析。《出梁

庄记》则是作者历时两年时间，对分布在穰县县城、西安、信阳、南阳、广州、东莞、内蒙古、青岛、郑州、北京、厦门、深圳等城市，靠打工和做小生意等谋生的数百名“梁庄人”，进行实地走访，“在场”聆听村民自述自己故事的实录书写。

《中国，少了一味药》的作者，亲自设法潜入江西上饶的传销组织，进行了23天的“卧底在场”生活。通过“卧底在场”，掌握了传销组织的真实情况。《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的作者萧相风，则是数以亿计的普通“打工仔”中的一员，他在多年的打工生涯中，几乎干过所有的工种岗位。这些“在场”的工作经历，是他进行“非虚构”创作的基础，《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的“在场”感鲜活地体现在“流水线”“工服”“打卡”“工伤保险”“ISO”“辞工”“出租屋”“摆地摊”“仓管”“倒班”“工伤保险”等现代工业词汇中。

由上述“非虚构”文本，可以感知其叙事风格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化”风格，而是采用了一种既像社会学、人类学调查，又有些现实主义文学特征的混合性艺术形式。通过这种特殊的形式，使得作者、作品和读者间达成“双重在场”（“时空在场”和“情感在场”），充分展示了“非虚构文学”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魅力。

（二）显著的“人民性”特质。

1. 何为“人民性”

据笔者考证，在西方文艺理论中，“人民性”概念最初的内涵，与西方启蒙话语体系中的“现代性”“民族性”“国家”等词关系密切。在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已有比较鲜明的体现。德国的莱辛在谈论英国莎士比亚及其戏剧时，最早指出是“具有人民性的伟大天才”^{[11]100}。在俄国，“人民性”最早由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提出：“作家的人民性是一种只能为本国同胞充分赏识的优点——对于别国人来说，它要么就不存在，要么可能是一种缺陷。”^{[12]151}其后，别林斯基对“人民性”的概念进行了深化，指出：“人民总是意味着民众，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阶层。”^{[13]82}他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一文中指出：“人民性算不得真正艺术作品的优点，只不过是它的必要条件。”^{[14]190}可以看出，他们都把文学作品中的“人民性”与民族、国家的概念紧密联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人民性”等同于“民族性”。

明确提出把“人民性”作为衡量作家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的是俄国的杜勃罗留波夫。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斯曾讲：“在最近同第

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交谈中可以看到,他们执着地希望回到自己的民族环境之中。他们反复提到自己国家的名称,注意到‘我们’这一集合词……我们如何能够比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做得更好……总之,他们把问题提到了‘人民’的高度上。”^[15]⁴⁶ 詹姆逊深刻的见解,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有着非常鲜明的体现。

在我国的古典文论中,“人民性”的概念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的民本思想,之后在历朝历代的文论中都有体现。五四运动前后,中外思想在国内激烈碰撞,“人民性”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以1918年周作人和李大钊先后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人的文学》和《庶民的胜利》为代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学艺术中的“人民性”进行了新的界定和解释,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新世纪以来,“人民性”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阐释。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16]。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文艺的“人民性”进行了更新的阐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当代文艺创作的纲领和行动指南。

2. 显著的“人民性”特质

在笔者看来,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备“人民性”,其核心要义在于:作者是否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进行创作,是否真实地书写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情感,是否对人民群众的遭遇、苦难和不幸表示真切的同情和怜悯。对此,评论家欧阳友权曾指出,文学的“人民性”的第一要求就是“写作者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17]。2010年以来,国内非虚构文学创作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人民性”的彰显。如梁鸿的“梁庄”系列,李娟的“羊道”系列,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郑小琼的《女工记》,丁燕的《到东莞》等作品,无一不是对最广大的农民、“农民工”、普通工人的生活、工作、情感等的真实书写,很好地诠释了非虚构文学的“人民性”特质。

国内当代非虚构文学作者大体上由三大类别构成:第一类是专职作家的非虚构写作;第二类是非专职作家,但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如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新闻工作者等;第三类则是广大的文学爱

好者,如网络写手等。就作品的艺术水准而言,第一、二类作者的作品要优于第三类作者的作品。从数量上看,无论是作者人数还是作品总量,第三类要远远大于前两类。前两类作者中,以冯骥才、乔叶、梁鸿、孙惠芬、袁凌等为代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记录了“小人物”的生活和情感,在看似冷静旁观的叙事中,隐含着作者对“小人物”命运遭遇的深切同情。第三类广大的文学爱好者从事非虚构写作,他们自身的身份属性就已经具有了“人民性”。

从非虚构作品发表的渠道来看,第一、二类非虚构作者的作品多发表在文学杂志、报纸等传统纸媒上,如《人民文学》《收获》《钟山》《中国作家》等;第三类作者的作品则主要发表在网络新媒体平台上,如“谷雨故事”“网易人间故事”“真实故事计划”“故事硬核”“正午故事”“GQ”“人物”等。网络新媒体平台上的非虚构作品,同时也是网络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妨称为“非虚构网络文学作品”。“网络文学”与大众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评论家白烨曾在《文艺报》发表题为《网络文学的人民性特质》一文,对网络文学的“人民性”特质进行了分析,并给予了充分肯定^[18]。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0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中指出,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达4.60亿人,日均活跃用户约757.75万人;2020年累计创作网络文学作品2905.9万部,网络文学作者达2130万人。可以看出,我国已经进入了“全民写作”的时代。网络文学的“人民性”特色鲜明,而直接描写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非虚构网络文学作品”,其“人民性”特质无疑更加突出。

“非虚构网络文学作品”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的便利,得到了极大的传播,许多作品通过微信公众号、博客、微博、QQ空间等新媒体平台,瞬间即可推送至普通民众的眼前。如“界面新闻”的“正午故事”公众号,在2017年推出了普通家政服务人員范雨素的非虚构作品——《我是范雨素》,该文是文学爱好者范雨素对自己家人平凡生活的书写,语言简练直白,人间烟火气十足;该文点燃了普通民众的热情和共鸣,朋友圈争相转发,迅速登上热搜,仅三四天时间阅读点击量就达到数百万。如此快速巨量的阅读量,令传统纸媒难以企及。在流量为王的网络社会,关注量和阅读量是经营创收能力的最核心指标。这类非虚构写作已经成为一种写作潮流,激发了资本界、网络媒体界的关注和兴趣,争相设立非虚构写作共享平台,为更多的非虚构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机会,进一步促进了非虚构创作的繁荣。

三、结语

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作者运用“时空在场”和“情感在场”的“双重在场”创作模式,在大量现场调查采访的基础上,真实传达创作对象的细节特征,甚至在作品中直接让人物说话,采用问答、独白等形式来表达他们自己对生活和对世界的看法或思考。大量非虚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网络新媒体平台上的“网络写手”,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小人物”。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体,正是由这些千千万万的“小人物”所组成,书写他们就是书写人民;同时,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16]的文艺创作方向。

参考文献:

- [1] 聂珍钊. 根和非虚构小说[J]. 外国文学研究, 1989(4).
- [2] 董鼎山. 所谓非虚构小说[J]. 读书, 1980(4).
- [3] 王晖, 南平. 对于新时期非虚构文学的反思[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7(1).
- [4] 南平, 王晖. 1977—1986 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描述[J]. 文学评论, 1987(1).
- [5] 王晖, 南平. 生活真实与非虚构文学作家的真诚[J]. 当代文坛, 1988(2).
- [6] 曹颖新. 《中国作家·纪实》倡导非虚构文学[N]. 学习时报, 2005-10-3.

- [7] 梁鸿. 非虚构文学的审美特征和主体间性[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1(7).
- [8] 程正民, 曹卫东. 二十世纪全球文学经典珍藏[C].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9] 李敬泽. “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启事[J]. 人民文学, 2010(11).
- [10] 梁鸿. 梁庄的疼痛·序三[M]//梁鸿. 中国在梁庄.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7.
- [11] 陈恕林. 论德国浪漫派[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 [12] 普希金. 普希金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 [13]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论文学[M]. 上海: 新文艺出版社, 1958.
- [14]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选集: 第一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3.
- [15] 詹姆逊.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J]. 当代电影, 1989(6).
- [16] 习近平.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N]. 人民网, 2014-10-15.
- [17] 欧阳友权. 网络时代仍需倡导人民写作[N]. 光明日报, 2014-05-19.
- [18] 白烨. 网络文学的人民性特质[N]. 文艺报, 2020-10-26.

(责任编辑 刘海燕)

On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on – Fictional Literature

——Take *People's Literature* and Non – fictional Literary Works on the
Network New Media Platform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CHENG Yanjun

(Zhengzhou Technical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121, China)

Abstract: Non – fiction literatur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in recent years. Non – fiction literature began to attract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domestic readers when magazines like *Chinese Writers* and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ed and guided non – fiction literature, and the new media platforms on the Internet also took a part of it. Domestic non – fiction works, represented by Liang Hong's *Liang Zhuang* series, show the focus on the “little Character”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by the “double presence” of space – time and emotion, , which has unique social value and artistic charm.

Key words: non – fiction literature; space – time presence; emotional presence; “People's character”

协同融合视阈下河南省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金融供给研究

——2006—2019年基于协调度模型的经验分析

赵健

(河南工程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黄淮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要:以河南省为例,构建了反映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普惠金融发展的指标体系,分别采用欧氏距离法和因子分析法测度了两者的发展水平;随后借助协调度模型,测度了文化产业和金融供给两系统的协调等级;并利用 σ 收敛和绝对 β 收敛分析了两系统协调度的动态变化特征。研究认为,目前河南省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处于弱度失调,各地市间协调度存在差异,但收敛特征明显,区域间非均衡发展在逐步减弱。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推动河南省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的协同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协同融合;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金融供给;协调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06

中图分类号:F832.5;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32-07

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文化产业在一个国家和地区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愈加重要,其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亦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都离不开文化产业的有力支撑,其在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增长方式转变和培育经济增长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作为中央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经历了从认识到发展再到今日的全面推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2018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作出重大部署,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指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and 市场体系,要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经济政策”;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

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及扶持力度的增加,文化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力度也在不断攀升。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及其在世界文化市场中所占份额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地位是不太匹配的。2018年12月数据显示,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美国遥遥领先,占43%;其次是欧盟,占34%,而人口众多的亚太地区仅占19%,其中中国不足3%,这说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软实力已成为迫切的实践诉求。文

收稿日期:2022-01-20

基金项目:2020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精准扶贫视阈下河南省普惠金融的供求机理、耦合效应与绩效评估研究”(2020-YYZD-09);2020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的绩效评价及模式创新研究”(2020BJJ048);2020年度驻马店市“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赵健(1977—),女,河南新野人,经济学博士,黄淮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普惠金融与农村金融。

化产业与金融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匹配的金融供给,因此从协同融合视角,测度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剖析金融与文化产业的互动机理,对于清楚认识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寻求与文化产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供给模式,有效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从现有文献看,对于本题的研究采用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协同发展的机制分析、金融对文化产业的效应分析以及金融供给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事关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美好生活,文化产业与金融存在协同融合、互利共生的关系,但金融对文化产业的支撑不足,在作用机制、传导路径和相关政策方面尚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部分文献探讨了文化产业与金融的协同融合机制。这部分研究基本认为文化产业与金融存在互利的共生关系,协同融合对两者都是有益的。李露^[1](2018)从共生协同、耦合协同和聚合扩散协同3个方面,剖析了文化产业不同发展阶段与金融的互利共生融合机理。陈能军等^[2](2016)基于产业集群优化视角,在汕头市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基础上,研究金融与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机理,研究认为金融与文化产业存在互利关系。魏鹏举^[3](2016)探讨了新常态下文化产业金融供给体系,研究认为,中国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要求与其相适应的金融供给格局也应该是多元化、多层次的。

一部分文献实证研究了金融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效应。这部分文献定量分析了金融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并从金融角度探寻了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周凯、高玮^[4](2017)基于江苏省2013—2015年13个地市的的面板数据,基于回顾模型,分析了金融供给对文化产业转型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对文化产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顾江等^[5](2018)实证发现,金融错配对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从中国的数据看,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喻蕾^[6](2021)从产业创新、产业协调、产业开放和产业共享4个维度构建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袁渊、于凡^[7](2020)构建了包括产业效率、文化创新、协调发展、发展环境和对外开放5个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31个省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显示: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整体偏低,区域间存

在明显差异。江晓晗、任晓璐^[8](2021)以长江沿线11个省份为样本,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测度了各省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并借助Tobit面板模型分析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区域间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技术创新、新媒介发展和普及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一部分文献探寻了金融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这一部分文献基于对样本文化产业的现状分析,采用定性分析方法,提出文化产业与金融协同融合的对策。朱贾昂^[9](2017)研究了文化产业与金融的对接问题,从金融端、产业端、外部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的匹配对策。朱兴龙^[10](2017)以哈尔滨市为例,研究了金融对文化创新的影响,研究认为金融供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因素,但目前金融供给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不畅通、机制和政策不完善,成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肖虹、罗青林^[11](2017)认为应从扩大文化产业与金融合作领域、培育文化企业骨干以及合理布局文化金融生态圈等方面发挥金融供给文化产业的积极作用。徐鹏程^[12](2016)认为应加速金融供给侧改革,积极推进两者融合发展。余晨^[13](2016)从资本论视角、陈禹^[14](2016)从互联网金融视角、侯英^[15](2016)从金融创新视角研究金融与文化产业问题,这些研究基本认为金融供给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机制和政策不畅通,需要从支持模式、支持体系等方面改进,以满足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资金需求。

从现有文献看,几乎没有具体以河南为例研究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的,作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新兴工业大省,河南同样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文化大省,最近5年,河南文化产业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2018年全省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142.51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29%,文化产业已成为河南省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之一;2020年,有191个重点文化旅游项目开工,总投资7453亿元,其中重点文化旅游项目66个,总投资1837亿元;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沿黄生态廊道等标志性重大建设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中,这些项目势必会为河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本文将分析文化产业与金融的协同融合机理,并在此基础上以河南省为例,剖析其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金融供给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提升金融供给力度和效率的对策及建议,这对推动河南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的协同融合机理分析

协同融合是指不同事物和不同个体在发展过程中,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资源整合、相互融合和协调合作形成互相拉动效应,进而推动事物发展。协同融合不仅可以带来整体共赢,还可以增加个体间的相关关联,推动参与个体的发展。当前,文化产业和金融供给间的协同融合机理包括共生协同融合、耦合协同融合和聚扩协同融合。

(一) 共生协同融合

所谓共生是指不同事物相互融合,共同生存发展,依据是否获利可将共生关系分为寄生、偏生和互利三种。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之间存在互利共生关系,这是因为金融为文化产业发展壮大提供了血液,并通过对文化产业的支持获取高额投资利润。两大主体以供给和需求身份在金融市场中,相互融合、协调发展,实现社会资源分配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一方面,金融提供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必需资源。文化产业通过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两种渠道从金融市场获取资金支持,前者通过发放贷款等方式实现间接融资,后者通过发行股票、风险投资等方式实现直接融资。与其他产业相比较,文化产业经营风险高、回报率高,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考虑,使得文化产业在信贷市场的融资不甚给力,因此文化产业更倾向于直接融资,在其发展过程中通过发行股票和吸收风投资金等方式在资本市场获取用于产品研发及自身科技创新的资金,实现文化产业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金融在为文化产业提供资金的同时获得了高额回报,并优化了其内部发展。从直接融资看,资本市场将社会分散的闲置资金集中到证券市场,为文化产业研发、创新提供了足够的资金,同时活跃和壮大了资本市场。从间接融资看,金融机构向文化企业发放贷款,企业获得发展资源,使得文化产品创新成为可能,独创产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将获得丰厚利润,从而会支付金融机构较高回报,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发展、提升其竞争力。

(二) 耦合协同融合

金融和文化产业存在明显的耦合协同融合效应,在“相互促进、联动发展”的协同作用下,两者均得到积极发展,且各自内部的个体参与者也受益颇多。要真正实现“1 + 1 > 2”,复合系统整体效益高于两系统效应总和,就需要降低或者避免金融与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摩擦行为,推动两者良性协同融合。金融供给与文化产业耦合协同渗透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且呈现不同的特点。

文化产业发展初期,政策性金融供给与文化产业耦合协同融合。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未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文化企业在发展之初,普遍存在资金不足问题。这一时期,除了少部分内源资金外,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资金的政策性金融扶持。一方面,商业银行机构出于风险考虑,不愿意向文化企业发放贷款;另一方面,文化企业在发展之初又不具备上市条件,无法实现直接融资。为解决上述资金困境,政府应发挥市场调控作用,促使政府、商业银行和文化企业协同融合,为文化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性金融供给,主要方式包括采取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及贷款补贴等,调动商业银行向文化企业投放贷款的积极性。文化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策性金融供给将适时退出。

文化产业成长阶段,政策性金融供给、商业性金融供给与文化产业耦合协同融合。这一时期,商业性金融机构通过风投和信贷与文化产业耦合协同,将社会闲置资金供给于文化产业,与政策性金融供给相配合,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促进文化产业的实质性发展。同时,通过对文化产业的金融供给,丰富了金融产品,优化了金融结构,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壮大和质量提升。

文化产业成熟阶段,商业金融与文化产业耦合协同,政策性金融逐渐退出。这一时期,文化产业经过前一阶段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内源资金,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和上市条件,在资本市场通过发行新股及增发股票大规模募集资金。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既可以优化文化企业资本结构、降低发展风险,又可以使投资者有更多可选择的投资对象,投资优质企业成为可能,获得丰厚投资报酬。文化企业和金融供给双方相互协同,后者支持前者,前者给后者带来经济回报,提升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共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三) 聚扩协同融合

金融供给促进文化产业资源集聚和扩散效应发挥,最终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金融供给可通过向文化企业定向精准支持将政府相关部门和各金融机构聚合起来,不仅能将社会闲置分散资金聚集起来,又能借助金融市场的股权交易等方式,使文化企业实现参股、控股、收购、兼并等,从而加快投资资本、文化人才和新技术集聚,使得文化企业能够及时吸收高新技术创新成果。集聚作用的优势一旦触发,就会产生虹吸效应,吸引更多的市场要素、技术资源进一步集聚,更多市场主体加入这一系统,文化产业规模增大,扩散发展。这种扩散发展达到一定

程度后,文化产业就会突破原有人力成本、创新资金等降低文化产品边际收益的不利因素,向纵向和横向延伸发展,一部分具有竞争优势的文化企业会借此扩展发展规模,带动整个文化产业效率提高,扩散机制进一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金融资金也会随之扩散到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阶段,最终实现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文化产业为金融供给集聚提供平台,加快金融资源聚合。文化产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反向促进金融供给主体增加,金融产品种类丰富,金融供给规模扩大,金融供给结构优化和金融供给制度完善,金融供给资源不断集聚,其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的优势会得到充分发挥,逐步提高金融供给效率,金融资源集聚扩散作用得到强化。

三、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有效保障,从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实际诉求构建测度其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对于正确认识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存在的实际问题、进一步提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指标体系构建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应能充分体现文化产业的内涵、基本目的和发展理念。与其他产业相比较,文化产业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本质属性是意识形态,通过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和宣传,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指引和价值引领,实现意识形态从“产品”向“商品”的转变(喻蕾,2021)^[6]。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目的在于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同时,遵循指标的客观性、可量化性、层次性和可比较性等原则,本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包含4个方面,20个观测指标,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采用第一、二产业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表示,所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二) 测度模型

各观测变量量纲不一致,因此选择欧氏距离测度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文中数据来源于《河南省统计年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河南经济发展报告》,样本时间为2006—2019年。这是因为2005年河南省开始启动文化产业政策,这一年6月2日,河南省委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文化强省”在河南省委决策层达成共识;同年7月,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支持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相继出台;2006年

10月,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八次党代会上,正式提出了包含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在内的“两大跨越”,至此,文化强省战略上升为指导河南未来发展的最高战略之一。

表1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指标	单位
产业效率	产业投入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	个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数	人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资产总额	万元
	产业产出	文化部门教育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数	个
		文化部门教育机构在校生人数	个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劳动生产率	元/人
产业协调	城乡协调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利润总额	万元
	产业结构	城乡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	%
产业开放	国际旅游	产业结构高级化	%
		入境过夜旅游人数	万人
	文化交流	入境旅游收入	美元
		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数	个
		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参与人数	人
		资源	每万人拥有风景名胜区面积
产业共享	设施共享	人均拥有图书馆藏书数量	册/人
	设施共享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	平方米
	设施共享	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平方米
政府支持	政府支持	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	%
	政府支持	一般公共预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亿元

首先采用离差法消除各观测指标量纲差异,计算

公式为 $D_i = \frac{X_i - X_{\min}}{X_{\max} - X_{\min}}$, 其中 X_i 为指标观测值, X_{\min} 和 X_{\max} 分别表示各指标观测值中的最小值和最大

值;随后利用离散系数 $v_i = \frac{s_i}{\bar{x}_i}$ 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s_i 为该指标观察值的标准差, \bar{x}_i 为该指标观察值的

平均值,权重的计算公式为 $w_i = \frac{s_i}{\sum_{i=1}^{20} s_i}$;最后采用

欧氏距离公式测度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其计算公式如(1)所示。

$$QCI = 1 - \sqrt{\frac{w_1(1 - D_1)^2 + w_2(1 - D_2)^2 + \dots + w_{20}(1 - D_{20})^2}{w_1^2 + w_2^2 + \dots + w_{20}^2}} \quad (1)$$

(三) 结果分析

按照上述测度模型计算步骤可得到河南省2006—2019年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值,其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变化趋势反映了河南省文化产业的演进历程,在过去的14年内,其

大致历经启动、快速发展和调整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与中国文化产业整体发展步骤基本一致。

2006—2008年是文化产业发展启动阶段,这一时段在国家发展文化产业大背景下,河南开始有重点地扶持文化改革试验区和示范园区,探索发展经验。2003年中央设立“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经过2年多试运行,获得肯定性认可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河南也由此拉开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序幕。2005年制定并出台《河南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05—2020年)》,随后积极推动国有文化企业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搭建文化产业发展平台、重点发展文化改革试验区,在文化体制和市场机制政策构建两方面探索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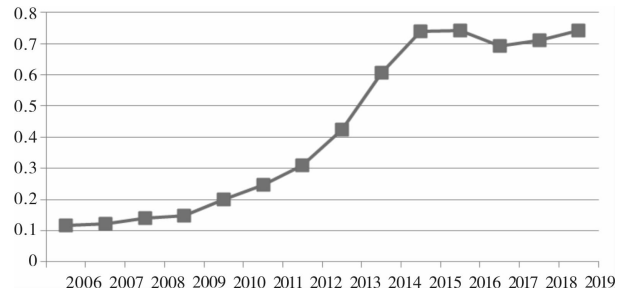


图1 2006—2019年河南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变化趋势图

2009—2013年是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段河南加大文化投入,文化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文化产业却逆向而行,成为经济增长的闪光点。2009年,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河南省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大建设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步伐、扩大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实施文化产业“双十工程”,在全省范围内择优培育和扶持10个重点文化产业园区和10个重点文化企业,同时完善相关政策,进一步优化环境,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

2014—2019是文化产业调整阶段,这一时期发展步伐减缓,2017年成为该阶段发展低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总方针,标志文化产业开始由政策为主转向市场内生机制构建,更为注重质量发展。河南省开始将关注点转向中小文化企业、新兴文化产业及特色文化发展,制定和实施了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政策,为中小文化企业发展搭建平台,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设立新兴文化产业财政专项资金,引导产业投向,驱动民间投资涉足文化产业发展;立足河南,挖掘中原特色文化,注重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和文脉保护等。

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供给的协同融合研究

为分析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供给两系统间的协同融合的关系,首先,需要度量金融供给状况;其次,借助协调度模型进行分析。

(一)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

鉴于上述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是基于表1的20个正向指标而来,度量值为指数,因此对金融供给状况也采用指数形式表示,此处选择普惠金融发展指数FDI来表示。选择8个可测指标^[16](赵健,2021),从金融可获取性、人口渗透度和有效性三方面反映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8个可测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计量普惠金融发展指数^①。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河南省统计局网站及历年《河南省统计年鉴》等。

表2 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

指标含义	指标计算方法
金融服务的可获取性	人均存款总额 = 存款总额 / 总人口 人均贷款总额 = 贷款总额 / 总人口
金融服务的渗透度	人均拥有的金融机构数 = 金融机构总数 / 总人口 人均拥有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 =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 / 总人口
金融服务的保险深度	保险深度 = 保费 / GDP
金融服务的保险密度	保险密度 = 保费 / 总人口
金融服务的居民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	居民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 = 存款余额 / GDP
金融服务的居民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	居民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 = 贷款余额 / GDP

(二)模型构建

文章借鉴魏卫^[17](2021)、杨应策^[18](2021)等人研究结果,构建协调度模型如公式(2)所示。

$$D = \sqrt{\left[\frac{QCI \times FDI}{(QCI + FDI)/2} \right]^k} (\alpha \cdot QCI + \beta \cdot FDI) \quad (2)$$

其中, D 为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两系统的协调度, k 为调节系数,一般取值为不小于2的整数,这里采用经验值,选择 $k=2$, α 和 β 为待估系统权重,文章认为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同等重要,因此 $\alpha = \beta = 0.5$ 。公式(1)计算出 D 的取值范围为 $0 \leq D \leq 1$,该值越接近0,表明各子系统间的协调度越差;越接近1,则说明协调度越高;以0.1为单位,划分为10个级别。

(三)协调度测度结果

依据公式(2)可测度出河南省2006—2019年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供给间的协调度等级,结果如表3所示。

从测度结果看,河南省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间的平均协调度为0.4012,属于弱度失调,说明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间尚未形成良性融合;从历年指数

变化情况看,呈逐年递增趋势,从最初的极度失调向中度协调变化,说明在过去的14年内,河南文化产业取得的瞩目成绩离不开有效的金融供给,两者在实践中摸索融合,协同发展。

表3 2006—2019年河南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供给协调度等级

时间	协调度 D	协调度等级	协调状况
2006	0.0306	1级	极度失调
2007	0.0399	1级	极度失调
2008	0.0742	1级	极度失调
2009	0.1739	1级	高度失调
2010	0.1631	2级	高度失调
2011	0.2712	2级	中度失调
2012	0.3138	3级	低度失调
2013	0.4039	4级	弱度失调
2014	0.5017	6级	弱度协调
2015	0.6665	7级	低度协调
2016	0.7789	8级	高度协调
2017	0.6610	7级	低度协调
2018	0.7524	8级	中度协调
2019	0.7856	8级	中度协调

(三)收敛性特征

为进一步剖析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两系统变化特征和区域间均衡发展差异,可采用 σ 收敛和绝对 β 收敛来判断协调度的动态变化过程。其中 σ 收敛的计算公式如公式(3)所示,公式中 n 表示河南省包含的地市个数,因此 $n=18$, D_t 表示第 t 期的协调度, \bar{D} 表示协调度的均值。公式(3)可用来考查协调度的波动趋势,如果 CV_{t+1} 大于 CV_t ,协调度是分散的,反之是收敛的。 β 收敛由回归模型(4)体现,用来判断协调度收敛的速度,如果绝对 β 收敛存在,说明河南省18个地市中,协调度较低的地市有追赶高协调度地市的特征。 σ 收敛的 CV_t 值和绝对 β 收敛的回归结果分别如表4和式(5)所示。

$$CV_t = \sqrt{\frac{1}{n}(D_t - \bar{D})^2} / D_t \quad (3)$$

$$\ln(D_{t+1}/D_t) = \gamma_0 + \gamma_1 \ln(D_t) + \varepsilon_t \quad (4)$$

表4 2006—2019年河南省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协调度 σ 收敛的 CV_t 值

时间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CV	0.2855	0.2134	0.1839	0.0908	0.1744	0.1613	0.1666
时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CV	0.1547	0.1617	0.1294	0.1314	0.1263	0.1210	0.1085

表4显示2006—2019年河南省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两系统间的协调度变化趋势基本是稳定的,2006年 CV 值为0.2855,2019年则降为0.1085,说明协调度偏离其整体平均值的离散程度在逐步减弱,协调度存在 σ 收敛特征,区域间不均衡发展差距在缩小。

$$\ln(D_{t+1}/D_t) = 0.026 - 0.159 \ln(D_t)$$

$$(0.102) \quad (0.058)$$

$$F = 7.581, R^2 = 0.639 \quad (5)$$

式(5)为回归模型(4)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回归结果,其中括号内数值为各变量对应的标准差, F 统计量为7.581,其对应 P 值为0.019,说明模型的整体线性关系显著;判定系数 R^2 为0.639,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达到较高;解释变量 $\ln(D_t)$ 对应的 t 值为-2.75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因此模型拟合比较理想。从回归结果看,回归系数为负值,且是显著的,说明河南省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的协调度存在绝对 β 收敛特征,在全省范围内,存在低协调度地市向高协调度地市追赶的特征。收敛速度可通过公式 $-\ln(1 + \gamma_1)/t$ 计算出,其收敛速度为1.24%。

五、政策启示

文章以河南省为例,构建了测度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普惠金融发展的指标体系,分别采用欧氏距离法和因子分析法测度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借助协调度模型,测度了文化产业和金融供给两系统的协调等级,采用 σ 收敛和绝对 β 收敛进一步分析了两系统协调度的动态变化特征。研究得出,目前,河南省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处于弱度失调,18个地市间协调度存在差异,但收敛特征明显,区域间非均衡发展在逐步减弱。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推动河南省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的协同融合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应强化金融支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力度,注重发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聚合作用,将分散、闲置的资金聚集到文化企业。

其次,应提升金融支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程度,从机制创新、模式创新、资源配置创新、金融链条创新等角度探索适用于文化企业的金融产品,靶向提升河南省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的协同融合水平。

再次,应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建立健全以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金融支持机制,在提升文化产业内部层次、创新文化产业品牌方面,探索金融支持新路径。

最后,应健全市场征信体系和信用评级制度,加强金融机构和文化企业之间的对接合作,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和环境保障。

注释:

①因篇幅所限,文章未给出因子分析法的具体实证过程及普

参考文献:

[1] 李露. 科技创新视角下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侧协同发展机制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 2018, 36(6): 70 - 73.
[2] 陈能军, 刘城, 赖明明. 产业集群优化与金融支持视角下的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以广东省汕头市为例[J]. 现代管理科学, 2016(11): 48 - 50.
[3] 魏鹏举. 新常态下中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学理探讨[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6, 30(4): 20 - 25.
[4] 周凯, 高玮. 公共支出、金融供给与文化产业发展[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12): 144 - 149, 156.
[5] 顾江, 车树林, 贺达. 金融错配对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理论与实证[J]. 江苏社会科学, 2018(1): 58 - 66.
[6] 喻蕾.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政策意义[J]. 经济地理, 2021, 41(6): 147 - 153.
[7] 袁渊, 于凡.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21): 62 - 66.
[8] 江晓晗, 任晓璐. 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2): 15 - 19.
[9] 朱贾昂. 金融对接文化产业的难题及对策[J]. 现代管理科学, 2017(5): 49 - 51.

[10] 朱兴龙. 金融供给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思考: 以哈尔滨市为例[J]. 武汉金融, 2017(3): 67 - 69.
[11] 肖虹, 罗青林. 金融供给文化产业发展路径[J]. 中国金融, 2017(2): 93 - 94.
[12] 徐鹏程. 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侧改革[J]. 管理世界, 2016(8): 16 - 22.
[13] 余晨. 基于《资本论》浅析我国文化产业金融融资的支持与创新[J]. 山东社会科学, 2016(S1): 231 - 232.
[14] 陈禹, 罗子欣. 现代文化产业的普惠型互联网金融供给[J]. 社会科学家, 2016(5): 50 - 54.
[15] 侯英. 文化产业金融供给体系创新研究[J]. 经济问题, 2016(3): 80 - 85.
[16] 赵健. 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2006—2018年基于VAR模型的经验分析[J]. 中州大学学报, 2021, 38(1): 22 - 27.
[17] 魏卫, 刘嫻嫻, 王晓宇, 等. 美丽中国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异质性探索[J]. 经济地理, 2021, 41(6): 30 - 38.
[18] 杨应策, 俞佳立, 夏梦凡. 居民健康水平与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的协调度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11): 53 - 5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Financial Supply in Henan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etic Integr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from 2006 to 2019

ZHAO J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nghuai University, Zhumadian, Henan 4630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measuring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inclusive finance. With the aid of Euclidean distance method and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he research measur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inclusive finance. Also,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coordinate coefficient model, coordination degree is measured in cultural industry and financial supply.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are further analyzed by using σ convergence and absolute β converge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financial supply in Henan Province are in a weak degree of imbalance,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different cities, but the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are obvious, and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is gradually weakening.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collaborative fus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financial supply in Henan Province.

Key words: collaborative fusion; cultural industry;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supply; coordination degree

电商发展的农村减贫效应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叶娟,顾一鸣

(安徽三联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随着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高,电商发展越来越普遍,电商或可以成为农村地区改善生活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使得脱贫方式多样化,有效促进扶贫开发工作。基于2014—2019年中国26个省份的相关数据,通过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电商发展的减贫效应,结论表明,在电商发展过程中,农村的贫困状况得到了改善,并且电商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周边地区的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也有积极的改善作用。

关键词:电子商务;减贫效应;空间面板模型;电商扶贫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07

中图分类号:F724.6;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39-05

一、引言

贫困问题一直是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世界性难题,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与解决更具有迫切性。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于贫困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投入脱贫工作,在此期间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在脱贫工作推进的后期,遗留下的主要是最难以解决的部分,这部分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自然环境脆弱、生存条件艰苦、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地区,他们的脱贫工作依靠“输血式”的方法是难以解决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特色脱贫方案,做到精准扶贫。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互联网普及率也越来越高。截至2020年6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67%,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52.3%,并且全国贫困村通光纤的比例达到了98%。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农村网络零售额高达17000亿元,有力支持了乡村振兴和脱贫工作,因此

通过电商途径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是有依据的。

随着我国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电商的发展势头良好,在国内形成了各种模式,如:沙集模式、义乌模式、遂昌模式、赶街模式、青川模式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电商的发展对于农村居民贫困状况的改善会产生作用。《“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提出,要将电子商务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将电子商务纳入扶贫体系,通过发展电子商务来提高贫困户的创业增收能力^[1]。

随着农村电商的发展和“互联网+”战略的提出,电商扶贫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模式,“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农业产业升级,可以建立现代农业产业链,完善农产品安全政策,为扶贫发展提供新机制,使得扶贫更加信息化、精准化和高效化,覆盖更多的贫困人口,改善教育、交通等问题,从多维度帮助农户改善贫困现状,实现多维减贫^[2];可以扩大农村创业与就业机会,通过培育电商生态发展,使得产业本地化,带动创业就业,促进本地服务业良性循环^[3];可以转变农民的思路,利用互联

收稿日期:2021-10-12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资助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安徽省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与引导策略研究”(SK2019A0754);安徽三联学院校级人文重点资助项目“精准扶贫视角下安徽省农村电商扶贫的绩效评估研究”(SKZD2018002)

作者简介:叶娟(1995—),女,安徽庐江人,硕士,安徽三联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电商经济研究。

网思维来发展农业,时刻紧跟市场的需求,农村电商将农产品与市场销售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得农业生产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生产者可以通过延长产业链、扩大生产规模等途径实现增富脱贫^[4]。

对于地方经济而言,电商的发展与普及会给农村提供新的发展思路,政府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引进大型企业,培育发展趋势强的企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并且可以为农民提供创收平台,为农产品提供对接市场的渠道,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因此,农村电商的发展可以解决农村中的一些问题,如信息鸿沟、产品流通不畅、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农业技术支持和辅导等。

综合上述文献的分析,电商的发展能对农村减贫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关于电商发展对于农村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需要从区域层面进行,各省份之间的电商发展情况差异明显,《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将各省份划分为:先导省份、中坚省份、潜力省份;并且各省份的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也存在差异,因此电商发展对于农村减贫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不同的地区电商发展的减贫作用存在差别。本文将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通过数据分析电商发展指数对农村居民贫困水平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一)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农村电商发展的减贫效应,考虑到空间因素,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一般形式如下:

$$POV_{it} = \tau POV_{i,t-1} + \rho w'_{it} POV_{it} + x'_{it} ECDI + d'_i X_i \delta + u_i + \gamma_t + \xi_{it} \quad (1)$$

$$\xi_{it} = \lambda m'_{it} \xi_{it} + v_{it}$$

其中, POV_{it}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的是农村的贫困水平; $ECDI$ 为解释变量,代表的是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指数; $d'_i X_i \delta$ 表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d'_i 为相应空间权重矩阵 D 的第 i 行; u_i 表示随机扰动项; γ_t 为时间效应; m'_{it} 为扰动项精简权重矩阵 M 的第 i 行。当 $\lambda = 0$ 时,为空间杜宾模型;当 $\lambda = 0$ 且 $\delta = 0$ 时,为空间自回归模型。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是2014—2019年全国的省份作为研究对象,由于相关数据缺失,因此剔除4个直辖市、台湾省、西藏自治区以及2个特别行政区,所以本文将剩余的26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被解释变量是农村居民的贫困水平(POV)。本文通过选用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进行衡量。因为在国际上恩格尔系数被公认为判定生活水平高低与贫富的重要标准,作为衡量农村居民的贫困水平十分合适。

解释变量是电子商务发展指数($ECDI$)。本文选用的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来源于《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该指数涉及电子商务发展的各个维度,包含电子商务的规模指数、成长指数、渗透指数以及支撑指数,对于电子商务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衡量。

控制变量包括:农户投资规模(SF)、农村产业结构(IS)、财政支农状况($CZZN$)、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基尼系数(NI)以及经济发展水平($PGDP$)。本文选择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居民贫困状况的影响,因为人均GDP动态地考虑了人口的变化,能够更加贴切地反映人民收入的实际变化^[5]。

表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计算方法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贫困水平	POV	恩格尔系数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核心解释变量	电子商务发展指数	$ECDI$	电子商务指数合成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
	农户投资规模	SF	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农村产业结构	IS	农林牧渔总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人均GDP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财政支农	FSA	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林水的部分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商品现期价格除以基期价格乘以100%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MLG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在进行实证分析时,为了克服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在计量过程中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如农户的投资规模、经济发展水平都做了取对数处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各

省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的均值为32.601,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将更少的钱用在了食品支出上。恩格尔系数的最大值为49.5,最小值为25.3,说明我国的农村居民的贫困差距比较大。根据恩格尔系数的数据进行梳理,发现从2014

年至 2019 年的趋势是逐年下降,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用于食品的支出不断减少;电子商务发展指数的最大值为 71.26,最小值为 7.2,说明各省份之间的电子商务发展指数的差异较大,因为各省份电子商务的发展规模、发展前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支持电子商务发展的环境因素都存在显著的差别。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OV	32.601	4.891	25.3	49.5
ECDI	20.937	13.778	7.2	71.26
SF	384.880	220.848	54.4	966.69
IS	0.418	0.165	0.102	0.891
PGDP	49858	17930	23151	115930
CPI	101.8	0.687	100.5	104.1
FSA	583.55	230.309	139.03	1310.89
MLG	173.339	116.582	14.7	477.06

三、电商发展的农村减贫效应空间计量分析

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对贫困水平(POV)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以判断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

(一)空间自相关分析

对于判断我国各省份的贫困水平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可以利用 Moran' I 指数进行测量。Moran' I 指数处于(0,1]时,说明存在空间正相关;当取值在[-1,0)范围内时,则存在空间负相关。本文利用 Geoda 软件得出我国各个省份的空间距离权重矩阵,再利用 Stata 14.0 软件计算出贫困水平在不同年份的 Moran' I 指数值。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贫困水平的 Moran' I 指数

年份	I	Z	P	年份	I	Z	P
2014	-0.211	-8.748	0.000	2017	-0.190	-7.684	0.000
2015	-0.218	-8.984	0.000	2018	-0.178	-7.067	0.000
2016	-0.203	-0.8231	0.000	2019	-0.134	-4.947	0.000

注:I 为 Moran 指数,P 为显著性水平,Z 为标准误

表 3 的数据表明,在 2014 年至 2019 年,我国各省份的贫困水平的 Moran' I 指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检验,因此强烈拒绝“无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即认为存在空间自相关。

(二)空间效应检验

空间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P 值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因此拒绝了“不存在空间效应”的原假设,即认为存在空间效应。

表 4 空间效应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statistic	p	检验方法	statistic	p
LM - Error	30.636	0.000	LM - Lag	26.612	0.000
Robust LM - Error	2.895	0.089	Robust LM - Lag	8.871	0.003

由表 4 可以看出,LM - Error 与 LM - Lag 两者都显著,因此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观察 Robust LM - Error 和 Robust LM - Lag 的结果,可以发现,仅有

Robust LM - Lag 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因此选择空间自相关模型。但在 10% 的置信水平下,二者皆显著,因此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对于空间自回归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检验值为 28.49,并且在 1% 的情况下显著,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若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对其进行 Hausman 检验,检验的 Hausman 统计量为正值,并且 P 值为 0,故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建立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对杜宾模型进行 Wald 检验和 LR 检验,Wald 检验和 LR 检验结果都显著,则接受 SDM 模型结果。

(三)电商发展的减贫效应模型估计

1. 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上面的分析,建立固定效应的空间误差模型以及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并对回归的结果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电商发展的减贫效应估计

	SDM(空间杜宾模型)	SAR(空间自回归模型)
ECDI	-0.0417** (0.0189)	-0.0407** (0.167)
lnSF	-0.319 (0.833)	-0.2664 (0.826)
IS	-4.301* (2.432)	-4.139* (2.410)
lnPGDP	-5.497*** (1.320)	-5.607*** (1.302)
lnSFA	-0.2808 (1.223)	-0.606 (1.014)
CPI	0.291 (0.214)	0.231 (0.182)
lnMLG	1.141* (0.668)	1.200* (0.653)
R ²	0.786	0.783

注:*、**、***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通过表 5 的模型回归结果可知,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和固定效应的空间自回归模型拟合的结果是相近的,并且 R² 达到了 0.786,说明拟合的方程能够很好地解释电商发展对于农村贫困水平的影响。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在空间计量的情况下研究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村贫困水平变化的影响。本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是电子商务发展指数。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系数为 -0.0417,且在 5% 的临界值上显著,说明电子商务发展情况会对农村贫困状况产生影响,根据系数的正负号可以得知,随着电子商务不断发展,农村的贫困状况会得到改善,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利于农业走向现代化、促进农业产业升级,构建现代农业产业链,并且可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民生活环境,多维度改善农村贫困状况。

农户投资规模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系数是 -0.319,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结果可知,随着农户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村的贫困水平会出现相应的下降,因为农户投资在固定资产上的资

金越多,说明持有的资金就越多,这时农户恩格尔系数就会下降。

农村产业结构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系数是-4.301,并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农村农林牧渔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升高,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会降低。因为随着农林牧渔总产值比重的不断上升,农产品附加值会增加,有利于提高农村的经济状况,这时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

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系数是-5.497,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会降低。因为人均GDP可以衡量个人的经济状况,人均GDP的升高说明个人生活状况的好转,因此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财政支农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系数是-0.2808,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回归的结构可知,随着财政支农的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村的贫困水平会降低,因为财政用于支撑农业的资金规模扩大,有利于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系数是0.291,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根据回归的结果可知,随着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居民的生活状况会变差。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说明货币的购买能力降低了,这时农村居民拥有的

资金相对而言会出现贬值效果,因此其生活水平会下降。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系数是1.141,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根据回归结果可知,随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的减少,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会降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的减少,说明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农村贫困群众人数的减少,农村越来越少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这有利于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

观察表5中的回归系数的结果,可以发现,在所有的解释变量中对于农村贫困水平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其次是农林牧渔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再次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虽然电商的发展对于农村改善贫困水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更好、更明显地改善农村生活水平:首先需要依靠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其次需要发展第一产业,使用现代化、规模化的生产技术,增加农林牧渔总产值;最后需要完善保障农村贫困居民的相关政策,提倡通过充分调动贫困户的积极性,发掘贫困户自身潜力,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劳动财富,由被动脱贫转向自主脱贫,实现扶贫又扶志。

2. 模型空间效应分解

本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通过空间效应分解得出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见表6。

表6 电商发展减贫效应分解

	SDM			SAR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i>ECDI</i>	-0.042** (0.019)	-0.071** (0.088)	-0.113 (0.090)	-0.041** (0.017)	-0.069** (0.033)	-0.111** (0.047)
<i>lnSF</i>	-0.369 (0.838)	-0.621 (1.598)	-0.990 (2.343)	-0.316 (0.837)	-0.607 (1.590)	-0.923 (2.391)
<i>IS</i>	-4.244* (2.463)	-7.021 (7.667)	-11.265 (9.418)	-4.091* (2.440)	-7.228 (5.351)	-11.320 (7.549)
<i>lnPGDP</i>	-5.706*** (1.438)	-9.236 (7.708)	-14.943* (8.552)	-5.832*** (1.375)	-9.947** (4.157)	-15.375*** (5.067)
<i>lnSFA</i>	-0.268 (1.247)	-0.569 (2.581)	-0.838 (3.666)	-0.596 (1.375)	-0.779 (1.806)	-1.375 (2.786)
<i>CPI</i>	0.309 (0.213)	0.384 (0.347)	0.694 (0.521)	0.251 (0.186)	0.390 (0.310)	0.641 (0.479)
<i>lnMLG</i>	1.228* (0.701)	3.988 (5.075)	5.217 (5.253)	1.260* (0.687)	2.102 (1.333)	3.362* (1.926)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由表6可知,电商发展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042,空间溢出效应为-0.071,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电商发展能够降低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并且可以认为对于其他地区的影响程度高于对本地区的影响程度。电商发展有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农产品走出去,农业技术引进

来,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会促使农村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的特色,增强农村经济实力。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根据电商发展对农村减贫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空间面板回归分析,利用2014年至2019年我国26个省份相关的数据,检验电商发展与农村减

贫效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电商发展对于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效应;第二,电商发展对于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具体来说,电子商务发展指数的直接效用的减贫效应会小于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说明电商发展对于周边具有积极的辐射作用和带动示范作用,有利于周边地区的经济等发展。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积极鼓励发展电商,改变农村发展现状。面对现在互联网发展的势头以及数字经济的普及化,各地区应该掌握好发展时机,借此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状况,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产品提供更多的销售渠道。首先,电商发展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因为通过发展电商,可以降低生产的销售成本,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促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价值;其次,电商发展可以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让农村产业生产变为以市场为导向,有利于实现规模化生产;最后,电商发展可以改变贫困地区的社会环境,无论是人才匮乏、还是人口老龄化,电商发展有利于农村年轻人才的回流。

第二,注重财政向“三农”倾斜。财政政策对于农业、农民、农村的倾斜,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投入,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增

收致富;有利于提升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促进农村和谐发展。

第三,稳定经济发展是关键。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对于农村改善贫困状况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经济的稳定发展,可以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和产品的销售渠道,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有利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质量,能够提高农村生活的幸福指数。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EB/OL]. [2016-11-23].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02/content_5142197.htm
- [2] 张岩,王小志. 农村贫困地区实施电商扶贫的模式及对策研究[J]. 农业经济,2016(10):58-59.
- [3] 洪勇.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制约因素与促进政策[J]. 商业经济研究,2016(4):169-171.
- [4] 颜强,王国丽,陈加友. 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的路径与对策:以贵州贫困农村为例[J]. 农村经济,2018(2):45-51.
- [5] 张磊,范淑娟,赵悦辰. 我国农村恩格尔系数影响因素的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2013,27(2):42-4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patial Panel Model

YE Juan, GU Yim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Sanlian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E-commerce may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living conditions in rural areas, diversify way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relevant data from 26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19,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China's E-commerc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patial panel model.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rural poverty has been improv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has a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which also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rural residents in surrounding areas.

Key words: E-commerce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spatial panel model;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论超大型数字平台双轮垄断的法律规制

姚保松,常 慧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垄断最重要的表现即数据垄断。作为平台的主要生产要素,数据收集后可以零成本多次使用。此外,在数据使用过程中会产生新的数据,从而增强平台的垄断优势。正是由于平台的数据优势,一些超大型数字平台可以将其活动延伸到其他相关甚至不相关的行业,从而在该行业形成新的垄断,这就是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双轮垄断效应。在杠杆作用的效应下,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崛起,正在引发经济社会的系统性的变革,引发深层次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各类问题复杂交织。对于超大型数字平台双轮垄断的问题,需要有新的监管措施和监管视角,应加强数据安全立法,同时加强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监管,严格限制超大型数字平台的无序扩张。

关键词:双轮垄断;超大型数字平台;杠杆作用;规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08

中图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44-06

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市场进一步开放,各领域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交流也日益密切,单一市场的“一元垄断”已经不能满足一些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在市场支配力、垄断利润等多方面的需求,“双轮垄断”逐渐产生。双轮垄断会影响市场的活力,造成信息的垄断,从而进一步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针对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双轮垄断行为,一味地提高市场准入势必会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均衡。一方面,政府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调控能力,对各个领域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准入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监管,同时建立更加完善的创新产业政策,为初创企业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保护;另一方面,超大型数字平台之所以具有市场竞争优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掌握了市场交易的关键数据,政府应注重资源共享,特别是数据方面的合理共享,促进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一、双轮垄断内涵及理论分析

(一)双轮垄断的内涵界定

随着数字经济和平台企业的迅速发展,双轮垄断已经成为平台领域垄断的热门话题。超大型数字

平台企业,以数据作为驱动力,将消费者的注意力作为与其他企业竞争的主要优势。这些平台企业既是在线交易市场的中介,又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基础设施的作用,因而在某些领域形成了独特的优势。而后,在原有的垄断优势的基础上,这些企业又拓展基本服务能力,试图在新的领域形成垄断,从而导致双轮垄断问题的产生。所谓双轮垄断,是指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利用其基础服务能力产生的数据和流量优势,通过杠杆效应将其现有的垄断地位扩展到其他行业,以构成新行业的第二轮垄断。

这种垄断的实施者是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就其行为内部结构而言,它由轴向市场的初始垄断和径向市场的第二轮垄断组成。在初始垄断层面,超大型数字平台由于在消费者数据和流量进入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因此更有能力将消费者的注意力变现,如谷歌和 Facebook 等具有支配力的平台越来越倾向于在数字市场领域“通吃”,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具有优势。这些企业在作为轴心的数字基础服务领域(例如即时通信领域、搜索引擎领域等),通过控制数据、流量等方式强化塑造自身的支配地位,并利用

收稿日期:2022-0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16BZZ063)

作者简介:姚保松(1973—),男,河南驻马店人,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竞争法。

强大的网络效应和数据优势,将自身的实力与控制力滚雪球般地放大,从而固化该项支配地位。在第二轮垄断层面,这些企业利用初始垄断形成的数据、资金、渠道等优势,进一步集中消费者的注意力,通过杠杆效应、规模效应、用户锁定效应等将其在初始基础领域的垄断地位延伸到多个其他领域,从而在新的相关市场形成新的垄断地位。

(二) 双轮垄断的理论分析

1. 双轮垄断中的杠杆作用

在早期的反垄断法理论和实践中,杠杆作用通常被解释为一种将一个市场的垄断权力转移到另一个市场的方式,从而使两个市场都受益。尽管杠杆作用经常被应用于美国法院的审判中,但却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通常认为杠杆作用是搭售市场和被搭售市场中的企业之间的一种默示共谋,企业利用搭售市场的力量扩大其垄断能力,或通过搭售来阻碍另一产品市场的自由贸易,以获取利润。^[1]

在杠杆作用下,企业把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变成垄断,垄断者可以任意加价或降价或限制生产,从而限制其他竞争者以获取利润。^[2] 杠杆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杠杆作用下,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垄断者将本来自由竞争的市场变为了垄断市场,而市场的这种结构变化并不是因为垄断者提供了一种较好的产品或者给予了消费者较低的价格,而仅仅是因为垄断者在其他市场拥有垄断地位,这种市场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强迫消费者购买在其他市场原本不会购买的产品。其次,两个市场的垄断会给垄断者带来更大的利润,同时也会给其他经营者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

2. 双轮垄断中的“加速累积”效应

平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数据,这是一种新的生产手段。虽然数据对物质生产来说不是必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在从前,一个产品的产业链中,由于消费者数据收集成本过于高昂,所以并没有办法直接作用于产业链最前端的物质生产环节。但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消费者数据可通过该系统以极低的边际成本获得,并可通过算法预测下一季度的消费者需求和库存。换句话说,本来处于产业链最末端的消费者数据,通过各种各样的算法,影响了最前端的物质生产环节以及其他的各个环节进而加速了资本的循环。

互联网企业必须通过垄断足够的数据来获得超额利润。在数据竞争的环境下,所有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实施双轮垄断的成本很低,但效率很高。而且,双轮垄断不断积累叠加,呈指数型加速增长。

回首过去二十年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历程,数据频次发生最高的领域就是搜索、社交、电商等。而在这些高频的市场中,最突出的就是社交。我们以腾讯为例:腾讯在社交领域的突出战略就在于,它并没有将用户的数据直接变现,而是在垄断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即以垄断社会关系作为分布式发展的起点。腾讯的所有业务都是从社会关系开始的,它保证了所有后续业务进入的流量基础。腾讯的微信几乎已经成为所有手机的必备,腾讯借助这一流量,以极大的便利和优势延伸其垄断地位,这也是微信的支付功能能在很短时间内与支付宝竞争的主要原因。同样,微信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一方面通过封锁链接,封锁“飞书”等在线办公方式,另一方面利用数据,迅速推广“腾讯会议”,成功扩大垄断地位。时至今日,互联网产业已经转变为资本的游戏,垄断格局已经形成,新进入者和新经济模式很快被第一垄断者淘汰,幸运的赢家也只能等待收购。

二、双轮垄断限制竞争的实施机制

总体而言,超大型数字平台利用其垄断地位在某一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时,往往会针对竞争对手的产品和自身旗下的产品实行差别化的待遇。此外,这些企业往往利用自身在数据领域的优势构筑在相关市场的主导地位,从而在新业务上形成优势。通过流量入口,纵向排斥上下游市场,对新创业者产生不利影响,这些都将导致超大型数字平台从最初的垄断市场向双轮垄断市场演变。

(一) 利用流量优势延伸到其他领域

利用流量优势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锁定效应”。^[3] 锁定效应一般是在性质相似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产品中产生。它的基本原理是对于两种先后进入该市场的产品或服务,用户相比较而言比较熟悉第一种,而后进入市场的产品或服务,用户需要重新学习和理解,给用户带来很大的不便,由于其很难积累到用户,因此在竞争中并没有相应的市场份额,慢慢就退出了市场。那么先进入市场的产品或者服务就相当于锁定了这一类型的产品和服务,发展也就越来越快。

在大数据领域,用户在选择了大数据的产品或者服务之后,由于转换成本较高,往往并不会退出刚开始的选择而再选择其他的产品与服务。因此,先进入的大数据产品或者服务凭借其自身的优势,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用户,后进入的产品或者服务就很难获得这些用户。以腾讯为例,其旗下的微信和QQ两款社交软件,除了最重要的社交功能之外,用户还可以使用这两款软件一键登录腾讯旗下

的其他软件,长时间下去就会形成一定的用户黏度。如果其他公司出品了未授权微信、QQ 一键登录的其他软件,用户选择该产品的概率就会十分小。此外,先进入市场的企业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不断改进产品或服务,吸引更多的用户。通过这种方式,平台利用需求侧的用户优势,锁定用户的注意力,为将新用户传播到其他领域奠定基础。

另一种利用流量优势的方式是“默认设置”。默认设置进一步巩固了平台的市场力量,增加了准入门槛。以谷歌为例,谷歌在搜索引擎中占据巨大市场份额的主要原因是在谷歌的 Chrome 浏览器和苹果的 Safari 浏览器中是默认搜索引擎。Chrome 和 Safari 垄断了欧洲浏览器市场约 80% 的份额,而这两种浏览器的主导地位本身就是由 Android 和 iOS 操作系统在移动设备上的主导地位决定的。因此,通过默认设置,流量优势也可以用来将垄断地位延伸到其他领域。

(二) 数据力量传导

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往往是从特定的服务开始,在完成一定数量的用户资源积累之后,就会利用用户资源,在不同产品之间进行“引流”,通过搭售、限制交易等强制性要求吸引用户流向其他产品,从而限制用户资源流向其他竞争对手。由于用户在网络效应的存在下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更容易屈服于这些大型数字平台的要求,从而放弃自身的自主选择权。当一项数据成为一个企业不可忽视的重要资产之后,就会在不同的市场之间交叉使用,轻易传导。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使用数据捆绑的可能性很大,也就是说,如果一家企业拥有高价值的数据集,那么它可以开发自己的数据分析服务。而这种数据分析服务的能力使其比没有这种能力的企业更具竞争力。谷歌以搜索引擎为中心,提供多种服务,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移动操作系统、云服务、虚拟现实和语音通信。谷歌安卓案的结论是,谷歌在安卓应用程序市场的主导地位被滥用。而此前“Google Shopping 案”的结论是,Google 利用其在搜索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过度优化自身新开发的比较购物服务,破坏竞争,影响公平。这两起案件都涉及超大型数字平台市场间力量的传导,不同的是,前者的传导者和接收者在各自的领域都具有市场主导权,后者只有传导者具有。

(三) 弱化数据的互操作性

数据的互操作性是指不同技术的系统、产品或服务之间通过信息传输实现互联互通的能力。互操作通常是通过应用程序接口(API)完成的。一般来

说,互操作性可分为协议互操作性、协议完全互操作性和数据互操作性,而数据互操作性是双轮垄断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不同的类型,数据互操作应区分不同的情况,公共领域的数据即政府的信息应该公开透明;私人领域的数据使用区分不同的情况,电商、搜索等领域应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来使用。

但事实上,脸书、谷歌、抖音及很多视频、音乐甚至社交平台,在轴心型和轴辐型相关市场收集了大量的数字资源。^[4]为了从庞大的数字资源中获得可观的收益,它们往往会削弱甚至破坏数据之间的互操作性,并可能阻碍其移植,这很可能导致数据或服务供应的孤岛效应,导致数据和服务市场的分割和竞争机制受阻的后果。

三、双轮垄断的竞争效果评价

(一) 阻碍创新创业影响市场的活力

双轮垄断扼杀了创新,剥夺了拥有创新技术的企业家生存或发展的希望。众所周知,中小企业想要挑战大企业,抢占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创新的技术和产品是它们唯一的出路。但如果该大型企业实行双轮垄断甚至多轮垄断,其必然会通过自己的垄断力量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调整市场的价格、重新制定市场规则甚至对客户进行威胁,进而排斥中小企业的产品大规模进入市场。我们熟知的很多企业,包括阿里巴巴、腾讯、滴滴、58 同城等皆是如此。这些企业虽然也在竞争,但大多以垄断为目的,甚至利用自身的实力优势烧钱进行补贴,目的是通过价格战把竞争对手赶出市场,而并非是利用技术创新。这严重影响了市场的活力,阻碍了创新创业。

(二) 影响公平竞争和诚信竞争

公平竞争与价格垄断自古以来就是天敌,为了公平竞争,必须反对价格垄断,因为如果出现价格垄断,就不可能公平竞争。一个行业的价格垄断会直接影响其上下游行业的竞争状况,从而使垄断企业获得非法的优势。以我国的电商行业为例,原有的商家与电商平台已然形成了内在的利益关系,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这些同时实施价格垄断的电商平台,也联合封锁了该行业的潜在市场参与者,以维护价格垄断的整体利益,这也构成了对其他行业企业的不公平竞争,破坏了线上甚至线下采购的竞争规则。如果你不主动加入垄断体系,极有可能直接出局。

(三) 影响消费者的利益

超大型数字平台利用其基础服务能力将其垄断地位扩展到其他领域。简单来说,它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便捷的服务。但事实上,这种效率和便捷损害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超大型数字平台根据其已掌

握的数据资源,运用算法对消费者进行个性化的推送,将消费局限在平台所设定的圈层,削弱了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感受。尤其是在双轮垄断中,平台将消费者的数据进行跨领域使用,更加深了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再者平台承担的是价值引领、文化传播等社会责任,不仅应推送个性化的内容,更应该推荐的是社会主流的内容。

四、双轮垄断的规制路径

(一)完善数据安全利用的法律制度

数据不仅是数字经济的血液,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物资。数字经济的安全与平台经济的反垄断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行动。从我国的实际发展来看,维护我国数字经济的安全,不仅可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可以保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同时,全球竞争和数据博弈也在不断深化,这不仅加速了数据安全法的制定,也导致了数据安全法从“内部”向“外部”的转变。我们不仅要解决内部的双轮垄断问题,还要参与国际竞争,进一步明确数据管理的全球规则。

早在2015年,中央的决策层就已经开始关注数据的安全问题。当年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要“科学规范利用大数据,切实保障数据安全”。从整体上看,我国关于数据安全的立法正在加速推进,《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的颁布与实施,为数据安全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民法典》也明确了对个人信息以及数据的保护。但各法律之间衔接并不紧密。在数据安全法治尚不健全、数据安全形势尚且严峻的情况下,《数据安全法》肩负着应对我国数据安全内外风险、构建数据安全核心体系、维护大数据时代个人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使命。但在跨境数据、重要数据保护和数据汇总等核心问题上,仍然缺乏进一步的监管和协调。

1.完善数据法制体系

虽然我国已经有相对完善的网络建设的法制体系,《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已经生效,但在反垄断监管中,数据安全风险和漏洞依然存在。在隐私数据的采集、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区块链技术层面,应该进一步完善法制体系。同时,大力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落地,补充完善相关重点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法规,加强对平台垄断行为的认定、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监管。同时,对不同领域产生的数据建立“防火墙”系统,不能混用和共用,以避免潜在的风险。

2.完善数据交易系统和数据标准

目前我国还没有数据要素市场,但已有一些数据交易平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数据生产或数据服务为主的数据交易平台;另一类是具有第三方匹配性质的数字交易平台。因此,有必要完善我国的数据交易体系。制止垄断行为,让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是运用数据和技术手段解决数据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不是使用数据垄断和技术壁垒加剧信息不对称,阻碍竞争,导致市场扭曲。

虽然超大型数字平台收集的交易数据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该平台的私有财产,但不受管制地使用这些数据会损害消费者和其他企业的基本利益。因此,有必要对超大型数字平台智能定价算法的行为进行界定。智能算法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竞争,也可以阻碍竞争。它不仅可以提高交易效率,而且会导致算法合谋和价格歧视。因此,监管部门需要规范和完善超大型数字平台使用用户数据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二)施行前置协同审慎监管

1.监管机制的前置性转变

国内外政府对于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双轮垄断行为普遍采取事后监管,当一些超大型数字平台出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时,监管机构将对这些平台进行管理监督。^[5]然而反垄断调查需要极大的时间成本,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因此,对于超大型数字平台的监管,应逐渐从事后监管转变为事前、事中监管,比如平台的收购、商业的并购等,应该事先向监管部门申报、备案,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之后,再进行相应的并购和合并。超大型数字平台,随着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容易出现“一家独大”“赢者通吃”的现象,监管部门应严格监管这些平台,对垄断行为进行精准监控,有效衡量其市场份额,判断其经营行为是否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避免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双轮垄断问题的出现。

平台监管模式由事后监管转变为事前、事中监管,由静态监管转变为动态监管。传统的静态竞争理论包括三个步骤:界定相关的市场——限制或排除相应的竞争行为——确定其是否对市场产生负面影响。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理论已不再适用。超大型数字平台突破了原有的产业格局,模糊了市场边界。因此,在动态竞争理论下,市场份额和持续时间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市场进入者对后来者的关注程度和行业门槛的高低。

2. 加强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监管

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应共同对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双轮垄断行为进行监管,尽快建立和完善新的监管机制,避免跨界监管的疏漏。

超大型数字平台往往连接多个用户,业务范围涉及多个领域。我国现有的监管体系是以传统行业为基础进行划分的,行业之间界限分明,有各自的监管理念和方法,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并不多。但显然,这种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平台经济的发展。在当前的数字经济时代,超大型数字平台有能力涉足不同的行业,从事不同的业务。如果出现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双轮垄断现象,多个部门对同一平台进行共同监管不可避免。一方面,可以建立多个部门之间的联合工作机制;另一方面,可建立一个新的部门进行统筹监督。

3. 对并购创新型初创企业审慎监管

双轮垄断效应往往体现在并购领域。在发现创新型初创企业后,超大型数字平台往往会决定对其进行合并和收购,并利用其现有的数据优势和流量优势,迅速扩大相关领域的市场份额,导致行业投资大幅下降,从而导致“狩猎融合”。之所以形成“杀戮区”,是因为初创企业往往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即要么自身被收购,要么在竞争对手被收购后,自身面临更大的破产风险。

然而,在现行反垄断法的框架下,超大型数字平台对初创企业的并购往往达不到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被反垄断执法机构忽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19条已经将该种情况予以规定,该条款主要针对的即是“猎杀式”并购,初衷是为更好地保持市场的竞争动态,更好地促进创新。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并非所有新兴互联网公司的合并和收购都具有反垄断效应。事实上,一些并购旨在降低自身成本,但它们将继续面临相关市场上其他公司的竞争。此外,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发达,在没有退出渠道情况下,被收购不失为初创企业的理想方式。因此,基于理性原则,我们仍然应该谨慎对待所谓的“猎杀式并购”。初创企业一方面应推动产品创新,创造差异化优势。企业利用大数据对消费者进行分析,促进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精准对接,注重个性化产品的研发,努力创造因客而变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促进技术创新,创造智慧效益。企业不仅要依靠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还要通过创新促进企业管理,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嵌入企业的生产、营销等环节,进而实现规模化运营,降低运营成本。竞争政策的关键

作用是防止市场垄断者利用其市场力量通过收购潜在竞争者来排斥竞争者。因此,对于利用基础服务能力压制初创企业的超大型数字平台,要建立相应的惩戒制度,尤其是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举报者要建立相应的奖励制度。

(三) 建立“白名单”制度

作为要素流通和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平台必须在解锁国民经济周期、促进中小企业协调发展、便利人民生活、繁荣市场经济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应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损害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国家继续加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监管,依法查处垄断行为,恢复市场竞争,引导和督促平台企业通过个案示范和警示作用,自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建立政府扶持和发展的“白名单”,促进大型平台企业与中小企业良性互动,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利益,让各类市场主体共享平台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共同繁荣。

1. 培育公共领域竞争者

如果超大型数字平台在一个或几个领域存在双轮垄断行为,政府可以引入或培育新的竞争对手,创建“白名单”,为名单上的企业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支持其与现有的超大型数字平台竞争,从而降低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垄断力。特别是在公共物品领域,为了避免这些领域出现过多的竞争者而“交通拥堵”,竞争对手的数量也不宜过多,支持两到三个寡头企业,一方面可以避免垄断,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挤兑公共资源。

对于公众领域的后续进入者,由于存在一定的用户黏性,所以后进入者在与大平台竞争时面临很大的困境,国家市场监管的相关部门可以给予相应的政策性补贴,逐渐形成几个平台互相制约的格局,从而避免单一平台垄断问题。

2. 扶持“专精特新”型企业

现代工业体系一直以中小企业为主,主要为大公司提供细分领域和供应链的支持服务。在当前以创新驱动先进制造业转型和现代化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参与创新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主要是因为产业链的分工越来越细,细分领域的完善要求越来越高,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协同创新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为中小企业带来了创新发展的机会。政府应将“专精特新”企业作为“白名单”企业的重点。“专精特新”的灵魂是创新。“专精特新”类中小企业有能力发明创造、创新制造关键零部件、基础技术和配套产品。这些公司往往受到尖端技术的驱动,在细分技术领域

具有独到的技术能力、强大的市场坚韧性和快速的产品迭代速度,能够保持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敏感性并实时响应。因此,政府应将这些企业加入“白名单”,培育和发展一个内部有机关联、相互促进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生态,保持和提高产业链的水平和硬度,从而防止超大型数字平台双轮垄断的产生。

3. 提供良好环境促进产业集聚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应为“白名单”上的企业尽力提供良好的政策和环境,包括重大产业导向政策和创新支持政策以及公平公正的市场经营环境。互联网领域需要政府投资,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并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创新。对于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应支持包容性创新,帮助中小企业快速实现技术进步。过去,政府可能会担心,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要取得成果并不容易。事实上,这取决于当地的市场环境。如果市场环境鼓励创新,政府对企业的资助公开、公平和公正,就可以对企业产生积极的激励作用,并发挥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杠杆效应。

同时,政府还必须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和产业园区的作用,中小企业主要在产业链中对大企业起到支撑作用,产业集聚的较好效果有利于降低这些企业的经营成本。因此,政府应为“白名单”上的企业投资建立工业园区,更好地发展适合中小企业的智能化公共服务,减轻企业负担,充分发挥孵化功能,从而促进“白名单”上企业的发展,进一步防止双轮垄断的发生。

五、结语

互联网平台的崛起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双轮垄断行为不断出现,现有监管体系亟待调整。数字平台双边市场的特性和边际效应的递减,导致大量用户数据的聚集,引发了流量垄断。对于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双轮垄断问题,不应该仅仅适用反垄断法等法律,应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的精神与理念,纳入动态监管机制,考虑平台潜在风险,促进平台健康发展。对于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双轮垄断行为,不能盲目采用拆分的方法,因为其形成原因不同于之前,避免超大型数字平台进行双轮垄断的最佳方式是在市场形成的第一阶段就保护竞争。

参考文献:

- [1] 江山. 大数据语境下卡特尔发现的范式转换[J]. 当代法学, 2019(2): 93 - 102.
- [2] 郑鹏程. 论搭售的违法判断标准[J]. 中国法学, 2019(2): 183 - 201.
- [3] 杨东. 论反垄断法的重构: 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J]. 中国法学, 2020(3): 206 - 222.
- [4] 翟巍. 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双轮垄断的规制范式[J]. 财经法学, 2021(1): 18 - 31.
- [5] 王春英, 陈宏民, 杨云鹏.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经济垄断问题研究及监管建议[J]. 电子政务, 2021(5): 2 - 1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On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the Double Monopoly of Super Large Digital Platform

YAO Baosong, CHANG Hui

(School of Law,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monopoly of super large digital platform is data monopoly. As a key factor of production for the platform, data can be collected and reused multiple times at zero cost. In addition, new data is generated during data usage, thus enhancing the monopoly advantage of the platform. Just because of the data advantage of the platform, some super large digital economy platforms can extend their activities to other related or even unrelated industries, thus forming new monopolies in the industry, which is the dual monopoly effect of super large digital platforms. Under the effect of leverage, the rise of super - large digital platforms is causing systemic changes i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s well as deep - seated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problems that are complex and intertwined. New regulatory measures and perspectives are needed for the double monopoly of super large digital platforms. Legislation on data secur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between multiple departmen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strictly limit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super large digital platforms.

Key words: dual - round monopoly; super - large digital platform; leverage; regulation

从人格权辨析角度探究企业数据的权利归属

马牧青

(西南政法大学 人工智能法学院, 重庆 401120)

摘要:数字时代下,企业数据因蕴藏着海量的个人信息而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被誉为21世纪的石油。然而当前有关企业数据的支配、利用则会因与个人信息纠缠而显得异常混乱,究其原因则是企业数据这一无形物本身的权利归属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尚无定论。嵌套于企业数据的个人信息作为人格权的权利客体,具有人身专属性,但通过梳理人格权的理论基础,可以发现人格权同时具有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企业数据在此基础上合法收集个人信息的生成过程即可与现行法的相关概念进行衔接,从而明确企业数据的权属问题,为后续数据利用提供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

关键词:人格权;个人信息;企业数据;权利归属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09

中图分类号:D9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50-07

一、引言

随着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全球科技产业的发展,世界已逐步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时代已然到来。世界各国在2017年前后陆续发布人工智能战略布局的发展规划,中国也在2017年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争做人工智能时代的领先国家。然而建设人工智能这一通过计算机“像人一样”完成任务,以其更高效的运行、更高质量的产出作为刺激生产的支柱的科学技术,则是由大数据为其提供环境基础进行深度学习的。因此,数据是我国打造人工智能时代世界强国的重中之重。前几年我国的互联网企业顺势而为,发展迅速,但与用户签订的隐私协议因格式条款、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近年来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隐私侵权纠纷频发。面对这一现状,在法律层面,就要配套相应技术出台促进人工智能发展、数据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系列制度,以平衡商业利用与人格保护之利益冲突,化解数据利用中对用户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和利用。然而在平衡的过程中,人格权的重要性固然不言自明,但在立法规制中

却不排除矫枉过正的现象,造成立法司法过度偏向个人信息保护,导致互联网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数据“石油”所承载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个人信息“可望而不可及”,造成企业运营成本过高,收集的个人信息依旧“覆水难收”,无法实现立法初衷。究其原因还是立法角度出现了偏差,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落实有改进空间。为此,笔者反客为主,以人格权的角度进行辨析,梳理出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为关涉个人信息的企业数据权属配置提供合理化建议,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同时,为互联网企业数据利用建言献策。

二、数据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现状

当前之所以难以界定企业数据的权利归属主要在于数据之上的个人信息是否具有财产属性从而可被商业利用存在争议。为此笔者将从理论到立法最终到司法三个层面对个人信息相关的财产属性的冲突现状加以梳理,为下一步理论研究进行铺垫。

(一)法学理论层面的冲突

个人信息与隐私有交叉,均隶属于人格权。现理论界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人格权不具有财产利益,否则将违背人格权高于财产权的宪法价值,本质上将重回奴隶制。这一派学者的内在逻辑是将人

收稿日期:2022-01-06

作者简介:马牧青(1998—),女,河南郑州人,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工智能法学。

格权理解为人与人格在法律上连接起来的权利,而人格这一概念在学界又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本是哲学用语的“人格”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洗礼下,被法学家们通过引入“权利能力”而赋予了规范现实生活的法学内涵,自此就意味着法学语境下的“人格”有着不同于哲学语境下的新的含义。然而当前学界从“人格”到“人格权”跨越的主流观点尚有不足,将人格权定义为“保障一个主体能够支配自己人格和必要组成部分的权利”^[1],包括生命、身体完整、自由、名誉、社会地位、姓名和区别性的标志以及作者和发明者的权利等^[2]。主流观点认为人格权中虽有“少部分权利”具有财产性内容,但并不意味着从整体上看,人格权既有精神性价值,又有财产性价值。而隐私作为自然人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则因信息所有人的不愿公开而更具人身属性,将其视为有财产性质的物似乎有违伦理。涉及个人身份的信息,往往会因公开后侵扰他人生活安宁而被视为隐私,理应不具有财产性,然而却不可否认财产状况等有关个人身份的信息作为个人信息所具备的物质属性。可以看出,当前理论界对于人格权的界定,较之于外延的内涵,以及人格权内部隐私与个人信息的区分都显得异常混乱,在此种情况下,对于企业数据的定性只能在计算机领域徘徊,倒逼法学学者熟练掌握工科知识,最后的出路只能落脚在数据对特定自然人的“可识别性”有无。而技术手段层出不穷,加密与否、可识别性与否都是相对的,风险与变动过大,并非良策。作为法学学科,真正要做的是梳理与企业数据这一新现象相关的法学概念,数据作为无体物,仍属于物的范畴,法律具有预见性和稳定性,在现有法律制度可以进行定性,在规制的前提下,找出法律上与之匹配的制度进行充分的说理与应用才更符合法律思维。

(二) 法律规范层面的冲突

为了逻辑的自洽,理论也许可以不顾及生活事实而自娱自乐,调整现实生活的法律规范却必须直面生活^[3]。我国民法的总一分模式师承德国民法,这种编纂技术通过提取公因式而形成封闭的逻辑体系,民法总则就是在各编分则的不同法律关系基础之上提炼出的一般性规则,而法律人格这种自然人和法人统一享有的内容也是分则法律关系主体的概括。《民法典》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其中“不得非法收

集”就表明了倘若经信息主体行使意思表示,“同意”合法收集,则这一行为对于个人信息所有权人以外的第三人而言即为正当。在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关个人信息处理者对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又因个人信息的敏感程度而分为一般规定和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前者以“公开即可利用”为主,辅之以“撤回同意”及“明确拒绝”保护个人信息所有者;后者以“不授权不可用”为前提,以“目的具有‘充分必要性’且获取‘特别同意’”为例外。无论哪种情形,都可以明确个人信息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可利用性,而个人信息处理者是指自主决定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个人信息处理事项的组织、个人,这就意味着自主决定处理的目的中不排除以此营利的可能,这是否就间接承认了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

(三) 司法实践层面的冲突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隐私与个人信息的认定通常基于“是否具有大众意义上私密性”为由对案情进行审查。不同于一经泄露即导致人格利益受损的隐私,个人信息被认为更中性,又因为其会被主动使用或被所有人积极利用于社会交往或身份识别,似乎就减少了被保护的必要性,减损其被保护的正当性。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认为“没有造成不合理损害,利用行为即不必经得同意”或“一定情况下容许他人合理、正当地利用”。

在法律保护中,又因为涉案主体的类型不同而主要划分为两类:经营者和非经营者。司法实践中,若涉案主体均为经营者,案情符合1. 法律对该种竞争行为未作出特别规定;2. 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确因该竞争行为而受到了实际损害;3. 该种竞争行为因确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性或者可责性,法院通常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进行裁判。当有一方主体为非经营者,即并非竞争纠纷的当事人时,对于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或隐私之侵害多以侵权责任为由进行法律保护。

三、人格权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当前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面对个人信息被企业利用的主流态度均为强调个人信息及隐私保护,理由主要为个人信息与隐私蕴含着个人的尊严价值与生活安宁,在这两点无法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追求企业收益是有违伦理道德的。然而个人信息与隐私作为人格权的客体,真的只具有身份价值吗?笔者就此将视野回溯到人格权的发迹本身,从源头探究人格权究竟为何物,从而

找出人格权权利“客体”的内容与属性,进而为下一步个人信息的电子载体—数据之权属探究进行铺垫。

(一)民法上人格的理论基础

在公元前七世纪前后,随着一种新兴生产方式——私有制的出现,奴隶主与平民这组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因利益分配不平衡而不断升级,在这一背景下促成形成的罗马法为调和罗马公民内部冲突而一步步完善,而“人格”这一与“人”相分离的概念也在此期间诞生。罗马法上的人格,当时称为 *persona*,即罗马市民法上的主体,实质是家长、市民、自由人三种社会身份,可概括为“身份人格”。梅因爵士对此有着一针见血的评价:“‘罗马法典’只是把罗马人的现存习惯表述于文字中。”^[4]只是对奴隶制社会下的社会现实照搬到法律上而不加以任何调试,终将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而落后于更新的社会现实。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席卷整个欧洲,笛卡尔受此洗礼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自我意识的概念,相对于作为“主体”的人,被人感知并由理性来衡量的“万物”就成了“客体”^{[3]18}。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受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崇尚自由、人人平等的法国民法典跳脱了反映并适应现实生活的罗马法思路,让每一个自然人都成为法律主体,享有法律人格。但发明了近代人格理论的法国却没有对如何使用进行妥当的研究,导致人格理论过于超脱社会现实。若从人格技术的角度观察,法国民法典上的人格并没有安排在“法定权利”这一层级上,而是嵌在“自然权利”之中^{[3]22}。经过康德的理性批判,德国学者认识到,尽管从逻辑层面讲,成为世界的主体首先要成为一个“生物人”,但让人成为世界主体的,却是因为生物人所具有的“自由意志”,而这“自由意志”便是“人格”^{[3]24}。通过历史上“人格”概念的演进,由最初罗马法概念化的家长、市民、自由人三种身份作为人格,到中期法国民法典概念化的人人平等之公民身份作为人格,再到后期德国民法典通过“拟制”这一“人格技术”将人格概念化为“权利能力”,可以看出,人格即法律主体,分为自然人和类法人(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前者基于自由意志的人格基础,有着始于出生的权利能力,后者基于拟制的人格技术,有着国家授予的财产权利能力。

(二)人格权的内涵

前文提到笛卡尔哲学中,“我存在”是其第一原则,“我思”则造就了“我”的主体地位^[5],此时的“我”作为主体,由理性来衡量世界,大陆法系立足

于主体/人格,经由权利沟通“主体—客体”的法律关系架构也源出于此^{[3]18}。因此也可以看出,人格权并非是人格与权利的简单叠加,“人格”解决的是“人何以为人”的问题,而“权利”是“主体—客体”认知模式的产物,可以得出结论,权利乃人与外部事物法律上的连接^[6]。而人格内在于人,不可能成为外在于人的客体,因此我们所讨论的“人格权”并非是一个权利客体为“人格”的权利。原因有二,其一,人格无法外在于人,主体与客体内容均内在于人,即均为法律上的主体,将会与权利的构成相冲突,甚至导致“自杀权”这一“对自身原始权利”支配的成立^[7];其二,人格倘若成为权利客体,就理应当可以被当作工具、手段,这将从根本上违背“人不能当作单纯的手段”这一伦理诫命^{[3]51}。可见从“人格”到“人格权”的跨越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理论界出现过几种论证“人格权”的学说也都有自己明显的不足。当前的通说观点“人格利益说”为迎合权利构成,将人格权的权利客体解释为非主体要素的“人格利益”,既能与传统的“主体—客体”权利结构保持一致,又能回应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承认“人格权”的存在^{[3]62},但正如物权的客体是“物”,而非“物上利益”^[8],这一解释有明显“目的法学”的影子;“法律技术说”认识到了“人之本体保护”模式的捉襟见肘^{[3]64},但该学说从“人格”到“人格权”的跨越并未“刺破权利本质的面纱”,陷入了“人格的法律赋予论”的囚笼。在对现有主流观点进行反思过后,还是要回溯到概念的源头,即创设目的,来探究人格权的本质内涵。人格权应当囊括关于个体人格必要的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权利,人能够独自、合法地管理自我,并以此来反抗他人的一定的合法入侵^{[3]61}。因此,该人格权的权利客体应当是与主体身份息息相关但又并非内在于主体的要素。反观当前人格权客体,会发现其中的生命、身体、健康均无法与主体相分离,加上《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均内化于自然人,是主体的一部分,而剩余的姓名、名誉、肖像等则并非自然人这一抽象概念与生俱来的,无法内化于自然人。因此在民法人格权的构造上我们可以进行类型化的尝试^{[3]70},通过将杂糅于人格权客体的真正属于自然人本体之上的内容剥离,剩余的部分才应当成为真正的人格权客体。

(三)人格权的双重属性

通过对人格权内涵及其价值的辨析,认识到人格权上不仅仅有尊严价值和生活安宁,其本质仍为

人的内在属性之外的社会属性,有社会公共性这一面。当前《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关于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的叙述实则是在“权利至上”的今天将“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这四项人的内在属性之最高利益以法律技术手段降级为“权利”,以迎合“权利保护至上”的现状。这是宪法上“人之本体保护”模式不充分以及理论界对人格权、权利结构认识不足共同导致的结果。综上,自然人所具备的要素中能被权利化而称为人格权的,只能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姓名、名誉、肖像、隐私、信用等这些非内在于主体,系主体在社会生活中渐次获得的,他人不仅可以消极妨害,亦可积极利用的,同时主体本身亦可积极支配这些属性而获经济利益的内容^{[3]72}。基于此,就可以明确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的客体并非主体意义上的“人格”,而是具有身份利益与财产利益的共生体。

四、个人信息与企业数据的关系

厘清了人格权的内涵与属性,从属于人格权的个人信息与隐私也因此而具有双重属性。代码程序运行的互联网世界作为部分现实世界的镜像,与现实世界中最常见的数字、文字、符号等信息在代码框中一一对应,代码框中表示现实世界信息的内容就叫做数据。因此可以看出,数据就是信息在电子世界的表达,而承载个人信息与隐私的数据即为个人数据。为了探究个人数据在互联网企业运作中的权利归属,就要将其一分为二,首先明晰个人数据上承载之内容在现实世界中为何物,之间有何关系,进而探究其对应于互联网世界中的数据为何物,通过对个人数据一体两面性的剖析,为下一步企业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利用的行为定性,从而发现个人数据的真正权利归属。

(一)个人信息与隐私及其关系

《民法典》第1034条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应当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从法律条文的表述可以看出,其一,个人信息尚未上升为权利,而隐私是人格权项下的隐私权的权利客体,享受隐私权保护;其二,个人信息与隐私有交叉。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虽然在定性上仍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但在法律保护和救济途径上,

享有同隐私权一样的地位。这就可以看出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划分方法其实并没有遵循同一分类标准。

从保护客体来看,个人隐私在客观上一般呈现为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样态,在主观上权利人也具有不愿为他人知晓的意愿;个人信息指向的内容则更为广泛、更为中性,包含能够识别特定个体的各种信息,权利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主动积极使用的情形。

从保护方式来看,一般认为个人隐私一经泄露即易导致人格利益受损,故其保护方式更注重消极防御,对他人的行为限制更为严格;个人信息的保护方式则包括消极防御和积极利用,一定情况下容许他人合理、正当地利用,仅在信息处理者不当、过度处理等情形下才引发侵权。^①

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隐私具有从属关系,隐私包含于个人信息。论证理由为隐私是关于自然人身份的私密信息,而个人信息是关于自然人身份的信息,前者的限定多于后者,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加以限定即为隐私,因此个人信息这种更为宽泛的信息实现了对隐私这种更为狭隘的信息的全覆盖,故二者是从属关系/包含关系。这种论证逻辑看似毫无破绽,但法律概念并不可仅满足语义逻辑推演的自洽,概念本身存在的价值与必要性亦不可忽视。我们谈及个人信息,根据朴素的法感情,只会联想到姓名、肖像、身份证号码等,提及隐私,则会立刻想到不愿言及的私密话题。而法律就是要将有必要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加以区分实现不同程度的规制与保护。可以发现个人信息下的内容具有一个共性,即可以单独或组合后识别自然人;而隐私的特性则是该自然人并无意愿将其公示。因此可以看出,即使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内容有所重合,但二者是不同标准下判断的产物: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能否识别特定自然人;而隐私的判断标准则是权利人(或言该特定自然人)是否愿意公开。不同维度的分类标准取决于分类目的,只有在同一维度下才有对比的必要性,个人信息与隐私是在不同标准下对人格利益的圈定,二者之间相互独立,纵使包含的内容偶有重合,但均为不同角度上对人格权的细化,属于交叉关系。

(二)个人信息的一体两面之冲突发现

个人信息一体两面的特性决定了其对于个人而言的尊严价值属性,更具人格意义;对于企业来说,则更看重其资源价值属性,这种矛盾更加凸显了在数字经济时代处理好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的必要性。不同于隐私具有不言自明的被保护及限制使用的必要性,个人信息既然是为了识别其所有人而出现的,必然具有可公开性,正是在这种既与个人息息

相关,又可被外界尤其是互联网企业获取的境地下,个人信息之现有保护难以平衡,才体现了本文研究的必要性。因此,在完成人格权的财产属性证立,个人信息与隐私概念的剥离后,下文主要围绕个人信息这一公开后不具有可回收性与公开的必要性之冲突点进行展开。

面部信息,尤其是姓名、电话号码是个人信息中必须经过曝光给外界才具有使用价值的信息,信息所有人对其的公开本身是处分范围内的事物。公开后的使用结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在信息所有人预期范围内的使用,一种是在信息所有人预期范围外的使用。前者的使用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一对一的交往通信以及获取通知,后者的出现情形多为垃圾邮件,广告短信,来源多为营业公司,公开个人信息的目的往往是便利初次交易,但商家在该笔交易达成后会继续使用该信息进行后续的广告投放。这就梳理出当前公开个人信息对信息所有人的两个后果,一是不可收回,二是不可控制。不可收回是指信息一旦被他人知晓,他人便不会主动删除或遗忘;不可控制是指公开后的个人信息在后续使用过程中不受信息所有权人的意志左右。前者对应信息在外界的存废问题,后者对应信息被外界的使用问题。个人信息无论基于何原因被公开,一经公开就进入了对方知悉领域,不同于实体物具有唯一性、完整性,个人信息这一无形物的价值不会因为公开的次数而有所减损,亦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因此权利人无权因信息是自己所有的而要求对方“返还”自己的个人信息,即个人信息的不可收回是绝对的。既然个人信息一旦被对方掌握,那么如何使用也理应对方的权利。可似乎此话一出就会触及大众朴素的正义感,原因何在?不同于信息所有人不可收回对方已知的关于自己的信息,这是一种信息获取的必然结果,而对于不可控制这一特性所指的对信息的使用,则并非信息获取后的必然结果,如何使用均取决于使用人的主观目的,这是一种自由选择。而自由是相对的,每个人在行使自由意志的同时不能以侵犯他人对等的自由为前提,《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在从事民事行为的过程中除坚持自愿原则外,还要遵守公序良俗,不得侵犯公共利益。这就要求互联网企业在收集个人信息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权利人的“同意权”,不论是在初次收集,还是后续基于不同目的的使用时,只有经权利人授权收集与利用的个人信息才具有转

换为个人数据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三) 个人数据与企业数据

现实世界中的个人信息对应到电子世界即为个人数据,个人数据既然是个人信息在电子世界中的镜像,因此也具有个人信息的身份属性和财产属性,个人数据的身份属性是指以此可识别出特定的人,财产属性则是基于互联网企业对其提供无偿服务而进行的数据回收和转化。对于个人而言,被代码化的个人信息称作个人数据;对于企业而言,收集、加工、利用的个人数据即为企业数据,看似同一物上的两种称谓,实则反映了不同立场下的数据归属。因数据兼具身份属性与财产属性,个人与企业之间均具有对此类数据的所有权和支配地位的部分合理性,信息所有者主张个人数据蕴含自己的个人信息,理应归属于自己所有;互联网企业主张企业数据是自己前期平台搭建,通过提供无偿服务,积累用户数量与信任,从而获取的内容,其中糅合了太多资金、技术以及劳动投入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原始个人数据只在其中起着非常微小的作用^[10],因此谈及贡献力大小,互联网企业具有绝对优势,理应按照投入与产出原则将该数据权划归为企业资产。两派观点均有一定的道理,也从中可以略窥一二,即当企业数据作为企业生产资料时,对其的支配与利用不存在争议;而当个人数据作为识别个体的媒介时,不当利用则会产生个人信息与隐私受到侵害的风险,个人信息所有人对其的管理亦无可厚非。在这种分类讨论的立场下,对于企业数据的权属划分似乎就呼之欲出了。

五、企业数据的权属划分

(一) 企业数据内涵之重新界定

前文提到个人数据与关于个人信息的企业数据只是不同立场下的对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述,均为蕴含着个人信息的数据,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企业对个人信息的商业利用是否正当及其数据的权属问题,因此下文将使用企业数据这一称谓。完成了人格权与财产属性的对接,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区分,企业数据与个人信息的镜像关系,企业数据的本质也就真相大白了。作为个人信息在电子世界的“影子”,企业数据具有两层属性,一为企业数据与个人信息的对应性,二为企业数据于企业运作的资源性。关于个人的信息自然由个人所有,不仅是权属关系上的无争议,而且是利用、支配与公开的自愿性,这也反映了作为法律主体充分的自由意志与意思表示;关于代码运行的数据则是由企业平台搭建后的收集与转化,并非从社会生活中直接抓取的结果。

果,付出了前期的投入与中期的维护成本,对其加工部分享有权利,并有义务对数据之上属于他人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企业数据是被加工过后的个人信息,其本质是被代码化的数据,而数据作为企业的“劳动成果”,理应归属于互联网企业;而那些非经企业进行有效加工的数据,以及企业直接抓取的非以数据代码形式呈现的个人信息均因企业未付出相应的技术加工而导致企业不享有所有权。换言之,用户对其个人信息享有被遗忘权等控制信息内容的绝对的所有权,企业对加工后成为的企业数据享有无偿使用并以此成为数据交易的筹码等相对权的使用权,以及保护用户和企业数据之对应义务。

(二)企业数据权属的制度构建

互联网企业基于其投资、建设所付出的资金、技术,通过合法手段与用户签订隐私协议,获取用户“同意”后而提炼整合出相关数据才可以自主支配利用。然而企业数据的自主利用需要以明确的权利归属为前提,因此笔者将视野聚焦现行法寻找企业所有权属的法律依据。企业数据的形成是程序员编码的结果,而程序员作为互联网企业的劳动者,其工作内容根据《就业促进法》第8条第1款,“用人单位依法享有自主用人的权利”,而根据《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作者。”著作权属于作者。这似乎就为企业数据的权利归属找寻了一丝出路。然而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是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计算机软件等符合作品特征的智力成果,单纯不加编排整合的企业数据并不具备作品特征,无法由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企业数据既然是企业这一法人做出的整体“劳动成果”,是否可以寻求劳动法的保护呢?《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看似与企业的劳动成果应有的收益权挂钩,但其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企业,并非为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劳动者,倘若将互联网企业的生产行为视为为公众提供服务而具有劳动者身份未免过于牵强,因此也无法享受劳动法的保护。而《数据安全法》似乎与数据保护最为贴切,然而该法立足于国家主权视角,更多的是强调国家的数据安全战略,而非国内企业以合法、正当的方式收集的第一手数据,亦无法得以衔接。既然核心在于企业的“劳动成果”归属于自己,这是一种最原始财产取得方式,

不妨寻求民法上的出路。

所有权人对于原始取得的财产,天然享有所有权。而对于企业数据这种将个人信息转换成数据加以利用的财产,更类似于“添附”这种民事主体把不同所有人的财产或劳动成果合并在一起的新形态财产,如果要恢复原状则在事实上不可能或者在经济上不合理,在此情况下,就需要确认该新财产的归属问题。在“添附”的三种形态中,“混合”是指不同所有人的不同财产互相渗透融合,难以分开;“附合”是指不同所有人的财产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新的财产,虽未达到混合程度,但非经拆毁不能达到原有状态。无论是“难以分开”,还是“非经拆毁不能达到原有状态”,都无法解释个人信息始终能独立于企业数据可以单独存在的事实。“加工”这一过程,即对他人财产加工改造为具有更高价值的新的财产,与企业数据的生成过程更为匹配。企业数据是个人信息与互联网企业的技术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具有新型生产价值、财产价值同时关涉国家数据安全、主权性质的物。而用户接受互联网企业服务所同意的“隐私协议”就是企业对他人个人信息这一财产加工改造的合法依据。

根据“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奥卡姆剃刀定律,对新兴事物的法律规制只有穷尽了现有法律无以规制后,才有新增立法的必要。在兜兜转转之后,看似最为前沿的企业数据规制也逃不出古老民法的智慧。由于“加工”的原物本身并无价值大小的判断,因此这一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无法适用“新物之所有权归价值大的一方,由取得所有权的一方对另一方提供补偿”这一单独所有方式,也因无法衡量原物各自财产价值而实行按份共有方式,因此对于企业数据这一形成的新的物可以尝试共同共有,即企业数据的最终所有权归属于其上个人信息所有者与个人信息处理者共同所有。然而企业数据保存在互联网企业,信息所有者的权利监督 and 实现不便利,需要引入辅助制度帮助权利落实。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以契约的形式在一定期限内将财产权部分让渡给另一主体经营,这一信息所有者权利的实现需求与“托管”制度惊人相似。基于个人信息所有权的完整性与企业数据的附加性,信息所有权人对该部分财产权毫无争议,而以契约的形式在一定期限内的让渡则同时满足了个人信息收集前提的合法性和利用的期限有限性,最终在权利实现的同时达到可行性与合法性的目的。因为数据的价值来源于其庞大的个体基数,用户个人的信息转化为数据并不能为企业带来资源效应,唯有将海量的个人信

息视为整体,其贡献的财产价值回归于企业对数据维护与保护的成木,企业数据的权属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六、结语

为解决当前个人信息保护与企业数据利用的冲突问题,本文着眼于个人信息与人格权的从属关系,通过论证人格权客体不同于人格上内在的高级利益,解决本文的第一个问题,即人格权的客体究竟有哪些,排除了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这四项超越权利保护的内在于自然人的高级利益,其他与自然人有密切联系但又外在于自然人的属性才为人格权权利客体,如隐私、个人信息。在总结出个人信息除人身属性之外的财产属性后,第二个解决的问题在于隐私与个人信息的重新界定,从而梳理出真正为企业数据可用却易被侵犯的个人信息,进而阐述该个人信息与企业数据的关系。企业数据分为有关用户个人信息的部分以及日常经营必不可少的商业信息,而前者在本文中才有讨论的必要。最终解决企业数据与现行法律的衔接,通过数据的生成过程找出企业利用的正当性,及其对应的物的生成的法律概念,匹配出企业数据权利归属的相关制度。

注释:

①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4民终71号。

(责任编辑 刘成贺)

参考文献:

- [1] 汉斯·哈腾鲍尔.民法上的人[J].孙宪忠,译.环球法律评论,2001(冬季号):339.
- [2] GIERKE. Deutsches Privatrecht[M]. Bd. I.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85: 702-708. 转引自:薛军.人格权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的人格权立法[J].法商研究, 2004(4):63-75.
- [3] 易健雄.著作人格权与民法人格权理论的冲突及协调[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
- [4] 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1.
- [5] 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M].王荫庭,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5.
- [6] 马俊驹,张翔.人格权的理论基础及其立法体例[J].法学研究,2004(6):46-57.
- [7] 霍尔斯特·埃曼.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制度:论从非道德行为到侵权行为的转变[M]//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23卷.香港:金桥文化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2002:413.
- [8] 张翔.自然人格的法律构造[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222-224.
- [9] 时明涛.大数据时代企业数据权利保护的困境与突破[J].电子知识产权,2020(7):61-73.

Probing into the Right Ownership of Enterprise Da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ity Right Discrimination

MA Muqing

(Schoo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enterprise data gains great commercial value because it contains vast amount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is known as the oil of the 21st century. However, at present, the domin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enterprise data will be extremely confused due to its entanglement with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reason behind is that 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 data, which is intangible, hasn't been defined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Personal information embedded in enterprise data, as the right object of personality right, has personal specificity, but by comb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ersonality right, we can find that personality right has both personal and property attributes. Therefore, the generation process of enterprise data legally collect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on this basis can be connected with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the current law, so as to clarify the ownership of the number of enterprises and provide the basis of legitimacy for the subsequent data utilization.

Key words: personality right; personal information; corporate data right ownership

河南革命文物的时空分布与价值意蕴探析

赵金华, 亓淑贤, 吴鹏飞*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革命文物是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河南省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留下了众多革命印记。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类型众多,以革命战争旧址为主;时间上集中在土地革命战争与局部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抗日战争时期;空间分布上呈现“一核三次中心”的集聚性,市域分布广泛,以信阳、开封、郑州三市最为突出。平原地区革命文物数量不及山地丘陵地区,尤以大别山区最为聚集。河南革命文物对于传承红色基因、牢记百年党史、助力乡村振兴、谱写出彩中原新篇章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革命文物;时空分布;大别山;河南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10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57-06

革命文物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1]据国家文物局公布数据显示,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6万多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100万件/套。河南省是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热土,革命文物丰富,地域特色鲜明。每一处革命旧址、每一座纪念馆、每一件革命文物,都彰显着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因此,保护革命文物,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红色文化,牢记百年党史,高质量推动红色旅游发展,对“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以革命文物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研究,正成

为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重要领域。如贾旭东探讨了革命文物概念的历史沿革、时间界限等^[2],贺云翱和干有成探讨了革命文物保护的意義和路径^[3],唐前以延安枣园为例探讨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4],王霞对新时期如何对革命文物进行保护、利用和管理进行了研究^[5],陈琳对革命文物在红色旅游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6]等。这些研究涉及革命文物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时代价值阐释等。而从省域层面加强革命文物工作,则多见于报刊媒体,缺乏较深入的学术探讨,目前仅见冯海英对宁夏革命文物的时代价值和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进行的思考^[7]。河南作为革命文物大省,革命文物工作责任重大,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有哪些重要类型,其发展历程和分布状况如何,新时代如何彰显其时代价值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探讨。因此,本文尝试以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为研究对象,基于历史地理学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对河南革命文物保护传承与创造性利用有所助益。

收稿日期:2022-01-15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21ZDA081)

作者简介:赵金华(1997—),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人文地理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文化地理。

通信作者:吴鹏飞(1979—),男,江苏如皋人,博士,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开封市环境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环境变迁与黄河文明。

一、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资源简况

河南近代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抗争史。据《简明河南党史》，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侵占中国，在河南省内建铁路，挖煤矿，再加之地主阶级压迫，河南人民苦不堪言。1919年五四运动后，河南报界积极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文化，青年学子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郑州、开封、洛阳等地陆续成立工人俱乐部，后陆续在河南省内成立党组织。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河南省党组织受到重创。大革命期间，在党的帮助下，河南省党组织工作逐渐恢复，形成河南革命高潮。从八七会议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河南党组织贯彻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发动武装暴动50余次，与湖北、安徽等省的中共党组织创建了鄂豫皖、鄂豫边等革命根据地。全面抗战爆发后，河南省是粮食基地、兵源基地，又是战略指挥地，为抗日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河南省地处南北分界，是解放战争的主战场，中原突围、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事件都发生在中原大地上，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8]。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奋斗中，河南留下了众多革命文物，这些革命文物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河南人民为民族独立作出的英勇牺牲和巨大贡献。2020年12月25日，河南省文物局印发《关于公布河南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的通知》（豫文物革〔2020〕12号）（<http://wwj.henan.gov.cn/2021/01-15/2080076.html>），公布了河南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公布数据显示，河南省共认定的115项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以市域为基本地域单位，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7处。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将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类型分为革命战争旧址、烈士墓、陵园、故居、旧居、纪念馆、纪念馆等，本文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将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类型重新整合分类，整合后共分为六种类型，分别是：革命战争旧址、烈士墓/碑、陵园、故/旧居、纪念馆/馆/地、重要史迹等。根据公布的“河南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统计得出河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六种类型中，革命战争旧址数量最多，共计76处，占比高达66%，其次为故/旧居13处，烈士墓/碑9处，纪念馆/馆/地9处，重要史迹5处，陵园3处。河南省革命基础雄厚，在土地革命期间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赤城县苏维埃政府、固始县苏维埃政府等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留下多处革命战争旧址。全面抗战爆发后，河南省人民积极参加抗敌斗争，从1937年10月到1945年8月抗日战火遍及河南109个县，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晋豫边抗日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太岳抗日根据地、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豫鄂边抗日根据地、豫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等^[8]。战火频仍，故革命旧址居多。

二、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历史演进

革命文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体现特定历史发展阶段革命文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按照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将河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进行时期划分（表1），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河南革命文物的发展脉络。

表1 河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时期划分与统计

时期	革命战争旧址	烈士墓/碑	陵园	故/旧居	纪念馆/馆/地	重要史迹	比重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年)	2	0	0	0	0	0	1.7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	党的诞生和大革命时期	6	0	0	2	0	1	7.83%
	土地革命战争与局部抗日战争时期	26	4	0	0	2	1	28.70%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	23	3	3	11	0	1	35.65%
	解放战争时期	18	1	0	0	1	0	17.39%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	1	1	0	0	4	2	6.96%	
改革开放(1978—至今)	0	0	0	0	2	0	1.74%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年)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类型单一，只有旧址类。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的侵略和掠夺使我国小农经济受到重创。各地纷纷开始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走上革命的道路。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反对清朝

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河南省尚存有太平天国北伐军围攻怀庆府指挥部旧址。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

1921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南成立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洛阳组，为河南工人阶级指明了斗争方向，河南全省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

者和领导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可以划分为党的诞生和大革命时期(1921—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与局部抗日战争时期(1927—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9]。

1. 党的诞生和大革命时期(1921年7月—1927年7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河南有革命战争旧址、故/旧居、重要史迹三种革命文物类型,占比7.83%,以旧址为主。受五四运动后出现的社会改造思潮和社会革命运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河南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运动,农村也爆发了农民革命起义。同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河南共产党人开展革命工作,动员全省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的伟大斗争,组织了多次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并支持北伐战争,形成河南革命高潮,留下了如焦作煤矿工人罢工指挥部旧址等。

2. 土地革命战争与局部抗日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土地革命时期,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类型以革命战争旧址和烈士墓/碑为主,占比28.7%,共有旧址26处,烈士墓/碑4处。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河南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方针,创建革命武装,发动武装暴动50余次。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展开了多次游击战争,因此,革命旧址在这一时期居首位。该时期的烈士墓/碑,主要是在革命运动中阵亡的将士集体墓,纪念他们为民族解放做出的牺牲。

3.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9月—1945年8月)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总量的比重最高,占比高达35.65%,有五种类型的革命文物分布,主要以革命战争旧址和故/旧居为主。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和隐蔽的山区开辟了敌后战场。河南省内党组织领导各地人民建设抗日武装,创建了豫南、豫东、豫北抗日武装,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中原抗战,留下了23处抗日战争革命旧址。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了众多革命英雄,如属河南籍的许世友、杨靖宇、宋学义等人。战争结束后,人们为了纪念他们,保留其故居,铭记其历史。

(4)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9月)

解放战争时期,河南省革命文物占总量的

17.39%,共有20处,其中旧址18处,烈士墓/碑1处,纪念馆/馆/地1处。商丘地区是淮海战役的战场组成地,目前保留有商丘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1947年6月,中国共产党实施战略反攻,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带领晋冀鲁豫野战军自濮阳市台前县出发,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在信阳大别山地区先后建立了鄂豫、皖西、桐柏、江汉4个新解放区,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8]。河南省现存有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纪念地、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旧址、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旧址等。

(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1949年10月—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数量占比为8.7%,主要为纪念馆/馆/地。这主要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复苏、文化建设提上日程,人们在经历过战争的伤痛后铭记历史,缅怀英雄。河南省不可移动文物中的纪念馆主要有郑州二七罢工纪念塔和纪念馆、淮海战役陈官庄战斗纪念地、彭雪枫烈士殉国纪念地等。

三、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空间分布特征

河南革命文物资源丰富,并在省内广泛分布,呈现出以下几点特征:

(一) 整体分布具有集聚性,呈现出“一核三次中心”

利用 ArcGIS10.7 软件中的“核密度”工具对河南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进行“核密度”的估计分析,形成河南不可移动文物分布格局图(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河南省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性,布局形式为“一核三次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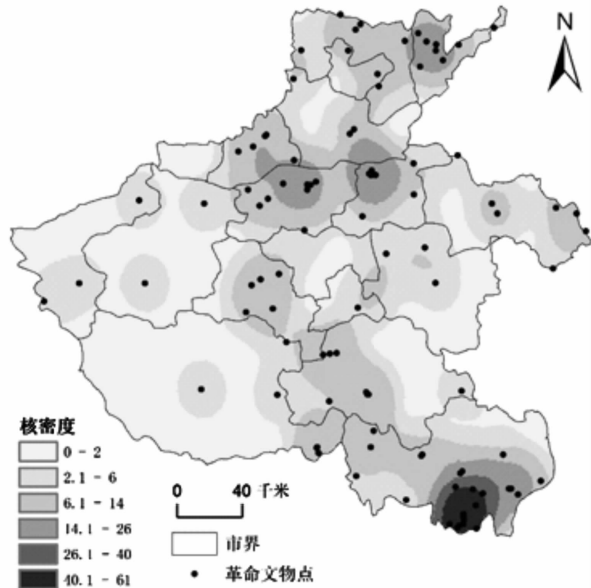


图1 河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核密度分布

“一核”是指以信阳新县、光山为中心的大别山区域,该区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卓越的革命老区。在地理位置上,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会区域,处于南京和武汉之间,又以大别山作为天然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向东可以截断津浦线,向西可以控制平汉线,向北可以扼住陇海线,向南可以威胁日军的长江运输,是打通中国南北战场的通道^[10]。1938年10月12日,来自皖西方向的日军攻克这一核心区域,将豫东与皖西连成一片,准备进攻华南。因此,作为抗战的重要战场,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在此奋力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大别山根据地对于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是防御国民党军向全国解放区进攻的前哨阵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11]。因此,信阳大别山区域留下了众多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形成了核心。

“三次中心”分别为郑州区域(郑州市区及巩义、荥阳);开封区域(开封市区),冀鲁豫交界的濮阳区域(清丰县、濮阳县、范县)。郑州和开封地处中原地区核心位置,两地相较于其他区域,革命文物多,地域面积小,革命文物集中分布,因此形成了两个次中心。开封城区历来是河南省的政治中心,“九一八”事变后,河南以省会开封市为中心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如学生联合举行响应“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罢课行动等。郑州市位于京汉、陇海铁路十字交汇点,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更是共产党人领导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重要活动地区。地处冀鲁豫三省边界的濮阳清丰县、濮阳县、范县一带,对外交往频繁,在五四运动以后,共产党人在该区域联络三省开展革命运动,是革命运动发展较快的地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集中分布,形成了又一个次中心。

(二) 市域分布广泛,呈现不均衡性

利用 ArcGIS10.7 对河南省不可移动文物的市域分布状况进行可视化处理,颜色越深代表该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数量越多。由图 2 可以看出,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市域分布广泛,但具有不均衡性。河南 18 个地市中,除许昌和济源外,各市均有革命文物分布(图 2)。其中,信阳最多,共有 33 处,信阳又以光山县和新县较为集中。其次为开封和郑州,两市并列第二,分别有 10 处。濮阳、商丘、驻马店较多,分别有 9 处、8 处、7 处,由于商丘和驻马店地域面积大,革命文物分布分散,未形成中心。其他地级市分布较少,其中南阳、平顶山、焦作、安阳四市,革

命文物数量一致,有 6 处,新乡、三门峡、周口分别有 3 处,鹤壁、洛阳分别有 2 处,漯河 1 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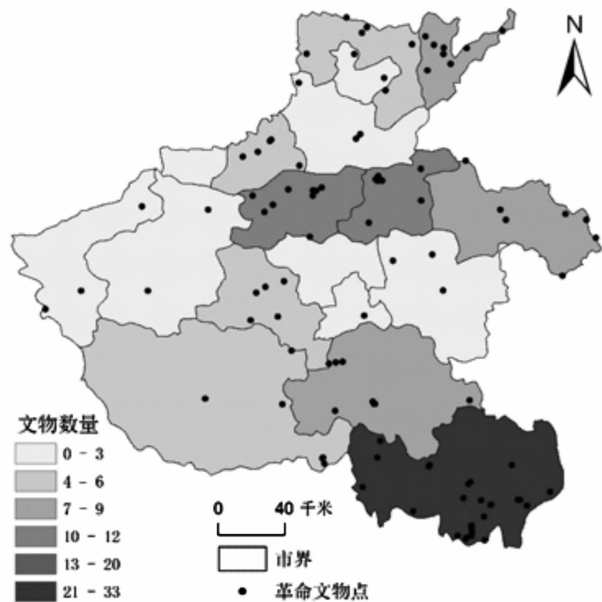


图 2 河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市域分布

(三) 地理环境影响革命文物分布

将河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点状数据和 DEM 数据叠加,提取每个点状数据的海拔高度并统计每个区间的分布数量,得出革命文物与海拔高度之间的关系(图 3)。由图 3 可以看出,在海拔 100 米以下平原地区的革命文物总数为 58 个,由于革命时期开封属于省会,郑州属于交通枢纽,所以两地革命文物的形成原因与地形关系不大,故予以剔除。因而,平原地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总数为 38 个。河南省平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55.7%^[12],平原面积广阔,革命军队在此区域活动或作战时没有明显障碍物遮挡,易被敌人发现,对革命极为不利,因此平原上革命文物分布少,且零散分布于各个地区。在海拔 100 米以上的山地丘陵地区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57 处。北部太行山,西部伏牛山,南部桐柏山均有革命文物分布,南部大别山区面积较小,却集中分布着大量的革命文物。这主要是因为山地丘陵地区,地形隐蔽,易观察且不容易暴露目标,有利于构筑工事。由此可见,河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山地丘陵地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数量多于平原地区,平原密集程度不如山地丘陵,在东南部大别山呈小范围密集分布,平原地区散落分布。

四、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蕴涵的时代价值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三大文化^[13],河南革命文物是我国革命文化的载体和革命文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发爱国热情、弘扬革命传统、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

体,蕴涵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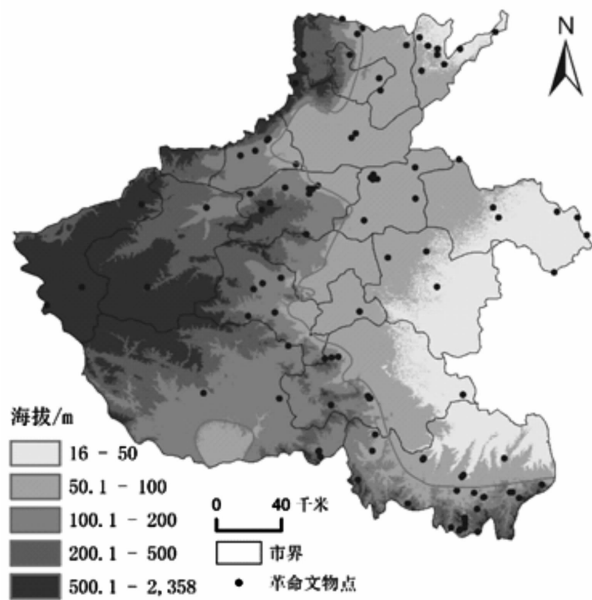


图3 河南省不可移动文物的地形分布特征

(一)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广泛分布,荷载的红色基因永流传

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在省内除许昌和济源外均有分布,其中又在信阳、郑州、开封和濮阳呈现集聚。这些革命文物留下了革命的火种,传承着红色基因。我们要充分利用河南革命文物教育人、启迪人、鼓舞人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活教材”,加深对河南省革命历史的认知。各地市可通过革命文物挖掘其背后的革命故事、革命人物,学习革命精神,传承红色血液,牢记百年党史。目前,郑州市二七纪念馆、夏邑县彭雪枫纪念馆、中共中央中原局旧址等革命文物已成为河南省爱国教育基地。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才能明其将往。我们要通过不可移动革命文物,高举红色的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以大别山为核心,增添了红色旅游资源

河南革命文物在信阳大别山地区,形成了核心。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将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与红色旅游、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发展红色旅游产业。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信阳新县田铺乡田铺大湾考察调研时指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大别山地区拥有丰富的革命文物资源,游客可通过花山寨会议旧址、白雀园殉难烈士纪念地、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旧址等感受革命精神,依托红色文化和绿水青山两大资源,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业。

通过红色旅游路线,让游客在革命文物中深刻感受百年红色奋斗历程的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凝聚信念,奏响了出彩中原新篇章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河南省要“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革命文物的厚重历史为奏出彩中原新篇章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原大地从来都是一片英雄的土地,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散落在中原大地上,流淌着先辈们的红色血液,承载着先辈们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革命文物所蕴含的二七精神、大别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融汇交织成河南红色基因精神谱系,凝聚起上下同心的磅礴力量,激发河南人民满怀信心的投身于文化强省的建设中去。

五、结语

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类型众多,共有六种革命文物类型分布,以革命战争旧址为主,占比66%。按其发展历程,多集中在土地革命战争与局部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在空间上,除许昌和济源外,在全省各地市均有分布,但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性,形成以信阳大别山为核心,开封、郑州、濮阳为次中心的“一核三次中心”的分布趋势;地理环境是影响革命文物分布的重要因素,平原地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数量不及山地丘陵地区,两种地形间数量相差19处,且处于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分布最为集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应加大工作力度,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发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1]。为此,我们不仅要保护管理运用好已公布的河南省第一批革命文物,也要进一步调查、挖掘和认定更多的革命文物,更要认识到革命文物对于传承红色基因,牢记百年党史的意义。全省上下应统筹安排,做好顶层设计,利用好各地市尤其是大别山、郑州、开封、濮阳等地众多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重点展示根据地红色故事、红色人物等,彰显河南在革命抗战之中的伟大贡献。今后,河南省应更加重视革命文物蕴含的激发党和人民奋勇前行的信仰伟力,汇聚奋勇向前的力量,谱写出彩中原新篇章。

参考文献:

[1]新华社. 习近平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激发广大干部群众

- 的精神力量[N].人民日报,2021-03-31(01).
- [2] 贾旭东. 革命文物概念及其界定[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41-145.
- [3] 贺云翱, 于有成. 革命文物保护的意義和路径[J]. 群众, 2018(6):17-19.
- [4] 唐前. 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研究:以延安枣园为例[J]. 建筑与文化,2018(9):195-196.
- [5] 王霞. 新时期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和管理[J]. 文物世界,2012(5):72-73.
- [6] 陈琳. 发挥革命文物在红色旅游中的作用[J]. 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7):46-48.
- [7] 冯海英. 宁夏革命文物的时代价值和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 民族艺林,2020(2):102-110.
- [8]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编. 简明河南党史[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20:8.
- [9] 邱潇, 郑德荣. “十四年抗战”概念衍生的党史分期问题研究[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4):4-10.
- [10] 李品仙. 李主席就职演词(二十九年一月十一日举行就职典礼时讲)[J]. 安徽政治,1940(1):5.
- [11] 宋俭.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与全国解放战争[J]. 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2(4):4-8.
- [12] 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河南省志·地貌山河志[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1.
- [13]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4] 白如山, 陈玲玲, 阳鹇. 安徽淮河流域红色文化遗产演化的可视化分析[J]. 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7-13.
- [15] 卫华. 加强革命文物工作, 发挥革命文物作用[N]. 光明日报,2008-08-22(010).
- [16] 岳音. 传承红色文化, 彰显文化自信[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6-29(006).
- [17] 单霁翔. 开拓进取, 扎实工作, 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独特作用[N]. 中国文物报,2008-08-06(00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nalysis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Value Implic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in Henan Province

ZHAO Jinhua, QI Shuxian, WU Pengfei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As red resources,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re the important carriers of inheriting red genes. Henan boasts glorious revolutionary history, leaving numerous relics, mainly the sites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Most of them are relics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the local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term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it shows the agglomeration of “one core with three sub-centers”. The relic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among cities, with Xinyang, Kaifeng and Zhengzhou as the most prominent cities. Topographically, the number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in plain areas is less than that in mountainous and hilly areas, especially in Dabie mountain area.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of Henan are of great value for inheriting the red gene, remembering the century-old history of the Part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writing a new chapter of splendid Central Plains.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 the Dabie Mountains; Henan province

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路径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

谭备战,马小月

(河南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中医药对于维护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突发疾病和重大灾情极大地考验了国家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的应急能力,同时也暴露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结构性短板问题。着重分析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现状和重要意义,依托河南省的优势资源,促进中西医并重,建立中西医相结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发挥高等院校教育优势,加快中医药人才队伍培养;提高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助力中医药传承创新,阐述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路径,助力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推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中医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路径;河南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11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63-0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这类突发事件,极大地威胁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给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带来了挑战,应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工作。在新冠肺炎防治过程中,中医药全程参与和深度介入,是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显著特色和突出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1]。在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应急管理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编制了《“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主线,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

代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河南省地处中原,是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在国家战略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应加快完善河南省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在中部地区战略崛起的发展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更好地为全国发展大局服务。国务院出台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从国家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明确了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对人民群众健康保障发挥核心作用^[2]。同时河南作为中医药的发源地,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亦有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作为支撑,将中医药融入构建河南省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之中,有利于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提高人民生活的健康水平,进一步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收稿日期:2022-01-19

基金项目:1. 2021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招标项目“中医药融入河南省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研究”(212400410058); 2. 2021年度河南省中医药文化与管理研究项目“中医药融入河南省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路径研究”(TCM2021039); 3. 2021年度河南中医药大学科技协同创新专项项目“沿黄生态走廊视域下中医药健康旅游研究”(XTCX2021-16); 4. 2021年度河南中医药大学强省战略研究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路径探析”(ZYYQS-2021006)

作者简介:谭备战(1969—),男,河南开封人,博士,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医药文化与管理。

一、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现状分析

中医药在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预防方案和临床诊治经验,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理论和中医体系。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医药有效发挥了“治未病”优势,并整合中西医的优势资源,成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2021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的《“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中西并重,特色发展。坚持中西医建设任务同规划、同部署、同落实,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认真总结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经验做法,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特色和比较优势,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3]在未来几年,我国旨在建成优质高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有效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坚持中西医协同参与,发挥中医药特色,使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河南省作为中原大省,人口密集,面对新冠肺炎和特大暴雨等灾害,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暴露出来,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带来挑战。将中医药纳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范围之中,从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组建中医药人才队伍、中医药科技创新、相关法律法规、应急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完善,建立符合中医药特色的服务体系,形成以中医药为依托、中西医防治结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健康中原的建设,构建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有力屏障。

二、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意义

河南省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更是中医药文化的发源地。中医强调辨证论治,采用“号脉”的方式,一层一层分析“病因”,采用“对症下药”的特色,充分发挥中医药的资源优势,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中医药方案。中医药作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有力储备军,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突破公共卫生科研攻关难题,提升中医药研发水平,产生其他良效连锁反应,对于推进健康中原和健康中国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中医药对于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有着重要作用,充分利用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发挥中医药独具特色的优势,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在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网格形成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同时使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实现全覆盖,公共

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显著加强^[4]。依托高水平一流化的综合性医疗机构,承担疾病救治和预防培训的任务,提高综合救治能力,确保医疗救治和保障体系更加成熟,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更加健全,把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提升到新的水平。

(二)提升中医药研发水平

中医药传承着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伴随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衍生而来,很多优质资源有待发现和挖掘,实现中医药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融合,对于充分发掘中医药资源和提升中医药研发建设都是十分有益的。中医药拥有底蕴深厚的医学积累,将中医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能产生巨大合力,为中医药研发水平提供技术支持。培养中医药高质量人才储备军,为中医药研发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中医药企业也有较强的生产能力,为中医药研发水平的提升提供最大的物资保障。提升中医药的研发水平,推动中医药的传承创新,有利于突破公共卫生科研攻关的难题,进一步提升医疗卫生的科研水平。

(三)产生其他良效连锁反应

中医药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融合发展将产生多重效益,二者的融合发展将带来多方面的共赢效果。完善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提升中医药文化的价值水平,不断提升中医药的接受度、知名度和认可度。利用信息技术构建应急管理信息共享平台,提高各级政府机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培养专业人才队伍,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和获得感。

三、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路径分析

重新审视时代赋予中医药的价值,依托河南省中医药资源丰富的优势,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促进中西医并重,建立中西医相结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一是提升中西医协同应急救治能力。通过创新中西医协作医疗模式,强化中医药在临床救治过程中的作用,将中医纳入多学科会诊体系,总结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工作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中西医救治协同机制,全面提升中西医协同应急救治能力。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针对中医药治疗有优势的疾病,结合西医的理论分析,总结出多种中西医结合的诊治方案,专门组建中西医结合诊室,打造中西医结合团队,开展中西医联合诊疗模

式,强强联合,协同救治发挥最大合力。

二是建立中西医结合的应急管理平台。依托中西医并行的运行机制,发挥中西医的最大优势和合力,提高诊疗能力。聚焦新发突发重大重点难题,开展中西医协同攻关,优势互补,建立应急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形成以国家为龙头,各省市为核心,各综合性医院和传染病专科医院为骨干,基层社区医疗机构为基础的中西医结合预防诊疗传染病体系,实现传染病的中西医结合预防与诊疗在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全覆盖,促进预防、医疗、科研、教育、法制的联动发展^[5]。提高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制体系的综合救治水平,构建新型中西医结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应做到消息互通有无,上下协调,尽快完善当前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平台,为国家卫生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镜鉴。

三是构建中西医结合、多学科优势互补的救治体系。完善组织架构,构建中西医并行的运行机制,多学科优势互补提高预防和救治传染病的诊疗能力。中医药与生物信息学和人工智能的交叉学科表现比较突出,通过与生物信息学的结合,建立了多个中药数据库,如组分中药数据库、ETCM(中医百科全书)等,及时筛选有效药物,预测药物作用机制,进行处方优化及评价,如宣肺败毒方就是基于“文献+经验+药物筛选”得出的有效药物。在人工智能方面,启动“面向2035人工智能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战略研究”,项目涵盖了人工智能在中医诊疗、中药智能制造和中医药服务等方面的应用战略研究^[6]。充分发挥现代科技的优势,使交叉学科之间形成优势互补,推动构建更加完善的多学科优势互补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二)发挥高等院校教育优势,加快中医药人才培养

一是建立以中医药防治为特色的突发性疾病学科体系。阅读古代医史文献可以发现,在抗击疫病的历史上,中医创造出了许多救治理论和诊治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要高度重视中医药经验的传承发展,继承中医药的预防救治经验,从中汲取先人们的智慧,传承其精华。中医注重普及起居调养、太极拳、八段锦等养生方法,可有效发挥中医药在调理、保健和慢病防治等方面的作用,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建立以中医药防治为特色的突发性疾病学科体系,建设出一批具有中医特色的医疗基地、防治传染病临床基地和重点实验室,不断发展中医药健康产业,对于中医药防治突发性疾病学科体系构建有着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加快培养中医药人才队伍。

二是培养“平战结合”全能型中医药医护人员。依托河南省的高校建设发展,培养一批“平战结合”全能型中医药医护人员,以河南中医药大学为依托,加强中医药院校人才队伍的建设,培养出一批与时代需求相对应的专业性人才。在高等医学院校教育层面,加强中医药储备人才的知识学习,着力培养出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等方面相结合的全能型人才,确保在平时阶段做好临床方面的治疗,战时阶段随时进入工作的状态。运用中医药专业知识进行防治,培养建设一支中医药功底深厚、重症救治能力突出、治病救人专业高效的“平战结合”全能型中医药医护人员队伍^[7]。促进多学科相融合发展,助力“平战结合”全能型中医药医护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中医药对重大疫情的防治能力。

三是注重前方救治一线和后方科研团队之间的配合。加快中医药人才队伍培养,将前方救治一线和后方科研团队紧密结合,借助中医院校、科研院所和中医院的发展建设,加强三者之间的联系。在高等院校的学科建设中,加强学校专业教师和医院临床科室之间的交流学习,将最新的临床信息及时反馈到学生的课堂,把最新的知识及时引进课堂教学。将最新科研成果深入临床考察,让前方救治一线的情况及时反馈给学校的科研团队,充分利用好前方与后方的资源,有利于加快专业型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培养。

(三)提高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助力中医药传承创新

一是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建设与科技攻关工作。中医药历来以辩证诊治、扶正祛邪而闻名,以“三方三药”为代表的中医药方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期间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为更好提升中医药的服务能力,我们要在传承中医药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中医药的科技创新。通过加强中医药研究基地建设,及时解决应急状态下暴露出的短板问题,让中医药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在中医药研发领域,通过进一步提升传染性疾病科研水平,推动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与科技攻关工作的开展,提升应急状态下中医药研发能力,从而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与发展。

二是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与传承发展。2021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南阳市考察时说:“过去,中华民族几千年都是靠中医药治病救人。特别是经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重大传染病之后,我们对中医药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8]中医药在历史贡献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赋予中

医药新的时代内涵,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深入实施中医药文化的创新发展工程,挖掘仲景文化等中医药特色资源,打造中医药品牌建设,使中医药文化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特色文化,推进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是注重与中医药企业开展“产教学研”合作。开展“产教学研”合作,提高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借助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河南知名企业,将中医药院校和中医药知名企业相结合,建立以中医药为特色的研究基地,以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疑难杂症问题为切入点,积极融入中医药诊疗方案,及时反馈治疗效果,为科研创新提出新的思路,为学校教学提出新的案例,加强“产教学研”合作建设。“产教学研”合作的开展有利于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中医药人才,深度挖掘中医药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的潜力,更好地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医药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重要贡献,总结中医药的成功防治经验,发挥中医药的现代价值,提升我国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应急管理水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真正做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推动健康中国的开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应急管理新格局,推进国家

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向现代化水平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小明. 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切实维护公共安全 [N]. 光明日报, 2020-02-27(06).
- [2]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通知 [EB/OL]. (2016-02-26) [2021-12-0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26/content_5046678.htm.
- [3] 关于印发《“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EB/OL]. (2021-06-17) [2021-12-01].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7/t20210701_1285212_ext.html.
- [4] 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N]. 北京日报, 2020-06-09(002).
- [5] 谷晓红. 从疫情防控看中医传染病学科建设 [N]. 中国教育报, 2020-04-06(05).
- [6] 刘茜, 陈建强. 将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N]. 光明日报, 2020-04-13(08).
- [7] 黄璐琦. “平战结合”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 [N]. 学习时报, 2020-03-23(A1).
- [8] 习近平: 进一步发展中医药 [EB/OL]. (2021-05-13) [2021-12-0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605904494916956&wfr=spider&for=pc>.

(责任编辑 谢春红)

Study on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Taking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AN Beizhan, MA Xiaoyue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a treas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afeguarding people's health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Sudden diseases and major disasters have greatly tested the emergency response capacity of the national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but also exposed the structural weakness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 syste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TCM into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TCM into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will be elaborated from these three aspects: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training of TCM talents; to enhanc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of TCM and promote it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CM,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capacity.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pproach; Henan province

行稳致远的中欧关系

柴生高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中国和欧洲是东西方文明的代表,都是世界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双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虽然存在一些摩擦和分歧,但总体上双方存在诸多共识,合作交流是主体。只要欧洲真正做到战略自主,双方有足够的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中欧关系的未来值得期许。

关键词:中欧关系;战略伙伴;行稳致远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12

中图分类号:D822.35;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67-05

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着力点,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途径和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和欧洲是东西方文明的代表,都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双方应努力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以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推进人类文明进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是欧洲乃至世界成就最大、结构最完善、实力最雄厚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中欧关系最主要的就是中国与欧盟的关系。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加上美国的干扰等因素,欧盟对中国崛起的疑虑重重,出现一些摩擦和矛盾。未来欧盟政策调整可能导致中欧经济上的纷扰增多,但双方合作的机遇和潜力仍然巨大,中欧加强合作仍将是主流。

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来之不易

70多年来,中欧从冷战时期的尝试接触、不断发展到新时期不断成熟,双方基于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愿望与利益,逐步发展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世界多极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冷战烙印下的尝试接触

二次大战后,世界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两大阵营一直处于紧张的激烈对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由于美国等西方阵营对新中国采取敌视、遏制包围政策,中国在外交上只能奉行“一边倒”战略,与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阵营关系冷淡。中国与欧共体直到1975年才建立正式关系,从1975年起到1989年的15年或许可称之为中欧关系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欧关系开始逐步缓解并有一定的建树,但总体上双方仅仅只是侧重于冷战时期外部各自需求,尚未形成较为稳固的政治与经济基础。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国家二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西欧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欧共体的成立,使欧洲在全球的国际地位不断攀升。1964年1月,法国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欧关系取得重大进展,中国与西欧各国接触越来越频繁,双方紧张关系得到了大大缓解。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打破了相互隔绝局面,双边得到了改善。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最大障碍逐渐消除。1975年,欧共体外交专员访华,双方在外交上相互承认,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方在欧共体派驻了外交使团,中欧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揭开了双方交往的新篇章。冷战格局的变化是这一时期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时期的中欧关系基础是为了共同抗击苏联的威胁,双方的战略共识仅仅停留在安全利益方面且缺乏长期规

收稿日期:2022-02-10

作者简介:柴生高(1977—),男,河南唐河人,历史学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政治教育。

划,双方在经济合作方面尚未深入发展。

1978年,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发展步伐吸引了欧方企业等纷纷加入这一新兴市场。中欧关系在整个80年代长足发展,双方贸易额增长了约十倍。

(二) 逐步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1990年,随着政治关系的回升,中欧经贸关系也逐渐恢复。20世纪90年代,中国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市场全面开发。鉴于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力和自身经济的不断发展,欧盟对华合作采取了务实态度,其充分认识到中国对欧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双方在诸多领域具有更加广泛的利益。

经贸关系是中欧合作的核心内容。作为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全球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市场,GDP年均增长高达9%以上,对外贸易更是达到了15%。到90年代中后期,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国、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一支重要经济力量、经济大国。与中国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局面相反,90年代的欧盟,经济发展进入低谷,经济增长一直陷入低迷状态。要想解决欧盟疲软的经济状态,其认识到了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吸引力。欧盟对推动对华经济发展,加强对华投资、贸易充满了期待,这也为欧盟积极调整对华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中国作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伴随着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不断跃升,国际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在全球各项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冷战的结束,欧盟致力于谋求多极化发展国际上的一极,致力于提升欧盟整体在国际的话语权与地位,致力于扩大其自身的影响力。双方加强协商与对话,加强合作与交流,完全符合欧方的外交利益,有利于其借助中方不断增加的政治影响力而提升欧盟在全球的影响,完全符合欧盟外交和战略利益。

1992年开始,中欧关系由凉到热,双方从恢复对话到高层互访不断增多,经贸往来更进一步。90年代中期,欧盟开始积极主动提升中欧关系,对华政策开始调整,中欧关系开始发生质的飞跃,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1995年,欧盟发表了《中欧关系长期政策》,这是欧盟第一个全面对华文件。文件认识到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强大,中欧关系应该成为欧亚关系甚至全球外交上的重要里程碑。希望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与中国建立长期的、稳定的覆

盖政治经济的良好关系;加强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促进欧中经贸关系的全面发展。1996年11月,欧盟委员会通《欧洲联盟对华新战略》的文件,对《中欧关系长期政策》文件作出进一步的补充,强调欧盟对华政策的全面性、独立性和长期性,支持中方广泛参与国际事务。

1998年3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旨在建立与中国的“全面伙伴关系”。文件确定了欧盟对华发展的五大目标。一是与中国继续接触,共同面对全球问题;二是以合作促进人权;三是支持和鼓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世界金融体系;四是发展中欧合作项目;五是提升欧盟在华知名度。欧盟视中国为“有着巨大共同战略利益的战略性伙伴”,把对华合作扩展到全方位。

整个90年代,欧盟对华政策颇具有连续性、务实性,双方政治关系的拓展推动了经贸关系迅猛增长。1997年欧盟已成为仅次于日本与中国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欧盟对外贸易由1990年的第10位上升到1998年的第4位。

(三) 确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21世纪初,历经冷战后的第一个十年发展,国际政治呈现出新的态势,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日益明显。2001年,中国加入WTO,经济发展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2002年,欧元在欧盟流通;2004年,欧盟一次性吸收10个新成员。欧洲宪法、欧洲议会、欧洲法院,欧盟一体化不断提升,开始向政治、经济集团大步迈进。时代赋予中欧新的机遇,作为国际社会的中坚力量,中欧积极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进。

2003年,欧盟在评估原有对华政策的基础上,推出了新的对华关系战略文件《欧中的共同利益与挑战》。文件认为中欧双方关系全面稳定发展,经贸关系得到广泛发展;提出了中欧合作计划;加强在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上合作,推进全球治理。2003年,中欧领导人第六次会晤,达成致力于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当年中欧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4年被确定为中国的“欧洲年”,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第一大技术供应方,这一时期被称为自中欧建交以来“历史最好时期”。2006年10月,欧盟《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文件,要与中国建立更加密切而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同年,欧盟阿什顿报告中国位列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第

二位,仅次于美国,其后分别是俄罗斯、印度。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欧盟总部,提出了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赋予了新的内涵。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双方合作现出了较高的水平,中欧关系稳定发展。

二、合作与防范考验着中欧双方

新冠疫情暴发后,双方在疫情控制、反对贸易保护、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等方面合作进一步加强。但伴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再加上美国因素的影响,欧洲内部对华不断有不和谐的声音,中欧关系面临着考验。

(一)克服疫情影响,中欧进一步加强合作

近几年,中欧互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货物与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在互利共赢的合作中,双方企业和民众普遍分享到合作红利。

在新冠疫情肆虐情况下,中欧双方成为共同稳定全球供应链并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中国与欧盟贸易韧劲十足、充满“牛气”,2020年,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2021年前10个月,双边贸易超过2020年全年贸易总额,同比增长30%。中欧经贸往来的成绩及其展现出的韧性,无疑是对鼓吹“脱钩”、唱衰中欧合作言论的有力回击,以中欧班列为例,面对疫情对海运和空运的冲击,充分利用国际铁路联运独特优势,承接了大量转移货物的任务,生动诠释了疫情下中欧贸易的繁荣与活力。中欧班列已铺画73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3个国家的170多个城市,运输货品达5万余种。成为日夜奔跑在亚欧大陆上的“钢铁驼队”。2020年,中欧班列首破“万列”大关,累计开行1.24万列,创纪录地实现了同比增长50%,跑出了互利共赢“加速度”。2021年1—8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0030列,较2020年提前2个月实现年度开行破万列,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中欧班列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国内国际双循环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对中国的警惕防范前所未有

随着中欧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欧盟对华政策出现新变化。欧洲虽然仍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但出现了不少不和谐的因素,对华观望、迟疑、防范立场在增多。

对华经贸活动不断保守化。欧盟先后通过了《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针对外国政府补贴的促进公平竞争白皮书》,持续加码对华贸易保护主义。

这直接导致了2017年以来,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联系大幅度减少,特别是在技术领域的跨境投资难度加大。疫情防控期间,欧洲对华贸易保护没有减弱,而是进一步增强。

将政治标准强加到经济领域。受舆论环境特别是中美近年来的角力,欧洲改变了“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做法,战略上强化与美协调。在2020年底,中国与欧洲达成了自贸投资协定,这一协议的达成,对于双方都有好处,能够大幅度提升中国以及欧洲经济发展水平。但2021年3月,欧盟就所谓“人权”问题实施对华制裁;随后,中方决定对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人员和实体实施反制裁。欧盟不反思自己无端污蔑并干涉中国内政,反而用人权为借口,宣布冻结了《中欧贸易协定》的审批,这意味着这个双方耗费多年所签下的协定,无法投入实施。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中欧关系。欧洲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感到恐惧,发布了《欧盟印太合作战略报告》,希望借助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合力,抵消中国塑造的国际地缘战略新格局。在南海问题上,英国航空母舰前脚刚走,德国军舰不远万里穿航南海,刷存在感。在台海方面挑战中国底线,立陶宛设立所谓台湾办事处充当反华“急先锋”,法国、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多国议员窜犯台湾。其还在香港民主、新疆人权等方面对中国指指点点,搞升级对抗。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力量此消彼长。欧洲一方面对华务实合作的需求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对中国的警惕防范也前所未有的,其本质上是欧盟因中国实力和影响力快速上升做出的应激反应。这必然会影响到中欧关系的平衡性,未来中欧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对抗也不能完全排除。

(三)美国因素是中欧关系的外部变量

美欧跨大西洋同盟是冷战期间为应对“苏联威胁”而形成的,欧洲国家的外交独立性十分有限,在安全上对美国严重依赖。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法德等欧盟核心大国对外政策便显出更强的自主性,但由于英国等所谓铁杆“亲美”国家,在对华政策上欧洲政策自主性仍然深受美国制约。美国把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欧洲就把中国定为“制度性竞争对手”。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欧洲就出台了外商投资、自由贸易等一系列新规。美国认为华为5G技术不安全,英国就开始和华为解除合同,拆除5G设备。美国说“南海航行自由受到威胁”,英国、德国就先后派军舰到南海巡航刷存在感。美国多借香

港、新疆、台湾等事项干涉中国内政，欧洲也随声附和、横加指责。

尽管欧洲也曾一度在特朗普大搞“美国优先”的时期，强调要“战略自主”，强调在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欧盟要在外交和安全防务等领域体现独立自主性，加快摆脱欧洲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但拜登上台后，美国重新回来领导西方世界，欧洲似乎觉得又有了主心骨，因此也就开始淡化“战略自主”了。欧洲的对华政策尽管会受美国影响，但出于自身利益出发，仍然表现出起独立性。毕竟，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要解决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也离不开中国；同时，欧洲与中国在经济上深度交织，中国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使欧洲已无法也不愿与之脱钩。但毫无疑问美国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作用更加凸显，美国因素成为中欧关系的最大变量，会深度影响中欧关系的发展。

三、把稳中欧关系前进航向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要想不断获得生命力，需要双方继续坚持沟通对话，妥善解决分歧，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一)相互尊重，共同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

中欧关系与中美关系有很大的不同。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不存在历史遗留的包袱，也不是战略竞争对手，更没有地缘政治矛盾，有的只是巨大的合作需求，完全可以互利共赢，双方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中国从未做过损害欧洲利益的事情。中国一直支持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支持欧洲的团结合作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欧债危机时，中国主动向欧洲伸出援手；在别人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时，中国力挺欧洲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在伊核等热点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顶住压力，保持了相近的立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与欧洲一道，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支持全球贸易自由化。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中，中国一直秉持公开、透明、开放、包容的立场，从未有任何要分裂欧洲的想法。恰恰是在新冠疫情反复肆虐，欧洲物资运输格外吃紧的情况下，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成果——中欧班列，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使欧洲许许多多的国家都从中受益。

目前，中欧经贸往来已经从货物贸易扩大至服务贸易、投资、技术、金融、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韧性持续增强。近年来，中国与欧盟签署了航空安全协定、地理标志协定，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还建立起数字、绿色伙伴关系，与瑞士、冰岛自贸区协定运行良好。

彼此交往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中方支持欧方提升战略自主，真正独立自主发展对华关系与合作，共同践行多边主义。欧盟应树立正确的认知，充分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政治选择，排除美方干扰，推动双方沿着正确轨道继续稳定发展。

(二)加强合作，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提供新动能

中欧合作的核心首先是经济。中欧贸易依赖性和互补性强，中国与欧盟是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双方的经贸往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贸领域中欧将仍以合作为主基调。尽管欧盟担心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将成为欧盟的强劲竞争者，但在2020年，面对疫情冲击，中国超过美国，中欧双方贸易逆势上扬，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大部分跨国企业仍然视中国为最佳合作伙伴，对中国市场高度认可。以德国在华企业为例，96%企业表示继续在中国，72%表示要扩大在中国的投资。

2021年7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进行第八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继续加快推进中欧投资谈判，推进金融业双向开放和互利合作以及扩大中欧农产品贸易等，双方达成一系列共识。疫情防控期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在疫情的影响下不减反增，成为国际贸易和物流运输的大通道。中欧作为拉动世界经济的“双引擎”，双边贸易的“牛劲”不仅为全球贡献增长与就业，更以实际行动维护开放经济与自由贸易，支持全球贸易复苏。

(三)顶层设计，从战略角度把稳中欧关系方向盘

中欧关系历经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在若干领域有着重要交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加强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合作等方面，有较大的共识和相似的利益。

过去的一年，中欧元首外交保持着紧密联系。习近平主席两度主持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达成了诸多共识，强调“要从战略高度牢牢把握中欧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主基调”，“牢牢把稳中欧关系前进航向”，把稳中欧关系方向盘。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视频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坚持共商共建、务实均衡、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合作原则，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助力各自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中欧之间的频频

对话,体现了高度政治互信和密切战略沟通。

2021年底,习近平主席与新任德国总理朔尔茨通电话,双边主要讨论了深化伙伴关系和经济关系、欧盟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以及国际问题。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欧是全球两大独立自主的力量,有着广泛战略共识和共同利益。双方要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确保中欧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作为欧盟的“领头羊”之一,朔尔茨总理表示以建设性态度促进欧中关系发展,愿同中方在国际事务中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2022年2月16日刚“开春”,习近平主席与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为中法、中欧关系定向把舵。双方均表示要扩大共识,为中法、中欧关系发展增添新动力,共同推动中法、中欧关系新发展。

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欧双方只要坚持互利共赢、携手合作,就能有效应对双方所面临的挑战,共同推动中欧合作行稳致远。中方建设并运营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成为亚欧非三大洲海运业务及全球发展最快的集装箱港口之一;2021年3月1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中方与匈牙利、塞尔维亚合作的匈塞铁路已部分建成通车。这一系列“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的稳步推进,充分体现了双方经济融合的加深。同时,双方在抗击疫情、维护多边主义、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也有广泛的共识。这些成绩证明了尽管中欧在认识上存在着不同,但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欧盟出于意识形态考虑,对中国认知上存在偏差,出台的一些限制双方合作的政策影响了中欧合

作的广度和深度,甚至出现了与立陶宛“关系降级”,这不利于双方利益。但总体而言,中欧关系合作仍将是主流,因为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双方的共识远多于分歧、合作远大于对抗。只要欧洲真正做到战略自主,双方有足够的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保持双边关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中欧合作空间也将无限广阔,中欧关系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中欧关系的未来值得期许。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8).
-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百年大变局: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M]. 上海: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 11.
- [3] 冯仲平. 新冠疫情下的欧洲战略困境与中欧关系(英文)[J].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20(4).
- [4] 冯怡然. 欧盟对华政策三大新变化及中欧关系发展趋势[J]. *国际论坛*,2021(4):81-98,158-159.
- [5] 杨骏,徐永春. 元首通话给中法中欧关系带来春意[N]. *新华每日电讯*,2022-02-18(010).
- [6] 周弘,金玲. 中欧关系70年:多领域伙伴关系的发展[J]. *欧洲研究*,2019(5):1-15,165.
- [7] 王灵桂. 合作共赢 开创中欧关系新局面[J]. *欧洲研究*,2021(5):1-5,165.
- [8] 人民网.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朔尔茨通电话[EB/OL]. [2021-12-21]. [http://politics. people. com. cn/n1/2021/1221/c1024-32313758. htm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1221/c1024-32313758.html).
- [9] 崔洪建. 盘整好中欧关系基本格局[N]. *环球时报*,2021-11-02(01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On Steadily Progressing China – Europe Relations

CHAI Shenggao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China and Europe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and both are important for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 – polar world. Afte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two sides have gradually forme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There are some fric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but on the whole there is general consensus.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re the main body. As long as Europe truly achieves strategic independence and the two sides enjoy sufficient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mutual trust, China – Europe relations would have a promising future.

Key words: China – Europe Relatio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steady progress

革命文艺的下乡:以鲁艺工作团为中心的考察

梁璐牵

(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摘要: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革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走进“大鲁艺”、实现“文艺服务于工农兵”亦成为1943年鲁艺师生组建鲁艺工作团、配合西北局工作的内在动力。下乡期间,工作团把握服务乡村的原则,文艺演出侧重当时革命需要,并在吸收和借鉴乡村民间文艺形式的基础上,融合乡村革命内涵,创作出《周子山》等新剧目,实现文艺与革命的双向互动。此次下乡,既促使团员深入理解和认识乡村社会,重新发现并重视乡村旧有文艺,又坚定了他们文艺创作“来源于生活”的理念,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革命。

关键词:毛泽东;鲁艺工作团;乡村革命;文艺创作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13

中图分类号:I206;J120;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72-05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力争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287}。随后延安掀起“新秧歌运动”,在改造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文艺创作与乡村革命的有效互动。学术界对此已有相当研究^①,为我们理解延安乡村革命文艺运动奠定理论基础。

时至今日,问题的关键不是革命文艺是否对乡村产生影响,而是如何产生影响,换言之,延安时期革命文艺如何走进乡村、乡村生活如何影响革命文艺的创作,这是我们深入理解延安革命文艺的重大理论问题,已有研究就此少有系统分析^②。鉴于此,本文以1943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团(下文简称鲁艺工作团)在绥德地区演出为叙述主线,结合《解放日报》、工作团团员及民众回忆等文献,在梳理工作团工作基础上,展示“讲话”影响下革命文艺工作者创作思路转变的历史轨迹,以期丰富我们对中共革命文艺及在其影响下乡村革命的整体认识。

一、走进“大鲁艺”:工作团下乡之缘由

全面抗战爆发后,动员民众起来抵抗日本侵略,

成为中共面临的重大课题。除利用现有革命力量,还须注意“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2]789}。就此,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③(下文简称鲁艺)成立。办学伊始,鲁艺就形成“文艺下乡”的传统。如是年9月文学系部分学院到二十里铺下乡,12月美术系的木刻工作团赴山西敌后根据地,1941年7月戏剧部、音乐部组成宣传队赴安塞、延安进行宣传等。就演出的效果,据时人回忆,形式较为单一,多是“演一场戏就完了”,且排演剧目多为《日出》《雷雨》等与抗战生活和边区群众关联不很紧密的“大戏”^{[3]85}。而在毛泽东看来,此时文艺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无法发挥其在革命中的宣传作用^{[4]384}。毛泽东对调整文艺发展方向的强调,是基于当时乡村革命的全局考虑。因此,鲁艺的文艺演出效果,理应是动态发展的。

1938年8月,由鲁艺戏剧系第一期学生为骨干组建实验剧团。之后排练并上演了包括曹禺的《日出》等剧目。据学员回忆,是毛泽东提出要演《日出》,要让从长征过来的干部、老红军“知道资本主

收稿日期:2022-03-05

基金项目:2021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视域下甘肃民族院校‘纲要’课教学改革研究”(2021QN004)

作者简介:梁璐牵(1988—),女,甘肃环县人,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义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和天津这些地方当时的社会是什么样子”^{[5]89}。自1940年元旦起,《日出》在延安正式公演,观众给予肯定,“士兵或外地的那些干部背着行李跑着来看”,知识分子“这么多年没有看这样的戏了,那时特别开心,也特别轰动,场场爆满”^{[5]91}。“因演出效果甚佳,博得一致好评。中共领袖毛泽东、王明、洛甫等同志对于原作者曹禺先生备极赞扬”^[6]。

1940年曾被中央领导肯定的剧目,为何到1942年成了被“引导”要改变的呢?其中缘由,一方面要从鲁艺自身转变说起。自1940年7月开始,鲁艺制定新的教学大纲。如戏剧系引入苏联的表演理论体系,注重演员“要同角色结合”,此种“提高的愿望是很好的,但是提高的条件并不具备”^{[5]100}。另一方面须从观众角度考察,即鲁艺的演出并未受到来自乡村观众的欢迎,甚至遭到部分党政军干部抵制。1941年12月,鲁艺音乐系创作《凤凰涅槃大合唱》,“好多名家都出来了”,但老百姓“根本不接受,不能理解”;就美术系的漫画展,毛泽东看后,不明白有些“画的是什么东西”^{[5]100-101}。此时鲁艺因过于注重艺术层次的“提高”,未能适应边区革命形势的变化。皖南事变后,文艺须设法动员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倡导的乡村建设,鲁艺此时却“关门提高”。

针对文艺工作与乡村革命的“不结合”,1942年5月2日、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讲话,阐释革命文艺发展的方向等问题。就此,鲁艺学生“虽然知道我们革命的文艺要为大多数人服务这样一些一般的道理,但为大众的文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并不懂得,思想上只有一个抽象的概念”^{[7]199}。为更好地帮助师生理解文艺与革命的相结合,30日,毛泽东到鲁艺给师生作了一场报告,指出:

你们现在学习的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对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渐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做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4]384}。

在毛泽东看来,鲁艺师生应走进乡村、到群众中去,向人民学习,这样创作的作品才为人民所喜爱。

是年7月,为配合纪念抗战五周年,鲁艺师生到乡村巡回演出,演出效果仍不佳。据演员回忆,“由于生活习惯、语言、动作以及生活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是当时当地群众所不熟悉、不了解的,所以一点儿也没有得到群众的欢迎”^[8]。面对如此效果,师生们

感到苦闷:“我们的演出怎样才能获得工农观众的喜爱呢?”^[8]师生们的疑惑恰好说明:即使有了毛泽东的倡导,但文艺与革命的相融合,仍须文艺工作者在不断的实践中得以领会与贯彻。正如时人所悟的“有了认识,不等于就能正确地行动”^[8]。那么,如何实现文艺“下乡”、满足革命需要,是鲁艺师生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1942年下半年,伴随整风运动的开展,鲁艺师生对“关门提高”“洋教条”等进行了深刻检查,通过学习与讨论,师生们明白“不仅要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愿望和热情,而且‘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去为他们服务才能达到真正的服务的目的”^[8]。1943年元旦,为了深入宣传《抗日救国十大政策》,鲁艺组织排练了旱船、大秧歌等节目,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肯定的同时,亦被点出存在的问题。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彭真指出“要在实践中创造和提高,注意把一些不健康的、有损于劳动人民形象的东西去掉”。民众也反映“鲁艺闹秧歌唱双手欢迎,就是将咱边区各行各业的人扮得不美,看了心里不舒坦”^{[9]279}。鲁艺师生回校自查:须抛弃“旧秧歌队中丑化劳动人民的地方(这是指秧歌队中的化妆仍把一些农民形象画上三花脸或是丑婆子等现象)”^[8]。此次元旦演出既坚定了鲁艺师生改造文艺的信心,又为其探索文艺走进乡村、走进民众生活指明了方向。随后在当年春节演出中,鲁艺师生改造了以往演出中存在的问题,改编后的剧目尤其是《兄妹开荒》《刘二起家》,在满足人民娱乐的同时,配合着政府生产动员等工作。民众看了后说“以前鲁艺的戏看不懂,这回看懂了”;当宣传队打花鼓的二人表演唱到“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老百姓就能接着唱和“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曲调他们是熟悉的。事实也是如此:他们正是在拥军运动中把猪羊慰劳给部队^[10]。如此效果,正是鲁艺师生们追求的。

就鲁艺工作团的下乡,已有研究将其归结于西北局宣传部的组织^④。而这仅仅属于工作团下乡的外在动力,如将分析视角转到鲁艺自身,尤其结合1942年和1943年鲁艺师生演出的动态变化。应该说,鲁艺师生的自觉亦是工作团下乡的内在驱动。因受毛泽东“到大鲁艺去学习”的鼓舞,实现文艺与革命的融合成为鲁艺师生的整体心声。“鲁艺去的地方是绥德分区。这个决定成了我们每个人的自觉要求,大家都急于想赶快到群众的火热斗争中”^[8]。如不系统梳理鲁艺1943年前后的演出活动,团员们急切下乡开展文艺创作的这种心态,将不易为后世所理解。

二、互动：工作团的文艺演出与文艺创作

1943年7月,受国民党拟闪击延安计划影响,中共注重提升边区防卫能力^[11]。鲁艺工作团下乡期间,正值各地开展生产动员、军事自卫和锄奸防奸之际。12月2日晚,鲁艺工作团路过延安甘谷驿镇,应当地政府要求进行文艺演出。对此,《解放日报》报道:

市长找到团主任和指导员,他说这里已经开了两天群众大会(坦白大会),王丕年同志也在这里,希望工作团能帮助配合工作。因此工作团负责人和王书记商量后决定在第二天早晨演出《赵富贵自新》和《张丕谟锄奸》两个剧本,并不能妨碍行军的路程和日期。第二天早晨大会就在广场上举行,全市的居民都来参加了,当演剧开始后,那些老乡们都很注意剧中的故事,团员都夹杂在人群中配合了剧本的情节,适时的喊出口号,因此群众也跟着喊口号,会场的空气就更热烈起来,在这种口号中就显出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来,赵富贵自新后,群众报以绝大的掌声,当这个戏演完后,王书记就上台讲了几分钟的话,群众因为听了王书记的话和看了这个剧,这些道理他们都解下了,所以斗争的情绪万分高涨,而且实际上也起了效果^[12]。

这则材料动态地呈现了工作团通过文艺演出配合当地政府开展工作的历史图景,尤其是将一个搞破坏的特务、因良心发现而投诚自新的过程以秧歌剧的形式呈现给观众,有效地与当时反奸反特工作结合起来,再配合着县委书记的讲话,实现了政权的群众动员。

进入绥德分区后,工作团利用3个多月时间,走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子州等五县的24个区,演出73次。每到一个地方,工作团即分为两部分开展工作,据团长张庚回忆:

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到一个地方,先进行调查访问的工作,看看这里有些什么工作需要配合,有些什么劳模需要表扬。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去进行艺术上的调查访问,看这里有什么老艺人,有什么特殊的艺术,并且立刻向他们学习,记录他们所唱的歌,搜集他们口述的秧歌本子。经过了这样一番调查之后,就连夜赶编一些适合当地情况的新节目在秧歌中间来演出^{[13]9}。

搜集民间艺术资料、结合乡村工作实际需要来创造和演出新剧目,这是工作团在下乡期间的工作

创举。工作团在绥德分区的文艺创作和演出,结合了三方面乡村工作:

(一)减租减息

1943年,绥德分区还未进行土地改革,地主用多种方式抵抗着减租减息法令,如明减暗不减、抽回租佃土地胁迫雇农等,造成了群众和地主之间的一场斗争。工作团到达后,投入调查并直接参加了动员群众和地主展开说理斗争的工作。如当工作团参加了村里的减租会,听完村民的控诉之后,根据村民的体验编成了《减租会》秧歌剧,掺杂了前一晚在村民家中学到的“道情”。此后的宣传中,《减租会》这一秧歌剧常常作为真实减租会的“序曲”来演出,“效果特别好”^{[13]9}。

(二)移民垦荒

绥德、米脂地区由于人多地少难以提高生产效率,故边区政府鼓励两地民众南下到地广人稀的延安以南地区开荒拓耕。鲁艺工作团根据边区政府的政策编演了《下南路》一剧,在葭县(现为佳县)的移民动员大会上表演之后,收效甚大。“演了《下南路》,群众高自厚就报名移民,他说:‘过去想下南路总没下决心,这个会开了,下南路去翻身呀!’会上,报名的共有二十四人,并且在锣鼓喧天的热烈鼓励下,欢送移民的慰劳金,共有三万八千元”^[14]。

(三)军事斗争

子洲县与国统区的横山县相邻,国共关系紧张后,横山的国民党军队经常对子洲县域进行骚扰。工作团到达子洲时,自卫队抓捕了土地革命时期参加过赤卫队、后来投敌的土匪头子朱永山。子洲县委书记认为朱永山的事例“很有教育意义”,工作团就安排王大化、张水华去监狱和朱永山亲自谈话,搜集素材来创作。因团员“没有一个人知道陕北的土地革命是个什么样子”,剧本写出后“一直很干巴,也排不出一些生动活泼的场面”,后工作团遇到参加过土地革命的申红友,“一场干巴巴的戏被他整成又生动活泼,又有声有色,土地革命时的气氛非常浓厚的戏了”,收到相当好的演出效果^{[13]9-10}。

另外,工作团此时创作的新剧目,从表演方式和内容来看,更多是下乡期间生活经历和相关素材的汇总。

其一,人物形象来源于团员们此次下乡经历。据于蓝回忆:《周子山》剧中革命干部马洪妻子张聚英的形象,源自于蓝参加的一次烈士追悼大会。会上,烈士遗孀“垂着头无言,也没有哭泣,在她悲痛的眼神里,我好像看到一种不同于一般农村妇女的精神状态。那是什么呢?我晚上躺在炕上苦苦地反复思索,终于我懂得了她那不同于一般农村妇女的

眼光,就是觉悟和力量”^[8]。

其二,表演方式融合了乡村艺术。鲁艺工作团借鉴利用民间“道情”“郾户调”,“我们把才学习的就拿来应用,虽然技术还差,群众也会来纠正我们批评我们。我们的水钹打错了,立刻有一个老汉上来代替我们打水钹的同志,在龙儿沟就有人指出我们有人唱得不合五音,经过多次练习,技术也渐渐能掌握了。”^[15]通过大胆的尝试,团员们掌握了民间艺术的相关技术,这种“收获”更为日后文艺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总之,鲁艺工作团这次绥德之行,工作效果是显著的。

第一,文艺演出推动了乡村工作。工作团“真正成为党的宣传队,在各种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比如:绥德的减租运动;子洲劳动英雄大会;米脂青年活动;葭县移民运动;兴堡生产运动。此外如改造二流子、妇女纺织、拥军优抗、自卫军奸防活动,也在鲁艺工作团的宣传鼓励下使得工作更加顺利了”^[15]。利用民众所熟悉的艺术形式,融入乡村革命的内容,实现了乡村娱乐与政治动员双重目的。

第二,演出促进了乡村文艺的发展。工作团在米脂县七里庙用当地人最熟悉喜爱的音乐,演出减租题材的秧歌后,民众议论:“新秧歌原来是这样的!这不难,我们自己也会弄。”不到几天,当地民众就编出了《减租》^[16]¹⁴⁰,实现了西北局组织文艺下乡来推动乡村文艺发展之目的。

三、文艺革命的实现:团员的心声与体验

1944年4月,鲁艺工作团返回延安,结束历时四个多月的文艺演出与文艺采风。下乡之初,部分团员认为此次“一面劳军,一面为老乡演出,一面也把秧歌运动普及到各分区去”^[3]¹⁹⁰。这是团员基于文艺演出的目的来审视此次绥德之行。返回延安后,团员们“对于陕北民间生活和民间艺术接触的较多了,就不大能满足于秧歌剧现有的水平了”^[3]¹⁹⁴。可见此次下乡对团员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影响之一,团员们开始深入认识与理解乡村,尤其改变对乡村旧有文艺的看法。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17]⁸⁷⁷此次下乡恰好给团员们理解乡村、走进群众生活提供了平台。团员们利用演出空余,深入农民家中,走访调查,采风学习。“我们都随便地坐在窑里,互相递着烟袋抽烟,我们看他们的管子、胡琴,他们也看我们的提琴,很自然的,我们唱一段,他们也唱一段,他们唱时,我们就记着,有时也伴奏着,大

家都很快乐,兴奋,一直到深夜还不肯散。”^[15]与乡村的近距离接触,改变了团员们的旧有认识。在于蓝看来,“几年来一直关在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王国里与群众格格不入,这时当我突破了这个小圈子真正接触了工农群众,我感到不仅生活充实丰满而且眼睛也突然明亮起来”^[8]。从“熟视无睹”到“明亮起来”,于蓝对乡村社会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团员王大化在下乡之前,因演出《兄妹开荒》已在边区享有名气。当其在米脂县杨家沟遇到民间歌手巩维忠,听了其创作的乡村作品后,在日记中记述:

人民大众的生活及他们本身正是艺术的源泉,这是万分正确的。过去,我表面上认为“这是对的”,但对于人民大众出身的艺术家,却仍是采取了“大概会有吧”的态度。周扬同志在《解放日报》上曾介绍了孙万福这位民间诗人,我仍认为这是个别的,在杨家沟这事给了我一个新的认识,纠正了我过去那种看法,因为群众中生长着无数个新的人物,新的诗人,而他们的诗歌正是代表了人民的心,人民是欣悦听之的。而我们的一套学生腔,一套远离生活实际的东西,当群众“解不下”的时候,还要责怪群众。这正说明我们自己的无知和丑。的确,群众是英雄,他们不但创造了生活,也创造了艺术^[18]²²⁸⁻²²⁹。

作为当时小有名气的文艺工作者,王大化对于“人民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虽有认同,但“大概会有”应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当遇到巩维忠并接触过他的作品后,切实意识到“人民是真正艺术家”等说法是“万分正确的”,此次下乡促使王大化的观念发生了真正转变。

影响之二,坚定了团员们“文艺来源于生活”之创作信念。

毛泽东在鲁艺的现场报告及当年春节演出效果的成功,已使鲁艺师生明白文艺创作的努力方向,但如何实现创作文艺服务于革命之目的,仍是摆在师生面前的重大问题。此次绥德之行帮助团员们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就于蓝而言,四个月的经历促使自己“开始懂得了毛主席所讲‘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的道理”,“真正领会这一似乎很平凡的道理”^[8];作为团长的张庚,亦总结了此次下乡的收获:“过去写话剧很讲究刻画人物性格,但那时我们根本不去接触现实。所以就没有看到过什么丰富的多样的人物”,而此次下乡后,发现“我们必须大胆创造新手法来表现新生活”,要从生活中寻找创造,

要“学习社会,先使自己成为一个懂得事情的人,一个懂得中国事情的中国人,然后要做一个中国革命的艺术工作者自然就容易了”^[15]。虽然张庚的总结也有从自我批评、发现问题的角度来审视此次下乡的收获,但综合团员于蓝的回忆及前文王大化的日记,此时“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创作观念已成为团员们的共识,亦直接融入日后的文艺创作。

我们不仅分析“革命戏剧在反映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的同时,也被作为政治动员的宣传武器”^{[19]330}这一客观事实,更要尝试走进当年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内心世界。彼时团员们的心声不同程度融合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影响,且从个体层面形象地展现了毛泽东《讲话》影响下文艺创作者思想认识的深刻变化。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20]通过前文论述,我们不难发现:鲁艺工作团下乡是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向大众化转化历程中的一次具体实践。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包括鲁艺在内整个文艺界开始整顿和反思,而毛泽东从“小鲁艺”走进“大鲁艺”的建议,更是为鲁艺师生指明了文艺创作的实践方向。因此,下乡期间,工作团一方面结合乡村工作实际来进行文艺演出,获得了乡村干部群众的认可,另一方面,团员们从乡村生活中寻找文艺材料,创作出《周子山》等新剧目,实现了文艺与革命的互动。作为革命文艺的创作者,团员们更是从下乡中获得了认知层面的提升。不仅发现并重视乡村旧文艺的魅力,而且坚定了文艺“来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可以说,此次工作团下乡,一方面实现了“把党的文艺政策加以具体的贯彻,为着使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工作和群众中去学习,并帮助各分区的文艺运动使之很好地走上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21],另一方面促使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有了根本的转变,真正踏上创作革命文艺、服务人民大众的发展之途,“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切实地融入革命文艺创作中,从而对革命时期乃至新中国时期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①参见赵锦丽:《论延安的新秧歌》,载于《现代中国》(第6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韩伟:《革命文艺与社会治理:以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为中心》,《人文杂志》,2016年第5期;王建华:《革命的群众艺术: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徐明

君:《鲁艺文艺道路研究:以秧歌剧为中心的考察》,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部分学者以鲁艺木刻工作团为考察对象,分析其乡村工作的具体实践。参见曹春燕:《论延安文艺创作思想在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实践意义》,《内蒙古艺术》,2018年第2期;向谦:《“鲁艺木刻工作团”及其木刻创作》,《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6期;王博仁:《走向“大鲁艺”的前锋》,《唐都学刊》,1993年第4期等。

③1940年5月,改名为鲁迅艺术学院;194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鲁艺并入延安大学,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

④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6页。时人也将此归因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鲁艺和其他几个专业团体分别派到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分区去劳军和给当地老乡演出,并把秧歌运动普及到各个分区去”。参见于蓝的《难忘的课程》,《电影艺术》,1962年第3期。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 [3]任文.永远的鲁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4]毛泽东年谱:中卷[M].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5]闫东.大鲁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
- [6]《日出》公演八天,观众将近万人[N].新中华报,1940-01-17.
- [7]戴淑娟.文艺启示录[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 [8]于蓝.难忘的课程[J].电影艺术,1962(3).
- [9]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10]黄钢.皆大欢喜:记鲁艺宣传队[N].解放日报,1943-02-21.
- [11]耿磊.1943年中共就国民党闪击延安计划之应对[J].党的文献,2018(5).
- [12]延大鲁艺工作团在乡下[N].解放日报,1944-01-14.
- [13]张庚.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鲁艺”的戏剧活动[J].戏剧报,1962(3).
- [14]延大鲁艺工作团深入农村[N].解放日报,1944-04-05.
- [15]张庚.鲁艺工作团经验[N].解放日报,1944-03-15.
- [16]张庚.论新歌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
-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8]曾刚.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
- [19]徐明君.鲁艺文艺道路研究:以秧歌剧为中心的考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下转第102页)

叙事性传播在博物馆展览中的应用与分析

戴 旸,刘欣悦

(安徽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叙事性传播是以故事的形式对历史事件进行重复演绎讲述,将静态史实以动态的方式呈现。将叙事性传播引入博物馆展览,有助于提升传播效果,增强观众的观展兴趣和体验。首先分析了叙事性传播应用于博物馆展览的适切性,进而结合巴黎大皇宫与安徽省博物馆的展览实践,总结了叙事性传播的应用状况,并提出优化和改进的策略。

关键词:叙事性传播;博物馆展览;受众体验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14

中图分类号:G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77-05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博物馆展览模式逐渐由“物”向“事”革新^[1],展览尝试摆脱“唯实物至上”的藩篱,更加侧重以故事化、情境化的方式进行传播,具有明显的叙事倾向,让观众在观展的过程中除了可以得到视觉上的享受,还可以对展品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受到思想上的熏陶。叙事性传播是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同时也是一种传播理念、传播范式的革新,其通过对展品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加以解构和加工并以“讲故事”的形式进行表达和传递,在发挥博物馆宣传教育的功能、吸引观众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将着力分析叙事性传播应用于博物馆展览的适切性及现状,针对实践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优化与改进的对策,为博物馆展览效果的提升提供有益借鉴。

一、叙事性传播应用于博物馆展览的适切性分析

叙事性传播应用于博物馆展览,有其适用性,也有其迫切性,分述如下:

博物馆展览进行叙事性传播的适用性,首先体现于与展览及展品特征的契合。博物馆是人类保存和唤醒记忆的场所,展览的本质就是通过对历史记忆的重构与再现来唤醒观众对过去生活的理解^[2]。博物馆内的每一件展品都是人类过去记忆的载体,

内含各种历史的故事和人类的生活经验,形象地再现人类过去的生活。因而展品在内容上具有故事性,在展品的生成、传播、继承的过程之中或多或少都有人类的参与,具有人为创造性。不同于传统灌输式的传播,叙事性传播是将需要传达的内容编排成故事情节,其内容上的故事性、结构上的逻辑性以及形式上的趣味性使得展览的传播过程更具有直观性和感染力,让观众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展品及展览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发挥博物馆的宣传和教育的作用。其次,在博物馆展览中,观众主要是以三维立体的实物作为观赏和学习的对象^[3]。以物为学习介质的弊端在于其信息的隐蔽性和间断性,其中隐蔽性是指展品多以静态的、结果性的形态呈现,需要借助外力的作用才能充分揭示展品物质外壳之下的信息,而间断性是由于展品通常以独立、非连续的样式呈现,如此便与真正的历史之间存在一定的间隙和空白,导致情节断点的出现。运用叙事性传播,可以将展品背后的隐性信息以完整而连贯的故事线索传递给观众,使得展品信息外显化、可视化、连续化,从而填补展品与观众之间的鸿沟,形成展品与观众之间的有效对话机制。叙事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扮演着连接过去与今天、展品与观众之间的桥梁角色,让

收稿日期:2022-02-13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要素协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跨机构集成机制研究”(21BTQ086)

作者简介:戴旸(1981—),安徽歙县人,博士,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

观众能够深入解读展品,了解展品背后的一连串故事。相较于碎片化的、断续的零散知识,将信息和知识寓于连贯的故事中,能够被更深地理解和记忆,方便观众的深度学习。最后,博物馆与学校不同,博物馆内举办的活动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灵活性和娱乐性。通过叙事性传播,变强制性的“知识灌输”为轻松愉悦的“文化体验”,变理论化、专业化的知识信息为通俗易懂、易接受的故事,这正是现代观众所希望的一种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有利于提高观众的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使得展览的传播效果显著。

而博物馆展览进行叙事性传播的迫切性则体现在:第一,现阶段博物馆展览传播的效果不够理想。传统的展览依然受到“以物为中心”观念的限制,过多地关注展品的物质外壳和外显价值,传播内容浅薄,传播形式陈旧且局限性强,致使展览的趣味性、艺术性和参与性不足。第二,博物馆展览传播面临困境。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精美昂贵的文物数量之少与大量的展览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同质化、重复化是当前展览传播工作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展品重复度高、展览类型大同小异使得展览在众多信息传播媒介中黯然失色,缺乏竞争优势。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数量的激增使得人们对于信息的自主选择权更大,空洞的、死板的、缺乏活力的信息传播方式很难引起社会公众的持续关注。展览传播的现状迫切要求博物馆能够扩充为观众提供的信息服务,寻找一种传播效率高、传播效果好的传播方式。第三,展览的传播工作亟待推进。由于传播活动的实践经验不足,博物馆展览常常混淆科研与科普之间的区别,在传播过程中运用大量专业术语和专业名词,把博物馆当作正规的学习场所对观众进行“说教”,导致传播方式过于生硬和程序化。叙事性传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传播理念、传播范式的更新,原先独立的、分散的展品被一条完整的故事脉络所串联起来,形成故事叙述系统,共同向观众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故事以其特有的传奇性、曲折性、冲突性、戏剧性、传播性和传承性的优势^[4],让博物馆展览能迅速吸引观众的眼球,让观众不仅仅能从视觉上感知展品的外在魅力,还能在听故事的过程中获得知识理解和情感认同。相较于晦涩的语言文字,故事可以在观众的记忆中停留更久,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传播的速度更快,可以充分实现“展览——观众——社会”的传播交流^[5]。

二、叙事性传播在博物馆展览中的应用

目前,叙事性传播已经在国内外一些博物馆展

览中得到了应用,笔者选择巴黎大皇宫的《庞贝》展和安徽省博物馆的《向往——“我”与安徽改革开放四十年》展览(以下简称《向往》展)为例,对其应用现状及特征加以总结。

(一)巴黎大皇宫《庞贝》展的叙事性传播

2020年7月,巴黎大皇宫与庞贝考古公园联合举办了一场以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为故事原型的沉浸式体验展览——《庞贝》。此次展览中,叙事性传播贯穿于展览的各个单元,真实而又形象地向观众展现了关于庞贝城的故事。

1. 叙事内容

本次展览以“庞贝”为叙事主题,内容上由三个不同时间段的故事串联而成。首先,展览利用技术手段再现了庞贝古城的街道、住宅和剧院等场景,着重选取了居民耕地、购买商品以及乘坐马车等日常生活场景,还原末日来临之前庞贝居民舒适惬意的生活。在此单元中,展览着重刻画整个故事的背景,将不同人物、不同场景、不同动作放置于同一画面之中,共同表现出火山喷发前富庶、奢侈的小城生活。接着,展览以时长约30分钟的影像再现了火山喷发的壮丽景象,记录下古城逐渐被火山灰湮没的历程,呈现出一片混沌的视觉冲击,打造出沉浸式的叙事空间。最后,展览通过对考古遗址的再现,将承载着庞贝记忆的壁画、黄金首饰、雕塑等历史文物进行展出并辅以相关的背景介绍,讲述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多方面、多角度地展现古城往昔的繁荣,并还原了后人的考古过程。从整体上来看,本次《庞贝》展的文物展品数量并不多,展览的规模也相对来说比较小,整个展览侧重点并非是为观众展示精美的文物,而是以物品为依托,将展示重点放置于庞贝故事的讲述上,保存并传承这段痛苦的历史记忆,达到重塑过去、启迪现在、塑造未来的叙事目的。

2. 叙事结构

总体上,《庞贝》展采用了以事件发展先后顺序为依据的线性叙事结构。展览以火山喷发作为叙事结构的划分依据,按照开端——高潮——结尾的故事情节组织方式,全景式地向观众展示了庞贝古城从存在到消亡再到重现的历程。展览以再现火山喷发前庞贝古城的生活为叙述起点,交代了整个故事的大背景,安静祥和的景象为火山喷发这一灾难性时刻的到来做了铺垫。接着再对火山喷发的场景进行还原,随着火山喷发的态势逐渐强烈,叙事节奏不断推进,观众的情绪在此时被推向高潮。最后以呈现考古遗址、展示文物展品作为叙事结尾,碳化的食物和埋葬在废墟中的人的遗骸呈现在观众面前,象

征着一座城市的毁灭和重现,引人深思。三段故事层层相扣,构成了关于庞贝的完整叙事。线性的叙事结构使得故事的讲述更加直接有力,逻辑清晰流畅,以前古城生活的轻松惬意与火山喷发之时的惨烈形成鲜明的对比,进而以文物的形式重现庞贝文明,让观众的情感体验也循序渐进、不断积累,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3. 叙事形式

叙事的多媒体化、互动化是优化展览叙事形式的重要途径^[6]。在第一个故事中,展览利用实体搭建与数字动画、红外成像等技术手段的结合,对古城街道、公园、剧院等多个生活场景进行虚拟复原,使已经消失了近两千年的古城以数字化的形式重现生机。同时利用超高清投影等技术,将观众的身影投射到影像之中,观众可以与行走中的庞贝居民进行互动,实现从“观赏”到“参与”之间的转变,获得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在第二个故事中,展览运用了数码全景技术并辅以声光电技术,以一个巨型投影装置视听结合地再现了火山喷发的全过程,以逐渐暗淡的灯光、碎石掉落的音效等辅助手段将参观者代入当时火山喷发的体验中,呈现出一个逼真的、立体的灾难现场,让观众沉浸于令人恐惧的故事空间之中。在最后的文物展示中,展览利用虚拟现实、3D建模等技术模拟还原了庞贝的遗址,展示了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并辅以相关的文字和影音对其进行阐释。虚拟现实以及3D建模技术的应用,使得文物与环境、场景、人物、情节等在虚拟的故事空间内融为一体,观众可以透物见史,对庞贝历史有更加直观、深刻的了解。

(二) 安徽省博物馆《向往》展的叙事性传播

2018年12月,安徽省博物馆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重要节点策划了《向往》主题展览,该展览以普通百姓为叙事主体,向观众讲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安徽与安徽人经历的种种变革。

1. 叙事内容

《向往》展呈现了安徽在改革之初、改革中期、新时代三个不同时期的变化与亮点。展览精选大量作为时代见证者的普通物品来叙述安徽改革开放的故事,例如学生日记、结婚照、驾照、家用电器等,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用“百姓话”说“百姓事”,让普通百姓成为故事的主角。展览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代表20世纪70至80年代的纪念品、生活用品进行陈列展示,包括1977年的高考准考证、小岗村包干到户合同书、数码产品等,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回顾了“黄山讲话”“十八枚红手印的故事”等历史记忆;第二部分呈现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

纪初安徽人生活发生的巨大变迁,重点讲述了“南方谈话”、农业税费改革等历史,并以漫画的形式清晰地勾勒出改革以来交通工具所发生的变化,表现出安徽以及整个中国在经济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和发展;第三部分则立足于现代安徽居民的生活,对安徽著名商业品牌进行罗列,并以科大讯飞创始人刘庆峰及物理学家潘建伟等人物的故事为例,表现出现代安徽在科技上取得的发展进步。

2. 叙事结构

从整体上来说,本次展览采用的是线性叙事结构。线性的叙事结构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同时也与观众的思维习惯相契合,时间上和逻辑上的不可逆转性保证了叙事的连贯和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展览按照时间的逻辑划分为“希望的田野”“春天的故事”“美好新时代”三个主题单元,分别立足于“新变革”“新发展”“新时代”社会发展变迁的特征。将三个不同时期的安徽进行对比,直观地表现出改革开放给安徽带来的巨大变化,展现出安徽人民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激发观众的获得感和认同感。同时,展览在每个单元内部又采用了漫谈式的叙事结构,将不具备因果关系、情节关联的故事进行拼贴、缀合,共同服务于一致的叙事主题。以第一单元为例,展览通过对恢复高考、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年广九创立个人品牌等独立事件进行串联,并放置于“希望的田野”主题下组合讲述,从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呈现出改革初期安徽不断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足的景象,扩充了叙事的维度,使故事更加丰富和完整。线性叙事结构与漫谈式叙事结构的综合运用,改变了单调刻板的展陈体系,变化与创新的叙事结构有效缓解了观众的疲劳感和无趣感。

3. 叙事形式

利用实物进行场景复原是《向往》展的一个重要叙事形式,也是本次展览的亮点之一。展览对特定的故事场景进行模拟还原并将具有代表性的展品放置其中,以最直观的视觉语言来呈现故事文本。展览分别搭建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家居场景:通过对手打家具、黄山牌电风扇、单门冰箱等物品按原状态进行布置,还原了20世纪80年代的家居场景;以台式电脑、印有“亚运会”的暖水壶、音乐磁带等特色物品为代表呈现20世纪90年代普通家居的面貌;将扫地机器人、彩色电视机、智能语音等物品放置于现代化的场景之中,展现出现代家居的景象。通过将四十年前的普通家居与现在的智能家居进行对照呈现,直观地讲述了安徽人民住房情况的变化,展现出改革开放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

除此之外,展览还搭建了供销社、理发店、照相馆、教室等多个场景,观众可以看到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收音机、二八自行车等,将这些实物还原到其原本存在的场景之中,形成物对人的自行表达,观众会产生置身现场的感受。场景复原具有二维的文字图片所无法比拟的说服力,弥补了因为展品间相对独立的性质而造成的情节断裂,从而调动观众的听觉和视觉,帮助观众唤醒历史记忆,获得情感共鸣。

三、叙事性传播应用于博物馆展览的优化策略

通过对以上两个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叙事性传播在博物馆展览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传播效果也有所提升,但在具体的展览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叙事内容上,当前部分展览依旧习惯于从器物学或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侧重于对展品进行编目卡片式的时空定位和形象描述^[8],使得叙事内容单薄且缺乏吸引力。另外,展览还存在着忽视叙事整体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部分展品自身具有很强的叙事性,但是展品之间相互独立、缺乏关联,导致展览的叙事内容分散。叙事结构上,大多数的展览都采用了线性的叙事结构,千篇一律的线性叙事束缚了其结构的多样性发展。而且展览的叙事线索单一也使得展品的全貌无法被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出来。叙事形式上,部分展览仍采用以实物展示为主的传播形式,观众只能依靠个人的经验以及辅助的说明文本叙事来对展品进行理解,局限性很强。单一的叙事形式使得展览的娱乐性和互动性不足,很难调动观众持续观展的兴趣。

针对叙事性传播方式应用于展览中的既有经验与实际不足,笔者从充实传播内容、合理安排叙事结构、丰富叙事形式三个方面进一步探讨展览叙事性传播的优化策略。

(一) 充实叙事内容

挖掘展品的内蕴信息是展览进行叙事性传播的前提和基础。展览应跳出传统器物学和考古学的窠臼,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角度对展品本身所承载的历史记忆进行深入的研究,尽可能全面地挖掘展品所承载的本体、衍生和流转信息^[9],拓展和细化展览叙事的内容。展览还应根据叙事目的、叙事主题对展品信息进行层次划分,突出重点和亮点,避免平铺直叙,保证叙事内容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对于重点的内容,展览可以采用与观众对话互动系统和声音、光线、色彩等手段有效调动观众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展览的叙事性传播不能仅依靠单件展品的叙事,应通过一系列展品组合的合力叙事来

完成整个故事的构建。因此,展览需要对展品之间的联系予以关注,加强对于主题性和系列性展品的研究。将展品系列放置于其原先存在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之中,探明展品的变化发展历程,并将这些信息整合成为有意义的系统叙述^[10],形成一个完整而连贯的故事,提高传播的效果。例如,故宫博物院推出的“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览,还原了18个发生于紫禁城的重大历史事件,围绕着不同时空紫禁城的宫廷生活、建筑营缮与保护等展开叙事,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关于紫禁城六百年历史的系统叙事。另外,不同观众的参观目的各有不同,展览应对观众的文化背景、专业程度、观展目的等要素进行调查与分析,了解观众期望听到的故事,把握叙事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为观众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信息服务。

(二) 合理安排叙事结构

展览要根据叙事主题和内容的实际需要,选择能最大限度提高叙事效果的主题结构演绎方式,综合运用线性叙事、漫谈式、纪录片式、类游戏式、板块式等常见的叙事结构,避免结构模式化、刻板化。借鉴文学、电影等领域的叙事成果,对于叙事结构的安排可以从故事线和情节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展览应对各个主题单元进行统筹规划,构建展览框架,提炼出贴切且富有特色的单元主题,以故事线的形式对展览各个故事进行串联,并在其中添加具有认知性、教育性的元素^[11],确保主线清晰且紧扣主题。为增强结构的合理性,展览在不偏离叙事主题的基础上可以建构多条故事脉络以帮助故事内容被更加客观、完整地呈现,推动故事主线的发展。另一方面,展览要充分架构起故事的开端、高潮、转折、结局等重要的情节节点,使其与故事的内在结构相契合,并适时地制造亮点,巧用悬念,强化故事情节,增强展览叙事对观众的情感冲击力。除此之外,展览的叙事结构也要充分考虑到观众在短时间内对信息的接受能力,不宜过于复杂化和理性化,加强结构编排的趣味性和普及性,保证观众可以在不费力的前提下快速且准确地理解展览想要传播的故事^[12]。

(三) 丰富叙事形式

一方面,基于实物展品的传播形式应在传统的静态橱窗陈列基础上加以改进,根据展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其进行有机排列,灵活运用组合展示、对比展示、语境化展示、场景复原等多种方式,赋予展品自我叙述和表达的能力,让观众通过展品的视觉形象“读”出展览想要叙述的故事^[13],了解到展品的意义及相互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对展览空间的形

式设计也至关重要,主要包括展厅的色彩、光线、材料、空间形态等,塑造一个贴近真实的空间场景可以很大程度上打造展览的沉浸式叙事氛围,促进观众认知与情感的相遇,使观众因情感上共情而主动学习并获得提升^[14]。另一方面,展览需顺应多媒体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在实物展示的基础上拓展展览要素,添加辅助设备和设施,以多元化、信息化、互动化的形式进行传播。因此,展览应积极运用情景再现、立体成像、全息影像、巨幕投影等各种多媒体展示技术来还原和放大需要讲述的故事,增加叙事的维度,拓宽观众对故事的想象空间。同时,为了向观众提供在叙事时空中进行互动体验的机会,展览需要增添手机导览、互动幕墙、数字沙盘、VR等项目,充分刺激观众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使观众拥有对故事情节的自由选择权,发挥观众主体意识,在沉浸式的体验氛围下感知故事的深层含义。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辅助性设备设施时要遵循“内容至上”的原则,避免被过度使用,寻求科学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知识与趣味之间的统一。

四、结语

叙事性传播是当今博物馆展览传播的趋势所在,其对传承人类记忆、促进博物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展览要积极运用叙事性传播,充实叙事内容,合理安排叙事结构,丰富叙事形式。本文在研究展览应用叙事性传播适切性的基础上,对两个实践案例进行分析与总结,并从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叙事形式三个角度探讨优化叙事性传播的策略,以期推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推进博物馆展览的传播工作。

(责任编辑 谢春红)

参考文献:

- [1] 严建强. 信息定位型展览:提升中国博物馆品质的契机[J]. 东南文化,2011(2):7.
- [2] 严建强. 博物馆与记忆[J]. 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11(1):24.
- [3] 严建强. 在博物馆里学习:博物馆观众认知特征及传播策略初探[J]. 东南文化,2017(4):94.
- [4] 汪涛,周玲,彭传新,等. 讲故事塑品牌:建构和传播故事的品牌叙事理论:基于达芙妮品牌的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2011(3):112.
- [5] 马宇婷. 博物馆展览“讲故事”方式的初步研究[D]. 昆明:云南大学,2016:25.
- [6] 钟隽迪. 乐器类展览陈列叙事研究与实践:以闵行博物馆“中国民族乐器文化展”为例[J]. 中国民族博览,2020(8):197.
- [8] 沈佳萍. 信息定位型主题性展览策划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2008:19.
- [9] 周婧景,严建强. 阐释系统:一种强化博物馆展览传播效应的新探索[J]. 东南文化,2016(2):122.
- [10] 周婧景. “阐释性展览”:试论当代展览阐释的若干问题[J]. 东南文化,2019(6):99.
- [11] 周进. 美国设计师谈博物馆展览设计构思的四个原则[N]. 中国文物报,2012-02-08(8).
- [12] 方苏晨. 博物馆展览文本结构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2011:30.
- [13] 严建强. 关于陈列语言的探讨[J]. 中国博物馆,1993(3):52.
- [14] 周婧景. 从“博物馆疲劳”概念出发:参观博物馆的影响因素、检测方法与改善建议[J]. 中国博物馆,2018(2):70.

The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of Narrative Transmission in Museum Exhibition

DAI Yang, LIU Xinyue

(School of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

Abstract: Exhibition is one of the basic functions of the museum.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exhibition and meet the growing cultural needs of the audience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faced by the current museum exhibition. Narrative transmission is the repeated interpretation and narr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form of stories. It presents static historical facts in a dynamic way. The application of narrative transmission in museum exhibitions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transmission effect and enhance the audience's interest and experienc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ompatibility and urgency of the application of narrative transmission in museum exhibition, and then combined with the exhibition practice of Paris Grand Palace and Anhui Museum, summarizes current state of the application of narrative transmiss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Key words: narrative transmission; museum exhibition; audience experience

抗战时期《大公报》正、副刊迥异的 言论倾向与身份符码

许 晶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3)

摘要:新记《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社训,公开、明确地表达了报纸自由、独立的办刊方向。随着政治局势和文化空间的变动,正刊言论逐渐倾向国民党阵营,而文艺副刊在抗战期间刊登了许多左翼知识分子的文章,呈现出靠近红色政权的立场选择。同一报纸上正、副刊迥异的论调,反映出权力场内部的紧张拉锯对文化场的影响,副刊背离的言说现象又表现出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品格与其对文化场发展的指引与纠偏。与此同时,文化场在言论斗争中不断提升的自主性,相应地影响了权力场的关系结构,体现出特殊空间内进步知识分子的性情倾向与身份符码。

关键词:《大公报》正刊;《文艺》副刊;言论倾向;场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15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82-07

抗战中期,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逐渐呈现出迥异于正刊的言论倾向。一份宣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商办报纸,正刊一步步地偏向国民党阵营,而文艺副刊上频频刊登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文章,呈现出建设红色政权与意识形态的话语特征,打破了《大公报》持中的身份定位。正、副刊迥异的论调反映出权力场内部的紧张拉锯,以及文学场中知识分子的性情倾向与文化认同。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有效地解释了权力场与文化生产场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话语与一定场域中的意识形态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生产场在权力场中占据的是一个被统治的地位。知识分子拥有权利,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就这方面而言,他们具有统治性;但相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利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又是被统治者。当政治场的行动者采取经济、道德的手段对文化场施加控制时,文化场的一部分行动就更倾向于从政治场的控制手段中寻找出一些对自己争夺文化场控制权有利的部分加以利用。”^[1]权力场作为元场,主要表现为

政治、经济场。文化场是位于权力场之下的次场,是由文化生产、消费等过程中各种力量构成的关系网络。场域内各种人、事关联纵生,主体间的张力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消长,这就为文学生产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如果文化场内行动者的目标路线一致,那么不论是单方占有还是多方共享的“资本”^①,都能够因共同的目标而互为助力;如果相关联的行动者的行进路线交错,那么在结点处凸显的矛盾势必影响文化场现有的空间结构。值得注意的是,特殊时空下多重力量的纵横交错,客观上增强了文化生产场的活跃度与自主性。《大公报》正、副刊言说立场的变化,正是知识分子转变思想倾向从而引发场域关系重构的一个缩影。一份以客观、求真为宗旨的报纸,副刊与正刊在一个时期呈现出迥然意识形态,我们能够沿着历史的脉络寻绎报纸上话语的流变,在文字的张力间发掘权力场与文化生产场之间或明或暗的关联,揭示出这段特殊时空下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与身份符码。

收稿日期:2021-12-15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KJZD2020-08)

作者简介:许晶(1987—),女,河南焦作人,文学博士,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四不”社训下的“亲蒋”走向

1926年,新记《大公报》续刊。为打破当下媒介言论挟私的弊端,三位合伙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商议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社训,公开、明确地表达报纸的独立立场。不党,并非中立之意,而是平等地看待各党,“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2]。《大公报》根据当前形势对各派力量进行考量,认为吴佩孚“目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3];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4];蒋介石“不学无术之为害”^[5];至于共产党,“以专力无产阶级运动自命,而排斥一切民主派或改良派进化派之智识阶级”^[6]。看起来,它对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都不甚满意,似乎要走一条独立品评的道路。实际上,它是在深入透彻地研究各党派的政治理念、政党行动、领导人格局,为国家的未来寻找一支坚实、可靠的力量。《大公报》从国民立场出发,推崇温和的政治改良,而非激进的社会革命,希望国内尽快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在统一政府的领导下,“对内务求得长治久安之规模,对外必脱离不平等条约之束缚”^[7]。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统一后,《大公报》对蒋介石的称呼也从“粤蒋”“宁蒋”改为“蒋主席”“蒋委员长”,言词的变化意味着报纸对蒋氏正统身份的肯定。究其原因,知识分子受到传统忠君颂圣思想的影响,在尚未理解民国政治的逻辑规则时,官方强势输出的价值观念便打破他们在混乱中生长的理性之思,正统地位轻易化解掉知识分子对党派格局的疑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改变立场,站在国民政府的角度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先前坚持的自由言论与激进的批驳也偃旗息鼓。

蒋氏深知媒体的言论倾向有助于引导国民认知,能够为政府施策带来助力。彼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愈演愈烈,地方势力持续引发骚乱。各集团旗下报纸都试图引导舆论,此举对国民政府的公信力带来挑战。于是,蒋氏通过一系列手段拉拢文化界人士,对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大公报》更是给予特别优待。他前奉张季鸾为“国士”,后纳吴鼎昌入仕,并多次接受《大公报》记者专访,通过这份商办报纸透露党国政令。权力场赋予《大公报》丰厚的资本,使之在文化场的分量陡然提升,其一贯坚持“不偏不倚”的办刊宗旨也悄然发生转变。张季鸾

在报纸续刊两周年时发表社评,“虽然本报非任何方面的机关报纸,今昔北战完成,党国统一”,“今后惟当就人民之立场,以拥护与赞助国民政府之建设”^[8],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他还夸赞蒋氏“气度宏廓,勋业灿烂。为现在领袖之第一人”^[9]。蒋介石报之以李,在《大公报》发行“一万号”之际亲笔撰文祝贺,声称该报“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10]。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立法、司法、监察及党政军要员皆发来贺电。蒋氏集团上下如此大张旗鼓地推崇一份商办报纸,既彰显出国民政府对自由言论的宽容态度,又拉近了与《大公报》的关系,为舆论战线增添筹码。此外,在战时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及时为报社提供纸张、油印等物资,帮助它维持日常运转。蒋氏前期的情感投入与后期的资源支持,使“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的报纸言论无可避免地“囿于智识及感情”^②。

在公,《大公报》建言献策、维护党国利益;于私,高层间书信往来、共商国是。张季鸾不仅为蒋氏谋定国策,起草《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等文件,通过《大公报》不遗余力地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政策方针,还与胡政之代表政府与日方秘密和谈,商讨和平解决两国争端的方案,为国内生产发展争取时间。随着《大公报》高层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民政府最高机密的筹划工作中,报纸上的言论也倒向国民党立场。例如,西安事变爆发后,舆论界一片哗然,媒体对此态度不一。作为西北联军喉舌的《解放日报》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表达支持“西安事变”,希望蒋氏能以民族利益为重。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认为,蒋介石“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11],要求把蒋氏交给人民审判。一贯持中立立场的商业大报《申报》认为,当下应“万众一心,镇静自处,拥护政府之方针”。同为民营报纸的《大公报》则连发数篇社评,严厉斥责张学良、杨虎城的“不忠不义”之举,认为蒋介石“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这样人才与资望,绝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12]。《大公报》此般维护蒋氏领袖权威,甚至不惜隐瞒事实,只字不提中央军轰炸西安伤及无辜造成的惨案,不只是出于双方利益往来和私人情谊,还在于报人对当时形势的思量。他们认为,“中国立国之基础条件,必须为一个政府,一种军队,犹如人体之不能有癌肿。中国今日亟需建国奋斗,不能容忍内部之组织的摇动,故共党今日须切自忏悔”^[13]。《大公报》认为,彼时必要

以国民政府为中心,凝聚力量外御其侮,才能挽救民族危机。在抗战时期,《大公报》奉行的“国家中心主义”原则,是从更广阔的角度呼吁全国一切政治势力服从中央领导,对有意破坏国民政府权威,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强烈反对。

皖南事变爆发后,各大报纸纷纷谴责国民党倒行逆施之举,苏联、英、美政府公开表示反对中国再起内战。《大公报》在沉默多日后发表社论,奉劝国民党妥善处理此事,“希望叶挺氏个人能邀得宽大的处分”。但它依旧维护统帅部的决议,认为“一个军队不容有分歧的组织,不容有多系的军令,更绝对不容有两个意旨”^[14],希望共产党能以民族利益为重,遵从政府安排。蒋介石为控制事态发展,发表声明辩解他对新四军采取的措施“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15]。正刊整版转载了蒋介石的讲话,对他解散部队、取消番号的行为表示赞同,并将韩复榘等违反军令的军阀与新四军相提并论,为国民党师出无名之举寻找合理解释。同年5月,中条山战役爆发,因国民党军队战略部署不当,导致3周内死伤5万余人。报纸正刊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痛斥第十八集团军“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16]。周恩来立即写信一一反驳谬论,指出报纸“善意的督责”是片面的。《大公报》全文转发周恩来的信件,并表示“期待十八集团军将协同作战的事实尽速表现出来”,警示共产党绝不可“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还可以再建一个中心”^[17]。直至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的社论依旧强调,“这次抗战,我们是以全国一致的统一姿态开始的;现在胜利了,我们还应该以全国一致的统一的姿态来接受战果”。“由盟军总部所规定的受降办法,‘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应请延安方面特别考虑尊重。”^[18]报纸上的言语仍以国民政府为核心,将国家实现和平、统一的关键指向共产党的选择。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高层在李子坝报社内宴请共产党代表团,王芸生还在劝说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灶”,希望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统一,能够服从国家至上的大原则。

《大公报》逐渐表现出偏向国民政府的言论立场和政治态度,过度的辩白显然已超出新闻持中、公允的原则,丧失媒体应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离办刊宗旨渐行渐远。张季鸾对此解释道:“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

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19]“国家中心”是《大公报》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与权力斗争中做出的策略选择,尽管当时国民政府在形式上掌控国内政权,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党派的客观存在,使其施策力度有限。随着战事愈演愈烈,“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成为报社高层应对危难时局的政治构想。值得注意的是,拥护领袖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但核心很容易在无形中被置换,因为领袖的指示与国家实际利益并不一定吻合。例如在各党派发生矛盾时,蒋氏并未以国家民族为重包容多方意见,而是急于通过武装斗争排除异己,牢牢把握军政大权。此时,国家中心被等同于领袖中心,《大公报》为维护国家中心发表的一系列新闻、社评带有明显偏向,刻意的辩白表明它已沦为蒋氏集团维护独裁统治的舆论生产源。

在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中,“正统”身份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与吸引力。军阀混战时期,权力场内部斗争还未明晰,《大公报》尚能秉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等视各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权力场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手握政治、经济大权的行动者开始对文学场渗透,一步步影响知识分子的性情倾向。作为“公众喉舌”的《大公报》逐渐偏离原本的身份符码,呼吁民众在统一政府的领导下共同努力,以实现内修外攘。但国民政府的独裁使报纸不断陷入推崇、维护、辩白循环往复的尴尬境地。报社同人也许是感到言行有差,于1943年宣布取消“不党不卖”的准则,声称此后报纸以“不私不盲”四字为社训。一份商业大报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做到持中品评谈何容易,最终它卷入权力斗争的洪流,呈现出鲜明的“亲蒋”倾向。

二、文艺副刊呈现的“红色”质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知识分子和文化机构相继向西南、西北转移。1938年,《大公报》决定筹办香港版。彼时,香港市场上“报纸很多,大报近十种,小报有三四十,但没有一张是进步的……除了几份与香港当局有关系的大报外,其他都是纯粹的商业性报纸,其编辑人眼光既狭窄,思想也落后,至于大量充斥市场的小报,则完全以低级趣味、海淫海盜的东西取胜”^[20]。单一的文化市场给予《大公报》足够的生长空间,包罗万象的内容吸引了不同阶层。报纸日销5万多份,其发行国内可达粤、桂、闽、滇以及湘南、赣南;国外遍及南阳各岛及暹罗、越南。^[21]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言论环境相对宽松,也就提

供给媒体重新调整文学生产的机会。

萧乾接手文艺副刊后,稿源主要依靠流亡大后方或留在“孤岛”的作家,靳以的《八一三》、巴金的《在轰炸中过的日子》、沈从文的《湘西》等文章,虽反映抗战时期民众的实际生活,表现出对战争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但与前线战事仍存在一定的距离。萧乾意识到“抗战时期的文艺副刊,不能像和平时那样率由旧章。它需要更直接地反映战争,更充分地宣传抗战并起到鼓舞前后方士气的号角作用”^[22]。随后,他发出《寻找朋友,并为〈文艺〉索文》的公开信,希望流亡各地的作家朋友将前线所见与感受记录下来。随后,复信纷至,许多作家都提到他们在延安的生活。萧乾决定改变副刊的一贯立场,刊登这些记录延安新貌与八路军事迹的文章。吴伯箫的《潞安风物》以战地通讯的形式连载16期,报道八路军在晋东南的抗敌活动,歌颂了根据地军民勤劳质朴的美德;刘白羽的《蓝河上》介绍了根据地人民热火朝天的新生活;黄钢的《两个除夕》讲述他在汉口、延安过除夕时的不同心境,详细描写了平易近人的毛泽东与群众共度除夕的场面。除了表现延安新貌的文章外,《文艺》还刊登了对延安文学的评论文章。例如,念英充分肯定卞之琳的《第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认为作者“用文学的手腕来提供一个历史的叙述”^[23],念英在文中反复强调惨烈的战争现实,希望借助《文艺》的影响力,促使读者重新审视国、共两党的军事行动及其潜在意图,做出对时局的正确判断。此外,萧乾还在副刊上开辟《战地特刊》,集中推出有关抗战前线的系列文章。如,陈毅的《最近的山西》记载了日军在山西境内的狼狈惨状,以及当地百姓对共产党的拥戴;由艾风翻译的史沫特莱的《八路军随军记》,宣扬了八路军在战争中的昂扬斗志与精神风貌。《文艺》上呈现的共产党形象与《大公报》社评中的样貌大相径庭,萧乾主编的副刊已表现出与正刊言论相左的倾向。

1939年,萧乾赴英任教前夕,向胡政之推荐杨刚接替自己的工作。胡政之担心杨刚的激进言行有损大公报“不党不私”的立场而犹豫不定。在萧乾的坚持与劝解下,同年9月,杨刚正式接办文艺副刊。如果说《文艺》在萧乾主编时,是抗日战线上的一名小兵;那么它在杨刚的推进下,迅速成长为一名勇敢的斗士。杨刚上任后,随即发出《重申〈文艺〉意旨》的宣言,提出当下我们国家尚不敢谈及理想,紧要的是暴露社会问题。“《文艺》篇幅小,野心却有一个,它要反映着民族囹圄的一整个,从内心腴理到表皮。”^[24]杨刚想要打破港英政府、国民政府、大

公报高层的言论管控绝非易事,有着多年办刊经验的她明白:只有利用报纸的时效性、连续性、通俗性,适时推出对重大问题的系统性讨论,借此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才能有效抵御外界权力对《文艺》的过度干预。在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杨刚以《文艺》的名义组织召开“民族文艺的内容与技术问题”座谈会,许地山、刘火子、黄文俞、郁风、刘思慕等十余人参会并达成共识,认为民族文艺是现阶段及将来要走的一条路,是抗战的、反汉奸的、大众的、有中国民族特性的。他们鼓励广大作家抛开外界干扰,直面周遭的一切,围绕抗战现实,从光明和黑暗两方面展开创作。这群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之际,自觉肩负起文人的社会使命,重申文学的认知功能,增强了文艺副刊介入现实的力量。

在杨刚的调整下,《文艺》发表首篇直接赞美八路军将领的文章(沙汀《贺龙将军》)。副刊上迥异的论调遭到报社高层的批评,却意外收获读者的欢迎。出于市场需求,胡政之不得不给予《文艺》一定的自由,默许它的言论。随后,左翼知识分子的稿件在《文艺》上频频出现,吴伯箫的《沁洲行》歌颂了根据地军民的抗争精神与质朴美德,庄栋的长篇通讯记录了延安文协代表大会的盛况(《记延安文协代表大会》),等等。《文艺》还刊登了一系列歌颂延安的诗歌,如征军的《走向延河》,逢英的《延安》;赞扬毛泽东的智谋、讴歌八路军将士的作品,如卞之琳的《〈论持久战〉的著者》和《给一位过雪山草地的参谋长》。与此同时,副刊还发表指责国民政府黑暗腐朽和残暴蛮横的文章,如原子的《几封信之一——长官的腐败》。《文艺》对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行为、言论的直白呈现,有助于民众意识到真实的社会状况,了解与熟识国家未来走向的另一种可能,也为知识青年在暗夜中点燃希望,在分析中做出指引。

随着民族危机步步加深,知识分子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下,携手共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国民政府出于对共产党力量的忌惮,令其在港立法委员简又文筹组“中国文化协会”与“文协”分庭抗礼,同时,指示旗下机关报《国民日报》与汪精卫集团的《南华日报》、国家社会党的《国家社会报》形成同盟。权力场力量的分流,破坏了文艺界抗日活动的效果。彼时的香港,抗日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暗潮汹涌。国民政府一面宣扬香港是歌舞升平的乐土,是不受战争侵蚀的世外桃源,一面发出反动的甚至卖国投降的言论。杨刚、乔冠华、戴望舒、叶灵凤等人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言论

以正视听,却收效甚微。为打破香港文坛的萎靡状态,杨刚借助中共地下党刊物《文艺青年》发出《反对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她在文中批评了香港青年的堕落思想与矫情行为。杨刚的挑战在香港文坛引发强烈反响,《国家社会报》《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学生界》《立报·言林》《华侨日报》等十余份报刊卷入论战,发表相关评论90余篇。当论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杨刚又组织《文艺》开展关于“新式风花雪月”的讨论会,利用舆论热度扩大其言论影响力,帮助香港青年走出别有用心的政治力量编织的幻象,鼓励他们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投身民族救亡运动,正视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与战争带来的残酷后果。自然,杨刚发起的“挑战”受到国民党海外部的控告,张季鸾也来信提醒她不要跟着共产党走。杨刚却认为《大公报》高层不能只照“上面”的旨意办事,坚持《文艺》要做好人民的喉舌,履行好“斗士”的职责。

在香港这个远离主战场的地方,权力场力量的消长给予文艺副刊调整文学生产的时机。萧乾、杨刚作为文艺副刊的主编,利用这块相对自由的阵地,从国家民族的现实需求对《文艺》进行改版,他们以团结抗日为行动宗旨,强调文学的本体力量,自觉实践自由独立的文学追求,彰显出进步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与信念持守。在他们的努力下,《文艺》成为抗战文学的阵地,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各党派的政策与实际举动。副刊上偏向红色政权的言论,记录了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积极姿态与立场选择,演绎了文学生产场自主性的生成过程以及场域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三、迥异的言说倾向背后的权力符码

从表面上看,《大公报》正刊与副刊迥异的言论倾向有悖于报纸统一的办刊宗旨;实际上,它是场域时刻发生着、紧绷的斗争状态的一种体现。文学场的自主性是相对的,它总是受到权力场不同程度的渗透与左右。国民政府为维护 and 巩固自身利益,在掌控物质资源外,还运行一套特定的话语系统,通过各种渠道将本集团的行动理念辐射至各个阶层,以固化民众对统治者的信赖。尤其是置身于三四十年代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权力场对文学场的过度介入使文学的功利性被无限放大,报纸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文学书写、新闻传播与政治因素联袂,进一步弱化了言说者的自主意志,使其不可避免地卷入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漩涡,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首先,刊物的言说倾向体现出权力场的策略导向对文化场行动者的影响。全面抗战初期,蒋介石为顺利推行专制统治,极力拉拢文化界人士为国民政府宣传造势。大批知识分子被延揽其下,一时间形成“专家治国”的气象。但是,蒋氏对不能为其所用之人施以打压、迫害,许多知识分子连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对国民政府颇有怨言。抗战中期,国民政府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的,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文化策略,依靠知识分子引导社会生产,积极参与备战。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政府试图“全国党化”,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法规控制言论,并加大对文化界人士的监视。抗战后期,蒋氏集团为稳固独裁统治,宣扬全体人民“都有加入国民党的权利与义务”,同时推行“全党特务化”,对左翼知识分子施以监禁、毒打等暴行。反观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从20年代初要排除“一切民主派或改良派进化派之智识阶级”,到认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和“革命的重要力量”^[25]。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26]。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极大的转变,在广泛听取群体意见的基础上,注重保障个人的言论自由。这种亲近与接纳的策略强化了政党的正向吸引力,大批智识阶层人士逐渐靠近共产党阵营并主动为其政治理念发声。

彼时,国民政府运行的文化准则是形式优于效用的格式。趣味的区隔,将政治场内权威者的行为崇高化、正统化。实际上,文化场对弱势独裁政府的无条件支持,无异于在沙土上盖楼,薄弱的根基难以支撑风雨飘摇中的建筑。资产阶级的“惯习”引发的行为倾向使他们忽视了矛盾根源在于统治根基的溃烂,并非辅助和支援可以挽救。立场与利益的作祟使得文学场的话语权威相信“维护”优于“重建”,他们认可“正统”的言行并不断为它的失职辩护。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偏狭的言语带来的危害,他们重新考量文学理论、方法与概念,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关系系统唤醒沉溺在靡靡之音中的从众。这些富有“对抗”意味的文学生产带着明显的目的,言语中的排他性、政治性不断挑战权威者建立的趣味区隔一步步改变文学场的格局。

其次,正刊与副刊迥异的言说形构,表现出不同性情倾向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场的空间占位。文化场的竞争双方,主要是掌握多数资本的话语权威与试图摆脱权力钳制、构建新的场域规则的挑战者。萧

乾主编港版《文艺》期间,开始调整文学生产方向,他号召流散各地的作家朋友书写前线战事实景,并改变副刊一贯立场,刊登介绍延安新貌与正面描写共产党将领的文章。这一时期,文艺副刊作为文学战场的一名小兵,开启了探索抗战时期文学走向的实践。随后,杨刚接替萧乾担任主编,她重申副刊的办刊宗旨,为《文艺》“披上战袍,环上甲冑”,集结进步知识分子对香港文坛的靡靡之音发起挑战,刊物“越界”的言论侵犯到权威者的利益,但言说空间的拓展意外收获读者的欢迎,报纸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为副刊调整言说方向增添筹码。面对《文艺》不同于正刊的言论倾向,报社高层从报纸整体发展考量,不得不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下,获得一息自由的副刊成为一块直言光明、暴露黑暗的言说阵地,逐步成长为文艺战线上一名勇猛的斗士,不仅撕开香港太平盛世的假象,唤起青年直面战争危机,还为秉持“独善其身”观念的商业报纸和知识分子做出文化界应有之举的示范。

话语权威推崇的审美趣味,在固化民众思想的同时,不断削减异己的力量。副刊在场域内、外权力的争夺与制约下,言说能够达到“出位”以吸引受众,却无法“越位”以逃离管控。主编只有通过编辑策略,推进《文艺》在“破”与“立”的交界处运行,才能够借助权威赋予的资本,打破文化场原有格局,建立新的文学生产版块。萧乾、杨刚担任主编后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调整文艺副刊的审美趣味。他们依靠自身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与性情倾向,吸引并汇集一群文学生产者,通过作品、宣言、组织座谈会以及与其他刊物形成文化战线等方式争取广泛的社会认同,不断强调并界定抗战时期文学应有的面貌,依靠《大公报》稳定的发行量与《文艺》上新颖、深刻的言说扩大受众群,试图构建文学场新的关系系统。副刊发起的挑战撼动了权威者在香港维系的文化秩序,这些由知识分子提出的“理论、方法与概念是争夺知识承认的斗争武器,对它们的选择,不管是否有意识,都受制于‘对差别的追求’”,知识分子“是以把自己在文化场域中的影响最大化为目的的策略家”^[27]。这种差异化追求并非他们为否定而否定的权力占位,而是个体基于对权力场的斗争状况与文学场的趣味区隔进行综合考量后的抉择。《文艺》言说路向的转变不仅对文学场观念进行了纠正,也在暗中应援了权力场的力量对抗。当投射了社会构想的文字书写凝聚成一条文化战线,新关系系统的运行将会冲击场域原有的权力分配、审美趣味,加速关联空间的结构转变,场域内格局变

动势必对资本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

最后,作为次场的文化场,也需要依靠权力场的支持以占据优势。文化场的行动者通常会借助政治场力量、媒体平台、身份名望等资本不断提升其自主言说的权力。场域赋予主编行使的权力为他们达到政治效用提供平台,同时,不断提升的政治资本又为他们增加自由言说的筹码。主编将文艺理论家、作家、读者聚集起来,组成一支文化战线上的队伍。在组稿过程中,他们既注重语言的通俗易懂,以便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修养和责任意识,又重视文章内容的深度,以求提高民众精神内蕴,培养其辨析是非的能力。读者作为信息源的接受者,容易受到媒体的言说路向与政治倾向的影响,他们效仿喜爱的作家,就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尽管这些文章看起来思想浅显、语言略显稚嫩,但言说主体范围的拓展,打破了文化权威对信息的垄断。相比一些刊物长期作为某派系的言论阵地,《文艺》客观、开放的办刊理念提供给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充分的话语权,使观点对立的双方在论辩中条分缕析矛盾,从而达到明晰缘由的效果。民众也能够从报纸上不断深化的论争了解与熟知真实的社会现状,意识到独裁统治的国民政府需要的是民众的服从与牺牲,而红色政权点燃的是另一番自由与民主的气象。

《大公报》正、副刊迥异的言论倾向是场域行动者空间占位的体现。正刊的“亲蒋”言论,代表了统治权威与资产阶级的意志,他们以“国家中心”为准则,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促使国家达到内修外攘的一统状态。即便国民政府存在一定的过错,他们依旧会采取包容的态度维护并巩固其权威地位。而文艺副刊呈现的“红色”质素,体现出无产阶级与进步知识分子的性情倾向,他们将“正统”与规范暂时悬置,进行着一场重建文学生产规范与社会秩序的先导性实践。他们认为先要外御强敌,再借助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业已腐朽的制度,才能转变国内水深火热的颓势。围绕《大公报》的重重论战,演绎了场域内行动者的认同与拒斥、聚合与分流的思想变迁。在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原本作为报纸“附张”的《文艺》一跃成长为抗战期间具有对抗实力的言说空间。副刊上倾注了理想的文字与战时大后方文艺活动遥相辉映,不仅对抗战时期的文学趣味起到一定的指引与纠偏作用,其不断提升的自主性也相应影响了场域的关系结构。这场由行动者的空间占位引发的文化博弈,体现出不同维度下知识分子的性情倾向与身份符码。

注释:

- ①布迪厄把资本划分为四大类: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他认为正是资本的逻辑,决定了场域内所发生的种种竞争和力量的不均衡……资本在场域中既是行动者在游戏中的最终争夺目标,也是取得该目标的手段和技能。
- ②1926年9月1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四不”政策,其中“不卖是指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在当时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一份商办报纸从新闻来源到办刊物资都接受了国民党的支持,加上报社高层与政府高层的亲密关系,即便不掺杂金钱往来,其言论倾向难免也会受到影响。

参考文献:

- [1]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85.
- [2]张季鸾.本社同仁之志趣[N].大公报,1926-09-01.
- [3]张季鸾.跌霸[N].大公报,1926-12-01.
- [4]张季鸾.呜呼领袖欲之罪恶[N].大公报,1927-11-04.
- [5]张季鸾.蒋介石之人生观[N].大公报,1927-12-02.
- [6]张季鸾.共产党在华失败之批判[N].大公报,1927-07-01.
- [7]张季鸾.岁首之辞[N].大公报,1928-01-01.
- [8]张季鸾.本报续刊二周年之感想[N].大公报,1928-09-01.
- [9]张季鸾.青年与领袖欲[N].大公报,1929-02-05.
- [10]蒋介石.收获与耕耘[N].大公报,1931-05-22.
- [11](社论)西安抗日起义的原因[N].红色中华,1936-12-16.
- [12]张季鸾.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N].大公报,1936-

12-18.

- [13]张季鸾.对西安负责者之最后警告[N].大公报,1937-01-22.
- [14]张季鸾.关于新四军事事件[N].大公报,1941-01-21.
- [15]蒋介石.蒋委员长对整饬军纪加强抗战的训词[C]//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2编.作战经过,1981:332.
- [16]王芸生.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N].大公报,1941-05-21.
- [17]张季鸾.读周恩来先生的信[N].大公报,1941-05-23.
- [18]社论.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N].大公报,1945-08-22.
- [19]刑建榕.民国文人归宿[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140.
- [2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41.
- [21]周雨.大公报史(1902—1949)[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50.
- [22]萧乾.我当过文学保姆:七年报纸文艺副刊编辑的甘与苦[J].新文学史料,1991(3).
- [23]念英.书报简评[N].大公报·文艺,1940-06-02.
- [24]杨刚.重申《文艺》意旨[N].大公报·文艺,1939-09-04.
- [2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
- [2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8.
- [27]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58.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Different Tendencies of Speech and Identity Symbols in *Ta Kung Pao* regular issue and Supplementary issu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XU J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000, China)

Abstract: *Ta Kung Pao*, published by Xinji Co., followed the motto “No Party, No Betrayal, No Selfishness, No Blindness”, expressed the newspaper’s philosophy of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ultural space shifted, the rhetoric of the its regular issue gradually leaned toward the government, while the literary supplementary issue moved closer to the Red regime. The different discourses in the newspaper reflected the impact of the tensions within the Power Field on the Culture Field. *Ta Kung Pao* showed the independent spiritual character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guidance and cor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in the Cultural Field.

Key words: The regular issue of *Ta Kung Pao*; literary supplementary issue; discursive tendency; field

“逆全球化”思潮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王苏琪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逆全球化”思潮是欧美国家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变化中的反应,它通过经济贸易中的保护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社会治理上的逃避主义、文化交流中的排他和拒斥表现出来,“逆全球化”思潮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带来挑战。但同时,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震荡中,也给我们带来启示,在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立德树人要强化发展理念,增进政治自觉,彰显人类情怀,担当大国责任,完成时代赋予创新创造精神的培养,为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积蓄动能力量。

关键词:逆全球化;经济;政治格局;社会治理;思想政治教育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16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89-05

2016年英国开始公投“脱欧”,意大利公投修宪,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2018年法国爆发“黄背心”运动,全球化遭遇一系列冲击,特别是美国政府频繁“退群”,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程导弹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一系列国际协议,并且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一系列多边组织,致使世界贸易组织被迫“停摆”,使“逆全球化”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逆全球化”是欧美国家共同启动的,来源于资本全球逐利,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全球化红利主要偏向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资本获利更大,但主要集中在少数资本所有者或精英阶层,他们获利比例越来越高,广大劳动阶层分配比例越来越低,欧美领导人利用全球化和贫富差距的相关性,祸水外泼,转移矛盾。这种状况不会因为某个领导人的退出而改变其趋势^[1]。

一、“逆全球化”的现实表征

“逆全球化”首先是从经济方面凸显出来。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中国开展301调查开始,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拉开序幕。2018年,USTR

发布《基于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宣布对中国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征税商品集中于高端装备制造、高铁设备、工业用机器人等中国新兴核心竞争力行业,中国相对应的也将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提高25%,中美贸易战打响。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从经济领域蔓延到科技领域,在深海、航天、5G信息化等高科技领域展开博弈。

2016—2017年欧盟针对中国的光伏反倾销一波未平,2018年接着宣布对中国不锈钢无缝钢管反倾销税延长5年,涉案产品征收率达48.3%—71.9%;2020年3月又对产自中国的钢制车轮加收费,费率最高达66.4%;4月起对玻璃纤维加收费,最高费率达99.7%,期限为5年。

在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贸易战中,同为发展国家的巴西,四次对来自中国的陶瓷餐具、尼龙纱线、摩托车轮胎和自行车轮胎等多种产品收费;越南对中国的彩涂钢铁产品加收为期5年的费用,费率最高达34.27%。除了东西方对全球“制造工厂”中国的限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两个阵营之间贸易摩擦也在升级。美、欧两大飞机制造商早在2016

收稿日期:2021-12-17

作者简介:王苏琪(1970—),女,河南南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年就开始对峙,先是美国对欧盟的空客飞机生产国英国、法国、德国及西班牙加收 75 亿美元专项税,2020 年美国又将欧盟进口飞机关税从 10% 提至 15%,还对加征 25% 关税的产品名单进行扩充。从数字税到飞机税、从农业到科技、从制造业到大工业,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步步攀升,欧盟也不停调整反制政策,全面反击美国。

各国为了维护经济利益,掀起贸易保护主义,在争夺国际经贸领域的话语权中,本土主义盛行,为抢占科技领域制高点,不惜损害多边关系。这不仅造成了国际关系的紧张,也将全球经济增速拖入了泥潭。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数据库的统计,2000—2007 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 4.48%,2008 年金融危机时,经济增速还保持在 3.70%,但 2009 至 2018 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 3.41%,降低了 1.07 个百分点,预计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下滑到 3.3%,2020—2022 年继续下降到 3.2% 左右。^[2] 中国经济的增速,在 21 世纪前十年,保持在双位数高位,印度每年的 GDP 增速也在 7.50% 左右。2010—2019 年,中国稳定在 6.6%—7.2% 之间,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导致世界经济利益格局发生新变化。发达国家为开脱自己经济发展无力、国家治理的无能,将国内分配不平等产生的民众不满情绪,转嫁给全球化,将资本寻求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利用发展中国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资源配置,迁移到发展中国家所造成本国经济空心化,就业机会转移而失业率高涨,也嫁祸给其他国家,以平息国内民怨,以大国经贸博弈顽守全球价值链顶端。

为配合经济政策,在政治方面布局造势,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在意识形态上大肆宣扬民粹主义。在全球,以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盾牌,维护自我利益,反对、排斥其他国家和民族;不仅具有排他性,而且把这种民族情感异化成对其他民族的憎恨,反移民,反难民,具有灭他性特征。在国内,将“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对立起来,主张政治是人民普遍意志的表达,强调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这既是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分化加剧的现实反映,也是真正的精英阶层隐藏只为“精英”谋利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的一种策略,从而在政治上达到对国内民众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在国际上,地缘政治风险急剧上升,影响了市场、企业、国家的未来信心和政治决策。

在社会管理上,共建共享意愿降低,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却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削弱或降低全球管理责任,随意性增大,表现出非理性和不可控性。公

共破坏性事件频出,造成全球公共领域管理和治理的难度加大,增加了国际合作的成本。美国不断退出国际组织,逃避自己的义务,对全球的气候变化、海洋治理、核管理、外太空及南北极地管理等国际公约,都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也使全球公共管理机构公信力失威,全球环境治理和公共管理领域面临危机。

经济、政治和社会治理上的政府政策与表征,必然通过文化表现出来。全球化中的文化是多元的,但文化的多元化正在遭受侵蚀。美欧的移民文化是包容的,但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特别是拉美和非裔的人口大量入美,对社会稳定安全的破坏力增加;冲击欧洲的难民潮,尽管带来了一定的劳动人口,但同时也带来了治安的压力和犯罪率的上升,本土文化在反噬中抬头,文化的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扩张,对政府政策形成压力,美欧国家对来自非洲、墨西哥、中国、印度、越南等地的移民者,采取排挤和限制措施,表面上是平衡人口数量和观念的冲突,实质上是西方文化软实力的同步衰减,文化影响力的下降,文化凝聚力的涣散,民族精神取向的疲软。

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并不是全球化的主导者,而是全球化的跟随着,并在全球化中展现出自己的优势,在全球风口转向“逆全球化”,我们同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在全球增速缓慢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在国内,保证了可持续发展势头,经济结构得到改善,供给侧改革成效显著,社会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就业率稳步上升,人民的幸福感不断提升。在国际上,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与全球化高度契合,市场容量和潜力巨大,成为提振全球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带动全球经济正向驱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样本,也为全球经济摆脱衰退带来信心,更是为全球产业链的搭建、调整提供了回旋空间,为世界经济贡献了中国力量。但在“逆全球化”的裹挟下,我国也受到发达国家经济衰减的下拉力,增速放缓。2017—2019 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 6.9%、6.7% 和 6.1%,增速逐年回落^[3]。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尽管我国最先从疫情防控中复工复产,但经济复原缓慢。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一季度为 GDP 增速为 -6.8%,二季度增长 3.2%,三季度经济增速为 4.9%,带动前三季度总体增速由负转正,呈现稳定恢复增长态势。

经济的全球化使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共振,美国和欧元区作为中国两大主要贸易伙伴,它们的经

济状况直接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2020年1月的《全球经济展望》发布了世界银行的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预计增长5.9%,比2019年实际增速低0.2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增长预计为1.8%,比2019年实际增速低0.5个百分点;欧元区经济增长1.0%,比2019年实际增速低0.1个百分点(World Bank,2020)。全球经济增长萎缩,使我国经济负重前行,想要短期内“康复”,在保持自己的中高速增长之外,既要拉动低增长的同向共进,又要抵御负增长的消耗,压力巨大,困难重重。

在全球政治格局中,我国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人民至上,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宗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民共同富裕,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拥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与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不同,它们在国内保证集团的利益、权力和资本的安全,并在全球获得超额利润。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从来都没有消除,为诋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排除异己,对中国政治制度“污名化”,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惯常的手段,把我国作为转嫁政治危机、转移国内矛盾的“替罪羊”。美国善用“人权高于主权”对我国政治制度横加干涉、指责,在公共事件中,更是抹黑、诬陷,手段层出不穷。在全球抗疫斗争中,美国的政客和媒体罔顾事实,将新冠肺炎说成是“中国病毒”,在全世界散布病毒是“中国制造”“黄祸”,甚至指责武汉封城是“侵犯人权”“缺乏民主观念”。尽管现实给予这种言论响亮回击,世界人民对中国抗疫的贡献也给出了公正的评价,但美国从没有停止对公共卫生事件在内的任何事件进行政治化操作,穷尽手段打压和遏制中国的发展,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排他性和灭他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仍会继续采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举动。

在社会治理上,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不逃避自己的责任,积极承担国际事务,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观,把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世界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这与“美国优先”包装之下的利己主义完全不同。欧盟虽然对美国的举措有所腹诽,但它与美国政治上合作,军事上依赖、经济上竞争的关系框架基本没有动摇。当美国以自己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而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为由,不反思制度失调、分配失公、政策失衡,而将国际经济影响力和国际地位降低嫁祸于全球化时,欧盟集体噤声,并快速跟从,致使

某些国际管理机构瘫痪,协调贸易、社会、生态、气候、海洋、国家关系的某些领域出现“真空”,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滋生理下隐患;同时美国主导的单边主义政策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以邻为壑加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将全球社会治理和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带入不确定状态,增加了全球风险。

中华民族文化,经过几千年的融合和发展,形成了包括爱国主义传统、集体主义本位观念、民族认同感、国家主权神圣感的核心内容,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尚和合、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讲仁爱、求大同,它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还能产生广泛的创造创新能力。讲好中国故事,利用文化传承,创造文化精神产品,进行传播和交流,并通过文化产品和规模化的文化服务进行价值创造,将民族的、独特的精神力量通过文化产业展示出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形成了实用主义、物质主义,个人本位的文化属性,表现出来的开拓冒险、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特征。东西方文化各有千秋,文化互鉴共融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美欧习惯于西方文化中心论,自工业革命以来暂时领先的优越感,使西方文化难以容忍中国崛起带动的文化反超,拒斥、贬低、排挤中华文化态势凸显。

三、“逆全球化”思潮的启示

全球化大势不可抵挡,“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4]。但全球化也遵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矛盾规律的否定之否定逻辑,熟悉其全程,把握其脉搏,洞察其起伏,利用其优势,驾驭其趋向,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嬗变震荡中,我们应该主动作为,深入分析,积极应对。

全球化能够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是因为全球化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投资,扩大了国内就业,改善了经济结构,提升了经济实力,但发展中国家也要看到,粗放经营型经济增长已经过去,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规模增长正在被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提质增效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所替代,政府的经济调整是关键,政策的顶层设计成为未来制胜之器。欧美国家的资本外流、国内经济体空心化、国际公共负担份额大、负担重的现状,致使政府政策会继续抵

制全球化，“逆全球化”仍会扩张，两种流向的碰撞与深度对抗，不仅决定了经济增速的走势，还决定了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全球治理来彰显了政府责任，各国政府对全球的责任承担和财政付出，不仅预示着未来国际话语权和公信力，也向世界展示了人类对地球家园的道义和正义，予少取多、不予反取，不仅是短视的、狭隘的，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是绝路一条。从科技的迭代看，信息化的物联网与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数据产业、机器人）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席卷了几乎所有的产业，各国的安全边界被科技上的边界安全所模糊，人们内心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面临着二重奏。一方面，多元化文化趋同文化融合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民族性的文化会更加清晰、更加坚定。民族性的文化不是封闭的、保守的，而是开放的、变化的、发展的。它在自己的历史行程中总要吸纳外民族文化的精粹，融于自己的血肉之中。全球文化互鉴与共融，必定会使人们观照自己的精神内核、文化价值，反思全球化带来的观念冲突，回望民族文化中蕴含的潜力，振兴民族文化，复兴本土文化已经崭露头角，民族文化复兴成为一种态势。

四、“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立德树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首先要使我们培养的接班人和建设者，了解自己国家的“家底”，包括当前的现状、国家大势、国家战略，加强对我国经济政策新发展格局的理解和掌握。

发展才是硬道理，无可置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首当其冲。我国 14 亿多人口的福祉，依赖经济的发展；“十三五”计划的收官和“十四五”规划的制定，都需要经济增速来保障；建设小康社会，国富民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实力是物质基础。发展离不开与时俱进的改革、调整，更依赖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调，也是深植爱国主义的基础。经济要增长，必须理解、支持国家的重要战略选择，深入领会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入理解在全球经济衰退现状中，增加我国经济抗风险的韧劲，挖掘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潜力，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同时，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区域化优势，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以区域经贸协定促进我国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打造合作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因“链”施策，顺势而为，多维度构建合作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5]

保持政治自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突出我国的“四个自信”，坚定“两个维护”是重中之重。将我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贯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武器，以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满信心，增强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的自豪感。维护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我们凝聚力量的所在。邓小平曾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6]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集中表现为五个“显著优势”：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

以全球视野彰显人类情怀，维护世界公义是应尽之份。在国内，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厘清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体系、结构层次、执行监察和运行效能，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历经实践检验，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也是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改革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正在进行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奋力提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社会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效能。在国际上，积极践行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一带一路”开启全球治理模式的地域探索。以“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为承载，从中国

出发,一头连着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通向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不把中亚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和经济发展的“洼地”,而是依托运输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的区位合作为平台,致力于维护开放型经济与全球自贸体系,实现各国经济提速发展的宏大愿景,使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国家经济潜力充分彰显,政治互信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文明互鉴更加多元,共同打造经济融合、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倡导所有国家求同存异,同舟共济,超越狭隘的一国私利,以天下为公之道,共同呵护和建设好荣损与共的地球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科技要创新,首先要注重基础教育,打好基础,要用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研究,只有基础研究充分、牢固,创新创造才能展开,科技发展才能行稳致远。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养成学生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并不是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持否定态度或吹毛求疵,而是保持敏锐的思维、好奇的探究,全面考虑各种可能的观点和解释,不拒绝非流行的观点,同时保持反省,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偏见歧视,自觉避免或减少这些对判断的影响。在追索问题中,尝试用不同角度看待问题,通过评估、比较、分析、探索,理性的批判伦理道德或学术观点,识别推理和逻辑过程

中的错误,愿意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并更加关注寻求真理。培养学生的辨别力、洞察力、判断力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是科学探索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科技创新的源泉。最后,培养学生顽强拼搏和越挫越勇的意志,敢于接受挑战,不怕失败,敢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在国家容错纠错机制保障下,既不知难而退,也不半途而废,而是敢于担当,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保持逆流而上的勇气和愈挫愈勇的坚韧,将“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作为信念,始终秉持“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程是状态”,具有攻坚克难、顽强奋斗的意志和乐观精神。

参考文献:

- [1] 万广华 朱美华. “逆全球化”:特征、起因与前瞻[J]. 学术月刊, 2020(7).
- [2] 朱民. 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阶段,不确定性和波动成主导[N]. 新浪财经, 2019-09-09.
- [3] 国务院. 中国经济形势报告[EB/OL]. [2021-05-18] 2020-06-08. <http://www.china-cer.com.cn/>.
- [4] 习近平.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M]. 天下财经, 2017-01-18.
- [5] 黄汉权. 加快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N]. 经济日报, 2020-07-15.
-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213.

(责任编辑 许峻)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gainst the Trend of “Anti – globalization”

WANG Suqi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Technology of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trend of “anti – globalization”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global interests amo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It manifests itself through protectionism in economic and trade, populism in politics, escapism in social governance and exclusion and rejection in cultural exchanges. The trend of “anti –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challenges to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flicts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anti – globalization” shed lights on our ou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people, we will strengthen our vision of development, enhance our political awareness, demonstrate our humane feelings, shoulder the Great Nation Responsibility, and foster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bestowed by the times, so as to build momentum for China’s comprehensive,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anti – globalization; economic; political structure; social governa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高校“课程思政”开发利用河南红色资源的路径探究

祝琳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文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15)

摘要:“课程思政”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把“课程思政”的支撑元素有机地融入高校的专业课教学中,才能确保各类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同向同行、协同并进。本文结合当前高校开展“课程思政”的实际情况,提出开发利用河南红色资源,使之成为“课程思政”的重要支撑元素,并探索该元素融入高校专业课教学活动有效路径。

关键词:高校;课程思政;开发利用;河南红色资源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1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94-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的改进提出了要求,并为高校开展“课程思政”指明了方向。

一、高校“课程思政”的内涵及重要意义

(一)高校“课程思政”的内涵

高校“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原理、价值观念以及精神心理追求等融入各类课程中去,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的理念意识、言谈行为、举止活动产生影响,从而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其政治思想素养的持续活动过程。^[2]可见,高校“课程思政”是指以学校设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外的其他各类课程为依托,既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将专业知识、原理有效内化于大学生的知识体系之中,也要求教师结合各类课程主要的教学内容和大学生的目前实际需要,探索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的整合,努力挖掘各类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支撑元素,有机融入教学活动中,让大学生充分体会其真、善、美意蕴,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项重要活动。

(二)高校“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

1. 高校“课程思政”能够发挥“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

在新时代,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的不断变化,社会的各类思潮不断地激荡和冲击,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讲,传统的思政课程远远“不够解渴”。如何在坚持传统思政课堂优势、发扬优良传统的前提下,同时探索新渠道途径、挖掘“课程思政”作用、展现其“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是当前高校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和逐步解决的重要问题。高校“课程思政”并没有要求改变各类专业课程中专业理论、技能的教学,也不是把各类专业课程改成思想政治课,“课程思政”是在专业课的教学活动中,挖掘真善美的支撑元素,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崇高信仰、高尚情操,不断提升其政治素养。^[3]本文认为偏重社会科学的专业课程可以

收稿日期:2021-12-20

基金项目:2021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题项目“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河南红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2021ZT13);2021年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专业课‘课程思政’亲和力及挖掘运用路径研究”(zhjy21-83)

作者简介:祝琳(1965—),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文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哲学与公共行政学的教学与研究。

通过“课程思政”收到良好的效果,偏重自然科学的专业课程因其蕴含着一定的人文属性、人文情怀,通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巧妙整合,开展“课程思政”也能达到良好的育人目标。如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的是具有一定政治学、行政学方面的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并能在党政机关、事业以及企业单位工作的复合型、高级的专门人才。通过开展“课程思政”活动,可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等的系统教育,提高此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2. 高校“课程思政”对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课程体系改革有重要推动作用

高校“课程思政”是指在专业课教学中根据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在把专业原理、知识与方法讲明白、讲清楚的同时,要把专业课讲得更有意义和价值,与思政课同向而行、协同共进,形成强大合力,成为大学生德才兼备的坚实基础。专业课教师开展“课程思政”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素养,而且对专业和学科建设、课程体系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如行政管理专业,是一个研究政治行为、行政体制及政府决策等相关领域的偏重社会科学的专业,它涵盖很多专业课,研究主题涉及政治制度、法律、政治行为、政治决策、政治心理等,具有非常鲜明的政治性、理论性、应用性和实践性。因此,开展“课程思政”有助于使行政管理专业更接地气,更有实践性和生动感,凸显其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导向。以开展“课程思政”为切入点和契机,带动教材建设、教学方式、方法创新,进而推进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行政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有政治学原理、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学、中外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制度等,课程内容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性和家国情怀等,既涉及中外政治价值、政治文化和制度的对照,也涉及当前的时事政治焦点问题。开展“课程思政”活动,把“立德树人”任务落实到课程目标设计、教学大纲修订、教案课件编制、教材编写选用等各方面,贯穿于课堂授课中、实习实践中、作业论文中等各环节,必然会推动此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二、河南红色资源是高校“课程思政”的重要支撑元素

(一)河南红色资源的含义及类型

1. 红色资源的含义

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进程中创造凝聚而成的物质遗产和精神财富,它承载了党的伟大历史、优良作风、光荣传统,汇集了中华民族崇高的民族精神,富有真

善美的意蕴。红色资源有物质、信息还有精神的三种载体。物质载体,主要是指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进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实体,如战争遗迹、革命旧址、历史文物等;信息载体,主要指以符号、图像、文字、声音等形式体现出来的信息;精神载体,主要是指能反映红色资源思想特质的精神文化,如红旗渠精神等。红色资源正是通过这些形式多样化的载体,将厚重先进的理念、光荣的革命传统、崇高的民族精神和信念融入其中,表现出贴近生活、丰富多样、直观形象的特点,在当今社会依然能够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2. 河南红色资源的类型

河南红色资源集中表现为以下四种类型:一是以确山县杨靖宇将军故里、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新县许世友将军故里、彭雪枫将军纪念馆、吉鸿昌将军纪念馆等为代表的伟人故里、纪念馆;二是以郑州二七纪念馆、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动员会议旧址、鲁山县豫西革命纪念馆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事件旧址、纪念地;三是以“共产主义新社区”的南街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刘庄等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四是以“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任长霞精神”等为代表的红色奉献奋斗精神。

(二)河南红色资源的真善美意蕴

1. 坚定的求真思想

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道路、方向符合当时的国情民心,具有合规律性,集中体现了“真”的意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战略思想,从而使国家成功迈入全面小康,走在世界的前列。河南红色资源所蕴含的“真”,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总结,客观地形成了符合国情、民心、规律的正确道路和建设方略,再现了我党的革命道路和建设方向的合规律性选择,这也正是河南红色资源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根据所在。^[4]

2. 清晰的向善追求

河南红色资源所蕴含的“善”体现在理想、信念的合目的性。推翻帝官封的压迫,建立人民当家作

主的新中国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的近期理想,这一社会理想的实现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新时期我们的理想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的社会理想是实现最美好的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这些社会理想都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是符合规律性和目的性的有机统一。河南红色资源中善的意蕴,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点,体现了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带领广大人民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无论是浴血奋战的战争年代,还是艰苦奋斗的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也是彻底的为着人民利益的。

3. 聚合的趋美体验

河南红色资源中“美”的意蕴,在于它将革命先辈们坚韧的革命精神、崇高的信仰理念、高尚的道德情操有机融入其中,展现出特有的境界、意境之美。河南红色资源作为我党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遗存,饱含着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融汇了我党自成立以来渐渐凝聚形成的以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展现了我党在革命、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高尚品格和情操,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革命、建设的生动历史画卷。河南红色资源正是通过丰富的内容,呈现出美的意境、美的韵味。同时,河南红色资源与生态环境相融合的自然情趣美,河南红色资源能够穿越时空隧道的历史厚重美,河南红色资源呈现的无私奉献的青春生命美,河南红色资源展现文物的陈列艺术美,河南红色资源拥有的安静肃穆的氛围美,使我党领导人民追求理想和信仰艰苦卓绝斗争的过程有生动感、审美化,使我们在参观活动中,能够体验到革命斗争的艰苦和仁人志士的豪迈气魄,受到感召和心灵的激荡。如1960年2月,为了彻底改变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河南十万林州儿女进入了茫茫太行山,决心与穷山恶水的大自然进行了一次工程浩大的决战。他们凭着一钎一锤一双手,逢山凿洞,遇壑架桥,几代人苦战十年,终于在千峰如削、万仞壁立的太行山上建成了长达1500公里的红旗渠。这条人工天河的建成,凝结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并且依托巍巍太行的天然美景和蜿蜒水渠自身的独特设施成就了天下闻名的红旗渠风光。

三、高校“课程思政”开发利用河南红色资源的有效路径

(一)课堂授课中有机融入河南红色资源,使学生体悟其真善美

河南红色资源的载体多元化且内容非常丰富,如何更好地应用在高校“课程思政”活动中,提升思

政教育的实效性、生动感,需要结合高校学生的思维、思考方式以及心理活动特点展开具体分析与探究,做到因材施教、审时度势。具体来说,要加强高校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教师可结合学生的心理、兴趣与专业特点来探究河南红色资源的导入点和切入点,绘制针对学生的个性化思政教育主题,形成较完善的选题材料库,如可把河南红色资源分为以下几个主题:“政治认同、法制意识”“历史人文、理想信念”“家国情怀、国际视野”“集体观念、职业道德”“艰苦奋斗、奉献精神”等,对有关联的河南红色资源进行梳理整合,同时要与学生专业课教学大纲中的重点内容相对应匹配,探究河南红色资源与专业课深度有机融合的教学路径,使专业课与革命历史、红色典故、红色遗迹有机结合,增强专业课课堂讲授的知识性、真实性、思想性、生动性,引发大学生对知识、情感和价值产生共鸣。教师还可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和方式,通过红色珍贵影像、红色经典老照片、红色纪录片资料等将河南红色资源展现在大学生面前,让同学们在专业课的课堂学习中同时能够聆听、观看到河南革命老前辈的英雄故事,能够感受到河南近代的革命历史航程和轨迹,心灵真正受到触动和震撼,以此取得有效的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二)实习、实践中有机融入河南红色资源,使学生感受其真善美

在大学生的专业实习、认识实习、毕业实习活动中,在与专业实践教学大纲中的重点内容相匹配的情况下,可组织和指导学生参观河南红色资源的遗址,如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彭雪枫将军纪念馆、吉鸿昌将军纪念馆等,开展行之有效的有积极意义的实践教学活 动,通过学生亲临现场体验、生动情景模拟、重温红色经典故事等途径和方式,使他们深入地感受到革命先烈、老一辈革命家、新时期无私奉献的英雄楷模们的奋斗牺牲精神,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直接的、生动的思想洗礼实践课程。大学生其他利用寒暑假和业余时间进行的各类实践教学活 动,内容和形式更可以多样化,如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较熟悉的河南红色资源专题调研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和方法,教师可以设计多项专题供学生选择,指导学生展开对河南红色资源的专题调研,通过对河南红色资源进行的深入调查分析,整理史料,分析现实,对学生深入认识党的历史与现实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紧密关系有着很大积极意义,也能促使他们深刻认识到正是因为革命先烈的无私奉献才有今天蓬勃繁荣发展的中国,从而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5]

(三)校园文化环境中有机融入河南红色资源,使学生领略其真善美

众所周知,校园是高校学生的重要活动与学习场所,将河南红色资源引入高校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当中,可以大大提升校园文化的思想性、价值性,使河南红色资源在校园文化环境中滋润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发挥潜移默化的思政教育功能。首先可以在校园中开展河南红色资源的专题宣传活动,高举旗帜鲜明的红色文化大旗,开展河南红色典故、英雄事迹讲述以及红色歌曲演唱、传唱,充分激发学生参与其中的积极性和热情,使学生在校园文化活动开展当中感悟河南红色革命精神和其真善美。其次,可在校园中构建河南红色学习基地或红色学习中心,配备可供学生查阅和了解的河南红色资料库,并且可将河南红色资源以时间为主线进行整理和串联起来,从而实现学生的自主性学习、自动化学习,以更加直观、生动的方式传播呈现河南红色精神,使学生在校园文化环境中接受河南红色资源的深度洗礼与滋润。再次,在智能化、全媒体时代,可借助高科技技术实现河南红色资源在校园的宣传和传播。融媒体平台不仅可以改变高校学生的学习方式与生活方式,而且也可将思政教育工作带来一定的发展契机。高校校园可以构建线上红色活动,借助融媒体平台搭建河南红色文化渗透平台,设立河南红色资源专栏,专栏中定期开展与河南红色经典故事相关的一系列主题活动,面向全校学生展开网络线上征集,定期在网站上进行红色文化优秀稿件推送,并且可以绘制成册,应用到线下校园的宣传活动之中。最后,在校园河南红色资源宣传平台发掘学生队伍,由于高校学生更加明晰学生这个群体的喜好心理与

接受能力,由学生自身展开对河南红色资源的宣传,可以显著增强河南红色资源真善美的感染力、思政教育活动的感召力,可以有效培养大学生对河南红色文化与精神的认同感,在这个活动中间,还可邀请学生们在校园互联网平台为河南红色资源发声,引导全体高校学生遵循思政的正确方向持续前行。^[6]

四、结束语

在建党已经百年的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开展“课程思政”意义重大,河南有着丰厚的红色资源,其真善美意蕴是高校“课程思政”的重要支撑元素。高校教师可在课堂授课中,在学生实习、实践中,在校园文化环境建设中导入河南红色资源,这对提升学生政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价值观、人生观,也为高校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综合素质提升、将来成为国家栋梁奠定坚实稳固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16-12-09.
- [2] 赖金茂.“课程思政”的本质内涵、建设难点及其解决对策[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21(4):22-23.
- [3] 许淑琴,邱晖,孟惊雷. 高校本科课程思政建设路径与机制[J]. 高教学刊,2021(11):53-54.
- [4] 郭宪鹏,舒毅彪. 红色资源的真善美意蕴及其社会价值[J].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5(2):64-65.
- [5] 赵胜男. 建党百年视角下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J]. 大学,2021(40):41-42.
- [6] 赵士红,王春亮. 河南红色资源开发利用问题研究[J].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6(5):72-73.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ation on the Path of Developing and Utilizing Henan Red Resources b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HU 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Industry Management, Zhengzhou, Henan 450015, China)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of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ly by integrating supporting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all kind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coordinate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Henan Red Resources, making it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element of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tegrating it into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Henan Red Resources

应用型本科高校《量子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究

李海东^a,周书焕^b,王 远^a,姜国峰^b

(河南工程学院 a. 理学院; b.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摘要:《量子力学》是应用物理学专业体系中具有重要桥梁作用的一门基础课,对培养学生的知识素养、科学能力以及积极的价值观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基于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在《量子力学》教学改革中,融入课程思政育人理念,对教学大纲、教学模式、考核评价等环节进行了系统的改革与尝试,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

关键词:应用型;量子力学;新工科;教学模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18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098-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1]。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用好课堂教学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课程思政要求在非思政课程上,通过挖掘或融入思政元素,改革教学方法,实现专业课程的培养与立德树人育人理念的相得益彰^[2]。在授课上,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专业课程知识的学习和实践中确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奠定思想基础。近年来随着新兴科技革命和产业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行业企业都急需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这也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国内各理工科高校都在积极探索和推进新工科建设。新工科相较于传统工科,更加注重行业企业需求,更加注重对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对教师来说,除了给学生讲授专业理论知识外,还要注重在教学中融入工程和技术的新进展新成果^[3,4]。河南工程学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服务行业和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在这一背景下,作者所在的应用物理学本科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提出了要在新工科背景下建设理科专业,在育人模式上实现专业教育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效应。本文以量子力学课程教学改革为例,阐述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建构方面所做的改革与探索。

一、改革前《量子力学》课程教学状况

《量子力学》是以微观世界粒子为研究对象,描述微观世界粒子运动规律的基本理论。量子力学课程是应用物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是从事当代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基础课程^[5,6]。作为应用物理学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不仅可以培养学生扎实的物理基本功,又能够为后继课程的学习打好理论基础。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学风,锻炼了学生抽象思维 and 创新能力,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然而,通过近十年的教学实践和学生反馈发现,尽管量子力学教学在整个专业教学体系中起着基础性、先导性作用,但是量子力学课程所涉及的基础理论知识比较多,概念较为深奥抽象,公式推导特别烦琐,对师生的数学功底提出了比较高的

收稿日期:2021-12-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BKS128);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19SJGLX021);河南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1JYZD015)

作者简介:李海东(1980—),男,内蒙古突泉人,博士,河南工程学院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量子结构的电子输运性质;周书焕(1973—),女,河南泌阳人,博士,河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基础理论。

要求。课程改革前,2017 年和 2018 年对我校应用物理学专业(2014 级 50 人和 2015 级 48 人)共 98 名学生进行课程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98 份。

有 30.6% 的学生反映课程比较难、不容易学。有 30.61% 的学生感觉教材比较抽象,很难自学。通过课下与学生交流,感觉课程比较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学生们经过多年的物理学习与训练,已经习惯了用宏观思维去理解物理规律和现象。量子力学研究的是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课程涉及很多全新的、抽象的物理概念,而且有很多量子现象无法用宏观的物理图像来理解。这就导致在学习量子力学过程中出现理解和认识上的不适应。另一个原因是量子力学本身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很多理论涉及了大量的数学推导过程。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受师资能力、办学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制约,编写经得起严格科学检验的、适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学生层次结构的量子力学教材难度较大。加上《量子力学》课程主要采用国家规划教材。这些教材的优势是由国内重点大学或知名教授根据其在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授课教学大纲编写,具有很强的基础理论性和逻辑严密性。但是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而言,这类教材涵盖的内容过于理论化、数学化,缺乏一定的可读性,学起来就会比较吃力,导致学生们认为这门课就是数学课。一旦在数学上跟不上教师的授课节奏,就更加难于理解,形成恶性循环,进而导致部分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了对量子力学的恐惧,影响了学习效果,甚至会失去学习兴趣。有 40.82% 的学生对量子力学的应用进展比较感兴趣,而对理论推演感兴趣的只有 10.2%。这说明学生们对量子力学课是感兴趣的,原因出在我们的教材和授课模式上。通过课题组教师认真的分析,发现在选用的经典量子力学教材中,缺少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案例描述,看不到量子力学对社会科技发展的积极贡献。受传统量子力学课程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课堂上经常出现教师过于注重数学推导而忽略帮助学生构建物理图像的情况。出现教师过于讲授课程的理论逻辑而忽视讲解课程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具体应用。导致学生在学习时感受不到量子力学课程应用价值,因此才有学生希望老师多讲授应用实践的建议。有 30.61% 的学生选择学习量子力学是必须课程的原因,纯粹是为了学分属于被动上课。这说明传统教学模式学生的参与度不高,很多学生并没有从内心认识到学习量子力学课程的重要作用。分析发现主要原因还是出在我们的教学模式没有跟上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

养目标的要求。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留给量子力学课程的学时有限,经典教材中涉及的量子力学的内容又比较多。教师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给学生讲授理论知识,也就很少有时间思考课程的育人效果。甚至就没有思考过如何在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育人内容。这也说明,我们以前传统的教学模式,本课程并没有实现人才培养方案中提出的,培养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目的。

基于以上学生反馈和分析并结合我校实际,我们从 2019 版人才培养方案开始,对量子力学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和探索,以期实现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协同推进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

二、《量子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一)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新工科背景下的课程育人理念是注重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传统的课程体系注重的是知识的传承和掌握,这也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不相适应。因此,为适应新工科建设和新时代教育发展要求,尤其是当前随着量子力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进展和突破。基于学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在 2019 版的人才培养计划修订中,提出了以 OBE 理念为行动指南,深入开展应用物理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OBE 是一种基于成果产出导向的教育理念(Outcomes Based Education,简称 OBE)^[7,8],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理念,重点聚焦于学生在学习过程的预期产出结果,并围绕预期成果组织教育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对于量子力学课程,我们立足应用物理学专业的学科背景,吸收了近十年的教学经验得失。在教学大纲的设计上,将学生能力培养目标确定为获取知识能力,应用知识能力和创新能力三个方面。也就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具备利用量子力学知识描述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能力,以及用量子力学基本原理分析和解释实际微电子器件问题的能力。具备就量子物理相关领域专业问题进行陈述和表达的能力,进而达到提高自身的科学抽象思维能力和创新性思维能力。在教学理念上,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在教学内容上,保留了学生今后从事电子类和光电类专业所需的量子力学基础知识,而将繁杂的数学推导和证明过程作为选学内容,授课时不再详细讲解。在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融入量子科技进展,融入计算机辅助教学等。总体上,我们在教学大纲修改上做到了力求让学生学有所获,学有所得。

(二)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积极的价值观

通过近三年的教学改革实践,《量子力学》课程中蕴含的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被逐渐挖掘出来,并引起了师生浓厚的探究兴趣。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处处体现着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基本思想。量子力学理论的应用与转化也充分印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新的教学改革中,开展课程思政育人模式^[9],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对每一单元都进行了深度挖掘,持续提炼课程思政元素、编写课程思政案例、精心课堂设计,将《量子力学》中所体现的思政元素融入量教学体系中,力争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思政素养提升,进而达到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协同育人效果。例如,在讲授完势垒贯穿内容时,教师组织学生调研透射电子显微镜,以及用它拍摄的新冠病毒照片。让学生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深刻感受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智慧,深刻认识到伟大抗疫精神的深刻内涵;同时,引导学生进一步认识到我国是唯一同时布局五种疫苗研发的国家,尤其是传统中医在抗疫关键时刻所起的重要作用,深化了对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理解,有助于进一步增强青年学生的文化自信,以及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与决心;在教授完明显违反宏观物理规律的“不确定关系”原理中,教师向学生讲述不确定性原理对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深远影响。正如物理学家玻尔所指出的“在物理理论中,平常大家总是认为可以不必干涉所研究的对象,就可以观测该对象,但从量子理论看来却不可能,因为对原子体系的任何观测,都将涉及所观测的对象在观测过程中已经有所改变”。通过向学生阐明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要实事求是,做到尊重科学、遵守规则、敬畏规则。另一个让学生印象深刻的内容是,在量子力学理论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闪耀的都是国外科学家的身影。但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带领的团队实现了世界上最远距离的高速隐态传输,引起了世界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凸显了中国科技创新成就。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教师在课堂上讲好这些生动中国故事,既能够使了解科技前沿的发展状况,增加量子力学新的知识,又能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感染学生,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将来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三) 结合学科发展前沿,拓宽学生知识能力视野

量子力学课程对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作风与科学方法,培养学生形成抽象的逻辑思维与创新能力

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教学改革中,立足唤起学生求知欲目标,不断优化繁杂的数学证明过程,将更多时间用于扩展和提高学生的知识视野。具体到在教学安排上,主要采用课前引导学生开展充分调研与预习、课上全面讲解与充分讨论、课后有效总结与持续布置任务模式等环节组织教学。为保证教学任务的高质量完成,任课教师在课前充分备课,特别是密切关注量子力学学科前沿。引导学生观看网络视频,收集课程相关资料。授课过程中预留小组讨论时间,与学生一起探讨课前给布置的内容,就相关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并及时将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融入教学过程中。例如,在讲解电子波函数时,要求学生查找电子衍射实验,调研量子力学中薛定谔方程的发现过程,达到提前了解课程内容,锻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目标。

课堂实施是教学的主体,考虑到量子力学的基本定律都是高度数学化的,很多现象用宏观物理思维难以理解。因此,在实施课堂教学中首先用一节课时间重点讲述当前课程的物理背景、物理概念,以及相关结论。让学生从定性的角度整体上把握相关知识,形成感性认识。学完这些内容后,第二节课会根据学生们的课前调研,一起重温薛定谔方程的产生过程,感受科学家们的创新思维、创新思想。尽管薛定谔方程来源于理论,来源于科学家的天才设想,但是我们要坚信,知识在于沉淀和积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授课结束后再给学生布置新的课后阅读材料,并及时总结学生的调研和掌握情况,形成平时成绩,以此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在学习量子态、自旋等内容时。我们给学生布置了近年来发展迅速的量子信息、量子通信、量子计算机等相关内容。学生通过查找科研文章或相关的网站资料,不但实现了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拓宽学生的视野,让学生感受到了量子力学的应用就在身边,今天的努力,就是储备更好的明天。

(四) 计算机辅助教学,培养学生从事科研的能力

在课堂教学中,结合基于量子力学的知识特点,充分运用了多媒体课件,Matlab 和 Mathematica 软件进行辅助教学。多媒体课件主要是向学生介绍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过程,系统讲解经典案例、展示物理结论等。对于复杂的数学证明过程以及推导过程,主要借助计算机软件辅助学习。例如,学习势垒贯穿时,基于教材的理论证明结果,让学生用 Matlab 软件描绘了单个势垒(图1)和多个势垒的隧穿概率图,以及反射概率图等。学生通过调节入射电子能量,势垒的高度和宽度等参量,让学生可以更

直观地感受到了量子隧穿图像。教师再借助图像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对量子隧穿过程进行分析和讲解,进一步加强了学生对相关知识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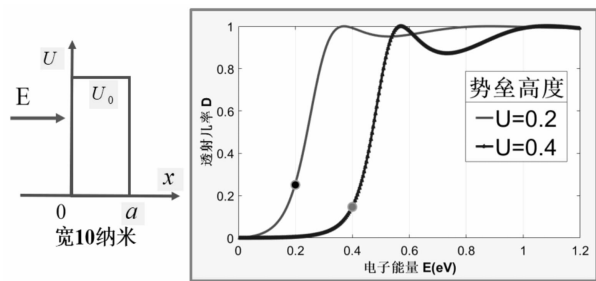


图1 一维势垒的电子隧穿概率图

在讲解氢原子内电子在空间各点的概率时,我们借助 Matlab 软件,描绘了电子的概率随位置坐标的变化曲线,观察了概率的极值点和节点。图 2 是描绘的电子概率随角度变化关系三维图,力争使学生清楚地、全方位地观察角量子数和磁量子数对概率分布的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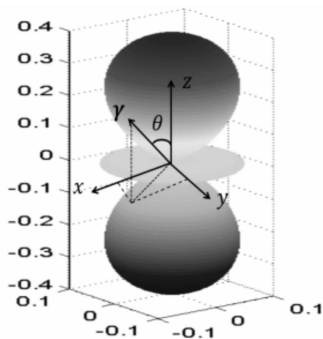


图2 氢原子 P 态电子的角分布概率 ($l=2, m=0$)

另外,对于复杂的数学运算过程,主要借助 Mashmatical 软件,不仅能实现对方程的求解,也可以完成高精度的数值计算以及复杂的符号演算。例如,求解粒子在一维有限深势阱中的束缚态能级时,最后涉及复杂的三角函数超越方程,很难求出解析解,这时借助 Mashmatical 命令就可以快速地通过图形化界面描绘出结果。因此,通过计算机辅助教学,让师生从数学上解放出来,学生就可以直观的感受物理图像之美,就有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和把握研究对象的物理特性。学生通过计算机辅助学习,不仅提升了学习兴趣,也为今后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五) 改革考核评价方式,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考核评价是反映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手段。在教学改革中,为适应和满足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我们借助工科专业认证的理念,既考试不仅要评价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还需要考核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能力。

同时,考核还要全面地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即考察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等。另外,通过考核还要诊断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后续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为实现以上这些考核目标,在量子力学的考核评价上,首先采用了平时考查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即平时考核占 30%,侧重考察学生的调研能力,阅读收集材料能力,课堂参与情况,课后作业完成情况等这一部分主要借助学习通平台完成;期末考试占 70%,主要是通过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实践证明,平时考核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参与度,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期末考试试题设定上,除了考核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外,重点通过简答题和应用题来考核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试结束后,通过认真分析学生的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结果,得出学生对各个考核点的完成和掌握情况,为深入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实践,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果,也提高我校应用物理学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其中一个明显的指标是该专业考研率逐年提高,尤其是在 2021 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中,应用物理学本科专业的学生考研录取率达到了 36.4%,有 85% 的学生考入了双一流高校,量子力学更是取得了平均 124 分的好成绩,受到了学校的表扬。

根据第三方高等教育管理数据与解决方案专业机构麦可思公司进行的毕业生培养质量反馈数据,我们的毕业生近三年来对母校和专业的满意度为 100%,用人单位连续三年对我们专业的毕业生满意度为 100%。

三、结语

在新工科背景下,基于我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对量子力学课程进行了多角度的教学改革与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深知,量子力学教学改革与创新将是一项综合性的,持续的改革工程。量子力学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仍在迅猛发展,有着无限广阔的应用前景,这为深化教学改革既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也赋予了新的责任和使命,只有如此,育人教学改成才能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16-12-09(01).
 [2] 桂玉. 课程思政路径下高校教育教学和教师价值回归探析[J]. 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92-96.

- [3] 钟登华. 新工科建设的内涵与行动[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7(3):1-6.
- [4] 张千帆, 段林彤. 新工科背景下教学改革与创新[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2):135-140.
- [5] 何良明, 周萍. 新时期地方院校量子力学教学改革与探索[J]. 高教学刊, 2021(22):94-99.
- [6] 董文泽.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大学物理”课程改革研究[J]. 现代盐化工, 2020(5):173-174.
- [7] 孙丽华, 韩晓慧, 王慧, 等. 基于 OBE 理念的“电力工程”

课程教学设计与教学改革[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3):64-68.

- [8] 刘利清, 王利霞, 鞠维. 基于 OBE 理念下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试行方案[J]. 大学物理实验, 2020(1):126-128.
- [9] 李海东, 王远, 黄全振, 等. 量子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 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

(责任编辑 许峻)

Study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of Quantum Mechanics Course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LI Haidong^a, ZHOU Shuhuan^b, WANG Yuan^a, JIANG Guofeng^b

(a. School of Science; b. College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Abstract: Quantum Mechanics is a basic course that serves as an important bridge in the professional system of Applied Physic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knowledge accomplishment, scientific ability and positive valu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training goal of applied talents in our university,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Quantum Mechanics, and a systematic reform and attempt was made on the syllabus, teaching mod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which achieved good educational results.

Key words: Application type; Quantum Mechanics; new engineering, teaching mode

(上接第 76 页)

- [20] 人民需要文艺, 文艺需要人民[N]. 光明日报, 2014-10-18.

- [21] 西北局宣传部组织剧团下乡工作[N]. 解放日报, 1943-11-2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Art goes to the Countryside: Research on the Lu Yi Working Group

LIANG Juqian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30, China)

Abstract: In 1942, Mao Zedong pointed out the overall direction for developing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art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In 1943, the “Big Luyi” movement and the realization “literature and art serving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motivated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Lu Xun Art Academy to form the Luyi Working Group and cooperate with the Northwest Bureau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period, the working group grasped the principle of serving the countryside, focusing its literary performances on the revolution's needs at that time. The group integrated rural folk art 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evolution activities toward rural areas to realiz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rt and the revolution, creating new plays like Zhou Zishan to absorb and learn from local folk art forms. The visit to rural areas also encouraged the members to understand rural society and the old literature and arts. As a result, the practice reinforced their philosophy that “literature and art are inspired by life” and realized literary and artistic revolu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words: Mao Zedong; Luyi Working Group; rural revolution; literary creation

认知行为理论视角下外语课程思政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樊永仙

(太原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摘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高校外语教学,强调在语言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过程中,重视价值观的引领。从认知行为理论出发,根植教学实践,探讨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协同发展的外语课程思政建设路径,论文围绕四个维度:把握外语课程思政目标提炼的高度,探索外语课程思政内容的广度联结,实现外语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体现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过程的育人温度,旨在触发学习者从认知到行为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外语课程思政效能,达到立德树人目标。

关键词:外语课程思政;认知行为;学生成长;效能提升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19

中图分类号:H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103-05

2021年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在对“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评估报告”的深度解读中提出,教学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这与课程思政“家国情怀、品格塑造、专业伦理、科学精神”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相一致。成长意味着“知行合一”,即认知和行为相统一,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结果。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也是从思想认知上归化,从行为上归于所化。“化”是指一种文化、体制、思想或价值观。高校课程思政应该着眼于促进学生认知和行为成长以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形成三全育人的“大思政”教育格局。

外语学科的人文性、工具性和通识性为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目前外语课程思政研究主要包括思政解读、体系建设、课程内容、模型构建等方面,而鲜少涉及教学目标达成与学习者认知行为的深层关系。如何将语言能力培养与价值观引领深度融合,如何从学习者的认知行为特征出发进行有效教学是亟须研究的课题。认知行为理论将学生主体的认知发展及价值观发展看作是一个具有阶段性的动态结构,教学实施既要考虑学生语言思

维认知,更要考虑以认知为中介的行为养成。基于此,本文提出将认知行为理论的“情境、认知、行为”三要素融入课程思政教学中,从“高度、广度、深度、温度”四个维度促进外语课程思政效能的全面提升。即主题思政元素提炼和凝练的高度,学生知识关联和信息链的广度,学生领悟力和认知水平的深度以及思政教学过程及效果的温度,完成认知到行为这一动态过程。

一、认知行为理论

认知行为理论(Cognitive Behavior Theory)将行为主义的行为习得和认知主义的心理信息加工相结合,被广泛使用于心理学、社会工作和教育学领域。该理论强调认知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重要性,内在认知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互动,外在的情境与内在的认知改变都会最终促发个人行为的改变。认知作为情境和行为的中介,其形成受“自动思维”(automatic thinking)的影响,而由核心信念发展成的自动思维,可以通过观察、认知结构调整、信息加工,辅之以行为塑造、刺激反应,达到行为的联结和强化。

托尔曼在认知行为理论发展过程中,强调整体

收稿日期:2021-11-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建设的协同效应研究”(20VSSZ119);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课程思政理念下基于主题的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2020YE029);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课题“创新发展战略下研究生英语思辨能力培养模式行动研究”(2020YJJG238)。

作者简介:樊永仙(1974—),女,山西太原人,硕士,太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

行为目的性、认知性和可接受教育特征。学习者在连续完成一项任务会建立其符号格式塔,学习的过程是结合当前整个情境领悟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将活动中的知识、技能、理论等内化为自身的知识与技能,并“由内而外”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所谓“格物致知、格心致远”,在课程思政教学中,价值体系的习得和构建注重由内化到外显的认知行为过程,价值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基于大学生认知准则基础上进行的外语课程思政育人体系也应遵循这一规律。

二、外语课程思政

语言是思维和文化的载体,表达思想内容,体现文化内涵与修养,承载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外语教学与课程思政紧密衔接,深度融合。《外国语言文学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规定了外语教学的知识要求、能力要求和素养要求。其中包括中西语言文化知识、跨文化沟通能力、思辨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综合素养,这说明大学外语教学在注重培养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全球视野,人文情怀以及多元包容性的同时,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胜任力,培养学生的品格和责任心,有理想抱负、国家意识和家国情怀^[1]。

外语界学者探讨了外语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要在改革创新中完善课程思政教育体系^[2-3],发挥教学内容的价值观引领^[4]。从教师思

政能力提升、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手段更新、考核评价重构等方面实现多方联动,探索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路径^[5-7]。但从高校学习者的认知行为特征及价值观内化规律出发,对外语课程思政深度融合的相关研究还很欠缺。外语课程思政更多地强调思政元素的挖掘和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融入,但是如何融入,采取什么样的教学策略可以达到育人目标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是外语课程思政教学的使命。因此,本文将探索外语教学中,外在的价值标准转化为内在价值的有效教学路径,围绕外语课程思政的“高度、广度、深度、温度”,达到学习者“知行合一”。

三、外语课程思政的效能提升路径

基于学习者认知发展规律,确定育人目标、提炼育人元素、分析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案、实施教学评价,通过“组建教学团队、搭建教学平台、构建学习共同体”等教学实践,体现“高度、广度、深度、温度”四维实施路径。如图1所示。在外语教学内容中挖掘育人元素三项序列任务中,凝练高度体现育人目标层次性;内容广度体现外语思政教育的全要素覆盖;深度融合体现在选择材料、设计活动、实施评价各个环节中;教学温度贯穿于整个外语课程思政过程。四维路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符合学习者认知行为规律,体现整体教学观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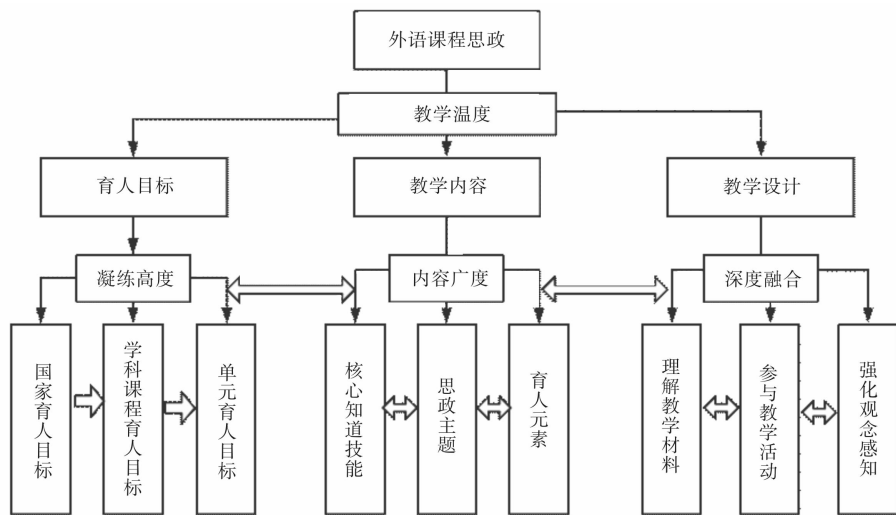


图1 外语课程思政“四维”教学实施路径

(一)把握外语课程思政目标提炼和凝练的高度

高度是一种“大知识观”,思想高度决定了价值高度,也决定了单元思政要素“点一线一面”的整体教学观,是教学广度和深度的前提。整体教学观首先需要教师有系统教育理论、相关话题知识框架及对教材文本充分领悟;其次要精心设计单元任务。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需要从教育政策、课程理论和外语学科特点三个视角系统把握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8],确定思政总目标和子目标,为任务共同体的构建和问题式课堂教学提供框架。

首先,育人目标的确立要依据育人维度。从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的角度把准方向,发挥上层教学理

论原则在外语教学生态系统中的统领作用。

其次,发挥教师协作作用。教学团队是提高凝练高度的有效途径,可以依靠团队建设课程群,协同合作实施课程思政^[9]。笔者负责的课程思政教学团队经过三个学期的合作研讨,通过搜寻、挖掘、整合、筛选思政材料、研讨、思想碰撞、外语教学理论和教学经验的结合、教学回馈和反思一系列教学活动,不断打磨,形成系统和完整的单元课程思政循环,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最后,从学生需求出发,结合校本特色和专业特色层面。外语课程作为服务于各个院系专业课程的通识教育,育人目标可以结合校本特色和校训、院训。校训体现校本特色,是师生对人生观、道德观、知识观和教育观的共同认知,承载了教育目标及践行的日常行为准则。院训则是学院办学定位的集中体现,也是专业育人原则。笔者将太原科技大学校训“负重奋进,笃行求实”以及所带应科学院院训“理实交融,博学卓思”融入外语课程思政育人全过程,从开学第一课到学期活动设计,强化“奋进、学思、笃行、求实”的育人元素。

隐含的思政元素服务于单元育人总目标,目标不能太多太泛,融入时也不能过于刻板,应自然贴切,符合主线性和聚焦性特点。比如在单元“High Days and Holidays”整体教学中,可挖掘的思政元素包括“通过批判思维理解节日的意义”“中西方节日习俗”“父爱”“尊重理解他人”“中国传统节日”等,通过梳理和研讨,结合文本特色,本单元思政的育人总目标定位在“传承传统文化”“培养文化自信及包容并蓄的文化价值观”,子目标包括“了解传统节日习俗和内涵”“用英语讲述中国传统节日故事”。其次,设计整体性包括单元活动的层级性、靶向性,遵循价值提升的科学过程,遵循了解、内化、实践、升华的规律,见表1。

表1 单元育人目标层级设计

育人总目标	子目标	布鲁姆认知层级	目标融合
传承传统文化	了解传统节日习俗和内涵	识记、理解	知识目标
	用英语讲述中国传统节日故事	应用	交际、思辨能力目标
	具有包容并蓄的文化价值观	分析、评价	
	探索发扬传承优秀文化路径	创新	
	培养文化自信	内化认知、提升价值	价值目标

(二) 延展外语课程思政内容的认知广度

外语学科特色决定了外语课程思政内容的广度,进而推动学生建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认知广度以及跨学科具体体现在主题和素材的涵盖范围广

以及思维和视野的广阔。

就课程育人主题而言,作为高等教育阶段的一门基础课,大学外语需要与各门课程同向同行,覆盖思政教育的全要素^[10]。围绕课程思政的一条主线及五大重点内容,不同学科对于践行课程思政教学有不同的侧重点,如经管法强调“经世济民、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理工类强调“科学思维、科学伦理、大国工匠”。外语学科的通识性将个人成长作为核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基、传承世界优秀文化作为发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关键^[11]。

就思政元素的范围来说,思政元素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领域,有效助力学科发展;包括中西方跨文化比较和价值观研判,开拓知识和思维视野。从纵向维度看,依托语言素材的思政元素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世界经典文化及现代先进文化。教学内容的广度使学生能够“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培养家国情怀,形成命运共同体意识。

就单元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而言,思政素材要有逻辑性,目标对应性,呈现方式和平台的选择性,遵循“Cognition + 1”的原则。根据 Krashen 二语习得“输入假说理论”,“i + 1”语言输入更有利于语言习得,同理,“认知 + 1”的原则符合大学生认知需求,与语言知识、能力目标相匹配,为学生深度思考、探索、讨论、参与、形成价值体系提供情境。以《新标准大学英语》“Food”为例,如表2所示,本单元育人目标是“美食文化”的认知理解以及养成“节约粮食”的行为习惯。围绕这个思政目标,制定层级子目标,选取以下素材在课前、课中、课后,通过线上U校园平台和线下课堂呈现,对于不同层级目标的素材,采用不同认知活动,如理解,讨论,分析,评价,反思汇报等。总之,认知广度联结和深度融合是紧密融合的教学过程。

(三) 实现外语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

认知行为理论中,由核心信念转化来的自动思维可以是短暂的感性的想法,也可以是稳定的、对行为方式产生影响的观念。认知和行为互相转化,认知制约行为,行为可以强化认知。朱熹阐释的“知行互发”也是这样的知行观。如何使学习主体的认知内化为正确的观念,如何构成内在心理活动与外在现实世界、情境、语料文本之间的互动,是外语课程思政育人目标的核心。外语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包括对学生综合素养的深层启发(Inspiration)、学生教学活动的深度参与(involverment)和学生价值观的深层感知内化(internalization)。

表2 “food”单元思政素材

总目标	传播美食文化;树立正确食物消费观	
了解中国传统美食 讲述美食故事及文化内涵	文章	Making moon cakes of Song Dynasty - (China Daily)
	文章	东坡肉,狗不理包子,过桥米线,粽子,月饼的来源
目标层级设计 及思政素材 (认知-行为)	视频	Li Ziqi: Vlogger who amazes world with China's countryside life
	视频	A Brief History of Fish & Chips
	文章	Table manners
	文本	跟着习近平总书记一起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分析评价食物浪费 现象及其原因	短片	The global food waste scandal 全球食品浪费事
	报道	Scientist: Food security remains key issue
树立正确食物消费观	文章	《悯农》诗;"命运共同体"之世界粮食日
	视频	袁隆平:Father of hybrid rice
	文章	China Focus: No losing tongue to food waste;Binge eating Vloggers urged to stop food - wasting shows
单元活动	以活动深化节约意识	输出 Record a campus movie clip on food waste;Write a survey report

首先是思政素材的深层理解。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系统中,将情感领域教学目标划分为接受、反应、形成价值观念、组织价值观念系统、价值体系个性化等层次。教师可以将问题化教学应用到思政元素的谈论中,问题的设置根据认知层级,依次为识记(remembering)、理解(understanding)、应用(apply-ing)、分析(analyzing)、评价(evaluating)、创新(creating),体现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性,符合大学生目前的认知需求,最终达到“启思明悟”的目的。问题化教学可用于课堂讨论或者课后思政元素文本分析中,经学生高阶批判性思维形成的价值观,其影响效果远远大于教师的说教。

其次是教学活动的深度参与。克拉克洪和思乔贝克的“活动观念”价值取向中,强调“做 doing”和“成为 being-in-becoming”的最终目标是努力成为更完整的自我。学习者参与具有目标靶向的共同体教学活动,用语言知识结合相关技能解决一系列问题,通过意义协商构建其价值体系、形成正向价值观念。在“参与、分享、感受、总结”过程中,实现外语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具体到教学实践中,教师可根据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布置单元项目或者小组任务。基于英语语言文本和技能培训,设计学习理解类、应用实践类、迁移创新类等活动,让学生自己发现“真善美”,探索事物真相,找出事物背后的原因,做出反馈,形成认知和价值判断,达到思维外化、行为外化。笔者在教学中提出“PISTOL”共同体原则,即成员参与(participation)、思想阐释(idea)、语言流利(language)、组织合理(structure)、技术素养(technology)、创新性(originality),共同体在完成任中要遵循这一原则,保障学生的全员和深度参与,有利于单元育人目标的达成。

最后是学生认知的深层次感知内化。斯金纳的新行为主义提出强化理论,认为人的行为会受到环境和强化反馈的影响^[12]。评价环节的生生互评和

教师点评不仅起到语言修补和技能提升的作用,而且共同体成员得到的正强化以及积极情感反馈增强学生自信,内化思政品格。

(四)体现外语课程思政的育人温度

课程思政的温度主要表现在将情感教学融入课堂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和求知探索欲,产生情感认知与知识技能的协同发展效应。具体体现在教师的师德操守以及活动情境的真实性和可激发性。

首先,教师要发挥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一书中写道:“梦想要以梦想去点燃,理想要用理想去唤醒。一个抱有理想信念的教师,才会在孩子、青年的心中播下梦想的种子。”^[13]教师的职业操守和学识风范对于学生价值观建构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是学生可以推断获得的深层信息。良好的教育氛围、严慈相济的教师使学生心境愉快,既满足学生需求,保障教学效果,也会激发学生课下搜索相关信息,内化正向价值观念,对其今后的学习生活产生影响。

其次,教学的过程增加育人情境的真实性。情境的真实性有利于学生认知行为发展需求,提高思政育人自然性和有效性。笔者在大学英语的主题式课程思政教学中,结合单元主题有机融入中国精神、年度人物、大国风范等时事新闻。比如在讲“Sports”主题时,导入中国女排精神和科比精神;在“Food”单元讲解时,将袁隆平院士的资料以视频、问题、反思的方式穿插在讲解中;在“News 24/7”时,补充对比同一话题中西方媒体的报道角度,探讨新闻辨析的策略和重要性;在“College Culture”单元主题讲解中,通过西南联大精神及大学之道,培养学生爱国爱校及社会担当意识;在“Family Affair”主题中,带领学生赏析《游子吟》和朱自清的散文《父亲》,发扬中华孝道传统,感恩父母及家庭温情。

这些真实的思政素材主题与教师在价值导向、语言结构的脚手架作用相结合,其影射作用体现在学生后续(第二个学期)进行的小组课堂展示,教师对展示内容没有做任何限制,只是规范了展示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学期末的教学反馈发现,很多小组都使用了曾经讨论的话题。“女排精神、新疆棉事件、袁隆平、母亲节、传统文化”占据了词云图凸显的位置。这说明教师思政要素的呈现和共享激发学生思维认知,引起情感认知共鸣,继而触动学生在共同体活动中进一步讨论、反思、探索,直到行动分享的一系列活动。

四、结语

本文提出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要符合学习者认知行为发展规律,最终达到“知行合一”的育人效果。结合教学实践,从“高度、广度、深度、温度”四个教学维度提升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效能的实施路径,将“语言、技能、育人”融入内容呈现、活动设计和评价反馈中,实践“格心”为目的的教育理念、初心和使命。外语课程思政是不断探索的教学模式,并非蜻蜓点水,而是通过一系列参与(involve)、启发(inspire)、内化(internalize),将思政要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具备认知修养和思维品质,并将内化的认知实践于日常行为和学习生活中,最终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为做一名合格的接班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石坚,王欣. 立德树人 润物细无声:课程思政的内涵建设[J]. 外语电化教学,2020(6):43-46.
- [2] 刘建达. 课程思政背景下的大学外语课程改革[J]. 外语电化教学,2020(6):38-42.
- [3] 曹进,赵宝巾. 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资源与育人体系建设探索[J]. 外语电化教学,2021(4):40-46.
- [4] 冯德正. 英语教学中的人文道德教育:正面价值观的多模态语篇[J]. 外语界,2015(5):27-34.
- [5] 赵鸣歧. 高校专业类课程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原则、任务与标准[J]. 思想政治课研究,2018(10):86-90.
- [6] 成娇林. 以深度教学促进外语课程思政[J]. 中国外语,2020(9):30-36.
- [7] 刘桂玲. 思辨能力视域下综合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研究[J]. 外语学刊,2021(6):83-88.
- [8] 胡杰辉. 外语课程思政视角下的教学设计研究[J]. 中国外语,2021(3):53-59.
- [9] 王欣,陈凡,石坚. 价值引领下的英语专业课程群思政建设[J]. 中国外语,2021(3):65-70.
- [10] 文秋芳. 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实施框架[J]. 中国外语,2021(3):47-52.
- [11] 刘正光,孙玉慧. 外语课程思政的“德”与“术”[J]. 中国外语,2020(9):4-9.
- [12] 陈琦,刘儒德. 教育心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14-122.
- [13]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C].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 许峻)

Promo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Behavior Theory

FAN Yongx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yuan, Shanxi 030024, China)

Abstract: Centered on “students’ development”,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mphasizes value guidance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knowledge imparting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behavior and rooted in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iming to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system and value system. The paper focuses on four dimensions: the height of educational purpose, the breadth of the curriculum content, the depth of the mor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atmosphere in the whole process. All that is designed to trigger learners’ cognitive behavioral initiative, foster integrity and promote all-round development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cognitive behavior; students’ development; teaching effectiveness

变频调速冗余控制在塔机中的应用

王继东¹, 王玉清², 魏铁壮³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54; 2.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 450001; 3.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辽宁 沈阳 110168)

摘要:塔机是现代工程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设备,近年来,变频调速器在塔机的电气控制中得到了普及应用。但由于塔机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变频调速器常会出现故障。而变频调速器是高度集成的电力电子产品,普通电工难以解决故障,等待专业技术人员赴工地进行处理,势必造成工程工期的延误,给施工企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甚至带来安全隐患。本文介绍了一种塔机变频调速冗余控制技术方案,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关键词:塔机;变频调速器;冗余控制;故障停机时间;经济损失;安全隐患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20

中图分类号:TH213.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108-04

1 引言

塔机是现代化工程建设必备的重要设备,广泛应用于水利电力、冶金化工、港口码头、船舶建造、矿山开采、民用建筑以及一带一路等重要工程建设中^[1]。现代工程建设中最为常用的塔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小车变幅式塔机如图1所示,另一种是动臂变幅式塔机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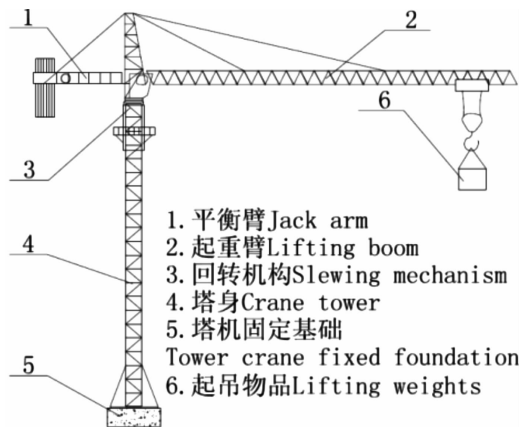


图1 小车变幅式塔机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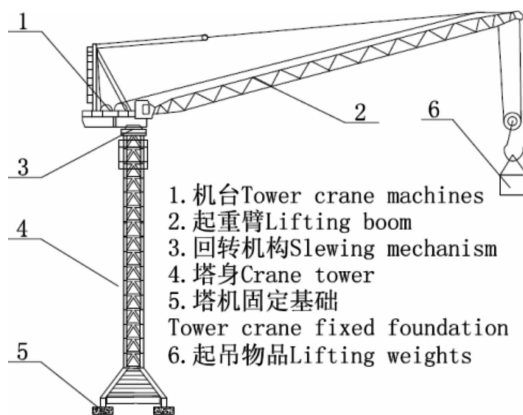


图2 动臂变幅式塔机示意图

两种塔机常被用作工程施工的主力吊车,塔机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着工程建设的进度,进而对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作为主力吊车的塔机因某种故障而停机,将会导致工程建设的停滞,给工程施工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有关报道表明,一个大型工程项目停工一天至少造成40万—50万元的经济损失。如果该塔机连续停工数天,会给施工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收稿日期:2021-12-22

基金项目:河南省2018年科技攻关“散料输送系统智能维护机器人的设计与研究”(82102210598);郑州市重大科技专项“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的研究”(121PZDGG220)

作者简介:王继东(1965—),男,河南太康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教授,电力工程专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从事土木、机械和电气工程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以及从事各类工程施工装备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研究和设计工作。

经过对我国某电力建设公司的塔机运行状况调查统计发现,作为主力吊车的塔机故障造成的停工天数约为每年7—14天,相应经济损失约280万—700万元之间。同时,塔机的故障引起的工期延误还会对企业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除此之外,如果在停机期间出现恶劣的气候变化,比如大风及雷雨天气,塔机由于故障停机的原因,而不能及时运行至安全状态,还会给现场设备和人身安全造成巨大的危险隐患。因此,提高塔机的可靠性,减少塔机的故障持续时间是塔机制造者和使用者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对塔机的故障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结合多年塔机设计经验,给出了一个提高塔机可靠性的重要方法。

2 塔机电气控制系统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2000年以前,变频调速器刚出现不久,价格比较昂贵,仅应用于重要场合。大部分塔机均采用传统的低压电气控制系统,变极调速、切换电阻调速、机械换挡调速是常用的调速方案。这种塔机调速方案的特点是线路复杂、系统故障率高^[2];操作时对机械设备的冲击较大,容易造成机械振动、机械磨损和机械部件损坏,进而降低整机的使用寿命;调速平滑性差,运行平稳性差,工作效率很低。因此对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影响很大。但是,由于电气控制系统是由比较普通的电气元件组成,故障维修技术比较简单,施工现场的普通电工即可完成,所以电气故障恢复时间较短。

自2000年之后,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变频调速设备越来越便宜,促进了变频调速技术在工业领域中的普及应用,变频调速技术在塔机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由于变频调速器是高度集成的调速设备,所以应用于塔机控制时,所需的外部接线比较简单,故障率较低;变频调速的调速范围大,调速平滑性好,起制动过程无冲击,运行平稳,能够减小机械设备运行的冲击和振动,因而不仅能够提高塔机的工作效率,还能够延长塔机的机械寿命^[3]。

但它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因为塔机是工程施工设备,施工现场的环境比较恶劣,另一方面,根据工程的需求,还需要频繁地拆装和转移施工现场。变频调速器会受到诸如雷电干扰、雨水侵袭、电磁干扰、器件老化以及震动和冲击等因素的损害,而造成故障。变频器高度集成,技术含量高,许多故障施工现场的电工无法处理,必须由变频调速器厂家技术人员进行修理,由于路途和修理过程的影响,一般会造成3—7天的停机误工时间,从而引起工程施

工的停滞,给施工企业造成相关经济损失、商誉损失和安全隐患。由此可见,缩短因变频器故障造成的停机时间对工程施工企业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变频调速冗余控制技术方案

在起重机电气控制系统中采用冗余设计,是减少故障停机时间的重要措施之一,冗余控制技术在核电、冶金、港口、水电站等重要场合的起重机电控系统中已经有不少应用,应用反馈效果良好。而在建筑工程施工塔机中的应用还比较少。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人们对塔机故障停机造成的危害体会越来越深刻,迫切需要对落后的塔机电控系统的设计改造,以减少因塔机故障停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隐患。本文结合多年的工程设计经验,提出一个既经济又具有较高性能的变频调速冗余控制方案,以期对广大建筑塔机用户有所帮助。

3.1 塔机电控系统简介

为了提高塔机的运行可靠性和工作效率,目前塔机的电气控制系统的组成一般如图3所示,它由6大部分组成,其中,配电系统是用于为塔机各个机构提供电能和电气线路的保护;PLC程序控制系统是用于整个塔机各机构操作和运行的逻辑控制和安全保护控制;操作系统用于司机向塔机发出手柄操作指令及监视各种安全信号;另外三个是变频调速系统是用于为塔机的起升机构、变幅机构和回转机构的电动机提供频率可调的动力电源。这样的系统配置的特点是,塔机的三大机构既能单独工作,又能同时工作,塔机的工作速度快,生产效率高。其缺点是,一旦某个变频调速系统故障损坏,相应的机构就不能继续工作,调运的载荷就不能及时运送就位,从而造成停机误工,产生安全隐患与重大的经济损失。

3.2 塔机变频冗余控制方案

要消除塔机故障误工引起的工程损失,一般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塔机电控设备和电控元件的可靠性,也就是提高它们的耐恶劣环境能力和选择较高质量的设备和元件,以减少电控系统的故障率,进而减少故障误工引起的工程损失。二是增设塔机故障备用电路,在塔机电控系统发生故障时,采用备用电路继续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冗余控制技术。采用专门的备用控制设备是不太经济的,因此很难被广大塔机用户所接受,本文提出了一种各机构电气控制系统互为备用的控制方案,具有很好经济性和不俗的可靠性。多年的工程实践表明,变频调速系统故障是造成停机误工的最主要原因,本文重点讨论变频调速系统的冗余控制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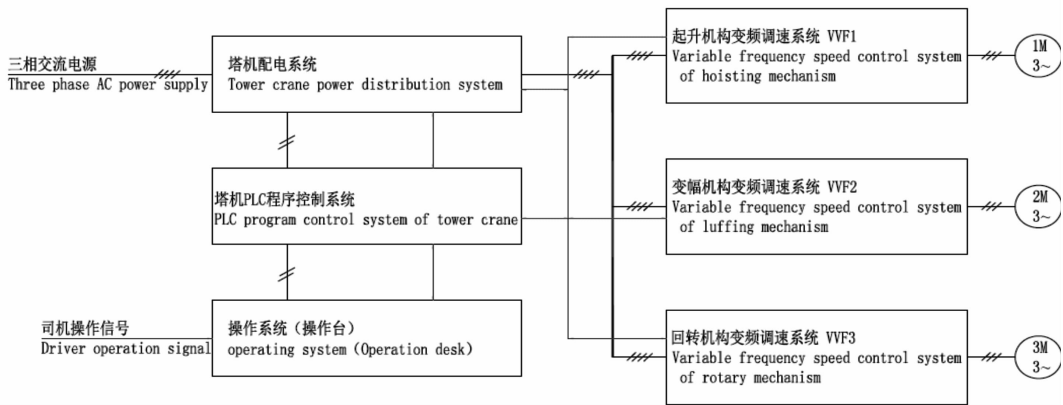


图3 塔机电气控制系统图

图4是该方案的控制系统图,它是一种两两互备的冗余控制方案。工作原理如下,在正常情况时,塔机电控系统的工作如同图3系统所示正常工作。一旦某个机构的变频调速系统故障,通过操作台上的旋钮直接切换到另一个机构的变频调速系统来执行本机构的工作,从而避免了因故障造成的塔机停机,保证了工程的正常施工。例如,如果起升机构变频调速系统VVF1发生故障,可采用变幅变频调速系统VVF2来

控制起升机构的驱动电动机1M的运行;如果变幅机构变频调速系统VVF2故障,可以通过回转变频调速系统VVF3来控制变幅驱动电动机2M的运行;如果回转变频调速系统VVF3故障,我们可通过起升机构变频调速系统VVF1来控制回转机构驱动电动机3M的运行。切换程序流程图如图5所示。这样一来,对故障设备的维修过程,不影响塔机的正常操作,从而消除或减少了故障停机带来的各种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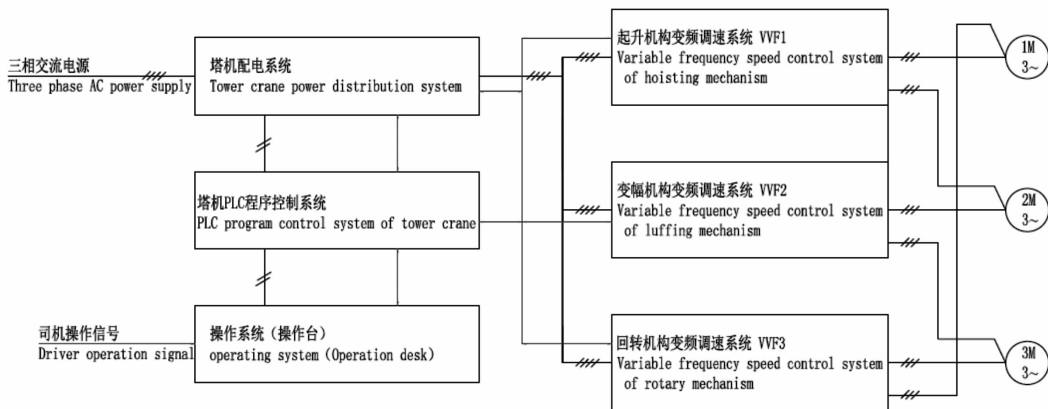


图4 塔机电气控制系统图(改造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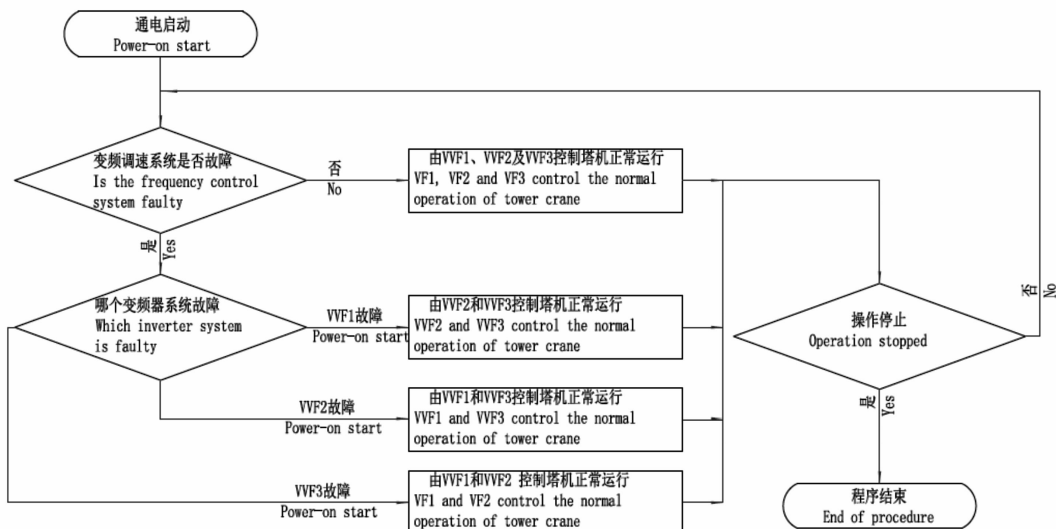


图5 塔机运行程序流程图(改造后)

3.3 塔机变频冗余控制电路原理图及变频器参数的设置

从上述变频调速冗余控制的切换过程可知,当一个变频调速器故障时,要实现另一台变频器的投入,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必须给定一个切换信号,使该台变频器接通故障设备的电动机,另外,变频调速器内部的控制参数组必须切换到与故障设备电动机相适应的参数组。具体电路图如图 6 所示,其工作原理是,当电机切换信号为 0 时,变频调速器按控制和保护电动机 1M 的参数组正常工作,接触器 1KM 闭合接通电动机 1M,接触器 2KM 切断电动机 2M;当电机切换信号为 1 时,变频调速器切换到控制和保护电动机 2M 的参数组进行工作,接触器 2KM 闭合接通电动机 2M,接触器 1KM 断开切断电动机 1M。在时序控制上要求,接触器 1KM 和 2KM 的切换要早于变频调速器启动之前 5s 以上。同时要注意,变频调速器的规格的选择应按塔机最大功率机构的电动机容量进行选定。

外部电路的切换必须和变频调速器内部参数的切换配合进行,才能实现冗余控制电路的正常运行。因此,在冗余控制电路投入运行之前,应分别按两个

机构电动机的参数对变频调速进行设置,以满足两个电动机的正常运行和安全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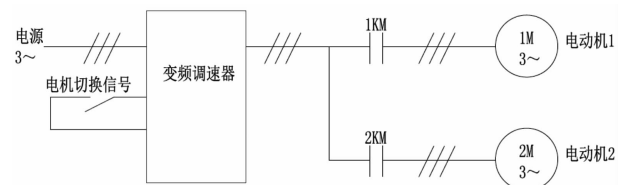


图 6 双电动机切换控制原理图

以日本安川 H1000 系列变频调速器为例,假如我们选择多功能输入端子 S6 作为电机切换信号输入点。此时,应把变频调速器的参数 H-06 的值设定为 16,把端子 S6 定义为电机切换信号输入端子;然后,依据电动机 1M 和电动机 2M 的实际工程需求设置相应参数。比如参数 C1-01、C1-02 设置为电机 1 的加、减速时间;C1-05、C1-06 设置为电机 2 的加、减速时间;其他参数见表 1 参数一览表。此时,S6 信号为 0 时,电动机 1 参数组起作用。S6 信号为 1 时,电动机 2 参数组起作用。参数设置完毕后,系统才能投入使用。对于其他品牌的变频调速器应参照该品牌的操作手册进行设置。

表 1 从电机 1 切换到电机 2 时对应的参数切换一览表^[4]

参数	切换命令:0	⇒	切换命令:1
C1-□□(加减速时间)	C1-01~04	⇒	C1-05~08
C3-□□(滑差补偿)	C3-01~04、C3-15	⇒	C3-21~25
C4-□□(转矩补偿)	C4-01	⇒	C4-07
C5-□□(速度控制(ASR))	C5-01~08、C5-12、C5-15、C5-17~18	⇒	C5-21~28、C5-32、C5-35、C5-37~38
E1-□□、E3-□□(电机参数)	E1-□□	⇒	E3-□□
E2-□□、E4-□□(电机参数)	E2-□□	⇒	E4-□□
F1-□□(PG 参数)	F1-01~21	⇒	F1-02~04、F1-08~11、F1-14、F1-31~37

3.4 工程应用和使用效果

2017 年至 2020 年间,河南某电力建设公司依据该方案对一台 FZQ 型和一台 PZQ 型塔机电气控制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自投入使用以来,因调速系统的故障原因产生的年故障停机时间,由改造前的 7—14 天减少到 0—2 天,每年平均为公司减少 400 万误工损失。而设备改造所需的一次性投资不到改造前的年误工损失的 1/20。多年的工程实践证明,此方案具有很大的推广价值。

4 结语

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工程建设如火如荼,对工程塔机的安全性、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同时,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高度发展,变频调速器的价格越来越便宜,塔机变频调速系统的冗余控制方案已成为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性合理的优质设计方案,完全满足工程设计的设计原则,加之它在减

少故障停机误工时间方面的巨大优越性,该方案在未来的工程塔机中必将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王继东, 闫玉萍, 李晶. 建筑塔机溜钩故障的分析及对策[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17, 34(11): 42-45.
- [2] 沈裕强. TC5613A 塔机回转变频调速系统控制技术研究[D]. 长沙: 湘潭大学, 2016: 1-3.
- [3] 郭现玲. 论海阳 AP1000 核电群塔作业安全运行管理[J/OL].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 2013, 000(21): 1-3.
- [4] 安川电机株式会社. 安川变频器 H1000 使用手册 SICP C710616 37B[Z]. 日本: 安川电机株式会社, 2010: 243.

(责任编辑 吕志远)

(下转第 118 页)

变截面节段拼装连续梁长线法预制工艺

刘秀元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北京 102600)

摘要:节段预制拼装施工方法是预应力混凝土梁式桥的一种施工方法,该工法造桥快速,质量容易控制,且不需要超大吨位的架桥机,能节约占地。文章通过该工法工艺流程设计,以及对节段预制胶接拼装连续梁成套技术和节段预制现场条件进行变截面连续梁节段预制长线法施工技术的研究,说明预制节段干拼工法是一种经济、美观、有效的上部结构解决方案,具有施工速度快,建设周期短等优点,适用于中等及以下跨度桥梁建设。

关键词:节段拼装;连续梁;变截面;长线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21

中图分类号:TU9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112-07

1 引言

预应力混凝土胶接拼装梁施工方法具有施工质量好、施工进度快及环境污染少等诸多优点,箱梁预制节段拼装综合应用技术,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预制节段干拼工法是一种经济、美观、有效的上部结构解决方案。实践经验表明该工法建成的桥梁工作良好,在几何线形复杂、现场条件困难的项目中也能成功应用。特别适合工期紧迫的项目。

节段预制干接法拼装技术,适用于中等及以下跨度桥梁建设,适用于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连续梁、先简支后连续桥梁,以及桥墩等任何预制拼装的混凝土构件,不受墩高限制,预制构件体积小、重量轻,运输、拼装方便,具有施工速度快,建设周期短等优点。

在铁路大跨度简支梁多有应用,但尚未在铁路连续梁中应用。郑阜铁路客运专线周淮特大桥跨新运河3联(40+56+40)m连续梁为首次在高速铁路连续梁中采用胶接拼装梁施工。该桥为变截面连续梁,给预制台座和模板设计带来很大困难,本文节段预制现场条件进行变截面连续梁节段预制长线法施工技术研究,以期该工法在今后将得到更多运

用,以减少施工对公众的影响并加快施工速度。

2 工程概况

2.1 连续梁结构设计构造

箱梁采用单箱、单室预应力混凝土箱梁,采用C55混凝土。梁底宽6.7m,梁顶宽12.6m,0#段中线梁高4.32m,直线段梁高3.02m。胶接连续梁共3联,每联32个梁段,3联连续箱梁共有96个节段,梁段最大重量为0#块190吨。每联主跨跨中通过1.0m宽的合拢缝连接;接缝面剪力键采用密布键形式排列,腹板、板和底板均布置足够数量的剪力键,设计采用梯形剪力键,腹板的剪力键顶宽5cm,顶板和底板的剪力键顶宽10cm,剪力键均设置45度倒角,键高均为5cm。节段梁的接缝面采用无溶剂型密封胶,该胶为双组分触变性桥梁专用环氧黏结剂^[1]。采用密封垫圈+涂胶方式密封接缝,采用圆环形发泡聚乙烯材料制作密封垫圈材料,密封圈尺寸:环宽10mm,圆环内环直径比预应力孔道的直径大5mm,厚为5mm。

后张预应力管道成孔采用内径 $\varphi 100$ 的塑料波纹管成孔。纵向预应力钢束采用符合GB/T5224-

收稿日期:2021-12-19

基金项目:中国铁路总公司重大科研开发课题“新线建设关键技术研究:铁路节段预制胶接拼装连续梁成套技术研究”(2016G002-H)

作者简介:刘秀元(1978—),男,山西繁峙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正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高速铁路、地铁设计施工科研工作与BIM技术研发。

2003 标准的低松弛钢绞线,抗拉强度标准值均为 $f_{pk} = 1860\text{MPa}$, $E_p = 1.95 \times 10^5\text{MPa}$ 。

采用微膨胀水泥浆进行管道压浆,标号规格不低于 M50,里面掺入阻锈剂,采用真空辅助压浆工艺进行压浆。

2.2 主要技术参数

铁路等级:国铁 I 级,客运专线。

正线数目:双线,曲线,线间距 5 米。

曲线半径:该 3 联连续梁处曲线半径 $R = 10000\text{m}$ 。

设计行车速度:客车最高行驶速度 350km/h 。

设计坡度:最大坡度 6.5% 。

设计寿命:正常使用条件下梁体结构寿命 100 年。

桥梁类型:变截面预应力连续梁。

施工方法:节段预制拼装施工。

环境类别:环境类别为碳化环境。

作用等级:作用等级为 T2。

一般大气条件下无防护措施的底面结构,

3 预制工艺要求

据课题和设计要求,节段拼装梁采用现场预制,造桥机拼装架设。在桥旁边设置梁段预制场,梁段用 200 吨门式起重机吊运至桥上,运梁车运输至造桥机处^[2]。

每相邻两个节段梁的梁端接缝面必须完全贴合,剪力键也必须完全贴合。预制完成的整孔桥梁线形要符合设计要求,节段梁接缝面外侧严密平顺。

预制台座必须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台座地基做必要处理,台座基础经过必要的预压,地基沉降要收敛稳定^[3]。

预制模板采用整体钢定型模板,模板必须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模板表面平整光滑,接缝严密平顺,模板拆装方便。

4 预制工法选择

当前常用的节段预制方法主要有长线法和短线法两种。长线法发展较早,工艺比较成熟、全桥线形控制简单,接缝面匹配很好,误差不会累积,对于已制块件形成的偏差可以通过下一个块件及时调整,而且还可以多点同时匹配预制,加快施工进度,构造简单施工生产过程比较容易控制,脱模后不必立即把梁段转运到存放地。缺点是相对于短线法预制场地较大、台座必须建筑在坚固的基础上,沉降要求较小、工作效率低,弯桥还需形成所需曲度,浇筑、养生等设备都是移动式的。

短线法发展稍晚,先浇筑端节块,利用端节块做中间块的端模浇筑中间块,中间块施工完后吊装存放端节块,中间块移动到端节块位置然后利用中间块作

下一个中间块的端模继续浇筑下一个中间块,如此循环反复,直至浇筑完成整孔梁。特点是侧模固定不动但可升降,内模可折叠收放并可前后移动,底模线形可调,并且可连同节段在轨道上前后运动甚至旋转,已预制好的前一节段为后一节段前移后的端模,在后一节段制作完毕后将前一节段吊离台座,后一节段又作为新制节段的端模,如此循环往复。优点是预制场地较小、工作效率高,缺点是其控制精度要求高,接缝面匹配和线形控制难度大,技术复杂。

综合分析对比这两种施工方法,本桥采用长线法预制节段。

长线法制梁所需设备较少,台座构造较简单,在预制时节段的线形控制比较简单。长线法预制节段梁,节段预制胶接拼装箱梁施工原理是把整孔箱梁按纵向分割成若干节段,每节单独用混凝土浇筑,长线法的节段间的制作误差可按需要调整,避免误差积累。采用此法预制节段可以解决以下问题:保证箱梁节段安装后相邻梁段间的拼缝严密;保证箱梁安装完成后的整体线形。首先预制梁段时以相邻的已制好的梁端面为端模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长线台座制梁是在一个整跨的台座上,台座顶面的线型完全按设计的梁底预制线型设置,每段梁在台座上预制的位置与架设成桥后的位置完全对应一致。每节梁段匹配预制,即前一段已预制节段的端面作为后一节段的端模,梁端涂刷隔离剂^[4],按顺序预制,预制的两个梁的端面完全匹配重合,便于胶拼贴合,也便于线型控制。前一块件出现的偏差可以通过后一块件及时得到调整,不至于积累偏差,因而能很好地保证成桥线型。但该法需要较大的预制场地,另外由于底模的线型关系到桥梁的最终线型,这就要求台座不能有大的沉降,其基础必须十分坚固。所有梁段在同一个台座上预制。

节段混凝土龄期达到设计要求后,用大吨位门式起重机吊装到桥上,桥上用运梁车运输至专用移动支架造桥机上,用环氧密封胶将节段粘接,按顺序从一端逐个拼接^[5],临时张拉拼装成符合设计要求的桥梁形状,最后张拉永久预应力钢束,使其达到整孔受荷的程度。

5 长线法台座布置

根据每联梁为 $40 + 56 + 40$ 的结构,和在 56 米跨中合拢,在合拢缝处前后对称的性质,所以按半联作为一个浇筑台座,半联为 16 片节段梁,这样节约台座建设长度。又因该桥梁处于曲线段上,前后半联不能在同一位置浇筑,为了与桥梁架设曲线方向相同,即预制节段梁的预制方向和架设后相同,以 0#

段为中心,40 米前后对称布置节段梁预制台座,这样预制台座上前后半联节段梁,均可以预制 40 米跨,和 56/2 米跨,预制后曲线方向和桥梁上的相同。这样预制台座总长 80 米,宽度与梁底宽相等。

节段拼装梁整体设计为变高度箱梁,从 0#段逐步抬高,9#段高度最低,台座设计时^[6],台座顶面弧线必须与梁架设后梁底弧线相同。

预制台座采用 C30 混凝土结构,条形台座顶面边角预埋 $\angle 75$ 角钢包边。长线制梁台座由 3 条钢筋混凝土条形台座组成,条形台座几何尺寸 $69\text{m} \times 0.7\text{m} \times 1 \sim 2.15\text{m}$ (变高),条形台座下设 $70.7\text{m} \times 0.4\text{m} \times 7.1\text{m}$ 扩大基础,中间设 $\phi 12$ 螺纹接茬钢筋。条形台座的标高控制方法采用加工等高模板,经测量确定与地面的相对高程与同组条形台座的平整度后,然后才可进行混凝土浇筑,浇筑完毕后要对其顶面标高进行复测,高度误差控制在 5mm 之内,平整度误差控制在 2mm 之内。

根据本变截面连续梁的特点和节段划分情况,以及长线法预制要求和节段梁重量,台座采用每一联 1/2 长度,制作一个长线台座,满足整联的预制需要。每联 32 个梁段,长线法台座上设 16 个梁段的预制位置,即可满足整联的预制需要。

台座上设有 1 台 200 吨门式起重机,跨度 35 米,用于梁段起吊;一台 20 吨门式起重机,跨度 21 米,用于钢筋笼和模板及其他材料工具的起吊;喷淋水养护设备,每排台座两侧布置自动淋喷养生支管路两排,每隔 0.8m 安装一个喷头,确保节段梁片上下里外的各个部位均能养护到位,尤其是翼缘板底面及齿板部位。

6 模板体系设计

预制节段钢模板由底模、外侧模、内模、端模及相互连接体系和支撑走行体系等组成。模板设计图见下图 1 和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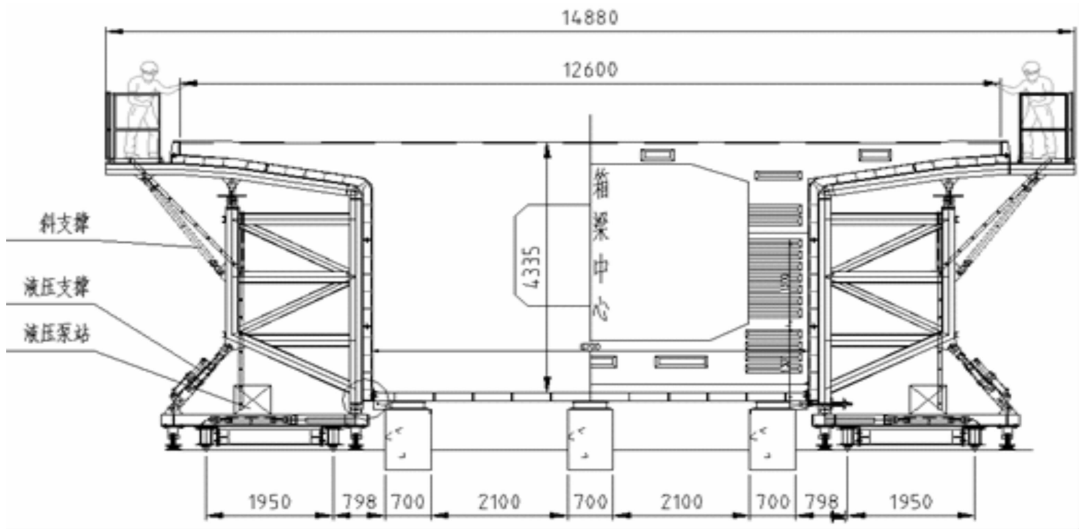


图 1 节段箱梁预制模板立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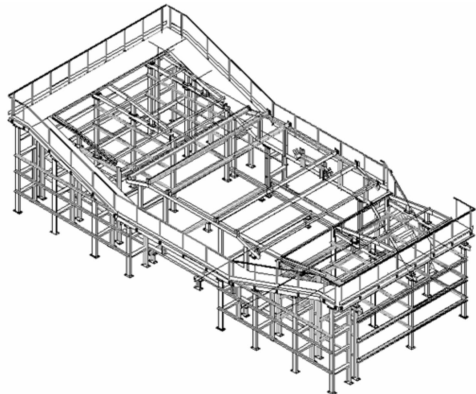


图 2 节段箱梁预制模板三维效果图

为了实现对箱梁的线形控制,将底模设置为可调固定式。底模预设可调整高度钢垫块,与台座连接,通过钢垫块的高度来实现底模挠度的控制^[7]。

底模面板采用厚 10mm 钢板,表面抛光涂刷脱模漆,横向肋为 H 型钢,间距 300mm,底模的钢面板和纵、横型钢骨架焊接成一个整体,底模和侧模之间安装橡胶条进行密封。节段接头处底模采用螺栓连接。底模施工完后设专人验收,表面应光滑平整,同时底模通过计算,调整钢垫块的高度设置预拱度。底模正常使用时,应随时用水平仪检查底模的放拱和下沉量,不符合规定处应随时调整,及时清除底模表面残余灰浆,均匀涂抹脱模漆;每孔梁的首、末节段均预埋有支座预埋钢板及防落梁钢板,钢筋绑扎前检查预埋钢板位置,检查支座预埋钢板的横向位置、平整度,四角高度,同一梁端支座预埋板的相对高差。安装后应用螺栓把支座预埋件钢板与底模固定。

外侧模板的面板采用厚度为 10mm 钢板,横肋

采用 14 号槽钢,间距 250mm,竖肋采用 H 型钢,高 200mm,纵、横加劲肋与型钢桁架焊接成整体,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能满足梁体轮廓尺寸和平整度的精度要求。顶部采用槽钢对拉固定,底部采用对拉螺栓将两扇外侧模定位。侧模板及其支架的竖向支腿下设置 4 个行走轮,这样侧模就可以纵向移动,承重

和高度调整用 4 个油压千斤顶调节。脱模后,侧模采用门式起重机和行走轮同时作业,纵向移动到下一个制梁台座^[8]。底模按设计预拱度线形布置。

7 长线法预制工艺

变截面预制连续梁节段分布见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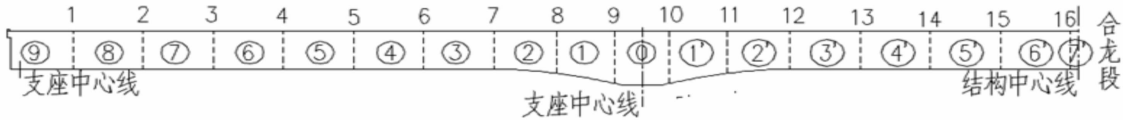


图 3 节段箱梁预制梁段分布图

因为匹配的需要,预制节段梁必须按照特定顺序预制,而且根据本工程变截面连续梁的特点,预制时在台座上先预制 9#、0#、6' # 节段梁,这 3 个节段为首节段,其余节段与 9#、0#、6' # 匹配预制。

预制台座两端有观测塔,上面设置梁轴线强制定位基准点和高程定位基准点,调节控制节段梁模板的纵、横轴线和标高^[9],实现节段梁的预制匹配定位。节段梁混凝土浇筑、养生完成后,用门式起重机吊运存放至存梁场。

变截面节段箱梁预制流程步骤如下:

第一步,调整长线台座底模线型到设计位置,预制首节段 9#、0#、6' # 段。

第二步,用 9# 作为匹配段预制 8# 段,用 0# 段作为匹配段预制 1' # 段,用 6' # 段作为匹配段预制 5' # 段。

第三步,匹配预制 7#、2' #、4' # 段。

第四步,渐变段模板移至边跨侧,以 2' # 和 4' # 段为匹配段预制 3' # 段;边跨侧匹配预制 6# 和 1# 段;提走 9# 段和 6' # 段。

第五步,匹配预制 5#、4# 和 2# 段;提走 8#、7#、5' #、4' # 段;将主跨侧模移到边跨侧,预制下一联 9# 段。

第六步,匹配预制 8# 段;以 4# 和 2# 段为匹配段预制 3# 段。

第七步,匹配预制 7# 段;提走 1# ~ 5# 段;进行 0# 和 6' # 段的预制。

第八步,重复以上步骤,直至梁段全部预制完成。

节段箱梁预制步骤见图 4 所示。

8 预制精度控制

严格依据施工工艺流程,在不同工况下测量控制节段箱梁的精度。测控总体程序有:①首节段的测量定位,②浇筑后的测量及分析,③待浇段的匹配测量定位,④放置架梁测控点,并采集数据。要求遵

循测量、调整、复核、再调整的测量检查过程。

8.1 建立预制测量控制网

分别在预制台座两端各设置 1 座观测塔,保证梁段预制精度。观测塔采用 $\varphi 377$ 钢管,内灌注混凝土,混凝土顶面预埋强制对中螺旋,GCT1 采用强制对中装置,GCT2 采用固定觇标装置,长线台座的纵向轴线必须与两观测塔中心点的连线相重合。为减少因振动造成钢管颤动,钢管周围浇筑 4m 高混凝土台。观测塔是实施节段测量控制的固定测控位置,观测塔的高度要能满足测量过程中两个中心点的通视,一般观测塔中心点的高度比端模中心高 50cm 即可。

平面测量控制网,根据预制节段连续梁测量需要,在预制场地内布设四个控制点,有 2 个点为场内观测塔中心点^[10],2 个点在台座两侧不受施工干扰且通视良好的地方设置。制梁施工中定期对控制网进行复核一次。

高程测量控制网,测量梁顶四点控制点高程,采用二等闭合线路高程控制网,预制过程中,测量控制网定期进行复核校准^[11],发现点位有偏差,立即分析原因,重新定位控制网。

整个预制节段的几何位置通过观测塔测控。

8.2 台座底模预拱度控制

先计算连续梁的压缩量形成的挠度,底模上设置反拱度^[12],每片节段梁的底模设置了 4 个高程点和 2 个轴线点,根据抛物线 $y = ax^2 + b$ 计算反拱数值。每一孔连续梁节段预制完毕进行反拱度复核。

8.3 箱梁线形控制

在节段预制过程中,预制厂根据线路的设计参数在待安装节段顶面预埋的轴线控制点、标高控制点等六个点的坐标有三种,分别为设计的六点坐标、预制理论坐标和预制的实际六点坐标,其中设计的六点坐标为最终成桥坐标。预制的理论坐标是预制

厂根据设计坐标和预制分段计算出每节段的六点坐标。在预制过程中,为保证最终成桥坐标符合设计的六点坐标,后续节段须根据前一节段的预制误差

进行修正,这便是预制的实际六点坐标。预制实际六点坐标是架梁单位实施桥梁拼装线形控制的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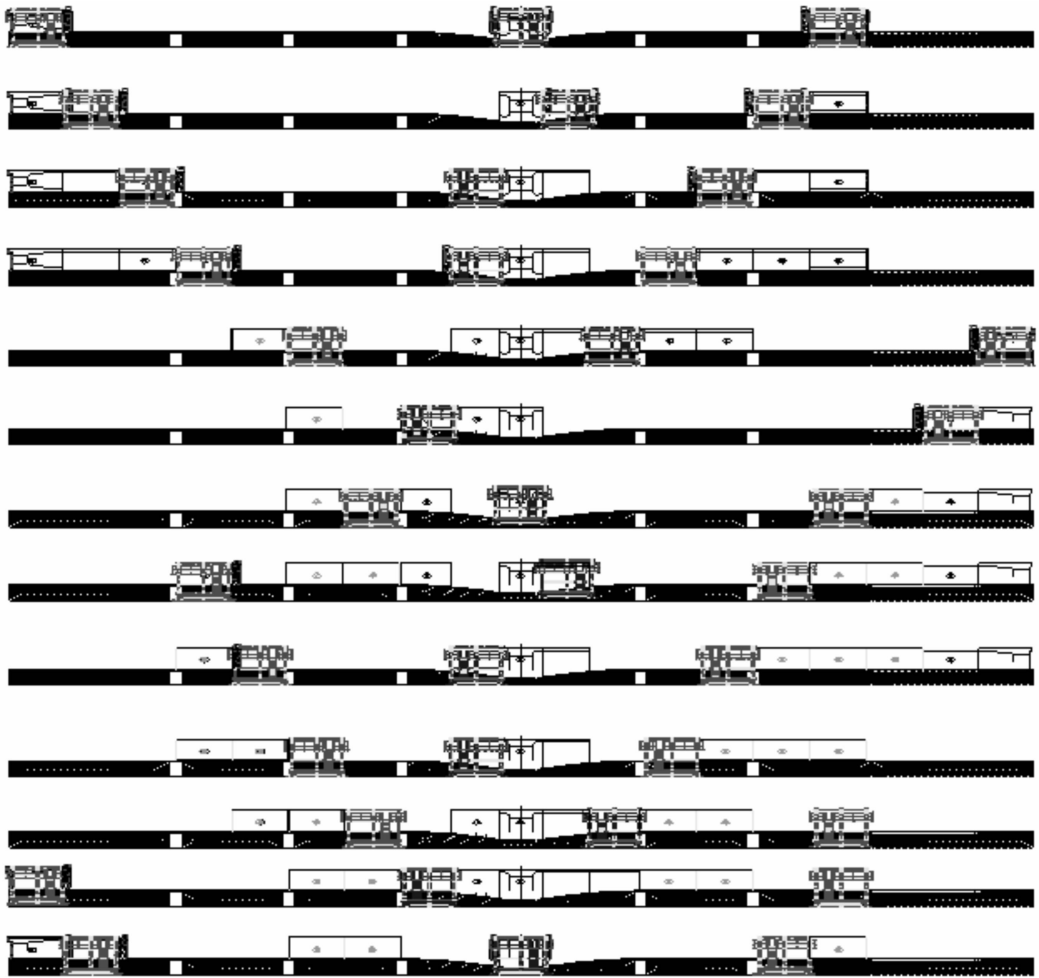


图4 节段箱梁预制步骤简图

0#节段浇筑:0#节段浇筑前要严格控制模板精度,浇筑完成后,埋设4个高程控制点和2个中线控制点标识,采集数据。

匹配节段定位:匹配梁段精确就位,一要保证2个中线控制点位于基线上,二要保证4个高程控制点绝对标高,三要控制两个0#节段纵向位置。

其他节段浇筑:以前一节段为匹配面,浇筑前要严格控制模板精度,浇筑完成后,埋设4个高程控制点和2个中线控制点标识,采集数据。

8.4 数据采集与分析

数据采集时,各控制点实测二遍,当第二遍数据测出来后,对同一控制点的二组数据进行比较,比较是否有差异,如果发现差异,该差异值超过 $\pm 2\text{mm}$,原先测出的两组数据应作废,重新测出两组新的数据,直至两组数据之间的差异在允许范围之内。此时应按以下原则取定最终的测量数据:差异为 2mm (例如: 4mm 和 6mm),将两个数据平均,取

5mm ;差异为 1mm (例如: 5mm 和 6mm),取两者之较小者,取 5mm 。

9 节段浇筑

9.1 端头节段定位浇筑

首节段在长线台座上直接预制,其定位是通过两块端模的标高控制和中心线的测设实现的,首节段为0#、9#、6'号梁段,按设计图纸要求加工定型端模^[13],用两块端模定位节段梁的浇筑位置。安装前复核底模的线形,用精密水准仪测量,采用观测塔上的精密水准控制网测量,测点为模板四角和轴线两点,这几个点高差控制在 1mm 范围内,端模的两侧标高(取相对标高)误差控制在 1mm 内。端模的几何中心定位在底模的中心位置上,用全站仪定位测量。

模板安装时用垂球检查垂直度,并进行顶部和底部纵向长度和对角线的控制(保持各部位纵向长度值一致,两对角线长度值一致,复核以确保端模的

垂直度),从而完成端头段的定位^[14]。端模的标高和中心点应准确定位。

选择华登牌作为箱梁预制脱模剂。施工时按照厂家说明书 25 m²/kg 用量进行涂刷,涂刷要求模板清洁干净且涂刷均匀。浇筑前要严格控制模板精度。

波纹管连接,待浇段预应力孔道一端用单锥形橡胶塞与活动端模连接,一端用双锥形橡胶塞与匹配节段孔道连接。

9.2 其他节段定位浇筑

当首节段的测量数据符合要求后,进行待浇段的预制,预制顺序由两头逐个向中间预制,最后预制 3#和 3' #梁段。各道工序的测量方法按照首节段和浇筑后的测量控制执行。

匹配段混凝土强度达到拆模强度要求后,拆除模板,后面节段将利用一侧端模和另一侧在匹配段(先前浇筑完成作为匹配)。

为了使节段梁连接面和剪力键的形状符合设计要求和表面光洁,必须在匹配段端面涂刷隔离剂,选择的是精面粉+双飞粉+水按照 1:2:4 的比例配制而成。涂刷时要求均匀涂刷两遍,并在钢筋骨架入模前完成并检查,对涂刷不均匀处或较薄处及时进行补刷。在梁段脱开后,及时用钢丝刷和清水清理干净。该节段端面作为端模匹配下一节段梁,来完成浇筑。

9.3 梁面测量控制点布置

每一节段梁顶面设置 A、B、C、D、E、F 共 6 个测量控制点,A、B 和 C、D 为高程测量控制点;E、F 为轴线控制点^[11]。节段箱梁面控制点分布见下图 5。



图 5 节段箱梁面控制点分布图

浇筑完成后,埋设 4 个高程控制点(A、B、C、D)和 2 个中线控制点(E、F)标识,采集数据,为以后箱梁节段拼装架设使用。

10 结束语

节段预制拼装胶接筒支箱梁的施工新工艺,适合铁路桥梁建设工期短、工程量大、施工质量要求高的需求,能够达到“优质、高速、安全”修建混凝土桥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①利于提高工程质量。节段采用工厂化预制,能保证混凝土质量;养护时间长,混凝土收缩徐变小,能实际控制线型误差在 0.5mm 以内,节段外观美;②利于提高施工效率。

节段预制可与下部同时施工,模板利用率和拼装架设效率高,劳动强度较低,目前可达到 64 米 8 天/孔,比湿接缝提高近 1 倍;③利于环境保护。废弃物少,施工噪音小。④受环境温度影响小,在 -10℃ 以上施工,不需采取冬季施工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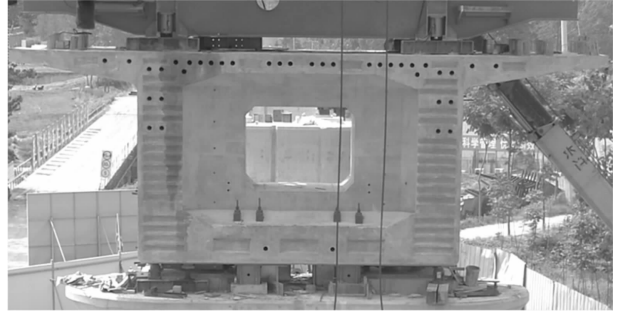


图 6 预制完成节段梁正面

节段拼装桥梁建造技术,箱梁节段工厂化集中预制,是一种快速高效高质量的工程技术,改善了混凝土箱梁浇筑和养护环境,提高结构耐久性,也是国家推广的施工方法,尤其在土地和空间缺乏的地方,能发挥更大作用。降低了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桥梁施工对当地环境的影响,施工设备周转使用,节省社会资源,且胶接拼装技术更加高效环保。此次建造变截面节段胶拼装连续梁,是在高速铁路上首次采用。

参考文献:

- [1] 沈殷,蔡鹏,陈立生,等.节段预制拼装混凝土桥梁剪力键接缝的抗剪强度[J].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10):47-50
- [2] 周光忠.五里亭大桥预制顶推竖曲线箱形连续梁施工技术[J].铁道标准设计,2006(8):18-21.
- [3] 郭敏,何建梅,陈亮.广州地铁 14 号线全刚构桥梁设计关键技术[J].都市快轨交通,2020(4):33-36.
- [4] 梁志新.石环公路(省道 S101)工程 307 东互通立交主桥 102m 系杆拱顶推施工技术[J].铁道建筑技术,2008(6):77-79.
- [5] 苏伟,周岳武,季伟强,等.铁路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节段预制胶拼法建造技术研究[J].铁道标准设计,2021(3):65-68.
- [6] 王力华.国外既有铁路升级改造设计研究[J].铁道建筑技术,2017(4):31-33.
- [7] 孙明德,李壮,高日,等.24 m 节段拼装活性粉末混凝土筒支箱梁抗弯性能试验研究[J].铁道建筑,2021(2):18-21.
- [8] 施威,邢雨,谢远超,等.京唐铁路潮白新河特大桥节段预制胶拼法建造关键技术研究[J].铁道标准设计,2019(9):55-58.
- [9] 杨帅.山区特大钢桁梁斜拉桥上部结构施工方案及其稳

定性研究[D]. 重庆:重庆大学,2018.

座设计与应用[J]. 世界桥梁,2018(3):46-48.

[10] 湛启发. 大跨度连续刚构柔性拱组合结构受力效应分析[J]. 桥梁建设,2012(3):42-45.

[13] 江梦莹. 节段拼装钢管混凝土桥墩的抗震性能研究及改进[D].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8.

[11] 徐光兴,李朝红,梁亮,等.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北东口水道桥两孔连做节段拼装技术[J]. 桥梁建设,2018(3):48-51.

[14] 周伟明. 三跨梁拱组合体系拱桥上部结构拼装施工关键技术[J]. 铁道建筑,2017(12):57-60.

[12] 陈孝诚,何前途. 错位法门形节段装配式不锈钢制梁台

(责任编辑 吕志远)

Prefabrication Technology of Segment Assembly Continuous Beam with Variable Cross – section by Long Line Method

LIU Xiuyuan

(China Railway Fifth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 LTD. , Beijing 102600, China)

Abstract: As a construction method of prestressed concrete beam bridge, the segmental prefabrication construction method is fast and easy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the bridge, and does not need a large tonnage bridge erecting machine, which means space saving. In this paper, the technology of segmental prefabrication gluing and assembly, the site conditions of segmental prefabri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segmental prefabrication continuous beam with variable cross – section by long line method are all studied. It is shown that the precast segment – dry assembling method is a kind of superstructure design solution which can effective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economy and aesthetics.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fast construction speed and short construction period. It is suitabl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um span and below span bridges.

Key words: segmental assembled; continuous beam; variable cross – section; long – line method

(上接第 111 页)

The Application of Frequency Conversion Speed Regulating Redundant Control Technology in Tower Crane

WANG Jidong¹, WANG Yuqing², WEI Tiezhuang³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Power China Henan Engineering CO. ,LTD. , Zhengzhou, Henan 45001, China; 3. China Energy Engineering Group Northeast No.1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CO. , Ltd. , Shenyang, Liaoning 110168, China)

Abstract: Tower cranes are essential fixture for modern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Frequency converter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electrical control of tower crane in the past decade, which improves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stability, speed regulation and life expectancy of tower cranes. However,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tower cranes operate within is often harsh and unpredictable. Therefore, frequency converter faults may occur. Furthermore, frequency converter is a highly – integrated power electronics device that an electrician may find hard to fix. An advanced expertise has to be sent by frequency converter suppliers to the construction site, which often takes a few days, and result in schedule delays, huge economic loss fo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and even safety issues. The paper presents a tower crane frequency conversion speed regulation redundancy control technology that solves the problem.

Key words: tower crane; frequency converter; redundant control; downtime; economic loss; safe hidden trouble

脱氢枞酸结构改性的研究进展

姜巧娟, 赵雅雯, 刘从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脱氢枞酸是由歧化松香分离得到的一种具有三环二萜骨架结构的天然树脂酸,因其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而备受关注,尤其对其羧基、异丙基等活性部位的结构修饰成为研究热点,以期获得高活性的先导化合物。综述了近年来脱氢枞酸的结构改性,脱氢枞酸的羧基、B环、异丙基的结构修饰以及改造后的衍生物具有较好的乳化、抗菌、荧光、耐腐蚀等性能,对脱氢枞酸改性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为脱氢枞酸改性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脱氢枞酸;羧基;苯环;异丙基;改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22

中图分类号:TQ351.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119-06

松香是自然界可再生的绿色化工原料^[1]。脱氢枞酸(Dehydroabietic Acid,简称DHAA)是歧化松香分离出来的主要成分,与其他成分相比,脱氢枞酸化学性质稳定,抗氧化能力较强,成为合成新型生物活性衍生物的重要原料^[2-3]。脱氢枞酸具有芳环和羧基2个功能基团,通过改性可以合成多种衍生物^[4],并应用于食品、医药、化工及生物农药等领域。脱氢枞酸的分子结构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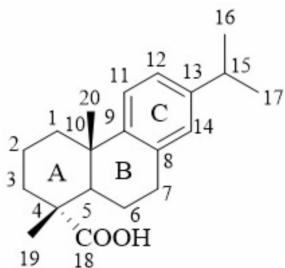


图1 脱氢枞酸结构

目前,关于脱氢枞酸研究进展的报道多侧重于衍生物活性方面,单纯对分子中基团的改性研究进展的报道较少,尤其是对B环及苯环上异丙基的改性报道更少。本文主要对近年来脱氢枞酸的羧基、苯环、B环及苯环上异丙基修饰改性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1 对羧基的改性

1.1 合成胺类化合物

脱氢枞酸结构中的羧基是一个活性基团,通过对羧基的修饰可以合成胺类、脂类、酰胺类等化合物,改性之后的衍生物可以得到具有抗肿瘤、抑菌、抗病毒等新的生物活性,在引发剂、表面活性剂等方面的应用也有突破。

陈景晶等^[5]采用歧化松香为原料,先进行胺化,之后经酸化和重结晶等步骤制得纯的脱氢枞酸,并利用缩合剂活化结构中的羧基与6-氨基己酸甲酯盐合成酰胺键,然后用氢化铝锂还原和 PBr_3 溴化,最后与三甲胺反应得到季铵盐表面活性剂1(图2)。通过表面张力法、电导法以及尼罗红荧光探针法对该化合物的表面张力和乳化性质进行检测,发现化合物1的临界胶束浓度为 $4.43\text{mmol}\cdot\text{L}^{-1}$,表面张力 γ_{cmc} 为 $34.56\text{mN}\cdot\text{m}^{-1}$ 时该化合物具有较好的乳化性能和稳定乳液的性能。陈景晶等还将11-氨基十一烷羧酸甲酯盐酸盐和脱氢枞酸缩合,经过皂化、酸化以及甘氨酸甲酯盐酸盐酰胺化得到松香基阴离子表面活性剂2(图2),并利用荧光探针法和表面张力法对其表面活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化合物的临界胶束浓度为 $0.23\text{mmol}\cdot\text{L}^{-1}$ 时

收稿日期:2022-02-06

作者简介:姜巧娟(1980—),女,河南新乡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化学化工。

具有极好的聚集能力,可以很好地稳定乳液与泡沫。

Li 等^[6]以丙炔酯和多种易得的氯/溴化苄为原料,合成了一系列脱氢枞酸偶联的 1,2,3 - 三唑衍生物;采用 MTT 法对 CNE - 2 (鼻咽)、HepG2 (肝)、HeLa (宫颈上皮)、BEL - 7402 (肝)、人体正常细胞 (HL - 7702)) 进行体外细胞毒性检测。研究发现大多数脱氢枞酸偶联的 1,2,3 - 三唑衍生物的细胞毒性比 DHAA 的活性明显提高,其中化合物 3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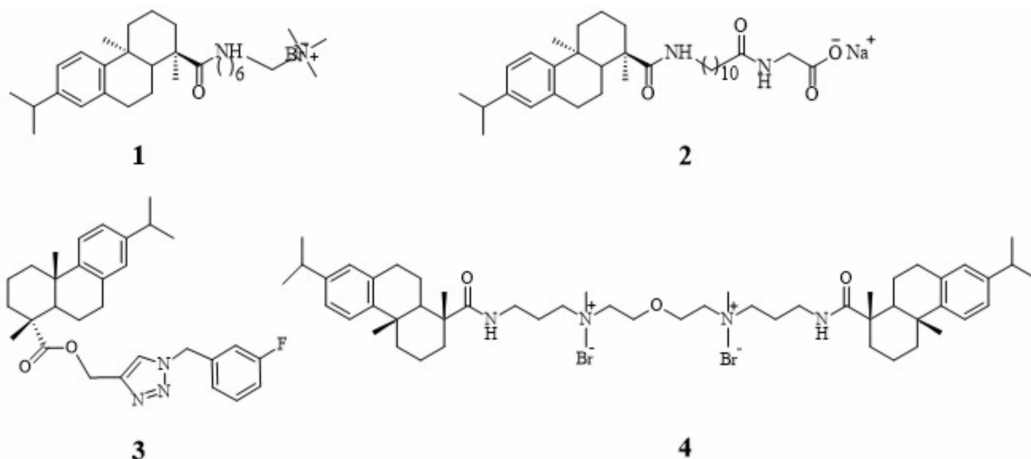


图 2 合成胺类化合物 1 - 4

罗云龙等^[8]以脱氢枞酸为原料,乙醇作溶剂,三氟甲基磺酸铯为催化剂,先与二氯亚砷反应,然后与氨基硫脲反应制得脱氢枞基氨基硫脲,最后脱氢枞基氨基硫脲与芳香醛和乙酰乙酸乙酯反应,合成了一系列脱氢枞酸酰胺基 - 3,4 - 二氢嘧啶酮衍生物;采用 MTT 比色法测试了该系列化合物对单纯疱疹病毒 I 型 (HSV - 1) 的体外抗病毒活性,发现该系列衍生物细胞毒性较小,其中化合物 5 (图 3) 具有最好的抑制 HSV - 1 活性。杨艳平等^[9]以歧化松香为原料,合成了 6 和 7 (图 3) 两种单体,经分离提纯后两种物质的纯度分别可达 97.95% 和 96.05%。将两种产物分别与环氧大豆油丙烯酸酯 (AESO) 进

对 HepG2 细胞有较好的抗增殖活性,IC₅₀ 值为 5.90 ± 0.41。Feng 等^[7]利用脱氢枞酸合成了一种双分子表面活性剂 4 (图 2),发现该表面活性剂具有 2 个大的刚性疏水基团,增加了离子头基团周围疏水部分的密度,有助于形成具有较低曲率和不对称形貌的聚集体。含刚性疏水部分的表面活性剂有望产生更精细、自组装的形貌,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行共聚合成固化树脂材料,通过动态拉伸、机械分析、热重分析测试,发现固化后的两种树脂材料断裂伸长率分别达到 36.1% 和 45.8%,拉伸强度分别达到 5.7MPa 和 6.5MPa。可聚合松香基丙烯酸酯单体的加入使得 AESO 树脂在疏水耐热材料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Berger 等^[10]利用乙酸镍四水合物和碳酸钠与相应的芳基碘化物偶联,利用臭氧分解和盐酸处理合成了一系列化合物,通过对耐甲氧西林和苯唑西林菌株的全细胞抑菌试验,发现化合物 8 (图 3) 具有较好的抗菌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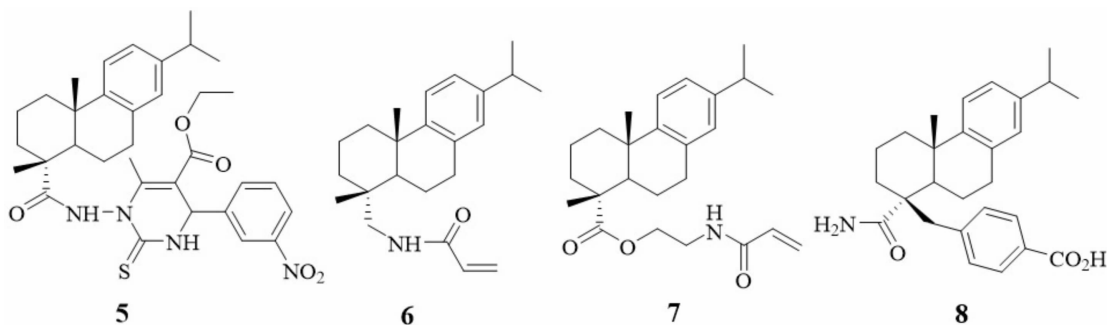


图 3 合成胺类化合物 5 - 8

1.2 合成脂类化合物

张海波等^[11]以脱氢枞酸、甲基二烯丙基胺、3 -

溴 - 1 - 丙醇为原料制备了 N - 甲基 - N, N - 二烯丙基 - N - (3 - 脱氢枞酰氧基) 丙基溴化铵水溶性

松香单体 9 (图 4), 对该物质自聚动力学及自聚性能进行了研究, 发现该化合物具有很好的可聚性, 自聚活化能为 $124.336 \text{ kJ} \cdot \text{mol}^{-1}$ 。俞娟等^[12]以脱氢枞酸为原料, 经酰氯化后与乙二醇反应合成脱氢枞

酸羟乙酯, 之后与 2-溴代异丁酰溴进行酯化反应合成引发剂 10 (图 4)。GPC 测试结果显示, 该化合物具有很好的 ATRP 反应引发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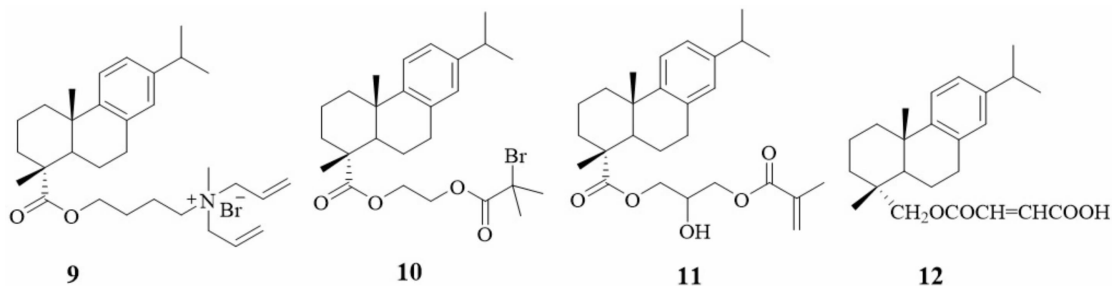


图 4 合成脂类化合物 9-12

刘少锋等^[13]合成了脱氢枞酸基甲基丙烯酸酯单体 11 (图 4), 以 AIBN 为引发剂, 该化合物可发生聚合反应, 得到均聚物的重均相对分子质量为 23900, 数均相对分子质量为 12254, 玻璃化转变温度为 62.61°C 。齐帆等^[14]以脱氢枞酸为原料, 用氯化铝锂将其还原为脱氢枞醇, 再与顺丁烯二酸酐反应合成脱氢枞醇丁烯二酸单酯 12 (图 4), 结果表明, 脱氢枞醇丁烯二酸单酯质量分数为 25% 的液体助焊剂在铜板腐蚀性、干燥度、物理稳定性以及焊后表面绝缘电阻等方面均优于精制氯化松香。

李娟等^[15]以歧化松香为原料合成了 4 种可分解型松香基表面活性剂 13 (图 5)。结果显示, 化合物 I 和 II 为非离子型松香基酯类化合物, 化合物 SAA-III 和 SAA-IV 为离子型松香基磷酸酯类化合物, 其中松香酯 II 具有较好的乳化性能, 松香磷酯 SAA-IV 具有较好的起泡性能。室温强酸条件下的酸水解实验表明, 4 种表面活性剂均具有可分解性。磷酸酯类具有较强的亲水性、润湿性、乳化性、发泡性和较低的 Krafft 点, 松香基磷酸酯类的表面活性能优于松香基酯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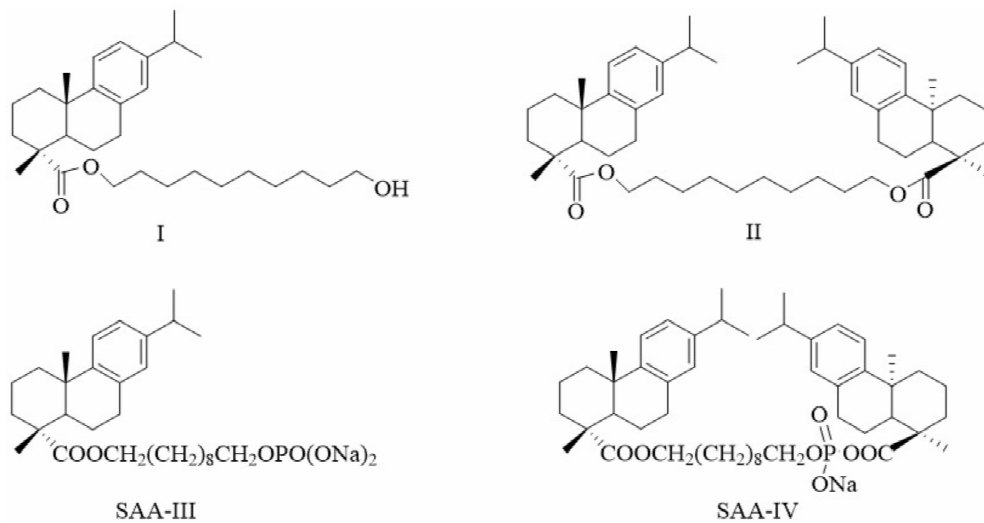


图 5 合成脂类化合物 13

1.3 合成酰肼类化合物

殷彬等^[16]合成了 2 种化合物 14a 和 14b (图 6)。根据 Stern-Volmer 方程分析, 化合物 a 与 DNA 作用强于 b, DNA 的黏度随着化合物浓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加, 化合物 a 的增幅大于 b, 浓度不同的不同化合物使 DNA 的 CD 信号改变量不同, 且化合物 a 对 DNA 构型的影响强于 b。通过凝胶电泳实验发现化合物 a

能够独自切割 DNA, 而化合物 b 不能, 但是在 Vc 存在条件下, 两种化合物都能对 DNA 进行单股切割。徐武双等^[17]合成了 2 种衍生物 15c 和 15d (图 6), 采用 MTT 法研究合成产物对人体癌细胞的抑制作用, 发现浓度分别在 25 和 $50 \mu\text{mol} \cdot \text{L}^{-1}$ 条件下, 两种衍生物对 HeLa, MCF-7, HL-60 和 HepG-2 这 4 种肿瘤细胞都表现出较高的抑制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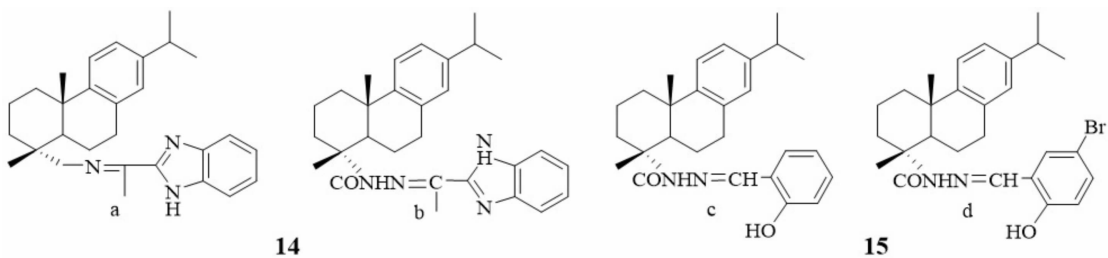


图6 合成酰胺类化合物 14-15

2 对苯环的改性

Liu 等^[18]以脱氢枞酸甲酯和各种酰氯为原料合成了一系列脲醚衍生物,研究了该系列化合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菌株和 5 株耐药菌株 (NRS - 1, NRS - 70, NRS - 100, NRS - 108 和 NRS - 271) 的抗菌活性,其中芳香脲酯衍生物 16 (图 7)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MIC 为 $0.39 \sim 0.78 \text{lg} \cdot \text{mL}^{-1}$, 活性最高。廖圣良等^[19]以脱氢枞酸为原料,通过酯化、乙酰化等反应合成了一系列新型含吡啶环的脱氢枞酸衍生物,采用 MTT 比色法测试了化合物对人体单纯疱疹病毒 I 型 (HSV - 1) 的体外抗病毒活性,发现合成的该系列衍生物具有抗病毒活性,对 HSV - 1 的半数有效浓度 EC_{50} 在 $10 \sim 25 \mu\text{mol} \cdot \text{mL}^{-1}$, 化合物 17

(图 7) EC_{50} 为 $12.1 \mu\text{mol} \cdot \text{mL}^{-1}$ 时, 抗病毒活性最强。通过构效关系分析,发现吡啶环结构的引入可以提高衍生物的抗病毒活性。

齐永辉等^[20]对脱氢枞酸进行分离提纯,用混酸硝化法合成了化合物 18 (图 7),以 12,14 - 二硝基脱氢枞酸作为手性拆分剂,利用非对映结晶法研究其拆分效果,发现改性后脱氢枞酸对普萘洛尔对映体的拆分能力显著提高。李聪聪等^[21]以羧基、氨基和苯环作为反应基团,通过酯化、酰胺化等反应得到了一系列基于脱氢枞基的可聚合手性功能单体。采用 HPLC, TLC, FTIR, NMR 等对其纯度和结构进行了表征,发现化合物 19 (图 7) 可以用于扁桃酸的拆分且具有优良的循环使用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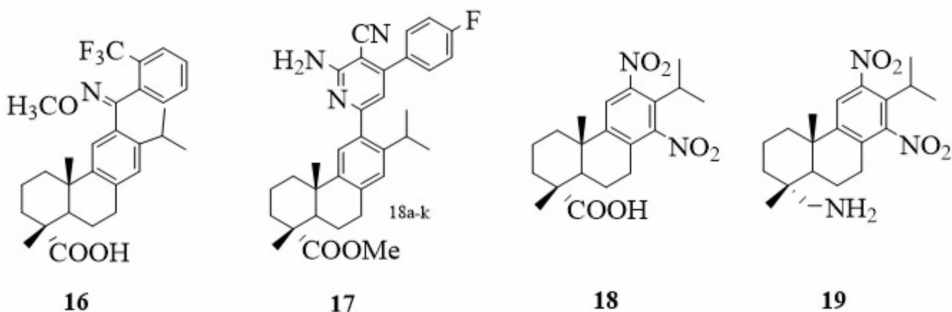


图7 对苯环改性化合物 16-19

3 对苯环上的异丙基的改性

檀贯妮等^[22]用歧化松香纯化制得脱氢枞酸,依次经过酯化、溴代、硝化和加氢还原反应,以 C - N 偶联等方法合成了一种含双萘的脱氢枞酸三芳胺化合物 20 (图 8)。对该化合物分别在甲醇、二氧六环、四氢呋喃、二氯甲烷和环己烷 5 种溶剂中进行紫外吸收和荧光发射性能检测,发现化合物在甲醇中发射波长最大、荧光强度最小,在环己烷中发射波长最小、荧光强度最大。

Gu 等^[23]以脱氢枞酸为原料得到二氨基中间体,将该中间体与 1,4 - 二溴 - 2,3 - 丁二酮反应,得到 2,3 - 二(溴甲基)喹啉衍生物,该衍生物在 K_2CO_3 和 KI 存在下与不同胺或唑反应,转化为含有不同含 N 侧链的目标喹啉衍生物。对新合成的化合物进行体外抗人肝癌细胞株 MCF - 7, SMMC -

7721 和 HeLa 及非癌人肝细胞株 LO2 增殖活性的筛选,发现化合物 21 (图 8) 对 3 种癌细胞株的细胞毒性最强。此外,细胞周期分析表明该化合物在 G0/G1 期引起了细胞周期阻滞,这类化合物可被认为是开发更有效抗癌药物的有希望的先导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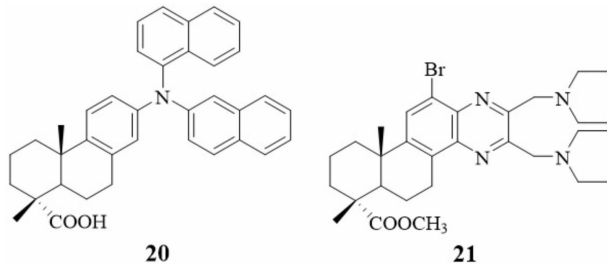


图8 苯环上异丙基改性化合物 20-21

4 对 B 环的改性

陈乃源等^[24]设计并合成了一系列新型去氢枞

酸基 B 环并噻唑 - 酰胺化合物,测试了化合物对番茄早疫病菌、黄瓜枯萎病菌、苹果轮纹病菌、小麦赤霉病菌和花生褐斑病菌等 5 种植物病原菌的抑菌活性,结果显示化合物 22(图 9)对苹果轮纹病菌的抑制活性级别为 A 级。Zhang 等^[25]以脱氢枞酸为原料,在碱性条件下合成了一系列脱氢枞酸的 N - 氨基乙脒衍生物,对所有新合成的脱氢枞酸衍生物进行抗菌活性筛选,发现化合物 23(图 9)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MIC 为 0.39 ~ 0.78lg · mL⁻¹时,表现出较好的抗菌活性。

Chen 等^[26]以脱氢枞酸为原料,合成了 3 个系列的 N - 取代咪唑衍生物。对合成的最终产物进行体外抗癌活性测试,化合物 24(图 9)对 3 株癌细胞

(SMMC - 7721, HepG2 和 Hep3B) 的 IC₅₀ 值分别为 (1.39 ± 0.13) mm, (0.51 ± 0.09) mm 和 (0.73 ± 0.08) mm,显示出最强的抗肿瘤活性。在激酶抑制实验中,该化合物能显著抑制 MEK1 激酶活性。此外,该化合物还可升高细胞内 ROS 水平,降低线粒体膜电位,破坏细胞膜完整性,最终导致 HepG2 细胞肿大和凋亡。Huang 等^[27]合成了一类新的 DHAA 手性二肽衍生物,用 MTT 法测定了该系列化合物对胃癌细胞株 NCIH460(肺)、HeLa(宫颈上皮)和 MGC - 803(胃)的抑制活性。抗肿瘤活性筛选结果表明,这些化合物对 3 种肿瘤细胞株均表现出中高水平的抑制活性,其中化合物 25(图 9)能诱导 HeLa 细胞凋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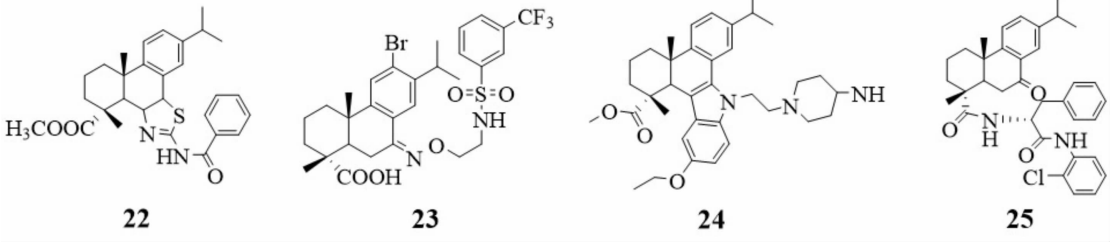


图 9 B 环改性化合物 22 - 25

5 结语

脱氢枞酸具有羧基、双键、苯环以及苯环上异丙基等活性基团,对其进行改性以获得具有更好生物活性的化合物是目前研究的关注点。改性后的化合物种类繁多,克服了稳定性差的缺点,具有较好的乳化性能、抗菌活性、耐腐蚀性和荧光性能,被广泛用作表面活性剂、引发剂和疏水耐热材料。目前存在的问题依然是松香的共轭双键不稳定、容易被氧化、溶剂结晶倾向较大、软化点比较低等。未来可以重点探究利用脱氢枞酸分子上的 3 个手性中心,通过分子设计对脱氢枞酸进行有目的的调控和改性,定向得到目标产物。对脱氢枞酸在改性方面的实践仍需进行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 付飞,王丹,沈明贵,等. 可自由基聚合的松香基苯并环丁烯单体的制备及其聚合性能研究[J]. 林产化学与工业,2019,39(6):21 - 28.
 [2] 马献力,陈丽,段文贵,等. 脂肪族二酸二烷基双去氢枞基双噁二唑的合成及除草活性[J]. 有机化学,2011,31(7):1069 - 1075.
 [3] 田小艳,杨达,潘英明,等. 含脱氢松香酸骨架的吡啶染料的合成及其理化性质研究[J]. 有机化学,2011,31(3):346 - 355.
 [4] 莫启进,段文贵,李行任,等. 2 - 取代氨基 - 5 - 去氢枞

基 - 1,3,4 - 噁二唑衍生物的合成及除草活性[J]. 有机化学,2011,31(7):1114 - 1121.
 [5] 陈景晶. 松香基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的合成及性能研究[D]. 无锡:江南大学,2019.
 [6] LI F Y, HUANG L, LI Q, et al. Synthesis and antiproliferative evaluation of novel hybrids of dehydroabietic acid bearing 1,2,3 - triazole moiety. [J]. Molecules 2019,24(22):4191.
 [7] FENG L, XIE D H, SONG B L, et al. Aggregate evolution in aqueous solutions of a gemini surfactant derived from dehydroabietic acid [J]. Soft Matter, 2018, 14(7):1210 - 1218.
 [8] 罗云龙,沈明贵,蔡照胜,等. 脱氢枞酸酰胺基 - 3,4 - 二氢嘧啶酮衍生物的合成与抗病毒活性研究[J]. 林产化学与工业,2019,39(2):46 - 52.
 [9] 杨艳平. 松香基丙烯酸酰胺单体的制备及应用研究[D]. 北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2017.
 [10] BEGER M, ROLLE A, MAULIDE N. Synthesis and antimicrobial evaluation of novel analogues of dehydroabietic acid prepared by CH - Activati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2017, 126:937 - 943.
 [11] 张海波,蒋建新,商士斌,等. N - 甲基 - N, N - 二烯丙基 - N - (3 - 脱氢枞酰氧基)丙基溴化铵的合成及其自聚动力学分析[J]. 生物质化学工程,2019,53(1):1 - 7.
 [12] 俞娟,王利军,刘少峰,等. 脱氢枞酸基 ATRP 引发剂的合成与表征[J]. 林产化学与工业,2016,36(2):87 - 93.

- [13] 刘少锋, 卢传巍, 王春鹏, 等. 脱氢枞酸基甲基丙烯酸酯单体的合成和表征[J]. 林产化学与工业, 2017, 37(4): 89-94.
- [14] 齐帆, 杨艳平, 商士斌, 等. 脱氢枞醇丁烯二酸单酯的合成及助焊性能研究[J]. 林产化学与工业, 2016, 36(2): 94-98.
- [15] 李娟, 杨明生, 田超, 等. 松香基可分解型表面活性剂的合成及性能[J]. 精细化工, 2018, 35(6): 964-969.
- [16] 殷彬, 徐武双, 解静聪, 等. 脱氢枞基苯并咪唑希夫碱和酰胺衍生物与 DNA 作用的比较研究[J]. 林产化学与工业, 2016, 36(3): 81-87.
- [17] 徐武双, 黄志向, 高炜琳, 等. 脱氢枞基苯甲酰胺衍生物与 DNA 作用及抗癌活性研究[J]. 林产化学与工业, 2015, 35(2): 1-7.
- [18] LIU M L, PAN X Y, YANG T, et al. The synthesis and anti-staphylococcal activity of dehydroabietic acid derivatives: Modifications at C-12[J].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2016, 26(22): 5492-5496.
- [19] 廖圣良, 沈明贵, 宋杰, 等. 新型含取代吡啶环的脱氢枞酸衍生物的合成和抗病毒活性研究[J]. 现代化工, 2016, 36(8): 120-124.
- [20] 齐永辉. 脱氢枞酸衍生物制备及其对几种手性药物的拆分研究[D]. 南宁: 广西大学, 2017.
- [21] 李聪聪. 以脱氢枞酸衍生物为单体的 S-扁桃酸磁性印迹聚合物的制备及性能研究[D]. 南宁: 广西大学, 2019.
- [22] 檀贯妮, 高亚楠, 高宏, 等. 含双萜的脱氢枞酸三芳胺化化合物的合成及光谱性能[J]. 林产化学与工业, 2019, 39(1): 61-66.
- [23] GU W, WANG S, JIN X, et al.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of new quinoxaline derivatives of dehydroabietic acid as potential antitumor agents[J]. Molecules, 2017, 22(7): 1154.
- [24] 陈乃源, 段文贵, 林桂汕, 等. 去氢枞酸基 B 环并噻唑-酰胺化合物的合成及抑菌活性[J]. 精细化工, 2016, 33(7): 811-819.
- [25] ZHANG W M, YAO Y, YANG T, et al. The synthesis and anti-staphylococcal activity of N-sulfonaminoethyloxime derivatives of dehydroabietic acid[J].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2018, 28(10): 1943-1948.
- [26] CHEN H, QIAO C, MIAO T T, et al. Synthesis and biological evaluation of novel N-(piperazin-1-yl) alkyl-1H-dibenzo[a,c]carbazole derivatives of dehydroabietic acid as potential MEK inhibitors[J]. Journal of Enzyme Inhibition and Medicinal Chemistry, 2019, 34(1): 1544-1561.
- [27] HUANG X C, JIN L, WANG M, et al. Design, synthesis and in vitro evaluation of novel dehydroabietic acid derivatives containing a dipeptide moiety as potential anticancer agents[J].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2015, 89: 370-385.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Progress on Structural Modification of Dehydroabietic Acid

JIANG Qiaojuan, ZHAO Yawen, LIU Congjun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Dehydroabietic acid is a natural tricyclic diterpenoid product from disproportionate drosin. It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wide range of biological activities. Especially, to obtain highly active lead compounds by modification of carboxyl and isopropyl groups is becoming a hot spot in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is paper,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tructural modification on carboxyl, B ring and isopropyl groups are reviewed with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i. e. emulsification, antibacterial, fluorescence, corrosion resistance. Meanwhil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dehydroabietic acid is further forecasted. It is hopeful for helping the relevant modified studies of dehydroabietic acid.

Key words: dehydroabietic acid; carboxyl group; benzene ring; isopropyl; modification

正交优化藜麦饼干的工艺配方研究

秦小转, 陈欣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在传统酥性饼干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以感官评分为评价指标,采用单因素试验法分析了黄油添加量、绵白糖添加量、熟藜麦添加量、鸡蛋液添加量对藜麦酥性饼干品质的影响。通过正交试验确定了藜麦酥性饼干的最佳配方及制作工艺,结果显示,以100 g低筋面粉和全麦粉(9:1)为基数,添加黄油60 g,绵白糖50 g,熟藜麦55 g,鸡蛋液30 g,全脂奶粉6 g,小苏打1 g,食盐1 g,设置面火170℃,底火170℃,烘烤20 min,在此条件下加工制成的藜麦饼干营养、色泽、口感俱佳,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求。

关键词:藜麦饼干;单因素试验;正交试验;感官评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2.023

中图分类号:TS21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2-0125-04

藜麦,别名印第安麦、南美藜、奎奴亚藜等,是一种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藜科藜属植物^[1],拥有5000年以上的种植历史。藜麦中蛋白质含量高达14.4%,富含钙、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同时还含有多种人类必需氨基酸和大量植物化学成分,营养价值远高于小麦、稻米等传统的谷类作物,被誉为“超级谷物”“全营养食品”等,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2-3]。藜麦具有提升人体免疫力、预防多种疾病的重要功效^[4],通常被作为一种“类全谷物”的健康食品^[5]。与传统谷物相比,藜麦是一种低脂低糖、高营养高能食品^[6],含有许多具有功能性的物质成分,例如藜麦中的黄酮是促进人体健康的有效物质^[7],藜麦中的多酚、皂角苷、植酸和其他功能活性物质具备很强的抗氧化性和抗癌能力^[8-9]。

饼干作为一种口感宜人、易于食用、成本低廉的传统烘焙食品,深受世界各地民众的喜爱^[10],但传统的饼干制品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等营养物质相对较少,整体营养不够均衡^[11]。藜麦的加入不仅能够丰富传统饼干制品的营养,还能够提高饼干的功能性价值^[12]。本研究以藜麦为原料生产饼干,通过单因素试验和正交优化试验确定藜

麦饼干的最佳配方,赋予传统饼干独特的藜麦风味和营养价值,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设备

主料:低筋小麦粉、全麦粉和藜麦,分别来自上海欣华商贸有限公司、苏州王后烘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内蒙古裕品源农牧业有限公司; **辅料:**雀巢全脂调制奶粉、安佳黄油、鸡蛋、小苏打(食品级)、绵白糖、食用盐,均为市售。

电子天平: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SM-603电烤箱:**新麦机械(无锡)有限公司; **KS-938AN打蛋器:**广州市祈和电器有限公司; **BCD-210L3CX冰箱:**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1.2 原料预处理

低筋面粉和全麦粉进行过筛处理。熟藜麦的制作方法如下:三色藜麦用水浸泡,并进行多次淘洗;用手指搓藜麦种子,直到洗干净为止,此时可看到藜麦种子有出芽现象;煮25~30 min,藜麦种子膨胀变软,有米粒冒出即可捞出;沥干后摊平到吸水纸上,放在通风处自然晾干。

收稿日期:2022-02-23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212102210463);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20B150026,20B550010)

作者简介:秦小转(1988—),女,河南邓州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食品研发。

1.3 藜麦粗粮饼干的制作步骤及操作要点

将制作藜麦粗粮饼干的辅料混合,调制面团并进行冷藏,然后将面团辗压成型,切成需要的形状,放到烤箱中烘烤,最后冷却至室温进行包装。

1.3.1 辅料混合

称取适量黄油,在室温下静置软化后与绵白糖融合搅拌,用电动打蛋器打发至黄油与糖完全融合,使之形成均匀的乳浊液,混合物为羽毛状,打蛋器提起来有钩状即可;将充分搅拌打散之后的鸡蛋全液分4次加入黄油打发物中,使其完全融合在一起。

1.3.2 调制面团及冷藏

将混合好的辅料与两种主要原材料(全麦粉和低筋小麦面粉)混合并搅拌均匀,制作成面团;加入煮熟的藜麦翻拌均匀,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中冷藏25~30 min。

1.3.3 辗压成型

用2 mm厚度尺将调制好的面团沿一个方向擀成2 mm厚的面皮,用饼干成型磨具切割成型。

1.3.4 烘烤

烤箱预热20 min,将已经成型的饼干放入烤盘,烤箱上火温度和下火温度均设置为170℃,烘烤20 min。

1.3.5 冷却包装

将饼干从烤箱中取出,冷却至室温,采用真空独立包装方式进行包装。

1.4 试验设计

1.4.1 单因素试验优化饼干配方

藜麦饼干的基本配方为以100 g低筋面粉和全麦粉(9:1)为基数,添加黄油60 g,绵白糖40 g,熟藜麦50 g,鸡蛋液30 g,全脂奶粉6 g,小苏打1 g,食盐1 g。本文以感官评分为评价标准,采用单因素试验确定熟藜麦、黄油、鸡蛋液和绵白糖4种原材料的最佳添加量。各原材料的试验添加量如下:黄油40,50,60,70和80 g;绵白糖40,45,50,55和60 g;鸡蛋液20,25,30,35和40 g;熟藜麦40,45,50,55和60 g。

1.4.2 正交试验优化饼干配方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选取4种原材料的适宜水平进行4因素3水平的 $L_9(3^4)$ 正交试验(见表1),以感官评分为评价标准,进行数据处理和结果分析,确定藜麦饼干的最佳工艺配方。

1.5 藜麦饼干感官评定

随机邀请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食品专业师生10名(男女各5名)组建藜麦饼干感官评价小组,采用百分制对饼干的形态、组织结构、口感、色泽和风味

5个项目逐一打分,总得分作为饼干的感官评价得分(满分为100分)。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认为上述5个评定项目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因此每项最高分均设定为20分。同时,为了排除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将小组成员打分的平均值作为饼干感官评价的最终得分。为避免不同产品间的相互影响,每个产品鉴定完毕,小组人员须用纯净水漱口后方可鉴定后续产品。表2为藜麦饼干的感官评分标准^[13]。

表1 正交试验的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A(黄油添加量/g)	B(绵白糖添加量/g)	C(熟藜麦添加量/g)	D(鸡蛋液添加量/g)
1	50	40	45	25
2	60	45	50	30
3	70	50	55	35

表2 藜麦饼干的感官评分标准

评定项目	总分	评分标准
形态	20	形状残缺,破碎严重,表面残缺,气泡较大(5~12)
		外型基本完整,表面基本平整,无大气泡(13~16)
		外型完整,厚薄均匀,表面平整无气泡(17~20)
组织结构	20	纹理坚硬,横切面层次不清,空洞较大(5~12)
		断面层次感清晰,孔径稍大,组织均匀(13~16)
口感	20	细而多孔,无大孔,组织均匀(17~20)
		口感僵硬粗糙,较涩(5~12)
		较酥松,基本无涩味,稍粘牙(13~16)
色泽	20	酥松,细腻,无涩味,不粘牙(17~20)
		色泽不均匀,有焦糊、过白现象(5~12)
风味	20	色泽基本均匀,有过焦、发白等现象(13~16)
		表面呈金黄色,色泽均匀,无过焦、发白现象(17~20)
风味	20	无香味,无藜麦特有香味,有焦味(5~12)
		香味略淡,无焦味以及其他异味(13~16)
		香味浓,有藜麦特有香味,无异味(17~20)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因素试验结果

2.1.1 黄油添加量对藜麦饼干品质的影响

由图1可知,藜麦饼干的感官评分随着黄油添加量的增加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当黄油用量为60 g时,感官评分达到峰值(90分),此时饼干酥脆可口。这是因为添加适量的黄油不仅可以减少面筋的形成,使饼干变得酥脆,大大提升饼干质量,而且可以阻断水分,延长饼干的保质期,从而提高其货架期。

2.1.2 绵白糖添加量对藜麦饼干品质的影响

由图2可知,随着绵白糖添加量的增加,藜麦饼干的感官评分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绵白糖不仅能增加饼干的甜味,还能够提高面团的吸水率,使得面团更加柔软,容易成型。此外,在饼干焙烤的过程

中,绵白糖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使得饼干具有良好的色泽和口感。当绵白糖用量为 45g 时,感官评分最高(89 分),此时饼干具有均匀的色泽、适中的疏松度和甜度、细密的组织。当绵白糖用量大于 45 g 时,饼干甜度太高,色泽太深,口感比较差,导致饼干品质下降。因此,绵白糖的最佳用量为 45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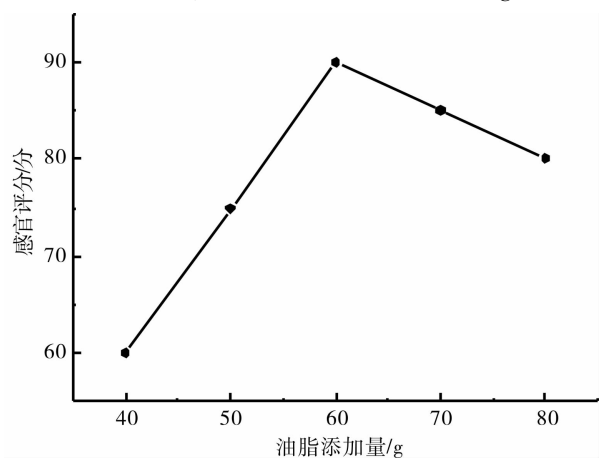


图1 黄油用量对藜麦饼干感官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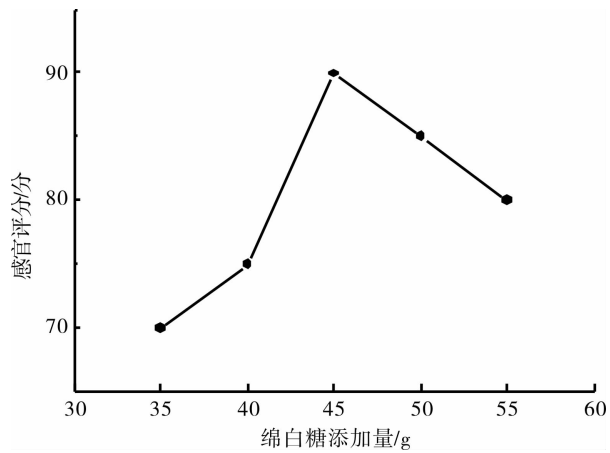


图2 绵白糖用量对藜麦饼干感官的影响

2.1.3 鸡蛋液添加量对藜麦饼干品质的影响

由图3可知,随着鸡蛋液添加量的增加,藜麦饼干的感官评分先升高后降低。当鸡蛋液用量为 30 g 时,藜麦饼干的感官评分达到顶峰(88 分)。鸡蛋液的添加能够影响饼干的脆性和口感,不加鸡蛋液的饼干容易分散,无法形成整体,一旦加入鸡蛋液,鸡蛋蛋白加热凝固失去水分较少,使得饼干成熟后体积增大,口感有一定弹性。加入鸡蛋液还可以赋予饼干制品脂肪、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因此,鸡蛋液的添加量为 30 g。

2.1.4 熟藜麦添加量对藜麦饼干品质的影响

图4显示熟藜麦添加量的改变对藜麦饼干品质有明显的影 响,但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随着熟藜麦添加量的增大,藜麦饼干的感官评分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熟藜麦添加量为 50g 时,藜麦

饼干的感官评分达到峰值(90 分)。加入藜麦的主要作用是提高酥性饼干的营养价值,熟藜麦的用量超过 50 g 时,饼干组织的横切面层次不清,会变得粗糙,口感变差,从而降低酥性饼干的质量^[14]。因此,选择熟藜麦添加量 50 g 为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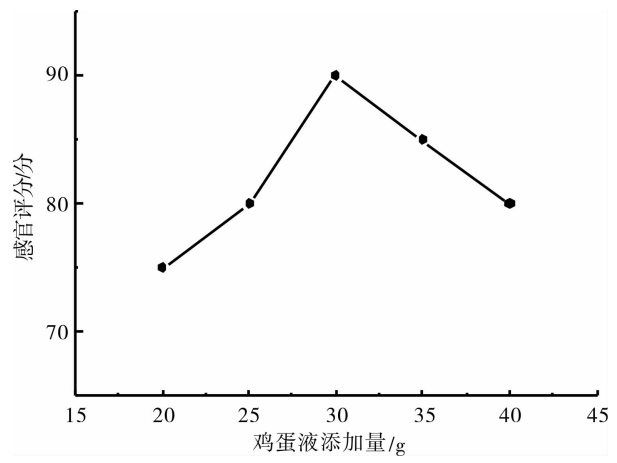


图3 鸡蛋液用量对藜麦饼干感官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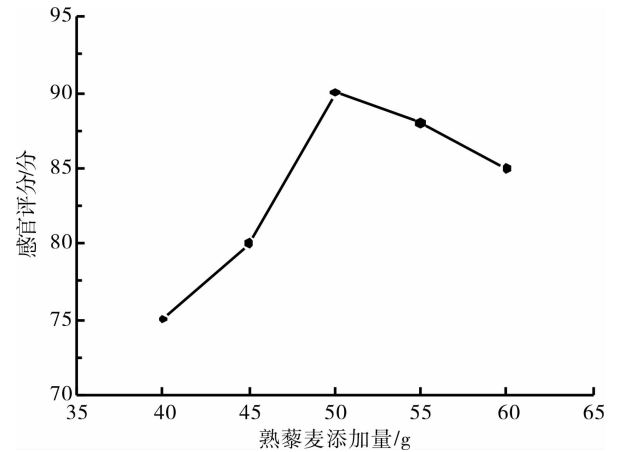


图4 熟藜麦用量对藜麦饼干口感的影响

2.2 正交试验结果

表3为藜麦饼干的正交试验结果。采用极差法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各试验因素对饼干感官品质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黄油、熟藜麦、鸡蛋液、绵白糖。以藜麦饼干感官评价为评判标准,配方最佳组合为 A₂B₃C₃D₂,即低筋面粉和全麦粉(9:1) 100 g,黄油 60 g,绵白糖 50 g,熟藜麦 55 g,鸡蛋液 30 g,全脂奶粉 6 g,小苏打 1 g,食盐 1 g。按此配方进行验证试验,重复 3 次,感官评分平均值为 90.11 分。在此工艺条件下,生产的藜麦饼干色泽均匀,无焦边,口感酥脆,具有浓郁的焙烤食品的香气,综合感官品质最好。

3 结论

采用单因素试验法确定黄油、熟藜麦、鸡蛋液、绵白糖的最佳添加量,采用正交试验对藜麦饼干的工艺配方进行了优化。结果表明,以 100 g 低筋面

粉和全麦粉(9:1)为基数,添加黄油 60 g,绵白糖 50 g,熟藜麦 55 g,鸡蛋液 30 g,全脂奶粉 6 g,小苏打 1 g,食盐 1 g,设置上火 170℃,下火 170℃,烘烤 20 min,在此条件下加工制作的藜麦饼干营养丰富、色泽均匀、口感酥松,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求。

表3 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因素				感官评分
	A	B	C	D	
1	1	1	1	1	72
2	1	2	2	2	75
3	1	3	3	3	78
4	2	1	2	3	80
5	2	2	3	2	90
6	2	3	1	1	82
7	3	1	3	2	85
8	3	2	1	3	79
9	3	3	2	1	86
K ₁	225	237	233	239	
K ₂	252	244	241	250	
K ₃	250	246	253	237	
R	27	9	20	13	
因素主次关系	A>C>D>B				
最优组合	A ₂ B ₃ C ₃ D ₂				

参考文献:

[1] 王晨静,赵习武,陆国权,等. 藜麦特性及开发利用研究进展[J]. 浙江农林大学学报,2014,31(2):296-301.
 [2] SCHLICK G, BUBENHEIM D L. Quinoa: an emerging "new" crop with potential for CELSS [D]. Washington: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1993.
 [3] FAO. Quinoa: an ancient crop to contribute to world food se-

curity [D]. Italy: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2011.
 [4] 杨发荣,黄杰,魏玉明,等. 藜麦生物学特性及应用[J]. 草业科学,2017,34(3):607-613.
 [5] ABUGOCH J L E. Quinoa (Chenopodium quinoa Willd.): composition, chemistry, nutritional and functional properties [J]. Advances in Food and Nutrition Research,2009,58: 1-31.
 [6] 孙芳. 藜麦饼干生产工艺的研究[J]. 粮食与油脂,2018,31(1):49-52.
 [7] 王黎明,马宁,李颂,等. 藜麦的营养价值及其应用前景[J]. 食品工业科技,2014,35(1):381-384,389.
 [8] TANG Y, LI X, ZHANG B, et al. Characterisation of phenolics, betanins and antioxidant activities in seeds of three chenopodium quinoa willd genotypes [J]. Food Chemistry, 2015, 166(1):380-388.
 [9] 魏志敏,李顺国,夏雪岩,等. 藜麦的特性及其发展建议[J]. 河北农业科学,2016,20(5):14-17.
 [10] 司波,曹玉发,陆洋,等. 无糖低热量魔芋饼干的配方优化[J]. 食品科技,2020,45(7),180-187.
 [11] 杨君,聂燕华,林丹琼. 高蛋白高膳食纤维豆渣饼干的研制[J]. 现代食品科技,2013,34(4):792-795.
 [12] 王文香,张香香,张秋红,等. 保健苏打饼干的研制[J]. 食品工业科技,2005,26(10):136-137.
 [13] 张素敏,段立昆,王晓闻. 酸枣酥性饼干的工艺研究[J]. 粮食与油脂,2019,32(12):49-52.
 [14] 王小平,雷激,孙曼兮. 麸皮酥性饼干制备的工艺优化[J]. 食品工业科技,2015,36(22):277-281.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tudy on the Technology of Quinoa Biscuit by Orthogonal Design

QIN Xiaozhuan, CHEN Xin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risp biscuit making technology, with the sensory score as the evaluation index, the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butter addition, soft sugar addition, quinoa addition and egg addition on the quality of quinoa crisp biscuit. Then the best formula of quinoa crisp biscuit was determined by the orthogonal optimization: based on 100 g low gluten flour and whole wheat flour (9:1), butter 60 g, soft sugar 50 g, cooked quinoa 55 g, eggs 30 g, whole milk powder 6 g, baking soda 1 g, salt 1 g. The flour fire was 170℃, the primer fire was 170℃. The baking time was 20 min.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nutrition, color and taste of the quinoa biscuit were good, which met the health needs of modern people.

Key words: quinoa biscuits; single factor test; orthogonal optimization method; sensory score